

回顾与反思  
苏联东欧问题译丛



# 摆脱克格勃

——克格勃最后一任主席回忆录

## Избавление от КГБ

〔俄〕瓦·巴卡京 著  
非 琴 译

Валдим  
Бакагин

仅供个人阅读研究所用，不得用于商业或其他非法目的。切勿在他处转发！

本电子书制作者

新 华 出 版 社

# 摆脱克格勃

——克格勃最后一任主席回忆录

[俄] 瓦季姆·巴卡京 著  
非 琴 译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摆脱克格勃——克格勃最后一任主席回忆录/ (俄) 巴卡京著;  
非琴译. -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8.8

(回顾与反思·苏联东欧问题译丛)

ISBN 7-5011-3958-X

I. 摆… II. ①巴… ②非… III. ①克格勃-概况 ②政治  
事件-苏联 IV. D751.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05384 号

**ИЗБАВЛЕНИЕ ОТ КГБ**

**Вадим Бакагин**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专有权由作者授予新华出版社

**摆脱克格勃**

——克格勃最后一任主席回忆录

(俄) 瓦季姆·巴卡京 著

非 琴 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照排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5 印张 5 张插页 185 千字

1998 年 8 月第一版 1998 年 8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ISBN 7-5011-3958-X/D·633 定价: 15.00 元 (内部发行)

(提请读者注意: 本书正版封底均贴有防伪标志)

# 目 录

前 言 .....	( 1 )
一、叛乱 .....	( 1 )
二、克格勃 .....	(14)
三、开始 .....	(46)
四、分解 .....	(66)
五、分权 .....	(88)
六、法制 .....	(109)
七、档案 .....	(125)
八、走向合作 .....	(148)
九、一百零七天 .....	(166)
十、联盟的终结 .....	(191)
十一、在议会里 .....	(209)
十二、旁观者的看法 .....	(216)

---

# 前 言

……绝望比希望更容易让人上当受骗。

——沃文纳尔格

明天是 1992 年 1 月 7 日——圣诞节<sup>①</sup>。

圣诞节是让人高兴的事吗？至少这是希望。应该有希望，应该有信心。希望和信心是存在的。只是需要找到它们。

莫斯科今天风很大。不知为什么，这一年没有用纸把窗框糊起来，八层楼上，风在窗外可怕地呼啸。窗帘轻轻地飘动着。阳台上有一个空硬纸箱在啪啪地响。明天是圣诞节。我坐在写字台前。我那几个可爱的小孙子从照片上关切地望着我。“怎么，爷爷，你又在写吗？”我又在写，又是“以前的”我——前克格勃的主席。

半年前我大致也是处于这样的心情之中。热天，6 月，敞着的阳台。我正在结束我写的一本小册子《摆脱幻想》。第一次尝试。那是回忆、文件和乐观主义的混合物。

现在要回忆的事情更多了。但是在肮脏的街道上、货架空空

<sup>①</sup> 东正教的圣诞节在旧历十二月二十五日，新历一月七日。

---

的商店里，在“自由化”的杂乱无章、普遍的冷漠和怨恨中，却看不到乐观的影子。就是在我自己身上，我也找不到乐观的踪迹。然而需要寻找。

1991年飞也似地过去了。“改革”的第七年，结果发现，对于“改革”这项政策，对于它的领袖，对于他的那一班子人来说，原来这竟是最后的一年。然而我认为，那些人——那些以为还可以拯救联盟、还可以拯救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哲学，认为这一年是错过最后机会的一年的人，是不正确的。

具有决定意义的这样一年是 1990 年。

和过去一样，我的根据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改革我们制度的最高任务在于改造它的基础，也就是改造它的经济。在于确定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企业家自由活动过渡的最佳途径。解决这一极其复杂的任务，是解决一切问题的钥匙。其余的一切——改革国家制度、政治结构等等，都是次要的。更确切些说，其重要程度从属于解决向市场过渡这一关键性的任务。

我们却一切恰好相反。就像懒惰的小学生总是把最难的作业留到明天去做一样，我们也是如此。1990年至少有两次错过了从远为有利的地位开始市场经济改革的机会。

第一次是在 4 月，结果发现，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内阁不能摆脱正统共产主义的思想束缚，不能提出一个真正有控制地向正常市场经济过渡的纲领。

第二次已经是戈尔巴乔夫阉割了众所周知的沙塔林——亚夫林斯基“五百天”计划的精髓。

归根结蒂，悲剧并不在于某项计划遭否决或被出卖。而在于，与此同时，“社会主义经营管理”的旧体制越来越威信扫地，越来越陷入混乱和无政府状态。除了空谈，除了一些精明的人在一场没有规则的游戏里迅猛地填补真空外，并没有任何东西来取

---

代这一旧的体制。

在这之后，经济加速走向崩溃。采取必要的措施变得越来越困难，越来越痛苦，已经谁也不想采取这样的步骤了。结果是经济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于是在政治中寻找“挽救的办法”。这样做比较容易。向“秩序和坚决果断”转变。找到了“罪人”——民主主义者。

如果要描述过去这一年的性质，那么只能说，这是错误政策和错觉政策的一年。从 1990 年底到 1991 年 8 月，采取了一些徒然的和毫无意义的措施，企图镇压、恐吓还十分脆弱的民主政治的萌芽。1 月是维尔纽斯。2 月是戈尔巴乔夫在明斯克的讲话。3 月里干的蠢事，是出动装甲运兵车、手持塑料盾牌、头戴塑料头盔的部队，向俄罗斯代表大会的代表示威。6 月里是部长们对联盟议员的恐吓。最后达到了顶点——8 月的闹剧，从而导致这一政策破产，连苏维埃制度的政治和思想柱石——苏共，也与之一同崩溃了。因为没有苏共，我们的党国已经不可能存在，所以它也就垮台了。强制的反动政策遭到了失败。

那么经济怎么样了呢？1991 年全年，经济增长速度继续急剧下降。而在 1992 年正在到来的法律、政治、组织、道德和思想的大混乱中，现在已经没有中心、没有协调一致的机构，正在诞生的独立国家联合体的领袖们，还是不得不回到被搁置起来的那项任务上来。不得不设法证明，他们有能力解决这项任务。大家一道，或者是每个人单独地解决这项任务。不过“每个人单独地”解决——这照例又是幻想。如果在 1992 年终于能出现服从经济任务的政治，也就是说，如果政治能获得健全的理智，那么正是在这里可以找到不可缺少的乐观主义。尤其是在圣诞节。

打网球的人有一种迷信说法：谁赢了第七盘，谁就赢了全局。一批新的俄罗斯政治家决定了自己的最低纲领，完全脱离了中央，以自己的方式赢得了“第七盘”（改革的第七年）。戈尔巴

---

乔夫离开了网球场。双打结束了。现在鲍里斯·叶利钦得单独打完这场网球，击败军事工业综合体，击败新布尔什维主义和新的骗子们，击败旧的官僚主义和坐享其成的心理，击败民粹主义和通货膨胀。只有明智地沿着有控制的途径通往市场经济，通往开放的新世界，通往民主社会，才能赢得胜利。我祝愿新的政治家们获得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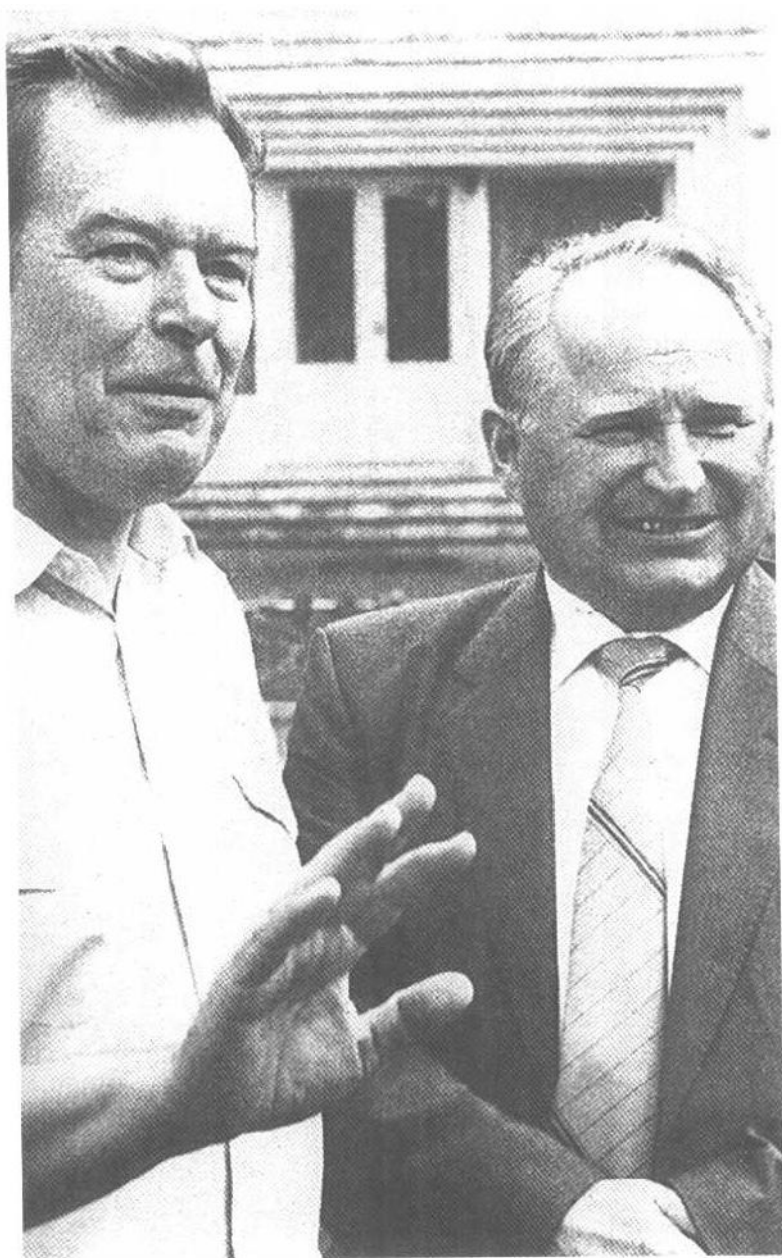
我在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班子里扮演的“角色”已经完成了使命。这“角色”是奇怪的，也很有意思。戈尔巴乔夫任命的州委书记中的第一个州委书记，不久又把他“调到”另一个部门。出乎意外地担任了内务部长，在民族爱国主义者们的坚决要求下，又同样出乎意外地、而不是合法地被戈尔巴乔夫免职，然后是政治局和克格勃。任命我为克格勃主席，更是无法预见的事，而主席的工作尚未好好地开始，就随着联盟的结束而告终了。

..... 1991年8月23日深夜我回到家里的时候，我的妻子柳德米拉泪流满面，在门口迎接我。我大概还从未见过她这样伤心和惊恐。“你怎么能答应呢？现在会怎样呢？怎么能在那里工作，今后将怎样生活呢？”她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她从电视新闻节目中得知，她的丈夫，瓦季姆·巴卡京，已由总统下令任命为苏联克格勃的主席.....对她来说，很难想像会有更为意外、更为可怕的消息了.....我好容易才让妻子放下心来。但是对她的问题我无法回答，大概现在也无法回答。“需要这样”。这就是全部逻辑。对这话，听到的是异常熟悉的回答：“你总是比大家都更需要。谁还需要这个？”.....

我无言以对。只不过在两天之前，才发生了一场叛乱。谁需要这个？



瓦季姆·巴卡京(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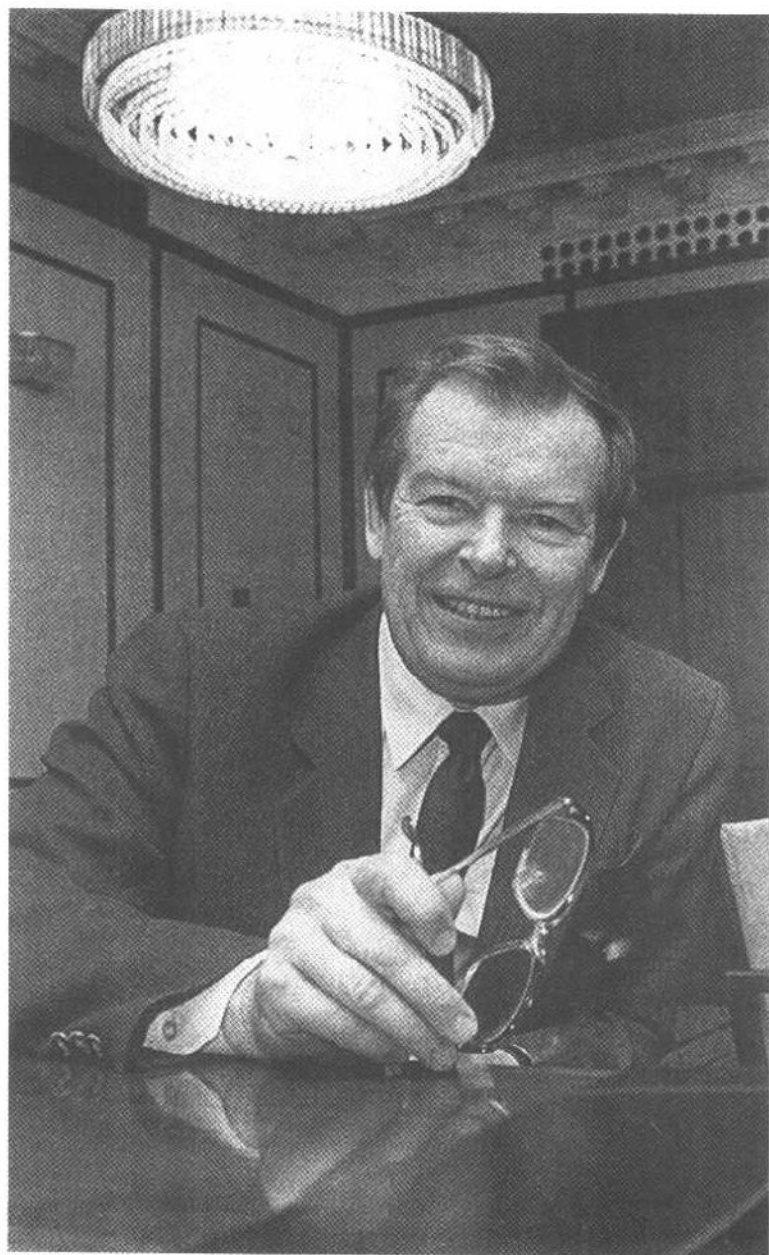
1986年,与基洛夫州“列宁之路”集体农庄  
主席亚历山大·切尔维亚科夫在一起。



1990年，在亚·亚科夫列夫处与法国内政部长若克斯谈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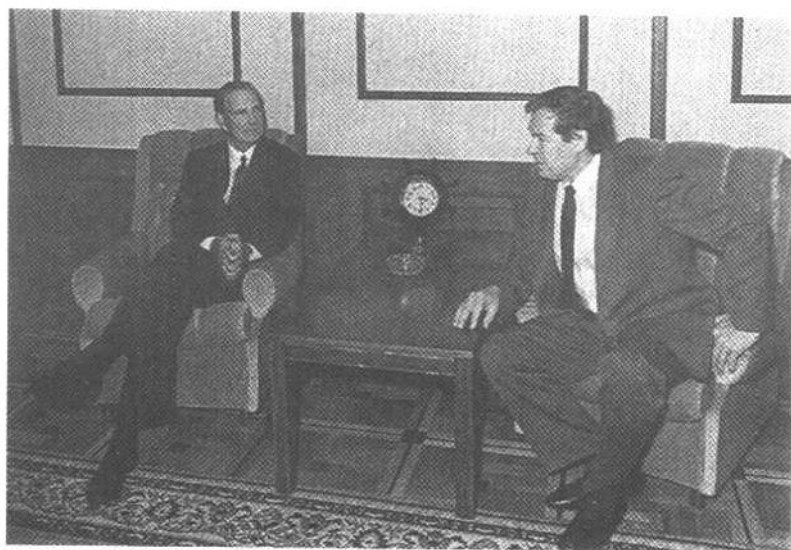
1991年10月，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司法部长金克尔会见。



瓦季姆·巴卡京近照



1990年，以苏联内务部部长身份访问乌克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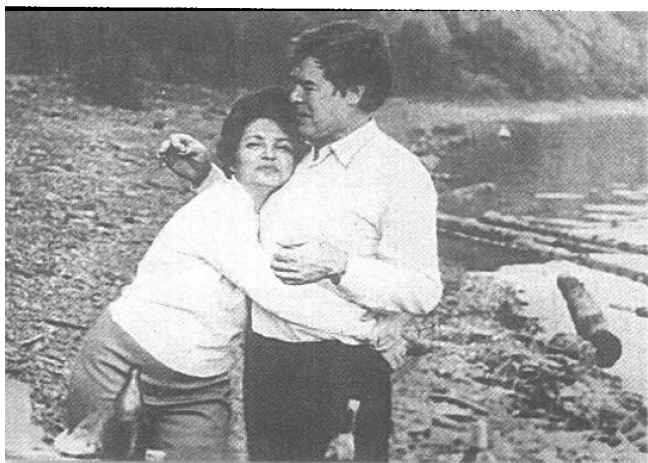


1991年9月，在克格勃与美国国务卿詹·贝克谈话。



◀1970年，瓦季姆·维克托罗维奇·巴卡京和母亲、舅舅。

▶1970年巴卡京一家：柳德米拉·安东诺芙娜（妻子），亚历山大（长子），德米特里（小儿子），瓦季姆·巴卡京。



◀休息时和妻子在一起。

## 一、叛乱

愚蠢的手段只适用于愚蠢的目的。

——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sup>①</sup>

8月19日早晨，妻子叫醒了我：“快点儿起来吧，出事了。”电视上一个神情庄重、俨乎其然的播音员在宣读卢基扬诺夫的声明。从最初一瞬间就有这样一种感觉——所发生的事情是十分荒谬的。立刻产生了一个想法，而且已经再也无法摆脱它：一件无可挽救的事情发生了，仿佛黑夜降临，而不会再有早晨。

在上班去的路上，司机安纳托利说，夜间，负有特殊任务的车库里，所有汽车都“出动了”，只有两辆小汽车——我的和文化部长尼古拉·列文科的汽车——没有开出去。

我到达克里姆林宫以后，头一件事就是去找戈尔巴乔夫的顾问格里戈里·列文科。头天晚上他才从佛洛斯克回来。除了他，还有谁会知道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发生了什么事呢？

我走进他的办公室。“戈尔巴乔夫怎么了？”一切正常，列

<sup>①</sup> 尼·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俄罗斯评论家，作家，学者，革命民主主义者，哲学家，19世纪60年代民主革命运动的领袖。

文科回答，“昨天早晨我和他谈过话。如果说有病，也只是脊神经根炎。就连这点儿病，也已经给他治疗过了。他打算回莫斯科。连飞机都预订好了。”

我从列文科那里直接去二楼见副总统根纳季·亚纳耶夫。他完全不像往常的样子：神经极端紧张，眼睛底下有一道黑圈，手上生了湿疹。他在办公室里不停地走来走去，不断地抽烟。“戈尔巴乔夫怎么了？”我问，“到底出了什么事？要知道，这是彻头彻尾的冒险！”瓦季姆·亚纳耶夫回答：“半夜四点钟把我从床上叫了起来，把我送到了这里，花了两个钟头说服我，我同意了，所有文件我都签了字。戈尔巴乔夫完全意志消沉了，什么也不明白，他已经不能控制自己。头天晚上他们在他那里。所以需要我来担负起管理国家的责任。这是正确的。”

副总统所作的全部解释，现在我已经记不得了，然而有一句话我永远也忘不了：“戈尔巴乔夫是绝对的法官”。听到这句话，我不由得打了个寒颤。我没听懂，又问了一遍：“法官是什么意思？”“啊，意志完全消沉了，他完全不能控制自己，不了解自己在做什么。”

我对他说，我不相信。戈尔巴乔夫身体健康。列文科刚刚证实了这一点。我站起来，往门口走去。亚纳耶夫跟在我后面。“等一等，”他说：“你别走。”不，这场赌博我不参加。”

回到自己办公室里，我给亚纳耶夫写了一份辞职申请书。“鉴于不同意以不符合宪法的方式解除苏联总统的职务，”申请书里写道，“我不认为还有可能履行安全委员会成员的职责。特此奉告。”我的秘书萨沙·德里亚德金把申请书送到了副总统的接待室里。

19日这个工作日过得有点儿忙乱。研究了那个自封的委员会的文件，在电话里与人交谈，在电话里接受采访。和萨沙一起把保险箱清理了一下，逐一翻阅了所有文件，有的撕掉了，有的

准备移交。

我不排除有可能逮捕我。

然而从叛乱一开始，我连一分钟也没怀疑过：阴谋者们的行动不合法。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宣布紧急状态的声明是不符合宪法的。我不相信戈尔巴乔夫病了。因为，如果当真病了，医生的正式结论呢？这是人人都懂得的道理。而现在，却完全是胡说八道。昨天总统身体还是健康的，今天却已经“意志消沉”了。而且宣布这一点的不是医生，而是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那时我最担心的唯一点，就是会对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使用暴力。因为既然阴谋家们已经采取极端措施，那就是说，为了证明自己的行动正确，他们可能让戈尔巴乔夫当真“生病”。

老实说，我个人感到有些不知所措。谴责是一回事。可是做什么呢？我想像不出，阴谋家们会走多远。根据他们的声明来看，他们的态度是十分坚决的。号召人们上街吗？街上已经布满了坦克。我觉得这是危险的，可能产生流血的后果。正在紧张地收获的时候，举行罢工吗？结果会怎样呢？

然而到傍晚，情况变了。国内局势变得十分紧张。国家总统的命运至今无人知晓。我屡次试图通过专线和他取得联系，回答都是：“线路不通。”我打电话问克留奇科夫：“怎样才能和总统取得联系？”他仿佛完全了解真实情况，非常客气而又婉转地回答：“请别着急。现在不行。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有病，不过很快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到那时您就可以和他谈话了……”

十分清楚，电视、广播、通讯社，都已被封锁。许多大众传播媒介都被禁止了。成千上万莫斯科人响应俄罗斯领导的号召，往俄罗斯议会大厦走去，以捍卫民主，保卫自由。“白宫”周围筑起了街垒。

解散安全委员会的决定是违反宪法的。我怎么办呢？一走了事吗？好像不该这样。决定以安全委员会一个成员的身份出来发

言，不承认停止委员会活动的决议。

第二天，刚一来到克里姆林宫，我给亚纳耶夫写了一份新的声明。“昨天早晨我曾通知您，由于不同意以违反宪法的方式罢免苏联总统米·谢·戈尔巴乔夫，我已不可能履行安全委员会成员的职责。据我理解，在组成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那批人决定暂时停止安全委员会活动之后，我昨天的声明今天已经毫无意义。

“我认为，您非常清楚，‘苏联领导’委以治理国家重任的这一违宪机构所作的这一决定是违反宪法的，其实，它所作的其他决定也都一样。

“和从前一样，我无意也无权参加新建立的机构的违宪活动，也不能承认这些机构‘暂时停止’合法机构活动的决定具有合法效力。我只能请求您运用自己的影响，使 8 月 18 日开始的国家政变不至导致流血和大规模牺牲。趁为时未晚，必须好好考虑，不要走得太远。应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军队返回军营，让米·谢·戈尔巴乔夫恢复自由。您还有一次历史性的机会，您不应错过这一良机。”

通过亚纳耶夫的秘书处送出这一声明以后，我就到普里马科夫的办公室去了。他那里不止他一个人。科学工业联合会主席阿尔卡季·沃利斯基也在那里。我建议，对所发生的事件发表一个联合声明，通过塔斯社转发出去。我们商议了一下，该怎样做最好。普里马科夫突然说：“这样吧，最好每人各自发表自己的声明。”老实说，我觉得这有点儿奇怪，于是从他的办公室走了出去，甚至没跟他告别。显然，我这一走对普里马科夫产生了某些影响。几分钟以后，他和沃利斯基来到我的办公室里，带来了已经拟好的我们的共同声明：“我们认为，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把国家权力交给一批人，是违反宪法的。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苏联总统米·谢·戈尔巴乔夫身体健康。作为安全委员会的成员，我

们有责任要求立刻从各城市街道上撤走装甲部队，尽一切可能，不允许发生流血事件。我们也要求保证米·谢·戈尔巴乔夫的个人安全，让他有可能立刻公开发表讲话。”

在把声明转交给报道机关之前，我们决定先与亚历山大·别斯梅尔特内赫取得联系。我们认为，如果声明上再有外交部长的签字，一定会使这份声明具有更重要的意义。普里马科夫直接从我的办公室出去，找到了别斯梅尔特内赫。“萨沙<sup>①</sup>，”他说，“您瞧，我和巴卡京写了这样一个声明。我念给你听听……你对这有什么看法？”别斯梅尔特内赫借口必须保持外交方针的连续性，说他不应该在这份声明上签字。我们决定就这样把只有两个人签名的声明转送出去。普里马科夫给塔斯社打了个电话，但是对他的回答是：类似的文件目前未必能够转发出去。于是沃利斯基拿走了这份文件，说要通过国际传真的途径散发出去。几小时以后，我们的声明在广播中播出了。

晚上，俄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尼古拉·斯托利亚罗夫从“白宫”打电话来。“瓦季姆·维克托罗维奇，”他对我说：“我是从鲁茨科依的办公室里和您说话。亚历山大·弗拉季米罗维奇请您设法影响亚佐夫元帅。我们知道，军队准备冲击俄罗斯议会大厦。请您试试看，劝说国防部长不要这样做。我们这儿的人已经武装起来了。可能流大量的血。”我答应实现俄罗斯副总统的请求，立刻拨了亚佐夫元帅的电话号码。他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德米特里·季莫菲耶维奇，”我说：“您的登陆人员打算冲击‘白宫’。请您拒绝这样做。”瓦季姆·维克托罗维奇，“亚佐夫回答，“我和您早就认识。难道您认为我会允许登陆人员冲击‘白宫’吗？我保证：任何冲击都不会发生。”

不知为什么，我觉得，亚佐夫和我说话是开诚布公的。当时

<sup>①</sup> 萨沙是亚历山大的小名。

我也不相信登陆部队会用来冲击“白宫”。我给鲁茨科依打了电话。接电话的是斯托利亚罗夫。“您听我说，”我对他说，“与亚佐夫谈过以后，给我的印象是：登陆部队不会冲击‘白宫’。至少是亚佐夫答应我不会这样做。”

第二天早晨，我和妻子必须到城外去。天气很坏。下着倾盆大雨。道路上发生阻塞。将近 1 点钟的时候，好容易才到了环城公路。突然汽车里的电话响了。我拿起听筒。是叶利钦。“瓦季姆·维克托罗维奇，”他说，“您最好能到‘白宫’来。问题是，克留奇科夫答应 1 点钟前来参加会议。代表们要求他来作解释。鉴于您和普里马科夫昨天发表的声明，作为安全委员会的成员，您最好能在克留奇科夫以后发言。这将会非常有益。此外，我和克留奇科夫已经达成协议，晚上 6 点钟和他一起乘飞机去见戈尔巴乔夫。可是会议不想让我去，显然，这是危险的。”

我也认为，这是危险的。“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我回答，“最好是让我去，让普里马科夫去，您却不该去。而在会议上发言这我同意。”

接近“白宫”的道路全都给堵住了。我把汽车停在加里宁大街上，徒步往前走去。那个阴雨天已经过去好几个月了，但是当时的感觉我却记得十分清楚，仿佛这就是昨天的事。这样深刻的印象，说实在的，我这一生中还不多见。

成千上万的人——湿透的上衣上佩戴着勋章绶带的老兵宿将，衣袖上戴着红蓝白三色袖箍的大学生，冷得发抖的妇女和小学生们——大家都瞅着我。还是只不过我觉得好像在瞅着我呢？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在他们面前我是有罪的。穿过“白宫”保卫者构成的人的走廊时，我预期会受到责备，然而他们却和我握手，对我微笑，帮助我越过障碍物。

在“白宫”里，我好久都找不到叶利钦的办公室，因为我不是从通常所走的入口进来的。一些民警帮着我找，后来有一位好

心的妇女终于指给我看，该怎么走。

国务秘书根纳季·布尔布利斯也在叶利钦的办公室里。

“克留奇科夫欺骗了我们，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说；他不来参加会议了。根据我们的情报，他们准备飞往克里米亚，去见戈尔巴乔夫。”“这样的话，我发言还有没有意义呢？”我问叶利钦。“当然，”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回答，“您必须发言。”

那时候叶利钦看上去满怀信心，沉着镇定，让人感到他有某种发自内心的力量。一般说，我敬佩他的勇气、决心和行动，这一切让人毫不怀疑，俄罗斯必胜。在他当选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之后，显示出他有作为一个政治家的一些新品质，在发生叛乱的那几天，这些品质更充分表现了出来。他成了名副其实的自由俄罗斯的第一任总统。

与鲁斯兰·哈斯布拉托夫商定，休息之后让我发言。我对俄罗斯代表的呼吁不会有什么新奇的东西。我说，不能容许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利用议会，使它的政策合法化。只有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代表能够阻止它这样做。我谈到，在这件事上，俄罗斯的代表们可以起什么作用。我说，十分重要的是，不能容许挑动人们的激情，而只能按法律行事。然而，就我现在所记得的情况来看，我虽然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同时我的讲话中还是有太多的激情。

我刚刚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下，就接到了俄罗斯总理伊万·西拉耶夫的一张条子。他希望与我紧急会见。几分钟后我到了他的办公室里。西拉耶夫已经知道我想去佛洛斯角会见苏联总统。他通知我，预订了 16 点 30 分的飞机。我们从伏努科沃二号机场起飞。我答应决不迟到。

但这时通知我，阿尔卡季·沃利斯基正急于找到我。我给他打了个电话。“瓦季姆，”他对着话筒大声叫喊，“我和普里马科夫决定举行一次小型记者招待会。你来吧。我恳求你！”“我不能

去，”我回答，“我和西拉耶夫很快就要飞往佛罗斯角。我只不过是担心我来不及。”来得及，”沃利斯基说；“这只要一分钟。”我不能拒绝阿尔卡季的要求，乘车疾驰，赶去参加记者招待会。普里马科夫讲话的时候，有人叫我去接电话。西拉耶夫说，他已经动身去机场了。我对记者们解释说，我要赶不上飞机了，于是急忙上了汽车。

从莫斯科去伏努科沃的路上有坦克行进。很多坦克。坦克用强有力的履带把滑溜溜的稀泥抛洒到沥青路面上。排出的废气犹如淡蓝色的云，形成一片刺鼻的烟雾，笼罩了路面。尽管司机把汽车开得飞快，我们还是迟到了。幸好西拉耶夫的助手有人通过专线预先通知了我们，飞机不是从伏努科沃二号机场，而是从伏努科沃一号机场起飞。

伏努科沃一号是民航机场。成千上万的人，成百上千辆小汽车。好容易挤到“代表”候机大厅。飞机已经准备起飞。舷梯撤掉了。涡轮机已经开动起来。这里有许多记者，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要求带他去克里米亚。可是我自己都差点儿没赶上飞机，怎么能带他们呢。我挤到一个地勤机械师跟前，拿过他的有通讯装置的头盔，力图压倒发动机的吼声，对驾驶员高声叫喊：“请您去叫西拉耶夫，告诉他，请关掉发动机，放下舷梯。”当然，这一“请求”看来是很好笑的，然而舷梯还是放下来了，我和普里马科夫摆脱了记者们，勉强挤进了机舱门。

飞机上有俄罗斯副总统鲁茨科依和几名携带武器的军官，总理伊·西拉耶夫，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内务部副部长阿·杜纳耶夫将军，几位俄罗斯代表，法国大使馆一等秘书佩斯西克，还有一些记者。一开始就在谈论，怎样才能把戈尔巴乔夫救出来。出主意的人很多。我没插嘴，因为我一向认为，凡事都应该由一个人来领导。在这种情况下，职业军人、参加过阿富汗战争的宿将、亚历山大·鲁茨科依上校就成了这样的一位领导人。他从我这里接

受的唯一建议就是，无论采取什么办法，在任何情况之下，都绝对不能携带武器去戈尔巴乔夫的别墅。

经过莫斯科的阴雨天气之后，克里米亚 8 月的晚上让人感到，这简直就是幸福。甚至不会相信，某处大街上布满了军队，在离我们飞机降落的军用机场只有几公里远的地方，苏联总统和外界完全隔离已经有整整两天了。我和佩斯西克先生同乘一辆汽车从机场出发。我和他是老相识了。我跟他谈克里米亚，谈我们正在经过的、我熟悉的那些地方。但是我们内心里一直非常紧张。根据我们得到的情报，阴谋者们已经在总统的官邸里了。他们要做什么？为了挽救自己，他们会采取什么措施？当时我们认为，什么事情他们都做得出来。

在戈尔巴乔夫的官邸前，让我们的汽车停了下来。我一看，都是熟悉的面孔，克格勃警卫队长尤里·普列汉诺夫将军，副队长维亚切斯拉夫·格涅拉洛夫。我们被告知，汽车不能再往前开了。只好步行。夜，路灯亮着。走在前面的是伊万·西拉耶夫，亚历山大·鲁茨科依，几位代表，我和普里马科夫跟在后面。路上，在一座楼房旁看到了克留奇科夫，亚佐夫，巴克拉诺夫。他们正站在一盏路灯下谈话。看到我们，他们都转过脸去。只有克留奇科夫打了个招呼。

在别墅附近，手持冲锋枪的总统卫队迎上前来。小伙子们的神情相当坚决，然而根据一切迹象来看，他们已经知道我们是来干什么的了。让我们进去了，并且告诉我们，戈尔巴乔夫这就下来。他出来接见我们时，穿一件家常穿的高领绒线衫，晒黑了，和往常一样，精神饱满。这是幸福的瞬间。爱戴和激情犹如火山爆发，急忙互相交换情报。戈尔巴乔夫谈了他两天来遭到软禁的情况，我们自然谈了这两天里莫斯科发生的事情，对这次叛乱，世界上有什么议论。鲁茨科依立刻要求，我们要一道坐我们的飞机回首都去，与阴谋者们不要有任何接触。“我决不和他们当中

的任何人谈话，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表示同意。“我只接见卢基扬诺夫。”

这次会见我也在场。卢基扬诺夫看上去样子不大好看。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需要进行一次困难的谈话，不仅是与苏联总统，而且是与一个和他几乎有 40 年友谊的人谈话。“你怎么能这样？”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开始说。“我连想都不敢想，你竟会这样，可结果是，你也站到那边去了吗？”安纳托利·伊万诺维奇开始辩解。他说，您怎么敢这样想呢！总之，这和我毫不相干！是我让坦克撤出了莫斯科……“那你的声明呢？”戈尔巴乔夫问。“声明我已经早就写好了，”卢基扬诺夫回答。总之，就这样，没能进行认真的谈话，不知怎么，一切都像小孩子那样。一个在责难，另一个在辩解。我勉强忍住，没有“插”话。

短暂地收拾了一下东西，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和他全家乘坐政府的装甲汽车驶往比什克克军用机场。随后我们也动身了。我们心情振奋，感到十分幸福。

我们乘同一架飞机回莫斯科，我竟差点儿又没赶上这架飞机。总统，他的夫人拉伊莎·马克西莫芙娜，他们的女儿伊琳娜，女婿安纳托利，伊万·西拉耶夫，亚历山大·鲁茨科依，叶甫根尼·普里马科夫——我们大家围坐在同一张桌边，举杯祝酒，为了俄罗斯人，为了幸运地获救，为了现在事情将要顺利解决，为了这些天来也经受了苦难的妇女们，干杯。

大概，很多人都记得电视实况转播在机场上欢迎从佛洛角软禁中归来的戈尔巴乔夫的那些镜头。列队站在舷梯旁的自动枪手。总统的亲属们疲倦的脸。充满未知因素的莫斯科之夜。但是对于那时候站在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身边的我们大家来说，有一点却十分明显：这场冒险和这次在克里米亚的软禁，已经使国家和总统的整个生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不确定的情况结束了。一切思想束缚都打破了。现在他已经成了完全不同的另一个

人，另一个政治家。叛乱被挫败了，阴谋者们给逮捕起来，但是谁也不知道，明天对我们将预示着什么。

好像是在星期四中午 12 点，总统召集了一次会议。照我看，大家还都没摆脱所发生的事件。每个人都习惯地和人谈自己的回忆，议论失败的阴谋的某些细节。但是基本上所谈的已经是未来了：怎样摆脱业已形成的局面，什么时候召开联邦苏维埃会议，在记者招待会上戈尔巴乔夫该说些什么。谈话有点儿杂乱无章，能够记住的内容不多。我只记得，亚历山大·亚科夫列夫劝说总统发言时要做自我批评，承认自己的某些错误。让我感到非常担心的是，恰恰是在今天，总统不想在俄罗斯议会上作简短和坦率的发言。我觉得，结果是，当时我们都没能很好地完成作为戈尔巴乔夫顾问的任务。他的发言没有怎么考虑到三天来已经发生了革命性转变的国内政治情绪。于是他又开始丧失了时间。

8 月 23 日早晨，星期五，有一位不寻常的客人来我家里找我。他是来自克格勃特别分队“阿尔法”的一位少校。他说，在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总统鲍里斯·叶利钦从阿拉木图回来以后，“阿尔法”全副作战装备，从清晨 4 点起对总统的别墅进行监视。最初有命令，在契卡洛夫军用机场逮捕叶利钦，但是不知由于什么原因，他们没能完成这一计划。于是接着下达了包围别墅的命令。他们看到，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怎样进到屋里，一清早怎样去上班。后来才弄清，逮捕叶利钦的命令之所以没有执行，是由于分队的领导意见不一致。“阿尔法”的一个副队长卡尔普欣将军坚持要逮捕叶利钦。另外两个队长反对。20 日，通过多种通讯渠道又把“阿尔法”全体人员召集起来，但是他们弄清情况以后，拒绝参加任何行动。在我们谈话的最后，少校对我说，“阿尔法”的小伙子们的意见，认为这个特别分队应该服从苏联总统本人，而不应该服从国家安全委员会。

过了一些时候，我给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打了个电话，

把谈话的内容转告了他。戈尔巴乔夫同意把“阿尔法”编入负责总统安全的人员之中。他请求为此准备好必要的文件，同时也要了解清楚，叛乱时是谁在制定“阿尔法”的行动计划。

我布置了相应的任务，为此我必须驱车外出。突然，汽车里电话响了。打电话来的是空军司令叶甫根尼·沙波什尼科夫。“瓦季姆·维克托罗维奇，”他说，“我不知道该给谁打电话，该跟谁商议。我想采取一项使空军非政治化和非党化的决定。全体领导人员也都同意这个意见。您认为怎么样？”“我不便于向您提出任何建议，”我回答沙波什尼科夫，“不过，我认为，您作出了正确决定。”

刚把汽车转往克里姆林宫，电话又响了。这一次是总统。“你把文件准备好了吗？”他问。只好解释说，我很快就会把文件交给他。从“阿尔法”来的军官们已经在克里姆林宫等着我了。我们又讨论了把这个特别分队划归总统安全部门管辖的方案。在我们打印必要的文件的时候，从戈尔巴乔夫的会客室里打来了好几次电话，催促我，说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早就在等着我了。

下午 2 点，我走进苏联总统的会客室。沙波什尼科夫迎面走来。我还不知道，刚刚已经任命他为国防部长。

一张大桌子前坐着各加盟共和国的各位总统，戈尔巴乔夫坐在主席坐的扶手椅上，他左边的座位空着。“瓦季姆·维克托罗维奇，”总统说，“我们现在共同决定，提议由您来领导国家安全委员会。”说实在的，我很平静地接受了这个提议。“当然，对我来说，这很出乎意外，”我对总统们说。“不过我认为，这样的职务最好由另外的人选担任。”什么人？”戈尔巴乔夫问。“我提议苏联最高苏维埃安全事务委员会主席尤里·雷若夫，”我回答。“尤里·雷若夫是个很好的人选，不过他得不到足够的支持。要知道，重要的是得让我们大家都支持他。”你们大家都会支持我吗？我问总统们。“当然啦，”他们回答；“我们都会支持您。”只不

过 要知道 你们是把 我派到这样一个机构里去，”我说，“照我看，一般说来 这个机构应该予以解散。” 那么我们就委托您执行这一任务，”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回答，并且建议把这一点也写进命令里去。 戈尔巴乔夫在任命我的决定里写上了第二点，内容是，我应该提出根本改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建议。

在会客室迎接我的是委员会代主席、克格勃第一总局局长舍巴尔申将军。“我们立刻就去吗？”他问。“请指定于下午 3 点召开委员会会议，”我回答，“我自己去。”

## 二、克格勃

……如果你们把断头台放在最重要的地位，而且是那么欢欣鼓舞地这样做，那么这仅仅是因为，砍头是最容易的，而要有思想，却比什么都难！

——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sup>①</sup>

为了要消灭它，我要去领导的这个机构，不仅享有不可动摇和当之无愧的共产党惩罚之剑的声誉，而且它本身就能消灭任何人和任何事物。克格勃及其前身全俄肃反委员会（契卡）、国家政治保安局（格普乌）、国家政治保安总部（奥格普乌）、内务人民委员部（恩克夫德）、人民安全委员会（恩克格勃）、国家保安部（姆格勃），构成极权制度的基础，没有这一基础，这个制度简直就不可能存在。当然，改革时期的克格勃曾试图改善自己的形象，使它看上去能有较高的威望，但是长期来种种秘密暴行和不法行为阻碍了这一企图的实现。直到目前，它一直是一个国中之国——尽管它正日益失去它掌握的主要武器，而凭借这一武器，它曾试图迫使人们相信那些他们并不相信的事情。对于许多

<sup>①</sup>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俄罗斯著名作家。

以前列入干部名册的团和党的工作人员来说，到克格勃去工作，曾经是他们幻想的顶点。但是这个机构却从来也没受到我很大的尊敬。尽管青年时代我认识一些“肃反工作人员”，我不但尊敬他们，而且爱戴他们。至今仍然敬爱他们，尽管他们早已不在人世了。弗拉季斯拉夫·伊万诺维奇·阿廖申和维克托·伊万诺维奇·波波夫，都是以人的面貌出现的“肃反工作人员”。

《绝密》月报有一期在封面上刊登了克格勃历届主席的照片：捷尔任斯基、缅任斯基、亚戈达、叶若夫、贝利亚、梅尔库洛夫、阿巴库莫夫、谢罗夫、谢列平、谢米恰斯特内、安德罗波夫、切勃里科夫、克留奇科夫。我是第十四任。老实说，参加这种“展览”，无论过去和现在，我都不认为是一件愉快的事。使我感到鼓舞的是：我应该成为进入这一肖像画廊的最后一个人，这一画廊是由全俄肃反委员会的父亲和奠基人、“钢铁意志的”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的圣像开创的，当我以新的身份进入卢比扬广场上那座世界闻名的大楼时，捷尔任斯基的纪念像仍然耸立在这座大楼前面。

十月革命后建立的镇压体系，从它迈出最初几步的时候起，就包含有迅速发展起来的为所欲为和不道德的萌芽，而这些因素又以革命的坚定性逐渐固定了下来。虽然“全俄肃反委员会”于1917年12月初成立的时候是为了与阴谋破坏和土匪活动作斗争，然而很快它的职权就扩展为“肃清反革命”了，而“反革命”的含意是极广的。为合法地保卫革命、针对革命现实敌人的阴谋而举起的利剑，结果竟举到了全社会的头上。布尔什维主义的领袖们把阶级斗争——一种“布尔什维克的雅各宾主义”<sup>①</sup>——提高到首要地位，把作为政权工具的国家的意义绝对化了，在国家中给惩罚工具指定了一个特殊的位置。全俄肃反委

① 雅各宾主义——指1793—1794年法国雅各宾党人实行的革命专政。

员会的机构好似天罗地网布满全国，控制了一切军事的和非军事的机关。经党准许，全俄肃反委员会随心所欲地进行逮捕、侦查、作出判决并执行判决、大规模枪杀“人质”，把恐怖和不法行为提高到了国策的高度。

经过以后几代苏共思想家和寄生于“犯罪—爱国主义”浪漫主义作品的政论家们修饰和润色，终于最后定形的一种特殊思想体系——“契卡主义”从那个革命的专横时期就已经初露端倪了。

事实证明，这一思想体系比产生它的那些机构具有更顽强的生命力。不仅如此，在党的惩罚机构——从全俄肃反委员会到克格勃——存在的全部时间里，这种思想体系在群众中还获得某种程度的同情，受到一定的欢迎，尽管这些机构本身会在人们心中引起——说得委婉一些——恐惧。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当然是我们传统的双重标准。至今还没有任何人充分了解克格勃全部秘密活动的实质。而那些甜得腻人的“关于侦察员”的英雄故事——多集电视系列片在群众思想意识里永远留下的成见，却怎么也无法清除出去。实际上“契卡主义”思想体系以及肃反工作人员，与侦察员都毫无共同之处。

以人民的名义“保护”人民，与人民的“敌人”斗争，这种从人民那里篡夺来的权力，是由不得人民作主的。不是由人民，而是由党来确定，谁是敌人，敌人是永远需要的。没有敌人的话，这种体系就会变得毫无意义。因此，“契卡主义”，这就是根据一个臆造出来的方便公式，经常不断地寻找敌人：“谁不跟我们一道，谁就是我们的敌人。”“契卡主义”，这就是经常不断、不受任何限制地侦查和以暴力镇压每一个人，只要他不能纳入布尔什维克党思想体系那个僵硬的模式。特工机关的思想体系不是与法律，而是与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完全融合，这就是“契卡主义”。

还在国内战争年代，这种融合就由党中央的一个特别决定予以确认，决定责成部队中的全体共产党员，以后又责成运输部门里的全体共产党员，必须担任全俄肃反委员会和军队中特务科的情报员。1919 年决定建造第一批集中营，但伪善地称之为“劳动学校”。

随着国内战争的停止，肃反委员会改组为国家政治保安局（格普乌），隶属于内务人民委员部。然而向正常法制系统的过渡，事实上并未实现。这个本来设想只是暂时的非常部门，简直变成了经常和制度化的固定机构。

大概认为当真有人设想这个部门是“暂时的”，那就是天真的想法了。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基本原理，在剥夺剥夺者之后，直到国家消亡，整个这段时间里，国家都是必需的。而且除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种国家不可能是其他任何形式。为了实行专政，不仅必需有权力机构，而且必需有惩罚机构。于是按照这一理论建立了这样的机构。而它们叫什么名称，这无关紧要。然而无产阶级专政很快变成了一党专政，一党专政又逐渐变成了“个人专政”。

正是格普乌成了斯大林借以确立其个人专权制度的主要工具之一。让格普乌担负起了实行农业集体化的主要任务：格普乌的代表参加了消灭富农阶级的“三人领导小组”，它的部队为驱逐被没收财产的富农提供了保证。在组织对“资产阶级专家”进行第一批示范审讯的过程中，格普乌曾起过巨大的作用；这些“资产阶级专家”其实都是生产部门管理技术的知识分子，为了把经济困难归咎于“阶级敌人”的阴谋，指控这些知识分子从事暗中破坏的间谍活动。

为了加强专政，臆造出了可悲的众所周知的、斯大林的论点：随着社会主义向完全胜利逐渐推进，阶级斗争也将逐渐激化。它是 30 年代镇压政策的基础，当时大规模的恐怖行动达到

了顶点。异端受到了无情的迫害。那些最优秀、最卓越的人，与那种思想一致的平凡体系无法协调，所以都被消灭了，即使他们对“各族人民的领袖”俯首听命，也不例外。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其天才的预见在不朽的《恶魔》中所描绘的那种制度变成了现实：“在他那里，社会的每个成员都互相监视，而且有义务告密。每一个人都属于大家，大家也属于每一个人。就所处的奴隶地位来说，所有奴隶都是平等的。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诽谤和谋杀，但主要是平等……不需要有较高的才能！有较高才能的人总是会攫取权力，成为暴君，把人引入歧途，其危害远远超过他们所带来的好处，他们不是被流放，就是被处决。西塞罗<sup>①</sup>被割掉舌头，哥白尼<sup>②</sup>被剜掉眼睛，向莎士比亚投掷石头……”

对于那些莎士比亚们、西塞罗们以及只不过是具有独立思想的人，斯大林那里已经为他们准备好了国家政治保安总部集中营管理局，30年代初改名为集中营总管理局——古拉格。1930年被关押的有1.7万人，1940年将近两百万人；几十万人被枪杀……人民自己成了“人民的敌人”。

国家安全机构的工作是由斯大林本人控制的。1934年成立了全苏内务人民委员部，由亚戈达领导的国家政治保安总部划归内务人民委员部管辖，从那以后，镇压机器就全速运转起来。建筑工程中的任何计算错误，技术上的任何差错，铁路上的任何一次事故，财政文件中任何一个不确切的数字，都被解释为“反革命破坏活动”。制造了大量“间谍”和“恐怖分子”案件。几乎没有一个稍为重要的国家，“人民的敌人”不曾为之效劳，为它“从事间谍活动”。由对季诺维耶夫和卡缅涅夫的诉讼程序开始。

① 西塞罗（纪元前106—纪元前43），古罗马著名演说家，作家，政治活动家。

② 哥白尼（1473—1543），波兰著名天文学家。

对一大批国家、党和军事活动家的大规模镇压，在很多方面使国家、军队在可怕的反法西斯战争初期失去了领导人。

斯大林害怕让自己那些暴行的目击者和执行者活在人间。镇压的浪潮也落到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头上。那些不接受血腥游戏规则的正直工作人员，以及那些刽子手本人，也都成了刽子手的牺牲品。内务人民委员部里的定期清洗并没有改变这个机构的本质，而只不过是使它变得更加残酷。根据亚戈达及其助手以前采用过的脚本，由尼古拉·叶若夫执行，消灭了亚戈达和他的助手们 这件事使 1937 年变成了一个普通名词，变成了全体人民悲剧的象征。

在 1938 年屈指可数的几个月里，由于政治原因而被捕的人数增长了九倍，监狱人满为患。国家安全机构决定采用刑讯的办法。谁也不能感到自己是安全的。恐怖在苏联蔓延。而且不仅仅是在苏联，共产国际的各国共产党，只要它们的代表驻在莫斯科，没有哪一个党能够逃脱致命的打击，特别是波兰、德国、南斯拉夫、匈牙利的党，受到了更大的损害。在这以后，又到了消灭踪迹的时期，消灭刽子手和那些伪造罪证的人。

.....在我面前，桌子上放着与完全不算太远的 40 年代有关的两份档案。其中一份，第 510 号案件，是从 1939 年 6 月 13 日开始的对叶若夫的控诉，在调查表的“职业和专长”这一栏里写着：裁缝，钳工；在“教育程度”这一栏里写着：没有受完初等教育。地球的六分之一陆地上，任何一个人的生命都取决于他的一句话。这个杀害了数万人的凶手被控犯了什么罪呢？叶若夫被控“是党内的两面派，最初曾参加以什利亚普尼科夫为首的‘工人反对派’，后来 1928—1929）与托洛茨基组织的领导人皮亚塔科夫和马里亚辛有了罪恶勾结，进行反对联共（布）和苏联的斗争。”除此而外，叶若夫还被控为波兰、德国和英国效劳，“从事敌视苏联的间谍活动”，是“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和部队中一

个阴谋家组织”的领导，在“苏联各级党政军及其他机关里”安插“间谍和阴谋家的干部”，消灭忠于党的干部，削弱苏联强大的军事力量，准备在苏联发动政变，策划在红场上举行游行的时候暗杀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从事加速击溃中国民族武装力量的阴谋活动，以便“日本人较为容易侵占中国，从而为日本人进攻苏联远东准备条件”，布置杀害那些不合他的心意、“能揭露他的卑鄙和背叛活动”的人；最后，指控他搞同性恋，嗜好男色。在法庭上，叶若夫否认了他曾在预审时承认的指控，同时宣称，他犯有“一些可以枪毙我的罪行”。这是些什么罪行呢？

“我清洗了 1.4 万名肃反工作人员，”叶若夫说，“但是我犯下的一项大罪是清洗得太少了……我给一个部门的这一个或那一个领导布置任务，让他审讯某一个被捕的人，同时我心中却暗想：‘今天你审问他，明天我就要逮捕你。’我周围都是人民的敌人，我的敌人。我到处清洗肃反工作人员。只有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北高加索没有进行清洗。我认为他们是忠实的，事实上却是，我在自己的羽翼下隐藏了一批破坏分子、暗害分子、间谍和其他形形色色的人民的敌人。”

一场荒谬绝伦的血腥的戏剧……叶若夫被枪决了。瞧，就是这样一些心理变态的人主宰了国家的命运，他们既是法官，又是刽子手，也是不可避免的牺牲品。

第二个案件，如果可以称之为案件的话——其中总共只有 10 页——是关于我祖父的。

1937 年 8 月 27 日，根据西西伯利亚边区内务人民委员部管理局“三人领导小组”的命令，巴卡京·亚历山大·彼特罗维奇受到最严厉的惩罚（没有说明根据哪项条款）——被枪决，并没收其财产；巴卡京是俄罗斯人，非党员，受过中等教育，已婚，在“粮食采购站”任会计，1937 年 7 月 27 日被捕。

据起诉书说，巴卡京承认有罪，招认他是沃尔孔斯基和埃斯

金在西西伯利亚领域建立的立宪民主党人起义组织的积极参与者。

祖父已于 1966 年恢复名誉。正如复查所证明的，起诉书中所说的那个组织并不存在。关于这个组织的材料是原西西伯利亚边区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伪造的。“肃反工作人员”必须完成“枪决指标”规定的任务。为了“凑数”，我的祖父也和许多旁人一样，被枪决了。

两个案件。牺牲者和自己也成为牺牲品的刽子手。他们当中应该怜悯谁，恨谁呢？似乎，一切都是明明白白的。然而奇怪，我心中并没有仇恨。大概这是因为，不可能恨自己祖国的历史。应该了解历史，不管它是什么样的。不能行同罪犯似地向人民隐瞒人民的历史。然而，不是吗，直到目前为止，我们不仅过去一直隐瞒着，而且现在还在尽可能隐瞒着。似乎连共产主义的思想家们也已经消失了，或者是改行当了总统，可是我们还在悄悄地隐瞒着。为什么？是出于良好的动机吗？是为了保护人民，使人民不致感到痛苦，让“理想”和“偶像”不致幻灭吗？不过也许是出于恐惧，害怕会为了我们那些前任党的肃反工作者的罪孽而进行报复吧？我不知道。然而不管真实情况是多么痛苦，只有完全说出全部真相，才能摆脱克格勃那些秘密暴行和不法行为的过去。为无辜的牺牲者平反昭雪，是神圣的事，但这还不是全部真实情况。

就这样，1930—1940 年消灭了叶若夫和他最亲密的助手，然而还是什么也没有改变：拉夫连季·贝利亚这颗新星升起来了，就是在斯大林死后，他的名字仍然会引起恐惧，不仅是在一般凡人中，而且会在“各族人民的领袖”周围那些人，也就是这个世界上那些强有力的人物中引起恐惧。

伟大的卫国战争时期经受严酷考验的那些岁月里，人民正竭尽全力争取胜利，政治镇压的飞轮仍然在不停地旋转，消耗国家

本来就已经感到缺乏的有生力量。内务人民委员部无条件地执行了政府关于强制移民的决定，把卡尔梅克人、卡拉恰耶夫人、车臣人、印古什人、巴尔卡尔人、克里米亚鞑靼人、梅斯赫季亚土耳其人、伏尔加沿岸的德意志人，从他们有史以来居住的故乡和其他常住地区强行迁移到东方去。在寒冷的车厢里，把没带家具什物的人们送往西伯利亚，那里等待着他们许多人的，是死于饥饿和严寒。

国家在战争中坚持住了，取得了胜利。但胜利的喜悦和重建的艰巨任务并没有使恐怖的机器停止运转。1946年关于独立研究哲学、文学、历史的青年小组案件，与“世界主义”的斗争，“列宁格勒”案件和“米格列尔人”案件，“医生放毒案件”——这只是战后年代最著名的几起诉讼案。鲜为人知的其他案件还有多少啊，然而鲜为人知，其悲惨程度却并不亚于众所周知的案件。

赫鲁晓夫的“解冻”，在许多方面使死亡的旋转木马停顿下来了。随着对贝利亚和阿巴库莫夫的审讯，大规模恐怖政策最令人厌恶的表现已经成为过去，国家保安机构从直接卷入镇压活动的那些人手中解放了出来。千百万人从古拉格（集中营总局）的“虚无境界”中回到了正常生活中来，他们的名誉恢复了。然而建立在一种思想体系居统治地位的基础上、建立在恐惧和镇压基础上的极权、官僚主义社会制度并未改变，这就意味着，为这种制度服务的国家安全机构的职能不可能在本质上有什麼变化。不错，克格勃的工作方法变得较为委婉、较为巧妙了，但是其镇压的实质依然如故。

赫鲁晓夫发起的改革使反对派的力量得到了发展，而随着反对派力量的发展，1964年10月解除赫鲁晓夫职务的时候，以谢米恰斯特内为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成为这一阴谋的中心，并不是偶然的。

勃列日涅夫新时代宣告政治气候变冷的时期已经到来，当局对任何异端都不能容忍的情绪加强了。刑法典里出现了一项条款（第 190 条第一款），规定对散布损害国家和社会制度的谣言和消息者，要进行惩罚。这就为对犯罪的解释留下了广阔的天地，让克格勃得以为所欲为。现在持不同政见者成了主要敌人——这就是那些正直和有思想的人，民族的良心，捍卫民主理想、人权、公民权利的人。等待着他们当中许多人的是监狱，经过短暂的秘密审讯之后，他们就被投入监狱，苏联舆论界从来也不知道他们的名字，虽说正是以舆论界的名义对他们进行审讯的。另一些人，经克格勃专门挑选的专家组成的专家委员会“认定”他们患有各种反苏和其他方面的综合病症，于是到了各个精神病“医院”里。还有一些，像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安德烈·萨哈罗夫那样的知名人士，不能这样简单地镇压他们，于是他们就变成了被社会抛弃的人。克格勃利用一切可以想像得到的反间谍手段——监视、窃听电话和所有其他谈话、详细研究信件以及其他等等——无微不至地监视他们的一言一行。克格勃档案中保存过的 550 卷萨哈罗夫案件的分析资料和 105 卷索尔仁尼琴案件的材料，就是证据。但是这些资料的全部内容，我们已经永远无法知道了。1988—1990 年，根据委员会领导的命令，这些案卷已被全部销毁，“焚烧之后，炉子也检查过了”，关于这些，都有相应的决定。但是有个别文件保存了下来，这些文件为了解勃列日涅夫时期克格勃领导的心灵主义提供了最好的概念。

“工人阶级和集体农庄农民的代表们怀着愤怒和蔑视的心情批评索尔仁尼琴，对在西方围绕着这个叛徒的名字展开的反苏宣传表示了自己的愤慨。”1974 年 1 月 17 日，克格勃主席尤里·安德罗波夫援引谁也不知道的旋工、女挤奶员、从来也没看过一行这位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家作品的学者们的话，向苏共中央提出这样的报告。两星期之后，2 月 6 日，一份由安德罗波夫和总检察

长鲁坚科签署的文件送往同一地点：“众所周知，最近资产阶级宣传利用索尔仁尼琴怀有敌意的诽谤性作品《古拉格群岛》，在西欧许多国家以及美国掀起了一场攻击苏联内、外政策的反苏叫嚣。而且这股反苏浪潮的特点不仅是力图在我们国内制造敌对舆论，同时也力图制造舆论攻击我们的驻外代表机构。

“分析证明，这场运动如此协调一致，而且来自同一中心。

“……传唤索尔仁尼琴去见副总检察长 M. П. 马利亚罗夫，并向他宣布，鉴于他的反苏活动，苏联检察机关认为必须审查现有的一切有关材料，这样做是适当的。”又过了一个星期，这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被驱逐出苏联国境。

未经审判和侦查，伟大的学者、一位有良知的人、科学院院士萨哈罗夫被流放到高尔基市长达 7 年之久。作为象征性的惩罚，因为在核物理研究领域所作的贡献以及制造原子武器的功绩而颁发给他的三枚苏联劳动英雄奖章，也被苏联政权剥夺了，而正是这种原子武器曾帮助这个政权在“铁幕”后生存了好几十年。

不仅作为镇压机器，克格勃是对社会的一种威胁。安全委员会还是国家最高领导据以作出决定的那些情报的主要来源之一，甚至是最主要的来源。不顾两种制度政治竞争的客观逻辑，进行致命的军事建设，结果使苏联的经济资源耗尽，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要归咎于克格勃的情报政策。从安全委员会经常不变地送来一份份情报，说苏联的军备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落后于西方，于是这些情报就成了军事计划不顾实际经济潜力和人民需要，继续螺旋形上升的依据。而寻找以“世界帝国主义”为代表的敌人的妄想狂，只不过促使刮起一阵又一阵“冷战”的寒风。

我不打算在这本书里提供安全机构的历史。更不认为，像现在通常所做的那样，只用黑色来描绘安全机构工作人员活动的做法是正确的。不过，当然啦，在这幅画布上，黑色是最主要的色

调。不能忘记成百上千的工作人员曾在 30 年代向斯大林的专横制度提出公开挑战，并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不能忘记侦察员们异常艰苦的、并非“电影上的”那种工作，他们的作战行动谁也没有看到，然而却耗尽了他们的神经和精力。

那些在克格勃工作，以及与他们合作的正直的人们，真诚地相信为祖国服务的理想，而实际上他们为之服务的并不是祖国，而是制度，这个制度的口号是为建设而斗争，实际上却只是为了没有建设的破坏而斗争，这并不是他们的罪过，而是他们的悲剧。这里所谈的并不是某些建设项目，开垦荒地，或艺术家的某些杰作。这里所谈的是那样的一种生活组织，在这种组织里，就连开垦荒地也会导致悲剧，而杰作却被束之高阁，难见天日。就这方面来说，肃反工作人员的过错比这样的教师或新闻工作者大不了许多：教师几十年来让自己的学生们牢记那些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对这些教条，他们自己是相信的，或者说服自己，让自己相信它们；而新闻工作者则设法容忍、迁就现实，言不由衷地歌颂“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而闭眼忽视那些社会制度的缺点。勇敢的人，战士，持不同政见者，反对这个制度的人并不多。虽然当时人们在唱“无论谁都可以成为英雄”，然而整个社会不可能单单是由英雄们构成的。绝大多数人——无论是在斯大林主义时代，还是在勃列日涅夫主义时代——只不过是在学习，工作，接受当时的现实，顺从生活的主流，过日子，照他们所理解的那样诚心诚意地做自己的事情。极权制度的规则就是这样严酷无情：要么你照领袖、党和“人民”指示的那样，“像大家一样”生活，要么你就已经不是人民，而是“人民的敌人”，应该进入不存在的状态。人们学会了适应这种生活，形成了一些自卫的机制，其中也包括免受自己良心伤害的机制。因为良心也是可以杀人的。

现在有谁敢谴责他们呢？而且为什么要谴责他们？就连那些

无辜牺牲的人也不会这样做，因为他们自己要活着，也只能是这样生活。

“不要责备别人，自己也不会受责备”吗？或者把这句话反过来说。责人之前应先责己。

学会了适应这个制度而且是由这个制度教育出来的人民，他们的心理已经被扭曲了，变得极不正常了，在这种心理中，主要的是过去的悲剧和现在的悲剧。这儿由契卡主义产生的主要罪恶是谎言和暴力的思想体系。

然而我觉得，在过去、在昨天的“制度”中寻找今天的失败，这种经常不断、已经成为时髦的毫无意义的做法，已经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了。这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只看到这是显而易见的，并没有什么用处。只有当每个人都试图首先弄清自己的责任的时候，我们才能摆脱那个“制度”，摆脱过去，完全改变我们的生活。

如果用一批新的罪人来取代以前的罪人——“犹太复国主义者”、“帝国主义者”、“战争贩子”，今天把一切责任都推给克格勃、“党务工作者”和“干部名册”，明天又把一切归咎于“民主主义者”和“共济会员”，那是不会使社会净化和面貌一新的。

我知道那些不理解我，不同意我的意见，而且会感到愤慨的人。不过这早就是众所周知的了。人民应该无愧于他们所过的那种生活。人民不是群众场面中不说话的配角。至少不应该是说不出的配角，尤其是在民主社会里。

要知道，所有曾向人民呼吁的政治家——布尔什维克和克伦斯基，勃列日涅夫和民主主义者，都害怕人民，过去害怕，现在仍然害怕。

是的，可以重复显而易见的真理：共产主义思想使我们的社会成为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生活成为我们的生活。然而，这并不是全部生活。全部生活毫无例外是由人民确定的：被欺骗的、轻

信的、要求不高的、有耐心的、听话的、酗酒的、天才的、慷慨和不幸的人民。我说的“我们”是指：每个人自己，然而又是大家一起。我们大家，每一个人使自己的生活会成为它现在这个样子。结果是，我们进行创造性的劳动，“为在社会主义竞赛中取得的胜利”获得荣誉证书和一叠叠“25 卢布的钞票”，却没有创造未来。每个人都做了些什么。每个人都在生活，在爱，在矿山或农场工作。种花或栽种土豆。或者被关在集中营里。晚上在拉手风琴或登台表演……

所有这些丰富多彩、色泽鲜艳以及普通的本色线，织成了我们生活的画面，但是没有为未来的几代人纺出结实和完好的经线。纺织品没有织成。它是不完整的。一旦去掉意识形态的沉重压床，一切都分崩离析了。

这是错误道路导致的结果。这是理论家和政治家们的得分，而首先是我們自己的得分。人民不认清这一点，就不可能重新建设新的生活。即使是在没有克格勃的情况下。

即将开始改革的时候，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一个渗透到一切中去的部门，能够控制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不撤销这个机构或对它进行认真改组，并建立起国家和社会对特工机关进行有效监督的体制，就不可能指望民主改革取得成效。然而戈尔巴乔夫的最大错误之一，就是直到发生叛乱（直到佛洛斯角），都对存在这样一个庞大的镇压机构的危险性估计不足，这个机构只是看风使舵，表面上表示对改革政策忠心耿耿，但实际上仍然忠于“契卡主义”的许多传统。戈尔巴乔夫，苏共中央的总书记，与其说把克格勃看作他的改革政策的威胁，不如说把它看作改革的支柱。

我回想起他于 1986 年在苏共 27 大上所作的报告，当时他对改革计划曾作了详细说明。谈到克格勃时，有这样一段话，无论是斯大林，还是勃列日涅夫，都会在这样的话下面签字：“在帝国主义反对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破坏活动日益增长的情况

下，国家安全机关所担负的责任也日益重大了。它们在党的领导下，严格遵守苏联的法律，正在做大量工作，揭穿敌人的阴谋，制止种种破坏活动，保卫我们祖国神圣的边界。”

这种显然与生活现实相矛盾的类似评价，在以后几年里也一再重复过。在进行改革的这些年里，克格勃之所以能成为其职能实际未变的不多几个国家机构中的一个，这就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在毫无选择余地的基础上选举出来、总是不加思索地一致通过党组织的决议的最高苏维埃，已经成为过去，让位给当真是选举出来的立法机构，这些立法机构虽然还不能完全反映千变万化的社会情绪，但总算向民主社会迈出了不大的第一步。确认共产党的“领导和指导作用”的苏联宪法第六条已经被人忘却，虽说共产党还不急于放弃自己的地位。在苏联和许多共和国里开始确立总统管理的形式，建立了宪法监督机构。但是改革之风却绕过国家安全委员会，从一旁吹了过去。国家安全委员会实际上仍然是以前的“党的惩罚之剑”。不过这把“剑”已经在剑鞘内生锈了。像从前那样使用它是很危险的。委员会本身的基层小组里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新思想，当局却没有工夫去管它们。结果是消极怠工，迷失路途，失去方向，不满，瓦解……

在改革的那些年代里，克格勃是什么，我被任命为主席以后，所看到的克格勃实际上是什么样子呢？

它的中央机关里有将近 30 个总管理局、管理局和独立科。

第一总管理局（普格乌）是情报局，最初由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亲自领导，后来由基干侦察员列昂尼德·舍尔巴申担任局长。最近几年发表的一系列报道，已经把本部设在亚森涅沃的这一机构的浪漫主义色彩传播到四面八方。习惯上认为情报局是安全委员会的精华，大概也的确是如此：在那里工作的基本上都是行家里手和受过很好训练的职业情报人员。

情报局的不幸在于，它的主要顾问和定货者经常不变地总是

苏共中央的国际部，而国际部却有性质非常特殊的全世界的利益。由于情报局属于一个在正常民主国家里不可思议的、声名狼藉的政治侦查系统，这也就明显地损害了它的声誉。虽然普格乌已经不像在斯大林时期那样，派它的工作人员到国外去消灭“苏联政权的任何敌人”，或苏联驻外大使，也不像赫鲁晓夫时期那样，派人到国外去消灭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可它仍然是镇压机器的一部分。

普格乌活动的特点是真正的世界性和总体性。驻外间谍机关毫无例外地在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积极活动，招募间谍，即使在普通苏联人从未听到过其国名的那些国家里也是如此，而在那些国家里，苏联的国家安全利益，说得委婉一些，也是很并不显著的。

按照党的要求，普格乌不得不从事与其说是搜集重要情报的工作（虽说在这方面它所做的工作并不是没有成就的），不如说是在为苏共中央的宣传提供必要的材料，而这种宣传方针与苏联的实际利益很少有共同之处。情报局可能“错过”某一最重要的国际政治事件，却按时向中央报告世界各国对苏联领导人一次又一次例行讲话的反应，或者是某一非洲国家某个共产党内部的无谓争吵。当然，这反应总是表示赞同的，而在那个共产党内总是可以看出，赞成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人，影响正在增加。

正如现在大家已经知道的，许多作为情报工作的成绩送交中央的材料，实际上来源于大众性传播媒介，不过经过整理加工，以满足中央的需要。各大使馆驻外间谍机构过分庞大的编制，与实际的工作成绩是无论如何也不相称的。

第二总管理局（弗格乌）是根纳季·季托夫领导的反间谍局。这种工作需要细心和耐心，而且十分微妙，工作的成功和失败是难以衡量的。无论如何，未必能仅仅以安置和派出的间谍数量来衡量。有时最好只不过是对于一个已经知道的间谍进行监视，发现

他的联络方法、与什么人联系，等等。

不过，记得有一个在所谓“英国部门”工作的人来见我，说：“我要退休了，没什么好回忆的，白过了一生。我们不仅没抓到过任何人，而且我总是徒劳无益地走来走去，甚至不知道是在跟踪什么人。”反间谍局以前工作效率不高，现在也缺乏效率。只是“监视”所有的人，“偷听”他们的谈话，这简直是浪费时间，浪费干部。

武装力量中的反间谍工作由第三总管理局负责，他们的代表在所谓的“特务科”工作。

由克格勃最有经验、资格最老的工作人员之一尤里·斯托罗热夫领导的第四管理局负责安全问题，并保证反间谍工作所需要的交通运输工具。经济安全问题属于克格勃第六管理局的职权范围。这个管理局工作的主要缺点，照我看，是它没能制订出在国家向市场经济过渡条件下的工作方针。克格勃几乎把正在出现的自由企业组织看作主要威胁。当然，它们是反常的。但正是因为过去阻碍、现在仍然阻碍它们正常出现，才出现了这种反常现象。包括克格勃在内，以前都是坚决捍卫唯一的社会主义国有经济的利益，抑制市场改革的发展。

由克留奇科夫领导的克格勃在与所谓的“经济破坏行为”进行斗争，而对“经济破坏行为”可以作相当任意的解释。最后事情竟闹到监视合作社工作人员的行动，去寻找藏在商店辅助用房里的罐头。成千上万的工作人员被派去研究仓库里存放着什么东西。这些“行动”都是大张旗鼓地进行，而且作了广泛的报道。可以设想，在电视屏幕上放映从柜台底下拿出来肉和罐头，对习惯于看到商店里货架上空空如也的消费者们会产生多大的影响，使他们对克格勃多么感激。然而却没想到，检查商店根本不是特工机关的职权，而是民警机关的职责，民警机关采取同样的行动，规模还要大得多，可是并不认为需要为自己这种并不新鲜

的工作大作广告。顺便说说，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对于他们很多人不得不转业去作商业检查员，也并不高兴。

克格勃的领导没有考虑到，这种本不应由特工机关去做的工作，分散了安全委员会与有组织犯罪活动进行斗争的、本来就很有有限的力量，这样也就给委员会的主要活动带来了损失，而它本应去对付黑手党和恐怖分子，制止在各级政权机关的走廊上十分流行的贪污受贿的犯罪行为。

克格勃始终都作出成绩的领域，是与异己思想进行斗争。从事这一肮脏工作的是臭名昭著的第五局，在 80 年代末，改名为“3”管理局——保卫宪法制度管理局。这个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在可以想像得到的一切机关、组织和运动——青年组织、宗教组织、民族组织、社会政治组织——中工作。在改革时期，对民主力量的代表人物给予特别注意，他们被看作宪法制度的主要威胁，当然，这是根据苏共和克格勃的领袖们对宪法制度所作的狭隘理解。克格勃不仅违反现行法律，而且也违反了它本身的工作条例，对一系列国务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采取了某些业务技术措施。对苏联人民代表鲍里斯·叶利钦、杰利曼·格德利扬进行户外监视，实际上对区域间代表小组的所有领袖都进行监视。他们的电话，连他们的亲属和熟人的电话都被窃听。俄罗斯议会选举以后，在俄罗斯联邦一些人民代表的电话上装了窃听器——在他们的住宅、别墅、休息地点都装上了窃听器。甚至连像拉伊莎·戈尔巴乔娃的女理发师或叶利钦的网球教练这样一些人，也都遭到了窃听。

执行窃听任务的几乎全都是妇女，在这个部门工作的姑娘们，工资相对较低，都懂一门或几门外语，而且对人的声音有非凡的记忆力。可怜的姑娘们，她们什么话没有听到过啊……有时，真让人无法忍受。

当我已经卢比扬安顿下来以后，作为例子，给我从苏联总

统府以前的领导人、也是阴谋者之一的瓦列里·鲍尔金的保险箱里拿来了厚厚的两个文件夹，里面收集了一些著名政治家谈话录音的记录。我动手翻阅，看到第二页就看不下去了。那是现在受人尊敬的议会代表的领袖之一在家中厨房里和自己母亲以及兄弟的谈话。我真为国家，为克格勃感到可耻。有这样一种感觉，就好像躲在门后从锁孔里偷看根本没想到会有人在偷看的正派人一样。

户外监视由第七管理局负责。不管是什么样的天气，也不管是一昼夜里的什么时候，这个部门的工作人员都在“伴随”着自己的“对象”，他们可真够可怜的。可惜，他们不得不监视的，往往并不是应该监视的人，这种情况实在是太多了。“阿尔法”特别分队也属于第七管理局。1979年12月，这个特别分队的军官曾突击攻占了喀布尔阿明所在的王宫，还参加过许多次解救被劫持的飞机上的人质的战役；1991年1月，曾在维尔纽斯拒绝执行任务，同年8月又拒绝攻占俄罗斯的“白宫”。

以“第九局”闻名的保卫局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它执行保卫国家最高级官员的任务，还有保卫包括克里姆林宫和苏共中央在内的、最重要政府设施和党的设施的任务。它的职责中还包括保卫党和政府要人的几十座别墅、休养地和消遣场所。

由伊利亚·卡利尼琴科任指挥的边防军总局负责保卫世界上最长的陆地和海上的苏联边境线。苏联边境的严酷条件需要大量人员和技术装备，克格勃不得不把将近一半人员和预算都拨给了它。边防军的工作总是很多的，他们大部分人都能胜任这些工作。仅从1991年初到9月就拘留了3700名偷越国境者，其中1700人试图逃出苏联，两千人试图从国外潜入苏联。在这段时间里，边防军还截获了价值2100万卢布的走私品。某些加盟共和国当局的政策给他们造成了特殊困难，例如摩尔达维亚，实际上造成了和罗马尼亚互相开放边界的状态；还有阿塞拜疆一些大

家都知道的事件，那里边境线上有些很长的地段往往无人防卫。同时，在边防军保卫边境的任务不应妨碍人们正常往来的新条件下，也完全没有准备好相应的工作细则。

克格勃的好几个管理局，其中主要是政府通讯管理局，从事保证国家领导进行专门密码通讯的工作，编制各种密码，进行无线电截听和电子侦察。实质上，这些管理局合在一起就类似美国最强大的情报机关——国家安全委员会。但作为克格勃的一个组成部分，正如叛乱所证明的，根据克格勃主席的命令，政府通讯管理局不仅能建立、而且能够切断通讯联系。

克格勃的这些管理局里汇集了第一流的数学家、物理学家、程序设计专家，他们都用最现代化的电子计算技术装备了起来。人们的确在工作。我曾对各种不同来源的情报的水平进行评价，应当说，来自这些部门的情报是最不带成见和最准确的。这的确是“不会为所作的工作感到遗憾”。

对业务技术管理局的工作，也可以这么说。那里面都是一些最高级的职业化的人员，他们确是白手起家，制造出世界上高水平的设备。而把这种智力花费在什么事情上，却是另一个问题

.....

克格勃还管辖着完全处于地下的巨大财富——在特殊时期，能在非常情况下，包括核战争时期——领导国家的一些点。它们都处于最理想的状态。有趣的是，就连那里，克格勃把意识形态放在首要地位的特点也十分明显：在遭到原子弹袭击的情况下，总统可以从那里指挥武装部队的地下室里，在那儿的书架上我只看到了一部列宁全集。意识形态压倒了职业化。如果不是心情这么忧郁的话，这简直让人觉得好笑。克格勃的共产主义核心按照自己的逻辑断定，在危机时刻，国家元首要的是什么。

在到克格勃来以前，我深信，这个机构有进行大量智力分析的能力。坦率地说，等待着我的却是失望。差不多一年多以前，

才刚刚成立了分析管理局，它还没能站稳脚根。实际上每个管理局里都有情报分析部，它们的活动和一系列科学研究所的活动，谁也没有认真使之互相配合起来。几乎没经过整理加工的情报的洪流同时汇集到克格勃主席的办公桌上，由他来挑选，什么情报值得引起国家最高领导的注意。

我在克格勃的最初几天，经常收到真正是堆积如山的各式各样的汇报，不久我就弄清了，这些汇报有许多都是互相重复的，通常是通过大众性传播媒介已经知道的情报。在这以后，我才明白了我的前任以前让我感到纳闷的作法。无论克留奇科夫在什么地方（在会议上，代表大会上，安全委员会开会的时候），总是用手提箱给他送来一大堆文件，他坐在那里，看文件，签署决议。只是到现在，我才明白这种独特的合理工作作风的价值。真的，对情报的加工水平如此之低，情报的数量又如此之多，不采取这种方式，未必能应付得了。用这种办法，用这种情报半成品，是不能作出高水平的政治决定的。除此而外，克格勃对情报的垄断还大大缩小了国家领导人的视野，使他们不能了解各种不同的观点，而且为克格勃主席根据个人的思想政治倾向有目的地利用情报开辟了道路。不能说委员会的领导以虚假的情报蒙蔽克里姆林宫和旧广场（指苏联领导人）。它只不过提供它认为需要的情报罢了。例如，不断向“上面”送去这样一些消息：波罗的海沿岸三个加盟共和国抗议地方当局的作法。确实是有这样的抗议，然而这些抗议是组织起来的，参加的人都是共产党员和讲俄语的那一部分居民，但数量更多得多的、人民支持这些地方当局的大量材料，却故意避而不提。结果使苏联总统形成了虚假的印象，认为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政府得不到群众支持。尽管只有十分天真的人才会相信这一点。

分析工作缺乏效率，当然远不能仅仅用旧克格勃领导层恶意的预谋和共产党的思想僵化来作解释。问题还在于，极权官僚制

度本身就认为，只有在苏共中央的办公室里才能进行分析和作出最重要的决定。几十年来只允许旧广场上考虑广泛的政治问题，克格勃的作用首先是提供原始材料和实现已经作出的决定。这就使得克格勃内不可能有考虑战略性政治问题的传统。然而根据“投其所好”的原则，把情报和工作分作几个部分，与其他机关相比，在这方面委员会却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

关于分析工作的缺陷，有很多话可以说。然而只提出一个论据就足够了——如此可耻地失败的 1991 年 8 月政变，就是由克格勃的分析提供思想，制定出脚本来的。

除了已经提到过的那几个管理局，克格勃中央机关中还有：检查局，主要负责检查各加盟共和国安全委员会和克格勃各州分局的工作（中央机关它是不能检查的）；侦查科，该科每个侦查员平均每年办 0.5 个案子，然而内务部里每个侦查员平均却要办 60 多个案件；第十科，管理侦查隔离室和档案——独一无二的文件汇编，实际上侦查员和记者都没到过那里；公共关系中心，它的工作是改善社会舆论对克格勃的评价；强大的军事医学管理局和军事建筑管理局，这两个局为所有加盟共和国服务；经济和财政计划管理局；干部管理局；动员科；两所高等学校——克格勃高等学校和尤·弗·安德罗波夫红旗学院。维塔利·普里鲁科夫领导的乌克格勃，以中央机关管理局的身分在莫斯科市、莫斯科州内进行活动。

此外，各加盟共和国和地方上的安全委员会里还有近 9000 名工作人员，在严格、绝对服从中央领导的情况下工作。1991 年 5 月作出了成立俄罗斯克格勃的决定，俄罗斯是各加盟共和国中以前没有自己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唯一加盟共和国。克留奇科夫提议让当时还不大有人知道的维克托·伊万年科担任俄罗斯克格勃的主席，大概是希望把他看作苏联克格勃万能的主席手中的一个驯服的傀儡。后来等待着克留奇科夫的却是痛苦的失望。但

是叛乱开始前，俄罗斯克格勃总共只有几十个人。

在任命我担任主席之前，克格勃总共有将近 48 万工作人员。

可惜，暂时还没有任何一个自尊的国家能够没有特工机关、没有情报机关和间谍组织。但是从克格勃存在的那天起，就不能把它叫作特工机关。这是一个为了进行普遍监督和镇压而建立的机构。它似乎是一个专门为了用来组织阴谋和政变的机构，而且拥有为达到这些目的而必须的一切手段——受过专门训练的部队，检查人们通讯和思想的检查机关，在所有关键性部门里都安插有自己的工作人员，而且对情报和许多其他资料实行垄断。克格勃的机构臃肿，编制人为地膨胀起来，而这并没对它的工作产生任何好的影响。负有保证国家安全使命的工作本身渐渐变成了对国家安全的威胁。

对于国家和国家的宪法体制来说，最危险的是，克格勃可以在实际上没有法律根据的条件下行使它的职权，而法律至少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限制它的活动。由克留奇科夫提出、1991 年 5 月经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的关于苏联克格勃各级机构的法律，以正常的民主标准来衡量，在它被通过以前就已经过时了。

必须说明，按照业已形成的官僚主义惯例，还在 1990 年，联盟政府就已经把这一法律送交内务部去作结论，作为部长，我完全同意民警法律处的意见，不给它作肯定的结论。我们认为，在通过关于克格勃的法律以前，应该制定并通过关于安全或安全概念的法律。但是终究没有这样做。

在克格勃，有近五千条工作条例继续有效，这些条例是由苏联部长会议、克格勃主席本人，或者还是在那些值得纪念的时期由什么人批准的。这些条例为克格勃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留下了广阔的余地，正由于此，克格勃以前的领导才能对那些要求改组委员会、使它向新的法律基础过渡的大量建议不予理睬。这些建议有的来自社会，有的来自法学专家，也有的来自克格勃内部

——来自检查局，来自第二总管理局的科学研究所。

8月叛乱失败后，成立了一个调查国家安全委员会活动的国家委员会，主席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人民代表谢尔盖·斯杰帕申。这个委员会在送交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和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的调查报告得出如下结论，对这些结论，我百分之百表示赞同：

“在实际上没有能于某种程度上控制其活动的法律基础的情况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长期工作导致它实质上成为一个高度集中的机构，可以对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进行检查，而且以最有效地保证国家安全为借口，在自己手中集中了庞大的政治和军事力量。既然苏联最高苏维埃没有制定出规范性的法令，没能保证对苏联克格勃的活动进行监督，所以它也就没有履行宪法赋予它的责任。苏联检察机关也没能对安全机构的工作进行有效的检察。结果安全委员会成为一种有其自己特殊利益的独立政治力量，客观上变成凌驾于苏联及各加盟共和国最高机关之上、不受其管辖的、超国家的设制。”

斯杰帕申的委员会正确地提请注意，甚至在苏联宪法第六条被废止以后，苏共中央仍然保持对克格勃进行监督、甚至直接领导的权力。由于克格勃的关键性职务多年来一直由以前党的负责干部担任，而在克格勃的所有机构中都有并非只起装饰性作用的党委会，实行党对克格勃的监督，是完全可能的。直到1991年8月，安全委员会一直把机密和绝密的材料送往苏共中央。在中央书记们的档案中，这些文件以“苏联克格勃文件”的名称被存放在专门的档案里。克格勃受中央书记处委托，负责调查不同政治活动家的情况，回答关于这些人的问题。这一切无论如何也不符合关于苏联社会团体的法律，根据这项法律，一切政党地位平等，其党委会都无权直接管理国家。

随着民主化进程的发展，作为力图保存过时的旧社会制度基

础的主要力量之一，克格勃变得对改革政策越来越无法调和，这是毫不足怪的。

现在已经十分明显，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克格勃决不会不肯采取甚至显然是挑拨性的措施。克格勃直接参与轰动一时的“安特事件”——由政府建立、也是政府使之垮台的超级合作社。根据一切迹象来看，正统派需要这个“事件”，以它作为借口，来“扼杀”合作制和允许企业家活动的思想。或者拿不那么轰动的“1400亿事件”来说，那也是克格勃为破坏俄罗斯政府的威信而制造出来的。

各加盟共和国在与中央的关系上表现得固执而任性，于是由安全委员会发起，在这些加盟共和国建立了“国际阵线”。“分而治之”这一有害的逻辑鼓励这些加盟共和国的社会分裂成两个不可调和的阵营，导致社会紧张状态更加尖锐化。不是进行耐心的对话，以平心静气、仔细权衡利弊的态度去解决各加盟共和国和中央之间业已产生的矛盾，却总是采取这一刻板的公式：“你们不愿服从吗——那么就尝尝国际阵线的厉害吧，国际阵线会号召罢工，提出各加盟共和国的边界问题和那里选举出的政权机关是否合法的问题”。随后，这些国际阵线的活动就作为“全体人民意志”的表现，呈献在安全委员会面前。

但是，如果认为克格勃是罪恶之源，仍然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是这个社会、这个国家、也是作为它的一部分的克格勃产生的原因，克格勃是靠秘密侦查、不法行为和暴力保证这个制度富有生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它毕竟只是这种党国制度的一部分，而这个制度的一切都来自旧广场上那些最高级的办公室。

当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使思想体系的危机日益加速尖锐化的时候，作为“思想体系的保卫者”——克格勃的作用也急剧地加强了。在“发达的社会主义时期”已经完全变了样的斯大林主义的

教条，正是在这里，在克格勃的领导当中，得以完整地保存了下来，而且很受尊重。因此，在戈尔巴乔夫和一部分党的最高层人物之间互不理解的鸿沟日益扩大之后，克格勃遂作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思想基础的保卫者，给推到了首要地位，而对于采取秘密的“积极措施”，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却有不小的能量和经验。

在苏共——俄共、克格勃的教条主义者，人民代表——“爱国主义者”，以及军事政治训练所的一部分将官之间，形成了一个反动联盟。我在总统和总书记那里的许多次会议上对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进行过观察。根据我的观察，他总是扮演一个重要和积极的角色，经常警告说，要预防民主主义者的“阴谋诡计”，要求采取非常措施，来整顿秩序。应当承认，戈尔巴乔夫处于克格勃强有力的影响之下。他相信克留奇科夫和他的情报。这也就预先决定了从 1990 年秋天开始修正改革方针，现在这已经是大家都知道的事了。

在那个时期，总统表现出明显地倾向于保守势力。埃杜阿尔德·谢瓦尔德纳泽勇敢地提出警告：对即将发生的专政要提高警惕。他的警告拥有一切证据，然而许多人充耳不闻，或者不想听，虽说当时我也不理解他的这一警告，不愿与之直接发生关系，也不愿辞去内务部长的职务。我相信戈尔巴乔夫，我不能设想，这只是政治阴谋的一个环节，这个阴谋要把一切护法机关都置于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坚定的拥护者监督之下，准备在拯救国家的非常措施的旗帜下，向改革发动反攻。

正如现在已经查明的，还在 1990 年 12 月，克留奇科夫就委托他的心腹中极少的几个人——第一总管理局副局长弗拉基米尔·日任，他本人的第一副主席维克托·格鲁什科的副手阿列克谢·叶戈罗夫——制定在非常情况下使国内局势“保持稳定”的主要措施。当时计划就已经拟好了，不过暂时搁置起来，留待“最好”的时期再付诸实施。

在我任内务部长的时期，我和克留奇科夫的关系十分正常，没有什么波折。最初几个月里他经常地和我谈话，让我熟悉“情况”，向我提出建议。我知道，是戈尔巴乔夫让他这么做的。

我清清楚楚记得他那从容不迫的谈话方式，要么喝茶，要么喝咖啡 还经常开玩笑说：“不来点儿威士忌吗？”

后来我经常主动去找克格勃的主席了，希望从他那儿得到些情报，但是他或者是隐瞒着什么，或者是不愿把情况告诉我。通常我总是不能从他那儿了解到任何关于“热”点的目前情况。民警机关对情况了解得更确切。民警机关的情报也更有效。

1991 年 1 月，克格勃在维尔纽斯直接尝试使用自己的力量，结果变成一场悲剧，造成新的牺牲。尽管有一些十分明显的事实，其中包括“阿尔法”分队一名青年军官无谓的牺牲，克格勃领导却否认它曾以任何形式参与维尔纽斯事件，并不得不稍稍抑制自己的热情。

迫使它试图在全苏联范围内重演立陶宛脚本的，首先是民主改革进程在确定不移地向前发展，民主改革进程没给过去的旧势力和机构留下任何一点希望。

到 1991 年夏初，政治力量对比已经明显不利于那些继续坚持“社会主义选择”的人们了。苏联总统越来越明显地走上加速改革的道路。叶利钦当选为俄罗斯总统之后，在他和戈尔巴乔夫之间形成了暂时的政治休战，这使那些经常力图使这两位领袖发生直接冲突的右派分子感到极为不满。有可能制定出主权国家联盟新公式的过程死灰复燃，获得了某种动力，但议会里那些“国家强权拥护者”和他们的领袖卢基扬诺夫却觉得，这几乎就是背叛。在苏联最高苏维埃 6 月 21 日的那次会议上，戈尔巴乔夫与议会里的“联盟”派发生决裂，责备它的领袖们试图破坏各共和国之间的合作。戈尔巴乔夫明显地更不想受党内保守分子的支配了，在 7 月的苏共中央全会上，那些保守分子曾提出，必须在二

者之间作出选择：或者接受实质上是社会民主主义的纲领，或者退党。戈尔巴乔夫从依靠党和国家的官僚们以及军事——肃反工作者集团，转而采取与各共和国领袖、苏共中的改良派、由埃杜阿尔德·谢瓦尔德纳泽、亚历山大·亚科夫列夫、加夫里尔·波波夫领导的民主改革运动中的“新民主主义者”进行合作的态度。

共产主义思想正统派分子正失去立足的基础。不然的话，就不能把总理帕夫洛夫、国防部长亚佐夫和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发言叫作轻率绝望的行动了，他们在发言中用现实的和虚构的种种经济困难、内部和外部敌人的“阴谋”恐吓代表们，要求给予他们特殊的全权和实际上进入紧急状态。不与总统协调一致，而且与他的政策背道而驰的类似行动，在任何一个正常的国家里都会导致所有这些反对派立刻下台。但是戈尔巴乔夫又一次表现出犹豫不决，后来这使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深信，如果当时帕夫洛夫、克留奇科夫被解除职务，那就不会发生国家政变，戈尔巴乔夫和整个国家的命运也就会是另一个样子了。但是……历史不承认假定式。

戈尔巴乔夫去克里米亚度假之后，最高权力机关中反动的反对派得出结论：采取决定性行动的時刻到了。

我不想预测俄罗斯联邦检察机关对国家政变调查的结果。但是本单位已经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调查苏联克格勃领导官员参加 1991 年 8 月 19 日—21 日事件的情况及其所起的作用。根据这个委员会提供的材料，同时还有斯杰帕申委员会所得到的情报，对克格勃参加这一阴谋的情况，已经可以得出某些概念。

8 月上半月，克留奇科夫就开始定期与所谓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未来的领袖们会面，讨论阴谋的细节——第一总局前不久建立了一所旅馆休息中心，叫作“阿勃茨”，他们就在那里会面。

就在那个时期，前面提到过的十二月“计划”被重新提了出

来，作了某些修改以后，这个计划就成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可悲的众所周知的决定和声明的基础。

按照阴谋者们的计划，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应该保证解决下列关键性的任务：

用隔离的办法使苏联总统离职；

防止俄罗斯联邦总统反抗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行动的任何企图，可以设想，俄罗斯总统一定会试图反抗；

对下列人员的所在地实行经常性监视：俄罗斯联邦和莫斯科市各政权机关的领导人，众所周知持民主主义观点的著名社会活动家，苏联和俄罗斯议会以及莫斯科苏维埃的代表，目的是在以后逮捕他们；

必要时，与苏联军队和内务部的部队共同占领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大楼，随后拘留冲击开始后仍然留在那里的人们，包括俄罗斯的领导人。

从 8 月 17 日到 8 月 19 日，苏联克格勃的特殊任务部队处于加强战斗准备的状态，其中一部分重新部署到早已规定好的地点，以便与军队和内务部的分队共同实施紧急状态。

隔离佛洛斯角“曙光”目标（苏联总统在克里米亚的别墅的密码名称）的措施，由克留奇科夫的第一副主席根尼·阿格耶夫担任领导。他下令，第七十九边防军支队和第五独立护卫舰队改由警卫队长普列汉诺夫和副队长根涅拉洛夫指挥。8 月 15 日，政府通讯局局长安纳托利·别德把一支政府通讯局工作队派往克里米亚，这个工作队是由已经飞往克里米亚的警卫队行动小组组成的，也由普列汉诺夫指挥。鲍尔丁、席宁、瓦伦尼科夫和巴克拉诺夫这四个叛乱分子去见戈尔巴乔夫，徒然地试图劝说戈尔巴乔夫宣布实行紧急状态，在这次失败的“旅行”前不久，8 月 18 日 16 点 30 分，遵照普列汉诺夫的命令，切断与苏联总统在佛洛斯角的别墅与外界的一切通讯联系。半小时后，又切断了与保卫

别墅周围地区的边防军分队的通讯联系。所以，隔离戈尔巴乔夫的行动完全是由苏联克格勃的部队执行的。

按照克留奇科夫 8 月 15 日的指示，第十科采取措施，对苏联和俄罗斯领导人中那些政府通讯网用户实行监视。从 8 月 18 日到 21 日，受监视的人中包括俄罗斯联邦最高领导人鲍里斯·叶利钦，亚历山大·鲁茨科依，伊万·西拉耶夫，根纳季·布尔布利斯，尤里·鲁日科夫，还有埃杜阿尔德·谢瓦尔德纳泽、亚历山大·亚科夫列夫及其他这样一些著名的政治家。值得注意的是，克格勃的领导甚至不信任政变中自己可能的同盟者，他们布置对副总统根纳季·亚纳耶夫，还有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安纳托利·卢基扬诺夫、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亚历山大·扎索霍夫也进行“窃听”，就可以证明这一点。窃听到的一切都要报告克留奇科夫和阿格耶夫。

第七管理局对某些政治家进行户外监视。克格勃对一系列出版物进行了检查。详细制定了攻击“白宫”的脚本。

幸而，对这个问题以后产生了分歧，这才避免了流血。克格勃独立教导中心的领导人别斯科夫接到了相应的命令，然而遵照第一总局局长未经他同意不得采取任何行动的指示，没有采取行动，后来又赞同“阿尔法”小组的立场，拒绝发动攻击。第十五总局局长弗拉季米尔·戈尔什科夫接到指示，要他组织一支 200 人的“后备队”，他没有听话。后来根·阿格耶夫告诉我，在预定冲击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大楼的那天夜里，也就是从 8 月 20 日到 21 日的那天夜里，许多领导人亲临现场，深信这场冒险必然会导致大量人员伤亡。后来把形势报告了克留奇科夫，当时阴谋者们当中偶尔有人出现在他的办公室里。他们花了好长时间决定：是冲击，还是不要发动冲击。只是到深夜 3 点，克留奇科夫才同意阿格耶夫的意见：不能这样做。于是政变结束了。

我不能提供苏联克格勃领导参加政变的一幅完整的画面，因

为我没有专门研究这个问题，还因为侦查和审讯将会对此作出评价。但十分明显，这个机构全部强大的力量都准备用来猛烈进攻尚未壮大起来的民主力量，而不惜破坏宪法和国家法律。

叛乱的组织者们在主要的一点上打错了算盘。他们没有考虑到，近几年来国内各族人民尝到了自由的甜头，把甘于受人支配的奴性从自己身上一点一滴地挤了出去。他们没有考虑到，最高层的政变已经不会像 1964 年那样遇到死一般的沉默。叛乱分子成了他们自己目光短浅、缺乏远见、对国内发生的变化不能作出正确评价的牺牲品。

聚集在“白宫”四周、阻止新的专政到来的普通老百姓制止了他们。

拒绝执行非法“新政权”命令的军人制止了他们。

民主主义的新领袖们制止了他们，在危急关头，这些领袖表现出了自己的勇敢、决心和善于捍卫人民按照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力，并且能够坚持这种权力。

虽然苏联克格勃的许多最高领导人参加了阴谋，但是这个委员会的大多数工作人员不支持他们。正如人们告诉我的，这些天里，克格勃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的基本群众要么是没接到任何指示，就这样待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要么是毫无目的地在首都的街道上闲荡。同时，他们当中还有为数不多的一些人，当时就对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违反宪法的行动和自己的领导公开表示抗议。不过，要使对“白宫”的冲击无法进行，要保护苏联总统的性命，使他不致遭到谋害，有这为数不多的一些人也已经足够了——因为和戈尔巴乔夫一起留在佛洛斯角的，还有他的侍卫，而他们也都是克格勃的工作人员。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的克格勃也站在合法民选政权这一边，不过这不包括俄罗斯联邦各州的管理局。

叛乱失败了。由于命运的支配，我却来到了这个几十年来使

人望而生畏的机构里。我要改组克格勃的心情是坚决的。但是在那些日子里，由于民主力量获得胜利，全国人民一片欢腾，我却连一点儿也没能预见到我前面道路上将会遇到的那些困难。

当时我不知道，为了力图使克格勃成为对社会的一个安全机构，我将要耗费大约三个多月的时间。

## 三、开始

几乎所有事情，最困难的就是开始。

——让·雅克·卢梭<sup>①</sup>

1991年8月23日，星期五，下午3点，我走进卢比扬广场克格勃的那幢新的灰色大楼。苏联克格勃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克留奇科夫的几位副主席，几个主要管理局的领导人——已经在会客室里等着我了。我们走进办公室，也就是克留奇科夫从前的办公室，在长桌边坐下。“你们大概知道，”我对他们说，“一小时前公布了苏联总统和国务会议的决定，任命我为克格勃主席。有人反对吗？”沉默。“那么我们就认为，我已经到职工作了。”我请求到会的人不要灰心丧气，而要继续工作，同时着手调查具体的人和分队参加本星期初这次事件的情况，但不要搞全面清洗。责任应该只由那些直接参加准备和发动叛乱的最重要的领导人来承担。

原来，根据舍巴尔申的命令，调查委员会已经成立了。

会议结束时，我通知大家，最近期间我将单独会见委员会的

<sup>①</sup> 让·雅克·卢梭（1712—1778），著名法国思想家，启蒙者。

每一个成员。这是苏联克格勃委员会的最后一次会议。

8月23—24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大楼几乎处于被包围的状态。卢比扬广场上，捷尔任斯基纪念像周围，大楼的入口附近，经常举行群众大会。<sup>①</sup>

警卫队长打来电话：“人们往大楼冲来！要占领大楼了！”对此我并没作出特别反应：“你们自己设法应付吧。”但是为防万一，我和我认识的一些参加过阿富汗战争的老兵取得联系，请他们帮忙。俄罗斯总统、副总统都到广场来过。来安抚举行集会的群众。“民主俄罗斯”运动的领袖之一伊利亚·扎斯拉夫斯基自愿效劳，不让发生破坏性的暴力行为，要我在情况完全无法控制的时候，给他打电话去。

通过8月23—24日的大众性传播媒介，我对莫斯科人作了解释：“……反应并没有过去。组织政变的罪犯一定会受到应得的惩罚。然而最近几天，人民的愤怒往往从一小撮不负责任的冒险主义者转移到克格勃全体人员的身上。这表现为在大楼前设立纠察线，试图占领大楼，号召进行肉体上的迫害。

“有些人追求远非合情合理的目的，想要夺取业务档案。

“我请求莫斯科人表现出克制精神，不要盲目感情用事，不

<sup>①</sup> 摘自与塔斯社记者的谈话：

问：几十年来克格勃大楼前有一座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的纪念像，政变后把它搬走了。不过这儿会不会再树立什么新的象征呢？

答：老实说，搬走纪念像，我感到遗憾，但这并不是因为我对捷尔任斯基怀有很大的敬意。绝对不是。我深信，历史教科书不能写得比这样更好了，不能比在广场上写得更好。这并不说明我们有很高的文化。纪念像最好能放在这里，提醒人们记住我们人民经受的一切。

类似的破坏文物的行为，我们历史上已经有过了——在1917年。拆毁了一些沙皇、皇帝们的纪念像以及其他等等。可惜。看来这些年我们好像什么也没学会。至于说到新的象征嘛，未必值得在这儿把它们树立起来。既然已经搬走了，大概就应该只不过是在这儿开辟花坛，种上鲜花。（作者注）

要听从教唆和挑拨性的号召……

“……有一切可能，使克格勃机关永远不再成为罪恶政策的工具。

“我请求你们给予支持……”

纪念像被搬走以后，大家暂时平静下来了。

在那个难忘的周末，情况是那样紧张，克格勃里的工作又十分繁忙，相当大一部分时间不得不呆在克里姆林宫戈尔巴乔夫那里。

总统仍然是苏共中央的总书记，而在叛乱期间，苏共中央的领导实际上已经背叛了他。这是一种明显的模棱两可的矛盾情况，不可能再这样继续拖延下去。

星期天晚上，戈尔巴乔夫对党所作的著名呼吁响彻了全球，后来全世界把它叫作历史性的呼吁。把国家政权和苏共中央联结起来的脐带被割断了。

我可以作证，总统——他也是总书记——很长时间不希望这样做。甚至从佛罗斯角回来以后，被自己同一政党中最亲近的论敌出卖了以后，他也没打算与党决裂。他是违反自己的愿望不得不这样做的。党的上层人物反对作为改革者的总书记，而总书记想要得到“党内群众”的支持，这种希望又是虚幻的。作为一个政治家，戈尔巴乔夫不会不明白，不依靠政党支持，或者党不支持的国家政权（总统），是注定要垮台的。但是在苏共内，他已经早就得不到这样的支持了。他尽可能拖延着。但最后，实际的决裂在法律上固定了下来。

正式取消克格勃内党组织的问题，出乎意外地很容易就解决了。政变以后，叶利钦发布了一道命令，暂时停止俄共的活动。

我过去认为，现在仍然认为，取消党组织，无论如何也不应意味着，一个人是否能从事某种职业，要取决于他是不是那一个或这一个政党的党员。根据政治上的理由禁止人从事某种职业，

这是直接违反人权的。但是我完全同意这种观点：国家机关或企业内不应有党的机构。（顺便说说，在苏联总统办公厅、安全委员会里都没有党委会。）在矿场、部或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外，一个人有权实行自己参加政治组织的宪法权利。

我正是从这样的立场出发来对待取消克格勃内党组织这一问题的。在我到来的一天以前，舍巴尔申就已经签署了关于这个问题的命令。委员会里的党委停止了活动，没有发生任何抗议或绝食罢工。苏共已经威信扫地，就连几乎人人都是党员的克格勃的工作人员也不肯出来保卫它了。不过也不会不发生一些小冲突。我记得，有一个显然十分激动的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来见我。“请您记住，”他勉强抑制着自己的激情说，“我过去是共产党员，到死也是共产党员！您可以开除我，但是我决不放弃自己的信仰！”“您是根据什么认为我打算开除共产党员的？”我回答，“这样的话，就得把所有的人全部免职。重要的是您的职业技能、对宪政法政权的忠诚，至于您信仰什么，这我不感兴趣。”

我认为，克格勃里的共产党员，他们好几代人曾徒然地试图强行给人灌输唯一一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他们比任何人都更清楚，不能强迫人们信仰什么，或不信仰什么。不能禁止任何人相信“全人类光明的未来”，何况这种思想本身（不是这种思想在我们国家里的具体表现）并不是那么坏，虽说它是幻想。愿意相信，你就相信好了，但是只能在业余时间。

取消党组织成了改革克格勃的第一个环节，克格勃应该成为不是为某一思想体系或某一政党服务，而是为国家、人民和法律服务的组织。

当然啦，这是现在，进行回顾的时候，才能这样轻松地分析自己的工作。可是当时，在最初几天，那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成几十次的会见，接连不断的电话，如波浪一般涌来的大量情报，却让人无法把工作纳入有系统的轨道。这是变幻莫测的万花

筒，疯狂的节奏，瞬息间必须作出反应，如果我犯的错误不是太多，这就是说，我非常幸运了。

8月25日。星期天。早上8点钟。应拉脱维亚最高苏维埃主席安纳托利·戈尔布诺夫的请求，与他会见。根据议会的决议，拉脱维亚的克格勃被撤销，大楼被查封，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我们商定不要匆忙行事。要共同有条不紊地处理档案、财产，主要的是，不容许以专横和不公正的态度对待以前的工作人员……

加夫里尔·波波夫打电话来。有关可能发生暗害行动的情报。已经指示：无论对民主运动的领袖，还是对苏共以前的领导人，都要加强保卫工作……

一位将军报告国防部里解体的情况。总参谋部士气沮丧。纪律涣散，酗酒。政治工作人员中心情特别沉重。人们都变得沉默寡言。担心会受到镇压。

准备起草一个指示：首先加强注意战略部队的情况，也要加强注意从生产到保存原子武器的整个综合体……

电话。有一位代表不知听谁说，克格勃内正在大规模销毁档案。我解释说，已经发出指示：暂时禁止对档案作任何变动。而有关叛乱的一切材料，档案里都没有，看来，永远也不会归入这里的档案。

关于干部，最好还是不要说了。揭发一个接着一个。有人利用士兵建造别墅。有人参加叛乱。有人犯了最大的大“罪”——摘掉了自己办公室里的戈尔巴乔夫像。有人迫害赞成民主主义的工作人员。有很多关于其他部门的情报。苏联最高苏维埃的领导，这一个或那一个部长的行为如何如何。我无权对任何一份情报置之不理，也无权立刻相信一切情报——有时这些情报是一些不认识的人提供的。责成谁来核查呢？克格勃吗？因为通常都没有确定犯罪的正式声明，所以这类情报大多数都没有什么结果。

感到担心的格里戈里·亚夫林斯基来了。在这个不安定的时

期，可能销毁或伪造与预算、外汇和金融业务、外债和黄金储备有关的文件。立刻责成第六管理局局长萨文科夫个人负责搜集必须的情报，制定进行监督的行动计划……

最初几天，叶利钦经常打电话来：“我认为，应该把驻在焦普雷营地的一个师转交给国防部”……“已经这样做了”……

电话铃又响了，提出第一副主席的人选，毫无保留地接受了这一建议……（但后来这一人选没有获得通过）。然后谈到必须使克格勃的莫斯科管理局接受双重领导，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

与维塔乌塔斯·兰德斯别尔吉斯进行一场长时间的困难谈话，他要求立刻把所有档案都转交给代理机关。我反对。两人都坚持己见。

叶戈尔·亚科夫列夫友好地要求从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撤出作战后备队的军官。我同意。但是这样做的时候，不应造成错觉，认为那里已经没有克格勃的地位了。

8月26日。早上8点钟。这一天是从与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弗拉季米尔·加姆扎谈话开始的。他提出了一个照我看颇有见地的对安全工作进行改革的构想。这已经是我这里的第五个方案了。我添置了一个关于改革建议的文件夹……建议不少，其中也有一些互相矛盾的建议……

但更多的是业务情报。明天企图谋杀……（说出了一位著名政治家的名字）。正在准备发动一场新的叛乱！有一纵队装甲汽车正沿着辛菲罗波尔公路向莫斯科方向行进，对国家汽车检查局发出的信号没有任何反应……以及诸如此类的情报……我感谢这些日子，它们使我的神经变得坚强起来了。

有许多非常重要的情报。

8月26日，星期一，莫斯科副市长尤里·鲁日科夫打电话来，说有一个人去找他，这个人拥有一些有关苏共的情报，对这些情报我应该很感兴趣。我委托我的副手维亚切斯拉夫·尼科诺

夫处理这个问题，他是跟随我从总统办公厅调到克格勃来的。第二天我的桌子上放着一张字条，字条的内容，我简短地引述如下：

根据与所叙述的事件直接有关的来源提供的情报，最近 25 年期间，中央委员会有一笔左翼政党和工人政党的基金，苏共每年存入 2200 万美元。最后一次存款是 1989 年存入的。1990 年有大约 1100 万美元分给了许多政党。各国外币的现金存放在对外经济银行，账 №1……基金的直接管理人，最近期间是法林（苏共中央书记兼国际部主任）。法林有权提取所需要的数目，存款的保管人会亲自把现款送到苏共中央委员会。在苏共中央，把这笔钱转交给克格勃的一名工作人员，通过他交给有关国家的间谍头子，再由这个间谍头子转交给接受资助的那个党的委托代理人。后者给开一个收据，收据通过克格勃第一总管理局的渠道交回苏共中央。存款账户上有大约 1150 万美元。8 月 23 日，法林把关于这笔基金的所有文件都拿去，锁到自己的保险箱里，同时还有波兰统一工人党归还的贷款 60 万美元，也锁进了他的保险箱里。

此外，苏共中央和苏联克格勃还有向国外政党提供资金的其他形式。例如，“友好的”西方商行“X’，向全苏对外贸易联合公司“Y’，购买某种货物。“Y”卖货得到的这笔钱实际上并没有交给它，而是通过克格勃的渠道又回到了“X”商行，再由该商行用来资助有关政党。“Y’，的亏损由克格勃的预算以卢布来予以弥补。

根据所得到的情报，1991 年初，曾以政治局某一成员的名义草拟了一份报告，建议将左翼和工人政党基金中的外汇存入苏联克格勃在国外的备用银行账户。

这份情报最初使我大吃一惊。几年来我自己一直是苏共中央委员，但是从未听到过这样的事，虽说也能猜到，确实会有这种

情况。我立刻派人组织仔细核对上述事实。向戈尔巴乔夫作了报告。而且认为，必须把这一情报告知俄罗斯内务部部长维克托·巴兰尼科夫。我不相信克格勃的工作人员会认真去做这项工作，然而对巴兰尼科夫，我是完全相信的。不久就获得了第一批结果：内务部的侦查员们相当干练地从苏共中央国际部的保险箱里没收了 60 万美元现款。后来又发现了 1100 万美元。

（俄罗斯报）上发表了亚历山大·叶夫拉霍夫（苏共中央工作人员）的一篇文章以后，10 月里，苏共援助外国政党的事被广泛宣扬出来。但那时候这个问题已经是由俄罗斯联邦检察机关来处理了。

从“肃反工作者”忙乱的日常工作回到分析改革克格勃的构想和实现这些构想的实际行动上来，大概应该先从干部问题谈起。以前我们领导人都喜欢重复说：干部决定一切。是不是这样呢，不过现在的情况正是应该从干部开始。

我的出发点是：克格勃参加叛乱，这是领导人的过错，而不是普通工作人员的错误。正是基于这种看法，我首先向苏联克格勃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发出呼吁。当时中央机关里的人什么也不做，由于情况不确定，感到完全不知所措。

我深信，你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只要还珍视人的重要意义，而且甚至从未想过要以暴力来取代法制，那么现在都会为反对宪法制度的阴谋感到十分痛心。不管这是多么令人惋惜，苏联克格勃的领导却直接参加了这一阴谋活动。反动势力想使国家和社会回到我们刚刚开始从中走出来的那条经济、政治、思想和道德的死胡同去，人民没让他们的阴谋得逞。然而果然不出所料，冒险行动使本来就已处于危机状态的社会局势尖锐到了极点。带来了许多危害。克格勃的威信在人们的心目中跌

落到了最低点。显然，以前的克格勃已经不会存在了。这是客观现实，不管你对这个现实采取什么态度。

同时，正是现在，惊惶失措，灰心丧气，希望进行报复——都是最坏的表现。谁也无权不分青红皂白，把所发生的事情归罪于全体人员，扩大打击面，“迫害异端”。责任在委员会的领导。绝不容许让全体人员分担罪责，或像通常所作的那样，寻找“替罪羊”。

时间已经失去了，但民主制的胜利正在开辟新的前景。首要的任务是阻止联盟解体——罪犯们撕毁了业已签字的联盟条约，从而加速了联盟的解体，而遵守联盟条约，本可以开始进入一个稳定时期。

在这个不稳定的时期，比任何时候都要求更加注意和保卫国家的安全。我们没有任何权利沉湎于自我检查、自怨自艾，自己放弃自己的责任。

我认为，我的任务就是要对委员会进行根本改革，使它成为一个团结一致、高度职业化的、公开的和为人们所理解的组织。克格勃应该保卫宪法制度，促进民主制的发展。不是凌驾于各主权共和国之上，而是与它们一起保证卫护国家安全的共同利益。

我请求你们集中力量，鼓起勇气，发挥自己的才智，自动更新，当之无愧地经受住落到苏联人民身上的考验。

我请求你们清醒过来，不要去考虑辩护和责难，而要考虑，怎样才能使整个国家安全系统的工作更加有效，有效得多。

我请求你们理解，现在我们要保卫的不是这种或那种思想体系的“价值”，而是公民的宪法权利，民主的真正价值，而且要在这一基础上保卫社会、国家和各族

人民的安全。过去是决不会重复的。

克格勃主席瓦·巴卡京

1991 年 9 月 27 日

天真的呼吁。也是徒然的希望。虽说我并未幻想会得到克格勃大量工作人员的支持。这样一个已经定型的保守机构里来了一个信念与旧领导截然不同的人，这在委员会内部不仅会引起某种不安，而且会引起一种敬而远之的反应，这是完全自然的。克留奇科夫周围最亲近的那些人中，有些人我自己不愿与他们共事，另一些人，根据一切迹象来看，也不能和我共事。

正如我所允诺的，我会见了委员会成员中的每一个人，他们来找我谈话，并带来了报告，在报告中他们叙述了自己在政变那几天里的行动，最后对自己作出“裁决”。大多数是请求辞职，辞职都获得批准。有些领导人，是我自己解除了他们的职务，因为我看出，他们对工作不能胜任。

这样一来，在我任职的最初几个星期里，辞职或被解职的，有克格勃的副主席格鲁什科、阿格耶夫、佩特罗瓦斯、普里鲁科夫、列别杰夫，管理局局长普列汉诺夫、格涅拉洛夫、扎尔杰茨基、拉斯谢波夫、日任、卡尔金、别达、格卢先科，“阿尔法”分队队长卡尔普欣。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检察机关对格鲁什科、阿格耶夫、普列汉诺夫提起了刑事诉讼。

我从来也不愿扩大这个名单，或者拖延委员会的“调查”。我也没有时间安安静静地研究那些“在职的”干部。需要尽快换人，因为当时我还认为，克格勃在工作，而这工作连一天也不能停止。因此我一直向我周围的那些将军们“呼吁”：让那些职业专家做他们自己的工作。不会把任何人赶到大街上去。要撤换的只是领导。退休的人是另一回事。该退休的，就得退休。

我请空军上校尼古拉·斯托利亚罗夫领导关键性的干部管理

局，他是俄罗斯共产党中的激进改革派，发生叛乱的那几天他是在被包围的“白宫”里度过的。这是个沉着镇静而又稳健的人，从来不会丢脸，不会失去勇气。然而缺乏行政工作和干部管理工作的经验，这使他不能坚决抛弃习惯的做法，依靠委员会中先进的人们，制定出更新克格勃干部的计划。看来，我的往往是主观的态度，对他也有某些妨碍。

克格勃的基干工作人员安纳托利·奥列依尼科夫成了第一副主席，以前他在莫斯科和彼尔姆州安全局工作，担任与有组织的犯罪活动斗争的管理局副局长，这是个工作能力很强，不骄傲，有经验，而且能关怀别人的人，不久他就挑起了日常工作的全副重担。对这一人选我永远也不后悔。

成了另一位副主席的，是尼古拉·萨姆，以前他曾担任过第六管理局的第一副局长。这个人表面上慢条斯理，沉着镇静，不爱多说话，他引起我注意的是博学多识，善于分析，见多识广，远远超过了职业上的要求。

最后一位副主席由费奥多尔·米亚斯尼科夫担任，在这以前他是检查局副局长，是一个有文化的、知识分子类型的人。反间谍工作全部由他负责。

最初一段时间，列昂尼德·舍巴尔申继续留任克格勃副主席，同时仍然担任第一总管理局局长。他是一位基干侦察员，有在东方国家工作的丰富经验，包括战争期间在阿富汗的工作经验。他是克留奇科夫提拔的干部，然而他学识渊博、沉着镇静、对自己的工作知识丰富，这一切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没有卷入叛乱，不过作为委员会的成员，却不能不感到自己对所发生的事也有责任。关于这一点，他在8月底自己写过一份报告，请求辞职。我请他继续工作。但看来他并不打算留任。三星期后，他的辞职终于被批准了，当时这使与“侦察员们”接近的报界感到非常困惑和惋惜。对这件事的解释很简单。这是外行领导对老干部

的第一小动作所作的反应。

摘自我与《共青团真理报》记者的谈话：

“舍巴尔申为什么走了？舍巴尔申走了，这是因为，作为一个聪明人，他想离开这里。同时也想试验一下，看他能不能操纵我。不过大概他早就猜到了，不能。他知道，这将会怎样结束，想要耍一点小小的手腕：谁是情报部门的首脑，为什么在他事前不知道的情况下就任命他的副职。我不一定必须先问一问，该任命谁担任什么职务。情报部门习惯上爱搞小圈子。不喜欢外人。这我理解。我特意把一个外来人派到那里去。是一个正直的人。舍巴尔申应该明白这一点，如果他想留下来的话，可是他试图搞小动作……不管是好是坏，不过我永远不会在搞小动作的人面前止步不前。我不能工作吗？你不能工作，就不要工作好了。而不要感到受了委屈。”

列·舍巴尔申走得这样快，并不是我所预期的，不过这也不是悲剧。习惯独立自主的情报部门里有足够经验丰富的副局长。

然而此时此刻在克格勃周围形成的那种形势——这我以后就要谈到——要求立刻采取措施，使情报部门从克格勃分离出去，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部门。舍巴尔申既赞成这项措施，也赞成把情报部门的编制分阶段地缩减三分之一。因此他的去职使情况变得有点儿复杂化了。

必须尽快找到一位有影响的著名政治活动家，能在新情况下领导这个独立的、对联盟非常重要的特殊部门。

叶甫根尼·普里马科夫就成了这样的人。无论是对此可以作主的人，还是去征求过他们意见的人，都认为这是个最合适的人选。总统府的机构尚未定形，叶甫根尼讨厌这种不确定的情况，所以也愿意来担任这个职务。

一切都取决于叶利钦的态度了。

这些天他在离莫斯科很远的地方。我在电话里说服了他，他

同意了。我这样写并不是因为“能够说服”他。不，叶利钦是不能说服的。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于：俄罗斯总统信任我。他就是这么说的。后来他对叶·普里马科夫说，对于他来说，这是个不平常的决定。而在更迟一些时候，在他公开会见情报部门的干部以后，他深信，这是个正确的选择。报刊上对普里马科夫的攻击将继续进行下去。这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他能沉着地对待这些攻击，我相信，他在国际政治领域中十分渊博的知识、他的经验、工作效率、组织才能、善于发现新问题、长于分析的头脑，这一切将会使情报部门的工作在质量上达到一个新的水平——符合俄罗斯、独联体的真正利益，符合国际关系新现实的新水平。

从我到职工作的最初几小时，我就对克格勃内这样一些现象感到惊讶和不快：执行任务的纪律相当松弛，处理公文的质量不高，甚至达不到最起码的要求。任何一个哪怕只是稍微接触过管理工作的人都十分清楚，有很多事情都取决于这样一些似乎微不足道的小事：迅速而且高质量地准备好文件，对执行决定的情况进行检查，等等。不得不撤换秘书处处长，现在秘书处由负责与有组织犯罪活动作斗争的管理局（奥普）局长德米特里·卢金担任领导，他并不特别乐意调任这个工作。看来，他对处理公文不感兴趣，而喜欢实际工作。几个月以后，卢金又回到“奥普”去了，把秘书处的职位让给了乌克兰克格勃的前主席尼古拉·戈卢什科。

我任命弗拉季米尔·鲁巴诺夫为分析管理局局长。过去他因为经常与克留奇科夫发生冲突，被迫离开了安全系统。

安纳托利·克拉尤什金领导第十（档案）科。立刻就查明，克格勃的档案中，我感兴趣的情报比最初向我报告的要多得多。

我到委员会来的时候就有一些想法，其中之一是：我深信，特工机关的建制完全没有必要按照军事部门的原则——如授予军衔等等。这样的军事化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僵硬的等级制，追逐肩

章上的“星”，寻求高级“职位”，使一切都带有一种“兵营气”。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特工机关建制都不按照军队的原则，这并不是偶然的。当然，不可能就这样一下子立刻改变旧的做法。对于克格勃的基干工作人员来说，军衔有很重大的意义——首先是精神上的意义。而且工资制度也与军衔紧密相联。这需要改变。但这是遥远的将来的事。

我自己拒绝了米·谢·戈尔巴乔夫授予我上将军衔的提议（我任内务部长时曾授予我中将军衔）。我邀请了几位文职人员到我的机关里来工作，以前他们与克格勃从来没有任何关系，然而见多识广，具有民主信念，而且有各种不同领域里的专门知识。成为我的助手和顾问的，有历史学博士、政治理论家维亚切斯拉夫·尼科诺夫，格里戈里·亚夫林斯基向我推荐的、在莫斯科大学工作的经济学副博士弗拉季米尔·古罗夫，以前在乌拉尔担任过法律系主任的法学博士尤里·斯库拉托夫。后备队中的普通工作人员亚历山大·德沃里亚德金担任了接待室主任。他们都保留了文职人员的地位。不能说我的试验完全成功了；在一个许多人仍然有军衔的机构里，这些人都感觉到，在许多方面他们乃是异类。

我要不按顺序，先说一说，我的主要错误之一，就是我到克格勃来的时候，没有带来自己的一班人马，没有带来一大批忠诚于自己事业的志同道合的人。我把自己的能力估计得太高了。没有自己的一班人马，要改变这个叫作克格勃的庞然大物，原来几乎是不可能的。

某些干部的重新配备与调查克格勃领导干部在反宪法政变时期行动的结果有联带关系。9月1日我下令解除了季托夫在机关委员会里担任的领导职务，任命奥列依尼科夫为委员会主席，检查局局长伊戈尔·梅扎科夫为副主席——这是一个非常积极、有强烈正义感的人。所有部门都接到命令，对调查进行全面协作，

提供必需的材料。

奥列依尼科夫的委员会与调查克格勃活动的国家委员会联系密切，除了谢尔盖·斯杰帕申，在国家委员会工作的还有苏联和俄罗斯联邦的许多著名人民代表——谢尔盖·斯坦克维奇，尤里·雷若夫，康斯坦丁·卢边琴科。苏联总统授权国家委员会于 10 月 26 日前提出安全机构在政变中所起作用的结论。我的处境变得更复杂了。干部不明确的情况本来就已经拖得太久，必须结束这种状况。

机关委员会于 9 月 25 日结束了自己的工作，根据调查结果，我签署命令，解除了下列领导人的职务：第三总局副局长尼古拉·雷扎克，格乌普夫军事政治管理局局长尼古拉·勃里特文，第一副局长多勃罗沃利斯基和佩尔菲利耶夫，莫斯科克格勃管理局副局长科尔沙克和卡拉班诺夫，第十二科第一副科长根纳季·古斯科夫。

我得承认，根据调查结果作出决定的时候，我表现出，我的态度是相当宽容的。委员会提议解职的人数，比我实际上解职的人数还要多。有 13 个人，其中包括卡利尼琴科，叶戈罗夫，法律科科长阿列克谢耶夫，我仅限于指出，他们“在执行上级协助叛乱分子活动的命令时，表现出政治上不成熟和缺乏远见”。我这样做完全不是企图“庇护阴谋家”，而是希望避免对人采取形式主义的态度，对于那些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是当时情况的牺牲者，而不是出于自己的反动信念做了错事的人，我想一个一个地仔细了解清楚。

9 月 25 日的命令里还指示我的几位副主席、克格勃各总局的局长、各独立局的局长和各独立科的科长，要仔细研究委员会关于全体领导和业务人员的结论，采取措施，防止今后发生类似情况。指示各共和国克格勃主席、各边区和各州克格勃管理局局长，凡是已经开始调查安全机关领导人在叛乱期间行动的地

方，都要在最短期间内完成调查，作出结论，这样做的时候，不容许进行迫害和报复，要记住，不应由执行者，而应由领导承担主要责任。

根据各地调查所提出的理由，被解职的有阿穆尔州、布良斯克州、沃洛格达州、伊尔库茨克州、明斯克州、新西伯利亚州、普斯科夫州、萨马拉州、萨拉托夫州、滨海边区克格勃管理局的领导人，他们在政变期间的态度，说得委婉一些，也是两面派的态度。

奥列依尼科夫委员会的结论转交给了国家委员会和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总检察长瓦连京·斯杰潘科夫。

对最高层干部的清理就这样基本结束了。工作应该继续下去，但是现在首要的已经是另一个层次的问题了——组织和实施国家安全机关体制的总体改革。

我不能说，从我在卢比扬广场大楼的办公室里安顿下来的第一天，对改组安全委员会就已经有一套严谨和完整的构想。不过对总的改革方向，当然已经有一个明确的概念了。细节是逐渐琢磨出来的。与委员会各级工作人员分别进行长达数小时的会见，有些人是我请来的，有些人是自己来找我的。参加各加盟共和国克格勃领导人的会议。与斯杰帕申委员会的代表交换意见。与著名的国务活动家、外国特工机关的代表交谈。在进行这些会见、谈话和开会的时候，细节才逐渐明确起来。

其实，原则上只有三种可供选择的方案。

第一个方案——治本，走东德或捷克斯洛伐克的道路。也就是撤销克格勃，解除所有人的职务，以后再为某一新的机构招募新的干部。必须指出，几乎没有人赞成这个方案，甚至在那些激进的政治家和理论家中也是如此。我也不认为这个办法是可行或合理的。

当然，仅仅作出一个主观上的决定，就可以使整个安全系统

于瞬间瓦解。但采取这一步骤的代价将远远超过任何错误，譬如说，甚至是在经济政策上所犯的最严重的错误。经济总是按照客观规律运转，即使干了蠢事，还可以指望它能自我恢复——在市场规律、企业家自由活动以及其他基础上逐渐恢复正常。安全领域内的错误，所付出的代价可能昂贵得多。重建机构、培训干部，甚至需要几十年时间，而那些原有的机构已经不可能重新恢复了。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重建这些机构，需要有新的政治决定、漫长的时间和大批经费。诚然，苏联的克格勃是不好的，可是没有比它更好的机构，而保证安全（当然，是公认的安全）的问题却并未消失。实行第一个方案，我们只不过会给各加盟共和国的安全造成真空，我不能这样做，而且也没委托我这样做。

第二个方案，原则上也是不能予以排除的，特别是，如果克格勃是由一个来自这个机构内部的人担任领导的话，这个方案就是，把改革归结为只是惩罚那些直接参加叛乱的人，再进行一些小修小补，给它化装打扮一番。实行这个方案，克格勃将保留它的全部职能，社会永远也不能保证，这个强大的机构将来不会再被某些不择手段的政治家利用来扼杀公民的自由，反对当局。

我走的是第三条道路——使克格勃不再对社会构成威胁，同时也不容许国家安全系统瓦解。我的方案是改良方案，而不是破坏的方案。我遵循的是这样一种指导思想，对这一思想，法国思想家勃列兹·帕斯卡尔<sup>①</sup>曾用一般哲学观点作过极为出色的表述：“没有力量支持的正义是虚弱的，没有正义支持的力量是残暴的。总是会有人反对软弱无力的正义，因为坏人不会绝迹，非正义的力量也总是会使人感到愤慨。可见，必须使力量和正义结合起来，或者是使正义变得强大有力，或者是使力量变得合乎正义。”

<sup>①</sup> 勃列兹·帕斯卡尔（1623—1662），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

当然，任何改革安全工作的理想方案都应以联盟和各主权共和国新的安全概念为依据。也就是说，在理论上，特工机关的组织和职权应该仅限于出自保证安全的需要，而这种需要，要由最高一级政治领导来下定义。我们的灾难之一，可惜，这灾难远远不是唯一的，就是，在那个时期，安全委员会内部或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一批批专家制定的各种不同方案，都被另外一批批专家否决了。主要是被时间否决了，被政治形势的急剧变化，首先是被中央和各共和国相互关系的飞速变化推翻了。也许，写一份保证锅炉安全的工作细则并不难，但是当这个锅炉已经飞上天去的时候，谁还需要这份工作细则呢。

所以，无论是联盟的，还是俄罗斯的最高政治领导，都没有对克格勃的改革提出任何明确的“国家要求”。

在我来到克格勃的最初几天，我就责成分析部门根据自己的构想，制定出一个计划来，这个构想要能够反映在全新的内外政治环境中的安全系数。但这项工作拖延下来了。不得不根据自己的理解，首先是根据职业工作人员的建议，采取行动。

几十年来苏联领导的出发点是，为解决安全问题，必须首先保证国家不受来自外部的威胁，保证社会意见一致，并且表现出，为解决这些任务，不惜付出任何代价。1934年正式出现的“国家安全”概念，反映了国家利益优先于社会利益和个人权利这一国家的观点。结果，当国家超越自己的职权范围，干涉个人生活的时候，就构成了对社会的主要威胁。但是国家安全机关越来越关心扩展对人们的监督，寻找越来越狡滑的“帝国主义阴谋”的证据，甚至根本就没想到，这会对社会构成威胁。

然而国内和世界上发生的根本变化，提出了重新考虑对安全问题的立场这样一个任务。民主化要求，在国家—社会—个人这三者之间建立一种性质完全不同的新关系，在这种新关系中，正是个人应该占据中心地位。我认为，安全概念的主要目的，就在

于保证公民不可剥夺的权利和自由，其中包括，不容许国家侵犯这些权利，在于保证社会尽可能不受内部冲突和危机的伤害，在于保卫联盟和组成联盟的各共和国的主权，在于创造条件，留意世界舞台上它们利益范围之内的形势。

这些最概括的总目标决定了安全委员会改革的逻辑。克格勃，更确切些说，是由克格勃保存下来的机构，应该成为支持民主社会和世界稳定的工具。

由此而产生了改革的基本原则：

1 分解。把克格勃分成一系列独立机关，使它失去对与保证安全有关的各种活动进行垄断的权利。把安全委员会分成几部分，都由国家首脑直接管辖，互相平等，互相竞赛——这已经意味着加强社会安全，消灭作为克格勃的那个克格勃了。

2 分权，或者是上下分解。让各共和国安全机关享有完全独立自主的权利，同时各共和国安全机关之间，在相对来说较小的程度上，在业务工作上又要相互配合。这与其说是取决于我的意志，不如说是取决于已经开始的、联盟内各共和国“划分权限”的过程。

3 保证特工机关活动的合法性，无条件维护个人的权利和自由。这大概不需要多作解释。

4 非意识形态化，克服“契卡主义”的传统。摆脱这个机关作为党的惩罚之剑的、很成问题的声誉，摆脱它作为普遍政治侦查和全面监视机构的、很成问题的声誉。

5 效率。由间谍狂与异端斗争，向在政治环境基本改变了的条件下的社会的现实需要转变，向建立在合作和信任基础上的安全转变。主要注意力应该放在外部的犯罪对我们内部事务的影响上，放在与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有组织的犯罪进行斗争上。

6、公开性，在特工机关活动中尽可能做到公开。特工机关

的活动应该为社会理解，得到社会的支持，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得为社会服务。

7 不要使自己的活动给国家安全带来损害。

原则明确以后，就只剩下了“小事”——在实践中实现这些原则。

## 四、分解

不要在总体中寻找统一，而更要在形式的统一中寻找分歧……

—— 库兹马·普鲁特科夫<sup>①</sup>

正如我已经指出的，对社会的威胁不仅在于不遵守法纪的思想，不仅在于得到故意支持的绝对保密和不受监督，而在于克格勃这个机构本身。这是一个渗透到一切方面、完全独立、只服从一个人的组织系统，这些组织能够共同解决任何政治的或有限的军事任务。委员会同时从事许多工作：侦察，反间谍，保卫，为国家政权最高机关提供情报和经济方面的服务，杜绝和调查危害国家的犯罪，与有组织的犯罪进行斗争，组织特种通讯联络，密码工作，保证保守国家机密，保卫边境，维护已经准备好的、战时管理国家、指挥武装力量的地下指挥点，而且还拥有自己的部队。如果再加上从医疗到建筑的高度发达的强大基础设施，对生

<sup>①</sup> 库兹马·普鲁特科夫是阿·康·托尔斯泰（1817—1875，俄罗斯诗人和剧作家）和热姆丘日尼科夫兄弟（俄罗斯诗人阿·米·热姆丘日尼科夫 [1821—1908]、弗·米·热姆丘日尼科夫）三人共同的集体笔名。

产和使用特种技术装备拥有几乎是垄断性的特权，还在军队中设有特务部门，那么很少会有人怀疑克格勃实际上的强大势力。迫切需要实行分解。从各方面来说，这都是有益的。在独立自主的情况下，每个部门都会增强责任感，表现出真正的协作精神。而主要的是，会明显减少搞阴谋和反宪法活动的危险。

在我出任主席的第一个星期，委员会所属的部门就已经开始缩减了。我不能说，在最初一段时间，这一过程就已经显得太不正常。我好像觉得，许多机构是怀着不加掩饰的满意心情脱离了克格勃的庇护。而这是可以理解的。属于这个如此令人厌恶的机构，很少会有人认为，这是值得高兴的事。除此而外，脱离克格勃，多半会提高那个分离出去的机构在国家等级制中的地位，这不可能不使这个机构的工作人员感到鼓舞。

克格勃首先失去了数万有特殊任务的部队。这是克留奇科夫于 1991 年 3 月接管其指挥权的那几个师，大概是希望在宣布实行紧急状态的时期，能够依靠它们。在 8 月 30 日我举行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我可以有充分根据证实：“根据苏联总统的命令，这些部队已经划归苏联军队，现在我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感到幸福，因为我已经没有任何可能把任何部队‘调动’到任何地方去了。我根本就没有部队了，即使我想这么做，也已经不能这么做了。不过我希望你们不会怀疑我有这样的愿望。”

保卫部门的问题，相当快就解决了。一个保卫总统的机构，却不属总统直接管辖，而且正如 8 月里已经发生过的那样，可以遵照克格勃主席的命令把总统隔离起来，无疑这是很不正常的。

“第九局”改归苏联总统直接领导，而且应该同时执行保卫俄罗斯联邦总统的任务。这个新机构被正式命名为保卫局，直属苏联总统办公厅，由弗拉季米尔·列德科色罗德任局长。

我已经说过，保卫局从第七管理局“А”联队（“阿尔法”）部署在莫斯科的分队里补充了一些人员。现在“阿尔法”的指挥

员是米哈伊尔·戈洛瓦托夫。可惜，为执行自己的直接任务，“阿尔法”需要精通专业的人员，机构调整造成了长时间的混乱，而这使“阿尔法”本身产生了解体的危险。因为“阿尔法”的任务不是保卫，它的任务首先是反恐怖。它的军官都有自己职业的自豪感。而主要的是，他们的心理不是保卫工作者的心理。如果他们只是护送黑色小轿车，那么他们会失去自己的专业技能，要么简直会逃跑。1991年11月护送鲍里斯·叶利钦去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是目前对“阿尔法”执行新任务的最“严峻的”考验，俄罗斯总统向广大听众发表演说的时候，设置了障碍的警戒线有被冲破的危险。

把负责政府通讯、密码工作和无线电侦察任务的几个局从克格勃分离出去，没有发生任何问题，而这几个局的预算占以前克格勃总预算的四分之一。8月29日，戈尔巴乔夫已经根据我的报告签署了一道命令，把政府通讯事务管理局、第八总局和第十六总局划归自己领导。在这几个局的基础上，建立了直属总统的政府通讯委员会（克普斯），由原政府通讯事务管理局负责科学工作的副局长亚历山大·斯塔罗沃依托夫任主席，这是一位职业专家，也是一位可靠和正派的人。

现在克格勃的主席已经不能自己决定切断任何人的通讯联系了。

现在情报由克普斯直接送到苏联总统和俄罗斯总统那里，而不是像以前那样，通过克格勃主席转交了。这样就会从专门机构源源不断送来可供选择的情报，使行政机关将来的领导人有可能得到最好的情报。克普斯提供的材料是不会带有任何偏见的。

克普斯面前出现了一些那个时期所有特工机关都遇到的共同问题——与各共和国协作的问题。我认为，斯塔罗沃依托夫作出了唯一正确的选择，与各共和国商谈，组建一个政府通讯事务协调委员会。当时达成了协议：分割原苏联的共同情报区域在经济

上无益，在技术上也是复杂的。“通讯事务对所有总统有利”，这一原则乃是协作的基础，根据这个原则，认为，政府通讯的技术设备（自动电话交换机，通讯、电路、交换、密码等技术设备）是这些设备所在国的财产，但所有共和国和地区政府通讯事务委员会的活动由克普斯负责调配，使之协调一致。

党的机构撤销以后，政府通讯网中许多不受干扰的线路、波道都空了出来，克普斯倡议把它们出租给银行、商人、各种企业和组织，这一倡议在各种社会组织，特别是实业界中引起很大兴趣。这只是开始。不久我们就明白了，商业秘密、业务情报需要保密，需要不受干扰，一点儿也不亚于政府和国家的情报。

我由此看到了问题的另一方面：把专用通讯设备从上层机关用户的垄断中解放出来，使之成为广泛的联系工具，会有助于提高管理效率。

老实说，克普斯的作法中有一点我很不喜欢，这就是它的领导力图为自己“争取到”更多的将军职位，并大肆扩充机构。在克格勃的时候，只有三个局，在克普斯里却变成了十六个局，局长的人数一下子不可思议地增加了许多倍。不过这一切我是后来才知道的，那时候对总统这些新机构办的“好事”，我已经无权干预了。

按照顺序，分解克格勃中央机关的下一个步骤，是把莫斯科市及莫斯科州管理局从克格勃中分离出去。关于这个问题，与俄罗斯总统，莫斯科市长，俄罗斯克格勃主席进行了谈判。在有关各方达成协议的基础上，签发了苏联总统令，根据这一命令，管理局划归俄罗斯机关领导，命名为俄罗斯联邦克格勃莫斯科市及莫斯科州管理局。签署了一份相互协作和划分责任的协议。

加夫里尔·哈里托诺维奇·波波夫给我打来电话，请我接见莫斯科管理局局长的候选人。来见我的是个留着大胡子的美男子，待人接物从容不迫，有知识分子风度，显然是个知识分子，名叫

叶甫根尼·瓦季莫维奇·萨沃斯季扬诺夫。完全是个文职人员，与特工机关没有任何关系。不过我已经对他的组织能力作出了恰当的评价。当几位政治家和院士在一起聚会，筹备民主改革运动的时候，就已经看出，如果没有一个好的行政管理人员——萨沃斯季扬诺夫，他们将一事无成。

当然，在我们时间不长的接触中对他有了进一步了解之后，我表示同意由他担任这一职务，而且我并没有做错。对于新的特工机关来说——如果这些机关终于会成为新型机关的话——萨沃斯季扬诺夫是个十分难得的人才。不错，不是立刻就任命他担任这一职务的。“有势力的人”打来过“电话”，还有政治阴谋。

“有势力的人们”当中某些人表示反对。但一切都以对事情有利的方式顺利结束了。这个文职人员和民主运动的代表进入了关键性的首都管理局，从此在旧克格勃军事化的保守帮派体系中又打开了一个缺口。

在进行了最初几次相对来说规模不大的机构改组之后，现在该轮到委员会中几个最大的部门——情报部门，反间谍部门，军事反间谍部门，边防军。

我们这一代人未必能活到所有国家都不再有情报部门的时候。有人断言，一般说，情报部门永远也不会停止活动，而且证明，情报部门是某种信任的因素。政治家、外交官们怎么说，是一回事，而当他们的话得到情报机关提供的材料证实的时候，则是另一回事，这会增强对情报的信任。我不想判断，这种意见在多大程度上是正确的。当然，随着世界越来越互相联系，越来越开放，会有越来越多的情报可以从公开报道和直接接触中得到。现在已经有了就地核查军备的国际协议，执行这些协议，会得到许多以前保密的材料，其数量之多会是世界上所有情报人员加在一起也梦想不到的。不过这绝不意味着，只有通过侦察才能获得的、涉及这个或那个国家安全的机密，将不再存在了。

然而大量情报垃圾仍然继续从第一总管理局送到我的办公桌上，这些情报垃圾往往并不比剪报有更大的价值。

在新的条件下必须根本改变情报工作的概念。我认为，首先必须摆脱这样一些观念：要求包罗万象，力图到处都有“自己的”人，就连那些他们显然无事可做的地方也不例外。了解了第一总管理局的工作以后，我得出结论，急剧缩减它的编制，不会给我们的侦察潜力带来损失，而缩小目标，提高对“秘密工作”的注意力，反而会提高侦察潜力。

1991年9月，克格勃内人心惶惶，这是因为一系列中央报纸都报道说，似乎在苏联外交部的领导和克格勃之间达成一项协议，要从苏联外交部中召回克格勃的所有工作人员。当然，我和鲍里斯·潘金之间并没有任何这样的协议，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协议。这样的决定意味着实际上取消国外情报机关，因为大使馆里的驻外间谍机关照例是国外情报机关的基础。所有西方大国的情报机关都正是依靠大使馆驻外间谍机关的支持开展工作的。而外交部长认为，应该适当缩减我们驻外使馆中第一总管理局代表的人数，这无疑是正确的。

情报部门的活动，照我看，占首要地位的应该是那些对全人类构成威胁的问题：对不扩散核武器、对能制造大规模杀伤武器的危险工艺进行监督；与国际恐怖主义和贩毒活动进行斗争。不能不注意对外经济的安全问题，当然不应把这理解为窃取先进的工艺、技术，而是要能预见世界工艺的突破，监视侵犯我国利益的非法经济活动。军事情报决不会被搁置起来，因为瞄准我们的武器还在继续生产，继续布署。在新的政治思维、世界由两级向多极转变的情况下，政治情报的意义不仅不会降低，而是恰恰相反，正在日益增加。无疑，这里所谈的已经不是留心“对官方声明的反应”，也不是收集来自政界的谣传，而是对某些国家和地区政治的、各民族间的、宗教和社会的形势发展进行分析，这种

分析要联系我国和我国公民的利益，尽可能准确地预见到这种形势。

但情报机关工作的概念中需要改变的，主要是要改变对敌人的看法，不要把“帝国主义”、把西方仅仅看作可能发生的灾难和紧张局势的根源。威廉·格拉斯顿<sup>①</sup>说，他的国家没有固定不变的敌人，只有固定不变的利益。他的这一著名公式与我的想法有共同之点。

在第一总管理局属于克格勃的那个时期，我就是遵循这些总的原则来组织情报活动的。然而，为情报部门提出目标，这是政治家和总统们的事。以侦察为职业的人，他们的工作是确定怎样调和和最有效地利用情报机关和电子技术，来达到这些目标。

按照顺序采取的第一个步骤——首先是为了挽救情报机关——我认为必须尽快使它从克格勃中分离出去，成为一个独立部门。这个主意既有许多人赞同，也有不少人反对。

反对的人认为，情报机关和反间谍机关常常为了完成共同任务，总是在密切联系的情况下开展工作，把它们分开是有害的。他们证明，第一总管理局的精兵强将和它属下的几个研究所分离出去以后，委员会智力活动的潜力必然会下降。他们说，经济部门和供应部门的统一基础设施不可能分开。所有这些理由都没有重要根据。把两个机构分开，并不排除，而是恰恰相反，会推动从事业务工作的人开展真正独立和全权的合作。在同一个机构里，居重要地位的总是上级领导的指挥，而不是合作。

赞成把克格勃和情报机关“分开”的人们的论据更有说服力，其中最主要的一条理由是第一总管理局局长舍巴尔申提出来的。用他的话来说，这一要求在全体侦察员中已经酝酿成熟了，

<sup>①</sup> 威廉·格拉斯顿（1809—1898），英国国务活动家，自由党领袖。1868—1874，1880—1885，1886，以及1892—1894，曾几次出任首相。

但是在以前的情况下，他不得不抑制同事们的愿望，不管他是多么赞同他们的意见。舍巴尔申认为，只有让中央情报机关独立工作，才能使它摆脱拖在后面的不愉快的克格勃“尾巴”，让它只去履行国家真正需要的职责。

赞成让情报机关独立的人还从世界其他国家的实际经验中提出一些论据，其中包括美国和它独立的中央情报局。第一总管理局分离出去以后，将组建一个独立于克格勃的中央情报机关，我也喜欢这个想法。

一系列加盟共和国都在悄悄议论克格勃的改革，越来越明显地试图把情报机关拉到它们国家里去，这一情况首先促使我急于要作出“分家”的决定。各共和国的这种意图只能导致一个结果——使情报机关完全瓦解。不能容许第一总管理局分解为吉尔吉斯、乌克兰、俄罗斯以及其他共和国的情报机关。那样会使它完全丧失行动的能力。同时我坚决赞成，统一的情报机关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仅仅为联盟政府服务，而且与其说今后它是为联盟政府服务，不如说是根据各共和国本身安全的需求，为各共和国服务。

预见到情报机关面临的威胁，我给戈尔巴乔夫总统送去一份报告，建议当机立断，立刻解决组建独立的中央情报机关的问题。报告中还说，考虑到这个机构的重要性，建议任命一位著名国务活动家或社会活动家担任它的领导人。在这个名单上，第一个名字是叶甫根尼·普里马科夫院士。

我已经说过，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都支持我的观点。10月1日，根据苏联总统的命令，普里马科夫院士担任了第一总管理局局长，最初还兼任克格勃第一副主席。我不能说，这一任命受到克格勃和政界正统派的热烈欢迎。在一个关键性的总管理局里又出现了一个似乎并不是职业工作人员的领导人，这个人自己没在“现场”工作过，也不熟悉这个机构。我却深信，情报机关恰恰

是需要一位像普里马科夫这样的著名政治家来担任领导。情报机关的职业化程度已经够高了。它所缺少的是对政治上的轻重缓急作出明确选择，缺少的是道德上的判断力，懂得它是在为谁和为了什么工作。

叛乱之后，第一总管理局面前出现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与许多国家特工机关的高级代表人物公开号召苏联侦察员叛逃有密切关系，他们答应世间所有的一切幸福条件换取有关我们情报机关的情报。值得赞扬的是，即使考虑到情报机关中那种很不寻常的道德气候和祖国令人很不愉快的形势，这些肆无忌惮的号召也没有在我们情报机关的工作人员中得到响应。年底，普里马科夫确定，在他到任以来的这段时间里，情报机关中没有发现一起“叛逃”的事情。但是，众所周知，最近一段时间情况发生了某些变化……

当时我支持普里马科夫保持对外情报机关的统一，同时也不反对各共和国建立它们所需要的任何机构，包括情报机关，首先是领土内的情报机关。我认为，他关于停止在国外苏侨区进行侦察工作的指示是正确的，那种侦察工作是旧的间谍狂的余波，是全面怀疑我们每一个公民可能“背叛”的回声；我认为，他指示取消跟踪监视对苏联进行突然导弹核袭击的计划，也是正确的。为实现这个计划，几十年期间内，克格勃和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部格普乌的几乎全部驻外机关都在不同程度上紧张地参加了这项工作。这一计划从国库中吞噬了大量金钱，却极端无效，仅仅是装点门面而已，实际上只是定期写一份报告，说这一个或那一个国家并不打算在最近期间向苏联投掷核弹。“冷战”的又一个遗传症被消灭了。

如果说，实现把情报机关从克格勃分离出去的想法并未引起特别的矛盾，那么第三总管理局的情况就不一样了。最初，我曾同意沙波什尼科夫元帅的意见，计划把它移交给国防部。

军事反间谍机关的问题有一段很久以前的历史。有一段时间，例如卫国战争期间，它属于军事部门。卫国战争结束后，斯大林害怕失去对军队的监督，这种恐惧心理迫使他让军事反间谍机关回到安全系统里来，赋予它的职权，是作武装力量的“监工”。发生八月事件的时候，军事反间谍机关的某些机构站在叛乱分子的前列，于是不得不又把这个问题重新提了出来。后来由尤里·布雷金领导的第三总管理局的新领导对自己的命运表现出某种无所谓的态度。起初他们对划归国防部领导表现出极大的热情，甚至着手和国防部一同准备了一系列相应的文件。后来布雷金又怀着并不亚于以前的热情证明，第三总管理局必须留在克格勃内，借口说，在组织上和心理上都没作好转到国防部去的准备。

还有一个考虑，使我并不急于让军事反间谍机关分离出去。把它转交给国防部，就会使它成为国防部领导的“囊中物”和驯服工具。这和我想建立“抑制和均衡机制”的思想是相矛盾的，而且会加强垄断，不过已经不是由克格勃，而是由另一个强有力的机构——军队来垄断了。

然而最主要的是，从最初几天起，我就不得不确信：在军队的环境中，由于政治上的混乱状态，根深蒂固的社会痼疾，会增加不稳定，使纪律涣散。而围绕着拥有核弹头的各个部门，正在形成一种什么样的局势呢？应该有某个独立的机构帮助国防部长、各军区总指挥得到有关这个问题的客观情报。权衡一切利弊之后，我们共同这样决定：只要军队还是统一的，为了使它继续保持统一，军事反间谍机关也应该是统一的。结果第三总管理局留了下来，仍然归我管辖。

最后，要确定边防军的地位了。最初我遵循的方针是，要让它成为苏联的边防军，而不是克格勃的边防军。还在 8 月里，这样的建议就已经准备好了。

不过，如果说，保卫部门和政府通讯事务委员会转归苏联总统办公厅领导，只要有戈尔巴乔夫的命令就已经够了的话，那么要让已经获得国家管理的中央机构权力的边防军（情报机关也是一样）分离出去，却需要有苏联国务会议的决定，以后还要得到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的批准。此外，情报机关和边防军分离出去，多年来命名为苏联克格勃的那个机构实际上也就消失了。撤销克格勃的问题也不属于苏联总统的职权范围。严格地说，这是苏联最高苏维埃的问题，但是它实际上也正在改革，而且会议无论如何也召集不起来。

当然，得从国务会议开始。而且得赶快，因为，根据它第一次会议的情况来看，它不大可能定期而有效地工作。

然而当我在国务会议第一次会议上刚一谈到必须为第四季度预算拨款，并提高全体人员的工资的时候，立刻就向我提出，应该完成任命我的时候我所接受的任务。这些问题与改组克格勃机构的建议同时提出来了。

1991年10月22日，各共和国首脑和苏联总统在国务会议上研究改组国家安全机构的问题。

会议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在三楼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室里。不太久以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刚在那里开过一次会。

我“瓦解克格勃的活动”，从开始已经过去两个月了。我为国务会议准备了一个简短的报告，在报告中我谈到了克格勃是个什么机构，它应该做些什么，它的工作是多么缺乏效率，对国家是多么不安全。我报告了克格勃的改革工作，谈到在这方面已经做了些什么：

“在安全部门的法律地位和提高工作效率这两方面做得最少。正在制定新的法律草案。但暂时我们简直不知所措。选择的余地十分有限。要么以旧的法律为依据，要么完全停止工作。

“克格勃对国内舆论界的公开性，与国外特工机关的联系，

都越来越明显了。

“我们已不再在异己思想和‘帝国主义的威胁’中寻找敌人。但是还没有学会具体分析。

“此外，尽管我深信这一切都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几步，但目前克格勃尚未进行真正的根本改革。

“这是因为，有一系列主观和客观原因：

“1、没有联盟条约，因而不可能明确提出共同的、总的安全概念。

“2、调查克格勃活动的议会委员会的奇怪立场。其实，与这个委员会并没有原则性意见分歧，但是这个委员会一方面在催促，建议国务会议‘于最近几天内发表彻底改组克格勃的正式声明’，而另一方面又为我们采取的每一个步骤设置障碍。就连没有任何法律效力的总统委托：‘提供建议……’也要求停止执行。

“由于俄罗斯总统鲍·尼·叶利钦坚决干预，才阻止了委员会作出更加奇怪的决定：先‘撤销克格勃’，然后‘立刻’开始谈判，解决组建，相对来说，共和国间新克格勃的问题……

“反过来是不是更好一些呢？

“先谈判，明确该做什么，然后再撤销……要破坏安全机构很容易，不过也很危险，而且也不大可能在经过一个不明确的阶段以后，重新组建这些机构，即使是在我们现在这样很低的水平上重建，也是不大可能的。

“委员会向‘克格勃领导’（也就是巴卡京）建议，放弃实现改组机构、调动干部……的计划，这个建议看起来是很奇怪的。

“那么做什么呢？

“众所周知，改组机构、调动干部都是克格勃主席的权力，而主要的是，有国务会议的委托，委托他提出改组克格勃的建议。

“鉴于出现的情况，我请求国务会议重申它的委托和赋予我的权力。

“不能匆忙行事，但也不能白白浪费时间。国家和社会的安全正处于最低水平。叛乱之后，全体工作人员的心情是复杂的。有发生反作用的危险。

“我已经以克格勃的名义向国务会议提出建议，大多数领导人和各共和国委员会的主席都支持这些建议。

“现在不是所有人都支持把军事反间谍机关交给苏联军队。因此请求取消这个问题。

“请求采纳所有其他建议。不能再拖延下去了。

“不明确是政治生活中最坏的情况。”

正如人们常说的，大家很感兴趣地听完了报告，但讨论不太热烈。白俄罗斯领袖斯坦尼斯拉夫·舒什克维奇事先准备好的反对把军事反间谍机关划归军队的激烈发言没有得到响应，因为我自己已经撤回了这个建议。鲍·叶利钦支持我的观点。此外，对拟议中的变动，他大概比别人了解得更多一些，他答应我，要和斯杰帕申的委员会谈一谈，有一个时期，这个委员会受到这样一些政治家的影响，他们希望立刻把“苏联的”一切，这就是说，克格勃也在其内，全都弄到俄罗斯手里，以后再说。

“边防军联合指挥部”这一表达方式被认为不明确，引起了争论，不过问题终于解决了。

根据讨论的结果，通过了国务会议第八号决议，这项决议是向撤销苏联克格勃迈出的最初的一大步：

“1、认为必须撤销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各共和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及其所属机构纯属各主权国家管辖范围。

“2、在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基础上组建若干由苏联国家管理的中央一级机构：

“苏联中央情报机构——为保证各共和国及苏联整体的安全

开展情报工作；

“共和国间的安全机构——协调各共和国安全机构的工作，并共同协作开展反间谍工作；

“保卫苏联国家边界委员会及边防军联合指挥部——组织保卫苏联陆地、海洋、河流、湖泊和其他水域及苏联经济区的边界。

“决定，由苏联预算及苏联储备基金保证上述机构的财政、物质—技术需求。”

那个时期报纸上开始议论，似乎国务会议受苏联总统支配，在斯杰帕申的国家委员会工作结束之前几天，专门审查了安全机构的改革问题，目的是作出与这个委员会的建议相矛盾的决定。此事与苏联总统安全无关。正如我已经说过的，矛盾不在于实质，而在于那条“新的”政治路线：消灭苏联及其一切设制，最终为自己开辟道路。就改革特工机关的基本方针来说，我们的观点与斯杰帕申及委员会大多数委员的意见完全一致——无论是原则，还是对机构改组的具体看法，都完全一致。在这种情况下，拖延到国务会议下次开会时再作出撤销克格勃的决定，只不过意味着延长旧委员会垂死的痛苦，不让新的安全机构获得正式地位。

虽然从法律观点来看，国务会议的这一决议还需要苏联最高苏维埃批准，但是从此时此刻起，我们已经开始根据新的现实来开展自己的实际工作了。不久就发布了苏联总统的命令：任命普里马科夫为中央情报局局长，卡利尼琴科为保卫国家边境委员会主席，任命我为共和国间安全局（姆斯勃）的领导人。

从这时起，对外侦察和保卫边境的问题，形式上已经不属我的职权范围了。我主要关心的是组建一个有能力的姆斯勃，它的任务和职权大概近似美国的联邦调查局。详细制定姆斯勃的组织结构，草拟姆斯勃的章程，协调所有安全机构的工作关系。

应当成为我们工作的法律基础的临时章程，由苏联总统 1991 年 12 月 28 日的命令批准了。姆斯勃遵循各共和国和苏联的法令及其他决定开展工作（如果各共和国对这些法令和决定不提出异议的话），同时也要遵守它自己的章程。姆斯勃由总统直接领导，并责成苏联最高苏维埃、苏联国务会议监督它的工作。共和国间安全局的职权首先是制定“各共和国安全机关工作的总原则，最有效地利用现有条件维护苏联和各共和国的安全，协调各共和国安全机关的工作”。

在姆斯勃的许多职责内，我优先注意的是：协调各共和国安全机关的反间谍工作，预防和制止外国特工机关及损害苏联和各共和国安全的国外组织的活动。

我想，谁也不会怀疑，的确是有这种损害我们国家安全的活动。十月里，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在他的一次讲话中宣称：“反对共产主义的斗争所取得的成绩并不意味着中央情报局的工作已经结束了。我们应该找到为深入了解苏联秘密所必需的最好办法。我们不打算消灭我们花费了那么多劳动建立起来的情报潜力。然而我们应该使之适应新的现实。”其他国家特工机关在苏联境内的积极活动，也看不出有所收敛。不仅如此，这些国家中有一些国家特工机关的活动甚至更加猖獗，而且越来越经常地表现为，当我们的同胞遇到什么经济困难的时候，就委婉地提议帮助他们。

然而，正像美国人一样，我们也要适应新的现实。对反间谍工作，我们不再作像以前那样的“广义”解释了，而以前我们几乎是逐个监视所有外国人和每一个认识外国人的苏联公民。

世界上和我国的内外政策，发生的变化都太大了，继续鼓吹以这种态度布置反间谍工作，已经不可能了。

此外，根据国内的现实情况，我认为，利用第二总管理局的职业化力量和业务潜力，与有组织的犯罪活动，首先是与国际性

的有组织犯罪活动进行斗争，是很重要的。如走私，买卖外币，恐怖主义，贩毒，贪污受贿。

军事反间谍机关面对的任务，不仅是习惯上所理解的那种反间谍工作——保证武装力量的外部安全，而且还有内部安全问题——防止军内有组织的犯罪活动、恐怖主义、盗窃和贩卖武器。

这样一来，除了克格勃传统的“抓间谍”的任务，又出现了第二项任务——与最高级、最危险的有组织的犯罪活动进行斗争。

这一任务的迫切性显而易见。在国内政治和经济形势不稳定的情况下，有组织的犯罪活动史无前例地滋生蔓延，不仅对公民，而且对全社会，对国家本身都构成了现实威胁。在这些具体情况下，我放弃了以前我提出的让克格勃与内务部合并的建议，认为现在垄断是危险的。此外，也得适可而止。不能让特工机关处于不断改组的状态。归根结蒂，工作是否会取得成绩，并不取决于机构是怎样设置的。

同时我认为，在与有组织犯罪活动及贪污受贿作斗争时，必须赶紧以标准的方式明确划清各种护法机关的职权范围，当然，这并不排除参加这项工作的机构采取共同措施和已经证明行之有效的平行措施。

当然，不能说克格勃或姆斯勃在与有组织犯罪活动的斗争中已经取得了什么成绩。然而有许多行动还是可以提一提的。负责与有组织犯罪活动作斗争的管理局“奥普”的工作人员与内务部和检察机关的代表一起，在“谢列梅季耶沃”二号机场追回了一批还在 1989 年 12 月就被偷走的外币。第六管理局和莫斯科民警局揭露和逮捕了一个犯罪团伙，该团伙曾向一些在苏联对外经济银行有存款账户的公民敲诈勒索可兑换的外币。对外经济银行的工作不完善，使在国外工作的苏联人不借助黑手党“居间效劳”，很难从银行账户中得到自己的外汇，这种情况就造成了促使诈骗

罪行发展的环境。大众性传播媒介也报道过和德国特工机关共同采取的一次重大行动：跟踪监视一个犯罪团伙，没收了他们经由苏联国境偷运到西方去的一大批麻醉品。但所有这些都只不过是沧海一粟。对盘根错节、互相纠缠在一起的有组织犯罪活动的规律和原因进行深刻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开展认真的、有系统的工作，姆斯勃还没能做到，虽说已经布置下了这样的任务，有命令要组织好这方面的工作。

应当记住，在法制国家，无论哪里，特工机关都不是管理机构。特工机关最主要的职能是获取情报，向执行机关和立法机关的领导人提供情报，而这些情报应有助于防止危害社会的倾向的发展，揭露非法的、极端主义的反宪法活动，随时留意可能出现造成社会紧张局势的策源地。

姆斯勃应当协调各共和国安全机构的情报一分析工作，以利于保证各共和国的安全，同时还应该与各共和国特工机关共同利用自动情报分析系统和反间谍情报统一系统的情报信息库，履行行业已商定的为使分析系统日益完善而应尽的义务。业务档案和业务登记仍然归我们管辖。

此外，姆斯勃的职权还包括与各共和国安全机关共同制定和实现保证下列设施安全的措施：国防工业设施，原子动力设施，空间设施，交通运输设施，通讯设施，以及在各共和国境内的其他军事和战略性的设施。

与各共和国安全机关共同协作，制定有效措施，保证指挥苏联武装力量、管理国家的各个点的安全，并将这些措施付诸实现。

考虑到国内的目前形势，有些地区实际上正在进行“热”战，一些极端分子越来越经常地从军队手中夺取武器和军事装备，不难想像，如果狂热分子闯进原子能电站，或者，更糟的是，如果核弹头或化学弹头落到他们手里，他们将会造成多大的

灾难。特工机关最迫切的任务，就是不允许有发生这种情况的最小的可能性。

为联盟和各共和国的安全机关培训、重新训练干部，提高他们的业务能力，仍然是姆斯勃的职责。

以前克格勃的中央集权体制认为，首先要在莫斯科培训干部，远非所有各共和国内都有培训安全干部军官的学校。这种情况不可能立刻改变，因此认为，仍然由姆斯勃来培训干部，让它的高等学校对各独立共和国的中学应届毕业生敞开大门，是适当的。

当然，整个教学体制需要进行根本改革，在旧的教学体制中，思想灌输、关于制止制度的假想敌人——以民主主义者和其他“非共产党人”为代表——“破坏活动”的作业、宣传“肃反工作人员”的传统，这些课程所占的地位与其他课程明显地不成比例。

还在 9 月 21 日，我就颁布了一道命令，指出，在民主社会的条件下，安全机关的任务已经发生变化，为适应已经改变了的任务，职业教育的内容也应作相应的改变，并提出了首先应采取的一些措施。取消教学纲领中的思想灌输，强调掌握真正必需的职业知识和技能。责成干部管理局、各级学校以及中央机关的各部门共同提出改革教育制度、保证其科学性的构想；提出根据各共和国和地区机关的要求培训干部的必修专业和技能的清单；彻底审查教材和教学法，制定新的教学大纲和教学纪律。为实现这一改革，成立了专门的教学大纲和教学法委员会。任命尼古拉·斯托利亚罗夫为主席，维亚切斯拉夫·季塔连科为副主席，后来，他当了高等学校的校长。

当然，教学改革是一项长期工作，我并不指望会迅速发生变化。不过已经有了推动改革的因素。

各共和国特工机关的许多领导人都认为，对于姆斯勃来说，

最重要的任务应该是根据各共和国安全机关的要求，着手研究、准备并向它们提供专门技术设备，教会它们使用这些设备。

同时姆斯勃还必须具备许多旁的职能——调拨中央供给各共和国机关的物质技术补给品，实现保障安全的、保密的法律措施，保证专门的和军事的运输安全，帮助各共和国机关组织合法工作，等等。不可能一一列举。

我们认为，姆斯勃的人数完全可以控制在 4 万人以内，它的预算，以 1992 年 12 月的币值计算，大约为十亿卢布。这样一个相对来说编制比较紧凑的特工机关完全能够使反间谍工作和协调各共和国的安全工作得到保证。

对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分解，苏联最高苏维埃没有提出重要反对意见，诚然，几乎拖延了一个半月，它才批准国务会议关于撤销克格勃，成立中央情报局、保卫国家边境委员会和姆斯勃的决议。苏联总统未作任何解释送交议员们讨论的第一个法律草案，不知为什么没有能够博得“各方面”的好感，立刻被愤怒地拒绝了，并被送到各委员会去详细研究。后来草案获得了专家们的同意，随后我和安全事务委员会的正副主席亚历山大·科坚科夫、弗拉季米尔·斯塔德尼科夫会见了好几次，他们坚决赞同这个草案，而且，照我看，他们想要使各共和国和联盟特工机关的活动以及安全问题获得现代的法律基础，他们的态度是十分认真的。

最后，11 月 27 日，联盟院重新审议“关于改组安全机构”的法律草案。在对代表们所作的发言中，我特别强调了下述几点：

“克格勃显然必须改组，但这并不是目的。国家的整个政治体制和结构都在改革，克格勃也必须改组，这是合乎逻辑的。

“克格勃的某些领导人积极参加了八月政变的准备工作，政变失败后，改组克格勃已经刻不容缓，不能再作任何拖延。

“调查国家安全委员会活动的国家委员会已得出这样的结论，要求‘立刻撤销苏联克格勃，并彻底改组它的所有机构’。

“在过渡时期的条件下，新的立法机关尚未采取行动，国务会议认为，撤销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它的基础上组建中央情报局、共和国间安全局、保卫国家边界委员会，是适当的。

“无疑，在主权国家联盟条约签字以前，特工机关完整的结构，尤其是它们的职权范围，还不可能完全确定下来。然而，既然立法者的出发点从来也不是废除联盟，既然确定特工机关结构的工作已经不容继续拖延，我请求尊敬的代表们审查并通过已经提出的法律草案。在国务会议和联盟院之间现实的相互关系中，采取这第一个措施，是很重要的。

“在过渡时期的可能限度内，这项法律会使对国家有重要意义的问题变得明确起来，也使特工机关的改革工作得以继续进行下去……

“改革的一个重要原则，一个特别应该强调的原则，其实，也是改革的实质，就是各共和国安全机关的完全独立。在各共和国独立的情况下，联盟的中央集权的克格勃已经不可能存在了。共和国间安全局将主要是，而且首先是要协调各独立共和国安全机构的反间谍工作，同时也协调国家一切独立自主的特工机关的工作……

“合作的原则：出发点是各共和国的国家安全。为保卫它们以及整个联盟的切身利益，互相配合，行动一致。共和国间的安全机构只保留由各共和国授权的那些职权，而且在现实条件下，也只有共和国之间的水平上，这些职权才能实现。

“当然，组织、职权的改变本身并不能解决多少问题。目前，许多机构都可能，而且必须裁减人员……虽然应该开始考虑钱的问题了，但特工机关的改革，主要的当然不是数学问题。

“主要的是——从思想上认为一切都可以做、可以秘密使用

暴力，转变为遵守法律，尊重人权。从党一国制的国家安全转变为个人、社会和法制国家的安全。不要把特工机关的工作看作寻找内外敌人，而应认为，特工机关的工作是保持社会的稳定。

“特工机关也应促使形成市场机制，与人为的垄断作斗争。不如此，‘自由’价格思想就会在刚刚萌芽时夭折，‘自由’则将由市场上倒买倒卖的黑手党来操纵。对于和通货膨胀进行斗争，我们也不应袖手旁观，不要忘记，与通货膨胀的斗争要想取得成绩，首先取决于政治上的支持，社会的同心协力，然后才是经济学家所做的职业性的工作。”

我结束发言时说的那些话，与其说是涉及姆斯勃，不如说是涉及联盟的，但是这段话没有引起注意……

“现在各共和国的人民已经认识到，与中央集权制的压迫，与思想垄断的强制相比，自由的主权发展具有优越性。但还不是已经全部认识到在，与孤立主义相比，在政治共同体内的经济自由也具有其优越性。还不是已经全部认识到在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罕见的历史条件下民族分离主义的危险性。毫无疑问，认识的过程正在进行。重要的是不要让这一过程长期拖延下去。为了共同的利益，各共和国不得不自愿互相让出一部分主权，不得不放弃‘一切都允许的民主’，又走上建设法制国家的道路，在这样的国家里，特工机关无疑必须有一定的地位，不过它的地位应该由法律予以确定。

“今天可以朝着这个方向迈出历史性的第一步。

“尊敬的代表们，我请求你们，让撤销苏联克格勃、新的特工机关开始工作的做法获得法律根据。”

我不能说，讨论是轻松愉快的。不得不回答问题。情报机关和边防军几乎没引起任何怀疑。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清楚，为什么需要有一个姆斯勃。没有它，各共和国也可以对付过去。对这个问题，我回答得很简单：“你们在多大程度上需要有一个邦联的、

或者任何其他形式的联盟，各共和国在多大程度上需要你们这个联盟最高苏维埃，那么也就在多大程度上需要有一个共和国间的安全机构……”

亚·科坚科夫以委员会主席的名义也呼吁代表们批准这项法案。然而还是没能批准。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不到法定人数，在那些日子里，最高苏维埃经常有这样的情况。

只是到 12 月 3 日，出席会议的代表才达到法定人数。联盟院的会议开得冷冷清清，没有引起记者们多大的兴趣。然而可以认为这一天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日子。从十三点十三分通过“改组安全机构”的法案起，苏联克格勃已经正式消失。我希望，它永远也不再复活。

## 五、分权

把权力集中在汇集了一切系统的中央，不只是会造成混乱。这些系统太多，也会在它们的发源地——地方机关中引起一种毫无出路的感觉。

——西里尔·帕金森

安全机关的权力分散很少取决于我的意志或任何其他组织和政治家的意志。即使我很想阻碍权力分散（不过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愿望，我一向认为权力分散是好事），我也做不到这一点。中央集权基础的削弱，各共和国主权的加强，在很多方面都在客观地发展。

国家正处于两个历史必然过程的交叉点。一方面，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超级中央集权的帝国式联盟正在解体，它的解体是不可避免的。从这一观点出发，我认为，各共和国力图争取独立、自主，是一种进步现象。

但是，另一方面，世界一体化的进程同样是历史的必然。这一进程是无法逃避的，也无法制止它。从这一观点出发，分立主义及与其相联系的一切现象，都是反动的，从历史观点来看，注定要失败。

从一个过程向另一个过程的过渡十分复杂，而又从容不迫。无论如何，还是要在这一进程中跳上迎面开来的列车。

对中央与各共和国的关系、分散特工机关的权力这样一些问题，我所持态度的出发点是，联盟将会以某种形式，即使是最松散的、不固定的形式保存下来，然而现在发现，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叛乱平息后的一些事件，特别是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九月初召开的那次非常会议的决议，为这种谨慎的乐观主义提供了某些根据，——在那次代表大会上，发表了苏联总统和各共和国领袖的共同宣言。

我十分清楚，在民族国家体制范围内，克格勃改革的任何步骤都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可以从 9 月 5 日我在各共和国安全委员会领导人会议上发言的速记记录中摘引一段话，来说明我到职后最初几天对这个问题所持的态度：

“发生叛乱以前，社会渴望对经济实行民主改革，大多数共和国内都在进行经济改革——有时是自发的，有时是有组织的——中央政权机构实际上却对改革消极怠工，进行抗拒，这是当时的主要矛盾。这一主要矛盾使国家陷于瓦解和混乱状态，可惜，目前国家就正处于这种状态……同时，——我想，你们会同意我的看法，——只有排除基本障碍，才能开始走出危机，然而基本障碍不但并未排除，反而明显地日益增大了。我指的是联盟的瓦解。可惜，叛乱分子，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达到了他们的主要目的：阻挠在联盟条约上签字。他们以自己的行动加速了联盟的瓦解过程。

“十分明显，有罪的不仅是叛乱分子，也不仅是他们的主观意图和行动应对此负责，联盟的瓦解也有其客观基础。由于那些想用暴力保持联盟的思想家的愚蠢。而联盟是不能用暴力来维持的。过去的联盟实际上已不复存在。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希望由上面来恢复那个联盟，不管议会和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多么

严厉。这全都徒劳无益。只有总统和各共和国最高领导人声明中提出的唯一一条途径。这就是各主权国家自愿联盟，由每一个主权国家独立自主地决定它参加联盟的形式。需要使一切建立在自然和正常的基础上，首先考虑的不是联盟，而是各共和国。由于大家的利益互相吻合，各共和国达成协议，实行某种形式的联合，至于联合的形式，联系的程度，都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

“而且应该完全清楚地想像到，如果没有联盟和置身于联盟之外，绝大多数共和国，也许，有极少数例外（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可以归入这一类，不过它们也会有某些复杂情况），在最近期间内简直就会崩溃。各共和国置身于联盟之外，独立、孤立、单独地存在下去，——这是幻想……不难想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早就从圣经故事中听说过的巴比伦的混乱状态，简直就像是地上的天堂了。联盟在客观上是必须的。不过我要再重复一遍：办法只有一个——各共和国自愿联合，而且不能有来自上面的任何压力。”

顺便说一声，这样提出问题，这样来看问题，没有引起各共和国任何一位代表的异议，这样的态度也就是安全机构分权的基础。在会议上我提出了如下方案，这一方案基本上得到了各共和国的理解：

“如果我们不让各共和国之间的矛盾升级，如果我们试图寻找相互间的共同利益，那么就会看到，这种共同利益是存在的，于是我们就会使我们的相互关系达到一个新的水平。而且我要再说一次，共和国总是主要的，中央将为各共和国服务。

“不过，大概应该明白，既然历史上已经建成了对外侦察的共同机构，每个共和国再建立自己的对外侦察机构是荒谬的。对外侦察机构有许多自己的问题：提高工作效率，节约资金等等。但是对于那些懂得建立新联盟有其必然性的共和国来说，作为一个完整的机构，情报部门大概应该保存下来。而且，这里显然不

应该有任何形式的双重领导（联盟和共和国的）。

“反间谍工作则是另一回事。它可以在每个共和国的领土上进行，不过应该精确地研究好协调一致的问题。

“与有组织的犯罪活动、恐怖主义、贪污受贿以及其他犯罪活动作斗争的问题。这里完全不必实行双重领导。各共和国可以完全独立自主地处理这些问题，只需要在各共和国的机构之间进行一般协作就可以了，如：共同进行清查，共同的情报信息库，交换情报，因为犯罪活动是不知道国界的，而且不会局限在一个国家境内，不管这个国家建立了多么严格的边境制度。”

在 9 月 5 日的会议之前，已经准备好了联盟克格勃和各共和国克格勃合作的协议草案，其中谈到在保障社会安全的范围内，各共和国授予苏联安全委员会全权。我看到了这个草案的所有不完善的地方，其主要缺点是，没考虑到也不可能考虑到每个共和国中各不相同的具体情况。后来我们采取这样的办法，与某些共和国的安全机关分别签订特别协议。需要有一个中央协调机构，它的活动建立在新协议的基础上，当时我首先感兴趣的是，各共和国代表对这个想法有什么反应。

我满意地注意到，各共和国出席会议的所有代表对在联盟一级协调它们工作的想法，都表示支持。各共和国克格勃的主席：乌克兰的戈卢什科，俄罗斯的伊万年科，哈萨克斯坦的尼古拉·弗多温，吉尔吉斯的盖尔曼·库兹涅佐夫，亚美尼亚的乌西克·阿鲁秋尼扬，阿塞拜疆的瓦吉夫·古谢诺夫，摩尔多瓦的安纳托利·普卢加鲁，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立法委员会主席德米特里·布拉霍夫，哈萨克斯坦的国务顾问尤里·希特林，土库曼总统直轄协调护法机关工作委员会的主席别格然·尼亚佐夫——大家都认为，必须保留全联盟的安全机构。

在这次会议上，成立由各共和国委员会主席组成的协调委员会，以取代旧的克格勃委员会的想法得到了支持，根据苏联总统

9月11日的命令，这一想法已经成为现实。后来，10月24日，又签署了成立“共和国间安全工作协调委员会”的苏联总统令，委员会的成员除了姆斯勃的主席，还有中央情报局局长，各主权共和国（国家）安全机构的主席。协调委员会的决议应由负责协调联盟与共和国特工机关活动的共和国间安全局的主席下令执行。

10月28日，我们召开了由新成员组成的姆斯勃协调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暂时先布置了一个有点儿像开“圆”桌会议的会议厅，既没挂总统们的肖像，也没有“肃反工作者”的象征，只挂了一些风景画。结果，“开头”并不难。尽管各共和国的情况各不相同，但对所有原则性的问题，都取得了一致意见。无一例外，大家都在会议记录上签了字，我认为，这是一份非常重要的会议记录。现在这是一份历史性文件，它不仅证明，我们已经错过了一些机会，而且也证明，大家相信，必须建立独联体的协调机构。

## 会议记录

共和国间安全机关协调委员会会议

莫斯科市

1991年10月28日

1991年10月28日于莫斯科召开共和国间安全机关协调委员会会议，委员会成员有：

瓦·维·巴卡京同志，叶·米·普里马科夫同志

各主权共和国（国家）安全机关的主席：

维克托·瓦连京诺维奇·伊万年科少将（俄罗斯联邦）

尼古拉·米哈依洛维奇·戈卢什科中将（乌克兰）

埃杜阿尔德·伊万诺维奇·希尔科夫斯基少将（白俄罗斯）

古拉姆·阿利耶夫少将（乌兹别克斯坦）

布拉特·阿布德拉赫曼诺维奇·巴耶克诺夫少将（哈萨克斯坦）

塔马兹·瓦赫坦戈维奇·尼努阿上校（格鲁吉亚）

拉菲克·阿利耶维奇·萨德霍夫上校（阿塞拜疆）

安纳托利·费多罗维奇·普卢加鲁上校（摩尔多瓦）

安纳尔·别克·库拉马耶维奇·巴卡耶夫上校（吉尔吉斯斯坦）

安纳托利·阿列克谢耶维奇·斯特罗依金少将（塔吉克斯坦）

乌西克·谢连诺维奇·阿鲁秋尼扬少将（亚美尼亚）

达纳塔尔·科佩科夫少将（土库曼）

协调委员会成员表示了共同的看法，认为，正在国内进行的民主改革为建立真正的主权共和国，并为各国人民谋福利的互利合作创造了现实条件。他们确认，只有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稳定，各国人民内部和外部的安全得到保证的情况下，每个国家才有可能进行单独的和各国集体的正常活动。

协调委员会的成员认为，只有在执行统一的、协调一致的集体安全政策的情况下，每个主权国家的真正安全才能得到保证。因此他们赞成各主权共和国在国家安全领域内协作的实际步骤。

委员会成员满意地接受苏联国务会议的决议：将国家安全机关转交给各主权国家管辖，在克格勃的基础上组建共和国间安全局，成立协调委员会，以制定保证各国单独和集体安全的战略，并为此采取一致行动。

鉴于各主权共和国渴望保持统一的政治、经济和国防，因此必须建立保护它们集体利益的体制，委员会成员一致同意，共和国间安全局可以成为协调共同的努力，以保证集体安全的有效工具。

协调委员会成员审查了共和国间安全局的临时章程，基本上赞同这个章程。一致同意，共和国间安全局的职能包括：对涉及共同管辖的问题，协调其所属各部门与各主权国家安全机关的行

动；向各安全机构提供保证它们开展活动的情报；分析研究与它们共同利益有关的安全问题；开展与各共和国协调一致的侦查活动；向各安全机构提供物质技术和科研设备，以保证它们的活动；为各共和国安全机构培训和重新训练干部；以及临时章程草案中列举的其他职能。

委员会成员赞成共和国间安全局内设立各主权共和国安全机构常设代表研究所的建议。

委员会成员认为，鉴于讨论的结果，必须于最短期间内将共和国间安全局临时章程提请苏联国务会议和苏联总统审核。

委员会成员——各主权共和国代表——认为必须尽快签订各共和国安全机构与共和国间安全局之间的双边协议。同时他们也表示愿意积极参加草拟各共和国间的集体安全条约。

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克格勃内一切管理线索都集中到了莫斯科。共和国委员会的主席不得不在有关人员编制、财政拨款、机构变动等所有问题上与苏联克格勃协调一致。没有苏联克格勃的签证，各共和国分支机构甚至不能把任何一个旧“人员”从一个工作地区调往另一个地区，更不用说拥有任命州管理局局长的权力了。这种停滞的官僚主义做法鲜明地说明，克格勃内缺少任何改革的征兆，克格勃以前的领导简直是无视或暗暗抵制各共和国主权化的过程。

鉴于原则上国内已形成各共和国与中央关系的新体制，已经签署了扩大各级安全机构领导成员权力的命令。加盟共和国克格勃的主席获得了下列权力：在工资基金限额内改变人员编制和工资总额、改变工作人员的职务和工资；任命州管理局的局长，录用和辞退工作人员，授予他们军衔等等。

让共和国当局独立自主地任命其委员会的领导人，我看不出这会有任何问题。实行这种办法，共和国的领导就处于一种完全

不同的地位，要自己来就人选问题征求我的同意了。

摩尔多瓦总统米尔恰·斯涅古尔打电话来，请我接见安·普卢加鲁，他想下令任命普卢加鲁为共和国安全机构的领导人。我认识了普卢加鲁。顺便说一声，他是个思维非常健全的人，记者。我们达成协议，将协同工作。颁布了总统令，我们机关也发布命令，宣布了这一任命。这样做，有谁的利益受到损害呢？完全没有任何人的利益受到损害。我认为应该按照这种精神建立与所有留在联盟内的各共和国领导人的关系。

波罗的海沿岸各国的情况是另一回事，还在 9 月初，它们就已经正式获得了盼望已久的独立。1939—1940 年斯大林的秘密交易中断了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独立发展的权利，然而它们有权走独立发展的道路，对此我毫不怀疑。十分明显，这三个共和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活动应该停止。

但是要这样作，需要解决一系列组织、法律和政治问题。

第一，应该确定委员会工作人员本来的地位，因为他们很容易成为这三个共和国内政治斗争的人质和牺牲品。我认为，他们忠于自己的誓言，不得不为苏联法律、苏联的机关服务，这并不是他们的罪过。造成这种局势的不是他们，不如说是兰德斯别尔吉斯<sup>①</sup>和戈尔巴乔夫，他们各人维护自己的利益，把社会分裂成了两个不可调和的对立阵营。在这种情况下，我能不能让已经分离出去的这三个共和国内以前克格勃的工作人员失去社会保障——养老金、获得其他工作的机会呢？当然，不能。

第二，得解决克格勃的档案这一十分敏感的问题。这些档案不仅保存了许多极其宝贵的历史材料，而且是一些日常工作文件，是能够激怒任何一个社会的、情报机关的案卷。我不认为，可以容许把这些情报机关的案卷和整套卡片交给当地政权机关处

<sup>①</sup> 立陶宛总统。

理。不过，既然他们坚持要这样做，那么问题就只能在国与国一级来解决，而且要有可靠的法律保证，保证不把这些材料泄露出去。

第三，还要解决专门技术设备问题，首先是密码和破译密码的技术设备。这些技术设备都留在分离出去的、现在已经是外国的领土上，这一情况可能对全部密码（而且不仅仅是密码）工作造成巨大损害，而为了组织好这项工作，曾耗费了许多年时间和巨额资金。

最后，解决保卫边界的问题，也十分重要。目前形成了这样一种反常情况：联盟的边防军保卫三个“外”国与西方接壤的边界，然而联盟却完全没有边防力量来保卫它与这三个国家接壤的边界。

所有这些问题都只能由有利害关系的各方通过谈判予以解决。我曾不止一次和爱沙尼亚总理萨维沙尔、拉脱维亚的戈德曼尼斯、立陶宛的代表瓦依什维拉交谈过。应该说，我和埃德加·萨维沙尔之间建立了较好的相互理解的关系。实际上我立刻就往所有这三个国家派去了全权代表团，让他们去准备协议草案，这三个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领导人也经常到莫斯科来。

紧张的协商和互相配合为相当快地签署协议创造了条件，协议规定，完全停止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三国内联盟——共和国一级安全委员会的活动。确定了一个短暂的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内解决一切有争议的问题。联盟克格勃承担责任，保证安置这三个国家克格勃所有在职的和以前的工作人员，由联盟预算内拨款发给他们津贴。为联盟各共和国安全机构雇用他们创造了条件。

可惜，还是难免会遇到一些复杂情况。结果发现，我们的干部部门很不灵活，有些地方表现出完全可以理解的利己主义。不得不几次派我的副手尼·斯托利亚罗夫去推动这项工作。立陶宛

和拉脱维亚，已经开始利用档案进行投机了。有些领袖经不住诱惑，总想利用获得的文件与自己的政治对手算账。结果只是更加煽起仇恨，使政府和议会里局势变得更加尖锐。

专门技术设备的命运，由对此有利害关系的各方组成专家小组进行研究。某些专门技术设备，汽车运输和组织技术设备，无偿地或有偿地转交给了以前的加盟共和国；另外一些则运回苏联领土。

保卫边界的问题是这样解决的——明确规定一个过渡时期：波罗的海沿岸各国要培训自己的边防军干部，还要解决许多与建立签证制度、出入境手续、检查护照的机构等有关法律问题，这一切都必须有一个过渡时期。

停止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安全委员会的活动，不仅需要双方的协议，而且要求我们采取单方面的措施。其中包括，必须帮助军职人员解决今后继续服役的问题，安置工人和职员，还要安置从这三个国家回来的、他们的家属，设法解决他们的住房问题，并为他们创造其他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的条件。考虑到全国所有地区住房也都相当紧张，其他条件也不十分理想，要解决所有这些问题，是很不简单的。有相当大一部分安全机构的工作人员从波罗的海沿岸三国迁移到邻近的白俄罗斯，而白俄罗斯本来就已经被切尔诺贝利搞得民穷财尽，现在又要安排这些人的日常生活，因而使这一工作变得特别困难。10月，我命令克格勃帮助白俄罗斯共和国成立军事建设局，作出规划，于1992—1995年期间在威帖布斯克建成一座军医大楼，在莫吉廖夫建成门诊部，在明斯克建成一批住房。

留在联盟内的各共和国（俄罗斯除外）安全机构的改革，几乎都是沿着脱离莫斯科、加强独立的方向发展。甚至难以把这叫作改革，因为多半只是给委员会换个名称，改由共和国的政权机关管辖，但是工作的方向、形成和精神都没有什么重大改变。我

无法摆脱这样一种感觉，各共和国的新当局把安全机关和对它们的监督看作民族国家体制的重要象征，而没有看到这是对民主政治的潜在威胁。也许，它们还没达到实行民主这一步吧？也许我的看法不对（我希望我弄错了），不过，照我看，联盟克格勃改革的速度超过了这些共和国的速度。我影响那里局势的能力是十分有限的。

苏联克格勃（姆斯勃）与各共和国委员会相互关系的性质，共和国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它们派驻中央的代表的职权范围，都在双边协议中作了明确规定，10—11月，一直在加紧草拟和准备签署这些协议。10月8日签署了第一批这样的协议——与乌克兰国家安全局的双边协议，接着是白俄罗斯共和国克格勃，摩尔多瓦共和国国家安全部，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克格勃。11月中旬，我离开莫斯科，三个月来，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外出访问——去了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与这两个共和国的领导人进行了很有意思也非常有益的会见，并与两国的安全委员会签署了双边协议。

与外高加索几个共和国达成协议的过程比较复杂。那里对联盟的克格勃不信任，也不可能信任。以兹维阿德·加姆萨胡尔吉阿为首的格鲁吉亚领导信守自给自足、自我孤立的政策，不愿在共和国一级与外界进行任何接触，其中也包括安全问题。这样，我们始终未能打破“格鲁吉亚之墙”。至于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安全机构，结果发现它们客观上要求合作的兴趣超过了对中央的成见——12月初和我们签订了协议。

当然，这些共和国实际上处于互相敌对、不宣而战的状态，对中央都同样不信任，而且抱有成见，要与它们合作，并非易事。需要经常得到有关外高加索发生的事情的准确和客观的情报，然而几十年来组织的获得情报的传统渠道，已经不起作用了。从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安全委员会给我送来的情报往往是不

完整的 或者是“修改过的”。

我认为，与外高加索各共和国相互关系的主要原则，是不干涉双方的斗争。有时大声疾呼，指控“克格勃”在外高加索“进行挑衅”——这种指控特别经常出自加姆萨胡尔吉阿之口——这当然纯属虚构，不过并非完全无害。

到 12 月初，参加联盟的各共和国中，只有三个还没有和姆斯勃签订双边协议。格鲁吉亚原则上不进行接触；乌兹别克斯坦，和它有争议的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了，我计划去塔什干签署协议。最后，还有俄罗斯。

无疑，与分权有关的主要问题，只有在俄罗斯联邦建立独立安全机构的过程中才能获得解决。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说又建成了一个共和国的特工机关。出现了一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新情况：联盟的克格勃失去了“自己的”所有一切领土，因此，对于联盟的克格勃（姆斯勃）来说，必须更加强调它的职能仅限于协调各共和国安全机构的工作了。

俄罗斯联邦的克格勃最初是于 1991 年 5 月成立的。当时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叶利钦和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由苏联总统授予全权）签署了相应的议定书。随后的四个月里，几乎没有为组建俄罗斯的克格勃做过任何事情。俄罗斯克格勃的中央机关里未必有 20 名军官，所有俄罗斯各州的管理局仍然由苏联克格勃管辖。所以实际上不得不从零开始。

1991 年 9 月 4 日我公布了一项命令：“为建立俄罗斯联邦克格勃，并为其开展工作提供保证的紧急措施”。以前各自治共和国的委员会和各边区及州的管理局，都划归俄罗斯克格勃管辖。责成联盟克格勃干部管理局缩减联盟克格勃各部门的编制，把编制内的人员全部调拨给俄罗斯的委员会；调离的人员所占用的房屋、使用的通讯设备、计算机、交通运输工具及其他财产，均同时转交给俄罗斯安全委员会。命令禁止给希望调往俄联邦克格勃

任职的工作人员设置障碍，不准许他们调离。实行一种原则性的新办法，规定苏联克格勃中央机关各部门的领导人只有征得俄联邦克格勃的同意，才能向俄罗斯安全机关发出指示。规定：在最初一段时间，把卢比扬广场上那幢克格勃大楼拨给俄联邦克格勃中央机关——几十年来那幢大楼一直是克格勃的象征。

当然，希望单凭一纸命令就建成一个庞大的新机构，那将是非常天真的。我知道，为组建俄罗斯内务部，当时几乎花了一年时间。即使是在克格勃的基础上，要组建一个原则上全新的机构，也是困难的，关于这一点，谁也不会持不同看法。只换一块招牌，就比较简单。只要一把锤子和四枚钉子就行了。

9月里我就已经清清楚楚地感觉到，有许多俄罗斯政治家企图完全取消克格勃的联盟机构，简单地把它们划归俄罗斯管辖。这种倾向完全符合叶利钦周围——无论是远的，还是近的——那些人的逻辑，那时候他们就已经采取了这样的方针：完全取消联盟，甚至不惜损害其他共和国的利益，最大限度地加强俄罗斯国家的地位。某个时期，调查安全机关活动的国家委员会里某些成员的态度中也表现出了这种倾向，顺便说说，进入这个国家委员会的，只有俄罗斯的政治家。我已经提到过，9月中旬，在委员会提出结论的正式期限的一个多月以前，斯杰帕申就已经向苏联国务会议提出建议：停止苏联克格勃的活动，在其基础上组建俄罗斯安全委员会。这样一来，问题就是把“苏联克格勃”这块招牌换成“俄联邦克格勃”这块招牌了。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十分有效的办法。我关心的不是我自己。这样做是好也罢，是坏也罢，我从来也不想赖在自己的这把椅子上。使我感到不安的，首先是，采取这样的步骤，将是对其他共和国的公开挑衅，会助长分离主义倾向。这样的政策无助于保存本来就已经相当脆弱的联盟，而只会促使它彻底解体。正是这一点，是我不能同意的。此外，这还会使各共和国内本来就已经很

严重的一种倾向变得一发而不可收拾——“攫取”为所有安全部门服务的公共财产（无线电监听设施、通讯设施、地面设施、卫生设施、建设基地）。所有这些共和国都可以提出要求，表示有权从联盟克格勃的“遗产”中继承它们应得的“那一份”，它们的权利并不比俄罗斯少。此外，所有共和国的共同安全系统彻底瓦解了，而新的、“统一的”安全系统尚未建立起来，甚至还没有这样的构想（情报机关、反间谍机关、边防军、保卫部门、军队、军事政治训练所、动力系统）。

当时只是靠鲍·尼·叶利钦的帮助，我才能坚持自己的观点，这一观点的依据是，深信必须让共和国间的安全机构保存下来。斯杰帕申的委员会也改变了它那种偶然的、来自外部的观点，终于表示支持建立姆斯勃、中央情报局和统一的边防军了。直到这时，只要联盟还存在，这是唯一可能和明智的态度。

组建俄罗斯克格勃时出现的另一部分困难，可以认为，纯属机关之间的矛盾，照我看，在一个机构从另一个机构分离出去的时候，这些矛盾是不可避免的。我的出发点是：俄罗斯克格勃的组织结构，各部门的职能和隶属关系，人员编制，都应该由它自己研究决定。与在其他情况下一样，我认为，首先应该考虑共和国的利益。然而应当承认，当具体执行的时候，或者，譬如说，要立刻腾出这里或那里的办公室时，并非总是能够遵守这个一般性的指示。如果不是维克托·伊万年科以理智和建设性的态度来处理问题，一些小磨擦也有可能发展成大冲突，——实际上我和伊万年科之间没有任何有争议的问题。

可惜，克格勃的领导人中远非所有人都有伊万年科所固有的那些品质：有分寸，有耐心，善于权衡利害得失，甚至连这些品质的一半也没有。他们当中有一些人总是喜欢把一切都归咎于别人，用来掩饰自己组织上的无能。他们责备中央机关，责备巴卡京本人，而这些责难都是虚构的，甚至只不过是谎言。我过去认

为，现在仍然认为，为这些事情与他们“辩论”，是有失尊严的，也不认为，需要对这些不会产生什么效果的努力专门作出反应。我深信，在这些毫无效果的努力背后隐藏着这么一点——克格勃的旧工作人员力图换换门面，然而实质上仍然一切照旧不变。他们指责我在一切方面都犯下了滔天大罪，自己却没提出，也不可能提出什么建设性的意见。

指责我侵犯俄罗斯联邦克格勃的特权，这种指责有时竟独出心裁，而且不合逻辑地与俄罗斯机构的这样一些攻击交织在一起——他们不积极解决完全是俄罗斯内部、属于俄联邦安全局职权范围的问题，却为此对我发动攻击。我只举一个明显的例子，这件事与 1991 年 10 月底至 11 月初在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发生的那些并非无人知道的事件有关。

读者大概记得，在以扎哈尔·杜达耶夫为首的车臣人民全国代表大会执委会执政以后，俄联邦总统发布了一道出乎意外的命令，宣布在车臣—印古什境内实行紧急状态。从一开始，我就认为这个想法是很不明智的，可能使整个北高加索的紧张局势发生爆炸。总统的某些顾问公然把总统“置于易受攻击的地位”。维·伊万年科也持同样的看法，我并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也不认为联盟有可能在车臣干预这场冲突。我还没来得及详细了解这道命令，突然得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通过了一项内容含糊、史无前例的决议，决议支持叶利钦的命令，认为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以实现总统的命令，并且把一切过错都推到了我、苏联内务部长维克托·巴兰尼科夫和 B. C. 科米沙罗夫的头上。我不得不给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写了一封信：

我一向认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决议是非常严肃的文件，而且要求对它作出适当的反应，因此通知阁下，我完全不同意 1991 年 11 月 9 日由您签署

的决议的内容。

首先，决议认为，实行紧急状态是“合理的行动”，这一论点不符合实际，在业已形成的现实情况下，这只能使冲突升级，促使反联邦分子的力量加强团结。

坚决反对决议中对巴兰尼科夫和巴卡京的活动所作的评价。这样的评价毫无根据，这只不过是某些政治家一种十分明显而且也是可以理解的企图，他们给俄罗斯总统惹出了麻烦，却想嫁祸于人，让与起草和执行命令毫无任何关系的人来承担罪责。

谨此奉告。

瓦·巴卡京

1991 年 11 月 12 日

附言：我认为，应该感谢科米沙罗夫，他处于紧张局势的震中，却能防止流血，为恢复政治对话保留了最低限度的希望，俄罗斯人民代表没有支持总统的命令，于是就利用了他提供的这种机会。

就在那时候，11月12日，车臣—印古什共和国克格勃地区分局的一名工作人员，维克托·托尔斯坚涅夫少校，在格罗兹内被捕。当晚，车臣人民全国代表大会地方机关的一名工作人员在电视新闻中宣布，人民将要审判托尔斯坚涅夫。第二天早晨，少校的尸体被送到了停尸室。令人发指的罪行！然而对于那些在11月4日已经直属俄联邦克格勃管辖的俄罗斯“肃反工作者”们来说，因为受到大家都知道的某些干部的挑拨，应对此负责的“罪人”又是中央，也就是巴卡京。报纸上大量援引从各州、各边区、各共和国克格勃管理局发来的电报，责备我无所作为，“纵容杀人凶手”。而斯塔夫罗波尔边区管理局顺带说一声和车臣—印古什管理局一样，它也不属于中央，而是属于俄罗斯管

辖)更表示对巴卡京不信任。问题不在于我。有明确的道义上的原则和标准。可以认为,当宣布在车臣实行紧急状态时——这是早已注定要失败的,而且只会使各族人民的关系变得更加尖锐——就已经有人考虑过克格勃的意见了。杜达耶夫将军也指责苏联克格勃在车臣一印古什共和国挑起冲突,这也就毫不奇怪了。

瞧,把自己的一切过错都推到克格勃头上,这种习惯真是无法消灭的。

摘自给杜达耶夫的信:“您在《独立报》上刊登的(第 153 期)一篇记者访问记中声称,我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车臣一印古什的事件,这至少使我感到惊讶。我完全负责地声明,在贵国领土内从未采取过任何根据我的指示,或者得到我同意的行动。

“我认为,解决政治、民族或其他问题,只能通过和平途径,坐在桌边谈判,在如争取主权和独立这样一些复杂的进程中,这样做特别重要。不是施加压力,而只有健全的理性、明智、完全尊重人权,才能保证国内各族人民自由发展。

“此外,我要提醒您注意,不能容许对任何人施用私刑,导致维·托尔斯坚涅夫悲惨死亡的行动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车臣一印古什事件好似一面镜子,反映出了这几个月来我在卢比扬广场的工作的全部复杂性和矛盾。人们,甚至连那些掌权的人,仍然习惯地认为,苏联任何地方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应该由联盟克格勃(姆斯勃)承担责任。尽管各共和国都已独立,克格勃也改变了,对国内任何地方的局势已经不能有任何直接影响了。然而无论哪里发生冲突,局势紧张,四面八方立刻纷纷责难,不是说姆斯勃失职(“巴卡京干什么去了?”)就是说,这是姆斯勃的阴谋(“莫斯科委员会的挑拨”)。经常不知为什么要承担罪责,这种处境可不是最愉快的。让人感到厌恶,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早就养成了这样的习惯,把政治上一切卑鄙污浊的事都“推到”克格勃的头上——而这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大概这个

习惯还会长期保留下去。即使到了新的特工机关已经和旧克格勃毫无共同之处的时候，这个习惯也不会消失。

报界在联盟克格勃和俄罗斯克格勃之间寻找它们如此喜爱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政治家们寻找，该把政治困难的责任归咎于何人。与此同时，俄罗斯的安全机构也正在坚定不移地成长壮大起来。

我认为，把克格勃的某些管理局分成联盟所属的和共和国所属的几部分，是不适当的。除了一些不可避免的情况（例如，反间谍工作，共和国以及各共和国之间的安全机关都应该从事这项工作），管理局和科应该或者完全划归俄罗斯克格勃，或者仍然留在姆斯勃内。我深信，总是可以达成一些协议，使姆斯勃有可能参加俄罗斯克格勃采取的某些措施，或者是相反。

为了加速建成俄罗斯联邦安全委员会，1991年11月1日，我下令把苏联克格勃第七管理局全部，第十二科，侦讯隔离室，业务技术管理局的几个处，军事建设管理局，连同几个工程建设处，军事建设科，连同全体在编人员、技术装备，统统划归俄罗斯安全委员会。明确规定，姆斯勃与俄联邦克格勃之间签订单独的协议，以确定利用户外监视、业务技术设备的手续，在前一天，奥列依尼科夫和伊万年科已经在协议上签字。

到11月26日，发布“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委员会改组为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第233号俄罗斯联邦总统令的时候，在俄罗斯安全委员会中央机关工作的人员已经有两万人，在地方机关工作的，已经有两万两千人了。这已经是一个完全合格的机构，有能力独立自主地完成重大任务了。

在建成联邦安全局（阿夫勃）以后，关于阿夫勃和姆斯勃之间进行“殊死战斗”的议论并未停息。就连我深深尊敬的

“BBC”<sup>①</sup> 也不例外，它的新闻广播听起来简直像是惊心动魄的侦探“故事”。据已有许多苏联报纸转载的“BBC”的消息，似乎从我的办公桌上偷走了关于未来姆斯勃组织机构的秘密文件。

“因为文件到了俄罗斯联邦总统的手里，叶利钦签署改组俄罗斯克格勃的命令比原来预订的时间提早了许多，这是为了赶在戈尔巴乔夫要求拥有旧联盟克格勃基本战斗力量之前，结束这场哪个克格勃更为重要的争论。”

看了或听了这种——委婉地说——呓语，每一个知情的人，多少了解一点儿机关里的“幕后活动”和“总统”正常工作程序的人，当然会一笑置之。然而这种赝品的作者们十分清楚，读者之中并非所有人都是知情者，对这种“会引起轰动的消息”，他们（读者或听众）立刻就会上钩，尤其是涉及克格勃的消息。不过，这些作者显然做得太过火了。只有十足的白痴才会相信，俄罗斯总统“得到”偷来的（?!）姆斯勃的组织方案之后，会手忙脚乱，仓猝行事。

第一，关于姆斯勃的组织方案，只要是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想要了解的，我都向他报告过，还征求过他的意见。

第二，这个“秘密”方案根本就不秘密，凡是对此感兴趣的人，包括记者和人民代表，都曾广泛地讨论过。

第三，在姆斯勃和阿夫勃的组织机构之间，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联系——这是原则上不同的两个机构。

第四，阿夫勃领导要求从旧克格勃中划归它管辖的一切，都已经划归给它了，这完全不需要俄罗斯总统进行干预。对他来说，这种事情实在是太小了。

我还不至于天真到这种程度：认为需要反驳报纸上的胡说八道，而在对电视或报纸上照例的“谎言”予以批驳以后，这些新

① 英国广播电台。

闻媒介就会停止造谣。当然不会。对于职业造谣者来说，辟谣就等于火上加油。只要还有政治家，就需要有造谣者。这是不会结束的。所以最好是不要愤慨。正像马拉<sup>①</sup>当时已经说过的，“既然卖身投靠的文人们造谣诽谤我，我就用蔑视来对抗谣言。”请看，时代变了，然而人的性情却没有发生多大变化。

为了让姆斯勃和阿夫勃机关里那些喜欢耍政治手腕的人失去散布谣言的乐趣，促使他们从事日常的艰苦工作，我和维·伊万年科决定发表一个共同声明：

最近新闻媒介中出现了大量报道，据说，似乎在协调各共和国间安全工作的安全局和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前苏联克格勃的某些工作人员对散布这些臆测也出过一些力。

我们以完全负责的态度声明，这一类报道没有任何可靠的根据。无论是姆斯勃的领导，还是阿夫勃的领导，最关心的就是尽快建立起强有力的俄罗斯安全机关，因为俄罗斯是所有共和国中唯一没有安全机构的国家，同样，姆斯勃和阿夫勃的领导也十分关心协调各主权国家特工机关的工作。俄罗斯的阿夫勃是在联盟的前克格勃一部分中央机关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后者并向前者提供了必须的干部和物质技术装备。

当然，组建阿夫勃和改组姆斯勃是一个复杂过程，不排除会在个别问题上产生众所周知的分歧。但是这些分歧完全不是原则性的，可以在互相协商一致的基础上予以解决。

我们认为，关于姆斯勃和俄罗斯阿夫勃正在互相竞

<sup>①</sup> 马拉（1743—1793），十八世纪末法国著名革命家，雅各宾党的领袖之一。

争的报道，目的是想在这两个组织之间散播不和的种子，给保证俄罗斯和其他主权国家安全的共同事业造成危害。

瓦·巴卡京

维·伊万年科

1991 年 11 月 29 日

然而姆斯勃和俄罗斯阿夫勃的未来已经不取决于巴卡京和伊万年科了。以 1991 年最后一个月为标志的那场悲剧性的政治斗争决定了它们的未来，那个月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存在的最后一个月。

## 六、法 制

……个人最神圣的东西恰恰是在他真正的自由里，  
这高于一切纲领。

—— 帕维尔·弗洛连斯基<sup>①</sup>

苏联体制中克格勃的无限权力首先是由这一点确定的：它凌驾于法律之上。任何破坏法律的行为都是不能容许的。然而当破坏法律的是国家的时候，这种看法就没有多大意义了。当经常、秘密地破坏法律的时候，当伪善地、理直气壮地扯谎，大谈什么对于“肃反工作人员”来说，法律是神圣的时候，这种看法就没有多大意义了。而主要的是在基本人权和人的自由这方面破坏法律。几十年来苏联宪法上——无论是斯大林的宪法，还是勃列日涅夫的宪法——都写着公民的种种权利：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然而实际上公民都没有其中的任何一项权利，而且正是克格勃专门监视着，让这些自由永远不能实现。以暴力和谎言为基础的体制在运转，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在接受诺贝尔奖金时发表的演说中，十分出色地为暴力和谎言的相互关系下了

<sup>①</sup> 帕维尔·弗洛连斯基（1882—1943），俄罗斯学者，宗教哲学家。

这样一个定义：“……除了谎言，没有任何东西能掩饰暴力，除了暴力，没有任何东西能支持谎言。任何人，只要他有一次宣布要用暴力作为自己的手段，就不可避免地一定会选择谎言作为自己的原则。”

有不少勇敢的人，记者，政论家，作家，牺牲者和见证人，向公民们，向全世界揭露了克格勃体系的可怕。当然，委员会的工作方法会有所改变。枪杀人质和向政治局告密，这二者之间是有区别的，但作为实质的违法却依然未变。

把苏联历史中还从未结合过的东西——特工机关的活动和法制——结合在一起，我认为，这是主要任务之一。

原来，这个任务是特别复杂的。法律要由立法者通过。这是一般的道理。然而我在克格勃工作的那几个月里，立法者却顾不上去管法律。无论是在停滞时期，还是在改革年代，还是在“改革后期”的那几个月里，委员会都是在没有法律根据的条件下工作。1991年5月关于克格勃的那项法律，不过是过去的残余。然而就连这项法律也没起作用。

法律的真空状态把委员会的工作人员置于进退维谷的境地：要么遵循那套旧的合法的，然而不符合民主国家原则的办法，要么无所事事。在二者之间作出的选择十分简单。在旧的合法基础上无所事事。

尤其使我感到不安的是，没有关于侦查工作的法律，在这个领域里，社会上感到最担心的那些问题首先会受到责难，这就是户外监视、窃听电话等等。还在我担任内务部长的时候，我就竭力设法想要通过这方面的法律，但是到现在仍然毫无结果。

在我发出的第一批命令中，就责成有关部门“按规定的程序，提请立法机关审查如下建议：为侦查工作奠定法律基础，对户外监视、使用技术设备和其他手段加强监督。必须修改规定使用这些设备的手续的苏联克格勃工作细则。”研究这些立法建议

的时候，委员会的法学家们利用了克格勃本身现有的一些健全的规定，仔细研究了世界上关于侦查工作的法规的经验，与联盟和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中有关的委员会积极配合，协同工作。

不幸的是，既没有人，也没有时间来通过这些法律。社会经济、国家政治领域内的问题，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多，联盟迅速解体，这一切迫使俄罗斯的立法者不得不去处理刻不容缓的共和国的生存问题，联盟的立法者则不得不处理他们本身生存的问题。议员们没有时间为特工机关的工作制定什么法律基础。可是有没有议会呢？

其实，1991年下半年关于安全机构的法律中所作的一切修改，都仅仅和以谢尔盖·阿列克谢耶夫为首的苏联宪法监察委员会有关。还在7月，委员会就认为，苏联法律中关于苏联民警机关的119条12款不符合宪法，根据这一条款，护法机关有权对经济领域里的不法行为提出“正式警告”。这是对企业家进行合法的恐吓和敲诈。我来到克格勃以后，惊讶地得知，克格勃的工作条例中也有这么一条，允许采取这样的办法。我废除了这个条例。

12月，宪法监察委员会分析了关于安全机构和民警机关的一些命令和法律，认为其中许多规定都与我们国家承担的国际义务相矛盾，违反人权，必须修改。就是说，委员会的成员认为，必须保护私营和国营企业，使它们免受安全机关和民警机关毫无限制的检查，而在检查过程中，这些机关有权没收文件，查封企业和仓库。当时宪法监察委员会通过决议，认为关于民警机关和安全机关的一系列法律条款没有法律效力。其中包括不受阻碍地进入公民住宅的权力，使用他们电话的权力等等。坦率地说，这些修改都很重要，然而，要为特工机关的活动建立可靠的法律依据，单做这样一些修改，却是完全不够的。

那么怎么办呢？只好诉诸我下属工作人员的公民的良心了。

在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我就是这样做的：“在法律真空的情况下工作，内心中必须有民主、法制这样一些概念，必须理解什么是公民的权利和人权，这样才不致越过暂时只是由合法的决定和合法的机关工作条例规定的权限。”只好同时也改变这些条例。

允许克格勃侵犯人权的主要做法之一，是可以不受监督地窃听公民的电话。在苏联，从来也没有进行这类活动的法律依据。只有 1959 年部长会议批准的一个合法决定，为滥用职权留下了广阔的活动领域。

原则上，我可以根本禁止窃听。但是我认为，这样一来，会使与许多危险的犯罪活动进行斗争的工作陷于瘫痪，而克格勃和内务部都在做这种工作。必须忍耐。等待通过一项法律，明确划定一个范围：对哪些犯罪活动可以允许窃听，哪些人有权批准窃听。例如，在英国，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只有三个大臣——外交大臣、内务大臣和负责爱尔兰事务的大臣——有这样的权力。把第十二科从克格勃中分出去，让它成为一个独立机关，必须得到有权批准窃听的人批准，才能进行窃听，这样做将是正确的。

然而没有法律。只好从现实出发，自己来整顿秩序。我要来了所有需要进行窃听的人的名单。老实说，我本来以为，这个名单会长得没有尽头。结果发现，他们窃听的总共只有 700 门电话，而且向我提供的这份名单中，每个情况似乎都有充分的正当理由：怀疑从事间谍活动，搞阴谋活动的人，恐怖分子，非法买卖外币的人。名单中没有一点迹象暗示，在叛乱前和叛乱期间，有人由于政治原因而被窃听，但后来查明，确实有这种情况。

8 月 26 日我下令，在接到特别指示以前，停止执行由十二科采取行动的任务，对外国侦察员、间谍采取行动例外，对经济领域和行政管理系统有组织的犯罪活动、走私、恐怖主义采取行动，也不在此列。批准采取行动的权限提高到了克格勃管理局局长、副局长一级。检查局接受了一项任务：检查十二科从 8 月

15 日到 22 日的业务活动。

由于十二科的职权受到限制，它的业务范围和工作量也缩小了，一个月以后，我下令让十二科裁员百分之三十。

检查局、奥列依尼科夫和斯杰帕申的委员会检查的结果揭露出，安全委员会在实际活动中利用各种技术设施，远不只是利用窃听装置。揭露出了一些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事实，证实了以前曾经否认和隐瞒的作法：非法使用秘密技术设施，侵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干涉私人生活，使个人安全受到威胁，进行政治性的监视。1990—1991 年，宪法监察委员会通过决议，停止根据一切未公布的法令采取的行动；对这一决议，克格勃实际上不予理睬，继续窃听和采取其他业务技术性措施，其依据仍然是在克格勃之外谁也没看到过的决定和工作条例。

根据检查结果，公布了克格勃主席 1991 年 10 月 9 日的命令。命令规定，绝对禁止利用业务技术设施获取不属于安全机关职权范围的情报，绝对禁止利用业务技术设施获取与揭露具体案件真实情况无关的情报。任何业务技术设施，只有在执行任务、经办刑事案件时才能使用，目的是揭露和制止外国特工机关的侦察活动，根据刑事诉讼法由安全机关侦查的犯罪活动，以及有组织的严重犯罪，包括恐怖主义，贩毒，负责官员的大规模盗窃，贪污受贿，走私，非法买卖外币，非法从事金融业务活动。

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宪法的原则，以前的做法却破坏了这一原则，禁止对苏共和国家机关的领导人使用业务技术设施，我以我的命令制止了这种有缺陷的做法。因为有这种保护“大鱼”的指示，有多少上层人物（甚至不是最上层）的罪行从来没有被调查啊！同时命令还指示，必须严格执行法律规定的人民代表、法官和人民陪审员不受侵犯的条款。

同时建议采取措施，要求人们知道他们的权利，保证他们能够看到与他们有关材料。安全机关的各级领导都接到命令，公

民要求解释限制他们权利的合法理由，要求提供与他们个人有关的任何情报，而公开这些情报又不会损害他人的利益，不会给安全造成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应该保证满足他们的要求。

克格勃的法律科接到指示，在一个月之内与苏联内务部和苏联司法部共同制定“关于侦查工作”的法律草案，并建议提请苏联最高苏维埃审议。同时，为执行苏联宪法监察委员会的要求，命令在同一期限内制定和公布关于使用技术设施的机关内的标准法令。

摘自 1991 年 11 月 28 日《工人论坛报》：

“与共和国间安全局局长瓦季姆·巴卡京谈不是在电话里谈的问题。

“最近在电话里和人谈话，往往话还没说完，对方就不再说下去了，他们说，这不是在电话里谈的问题。为什么呢？”

“对这样的提醒，通常会听到内行人的一声冷笑：那意思就是说，我们知道，克格勃里是怎样尊重法律的。瞧，现在他们尊重了。

“有可能偷听别人的电话，对于这样直截了当的问题，瓦季姆·巴卡京回答，安全部门窃听的电话不到一百个用户。采取窃听行动，毫无例外都与检察机关互相配合，而且只涉及有组织的犯罪活动、间谍活动这类具体的刑事案件。

“‘这么说和姑娘们谈话可以把话说完而不必担心会被宣扬出去了？’

“‘不仅和姑娘们。商业洽谈或者政治谈判也不属于我们部门关心的范围。’”

克格勃自古以来首先是一个政治侦查机构。不搞政治侦查，克格勃就不成其为克格勃了。不解散直接从事政治侦查的部门——“3”管理局，是不可能的。

我从“3”管理局的第四科开始，第四科的任务是监视宗教

组织，通过在宗教界招募的代理人秘密影响这些组织的活动。违反宪法中关于政教分离、信仰自由的条款的情况是最令人愤慨的。9月4日，我撤销了第四科，它经办的案件统统归档，又过了两个星期，整个“3”管理局也停止活动了。责成干部管理局，对“3”管理局以前的工作人员，或者根据他们业务能力和个人品质，编入现役，或者根据相应的法律，采取措施，予以妥善安置。“3”管理局里有不少熟悉国际关系的专家，辨别笔迹的专家，他们的专业知识是可以利用的。

从这时起，政治监视，或者是政治侦查，或者是出于政治动机的监视——不管叫什么吧——已经完全停止了。对这一点，我可以保证。当然，应该制定一个依法采取行动的明确办法，让特工机关能够取缔和制止非法的秘密政治集团，取缔那些以暴力推翻政权为目的、酝酿仇视人类的计划、宣传法西斯主义、沙文主义和使用暴力的非法集团。

在克格勃系统中，学院——用行话来说，叫做“后备役军官”——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这是指委员会的这样一些工作人员，他们的正式工作是在或多或少具有重要意义的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里。多半是指这种情况，这些人是克格勃的工作人员，而在他们所在的那个机关里，他们认识的人很多，甚至认识所有的人。后备役军官执行的任务也很广泛——从保密到监视同事们的思想倾向，以及对持不同政见者采取“适当措施”。

我认为，这种作法必须停止。我的出发点是：只有本机关的领导由于这种或那种理由，认为他那里需要安全军官的地方，我们才派安全军官去。如果这个或那个机构请求撤走后备役军官，在这种情况下，应该立刻满足他们的要求。不过应当承认，我经常会遇到相反的情况：机关的领导人希望让克格勃的工作人员留下来，或者是坚持要求派人到他们那里去。

最后，如果由于工作上的原因，特工机关需要在某个机关里

有自己的工作人员或代理人（原则上不能排除这种可能），那么它可以把自己的人秘密地安插在那里，让机关里谁也不知道这个情况。如果人人都知道谁是特工机关的工作人员，那还叫什么秘密工作呢？

还有一个与公民的权利直接有关、涉及自由出入国境的问题。多年以来，克格勃和党组织是对出入苏联国境的人进行筛选的主要筛子，这并不是什么秘密。访问其他国家，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几十年来一直是大多数公民无法享受的特权，任何一次出国都要对政治上是否忠诚进行多次审查。只有那些根据“上级”的意见，认为对“西方的腐化影响”具有免疫力的人，才准许到另一个国家去。

有一个侨居国外或被迫侨居国外的苏联公民的名单，由于纯粹意识形态的理由，凡是名单上的人，都禁止进入苏联国境，这种情况乃是真正的耻辱。结果我们自己切断了我们与国外的俄罗斯人（还不仅仅是俄罗斯人）的有机联系，现在这一点已经完全清楚了。

在改革时期，铁幕倒掉以后，国际上的接触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重新审查过去在这方面的做法，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通过了新的法令，明显地放宽了出入境的办法。但是照我看，这显然不够。对出境仍然有许多限制，例如，出国者知道某一绝密情报，就会受到限制。可以不同意法律中的某些规定，可以争辩说，不离开苏联领土，也可以把情报交给别人，而且有很多知道机密的人（譬如那些政府官员）反正还是会到国外去，然而无论是克格勃，还是作为克格勃领导人的我，都无法违反这些法律。何况克格勃还肩负着对遵守这些法律的情况进行检查的责任呢。

摘自（文学报）12月份的记者访问：

“问：您的部门里仍然有一些关于出国者的文件，也仍然有

不希望让他们从国外进入我们国境的人的名单。旧机关，可以说已经没有了，可是有缺陷的做法却继续存在，是吗？

“答：我今天就可以拒绝对出国的人进行审查。可是有关于出国的法律，其中提到知道国家机密的人，并责成克格勃监督检查，不让这些‘知道机密的人’出国。我同意，这不是我们的事。让企业的领导去审查好了。让那些到保密工厂去工作的人具结，放弃体验在巴黎街道上散步的快乐。至于入境嘛，所有国家都有不受欢迎的人的名单，譬如说，间谍，恐怖分子。

“问：你们不准以前的持不同政见者金兹堡入境，可他算什么恐怖分子呢？

“答：亚历山大·金兹堡，还有 140 多人，都已获准入境。不准入境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惰性，又是有害的惰性，强大的惰性……最近三个月已经没有这种禁令了。”

关于准许出入境的问题，我受到许多人的质询——各国大使馆，各种组织，个人。有很多情况，碰到法律条文设置的障碍，或者是某一个部里绝不通融的立场，我就爱莫能助，只能把文件转到审理这类问题的直属总统的特别委员会去。有时出国的要求遭到拒绝，申请出国的人似乎是受到了政治迫害，而事实上却是因为他们犯了十分具体的刑事罪——直到凶杀罪——正在受到侦查。对这样的人，我就无权帮助了。

而当问题纯粹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由安全委员会发出的禁令，如像金兹堡或其他以前的持不同政见者的那种情况，那么出入境的问题立刻就会获得解决。

多次重新审查使我作出决定，准许戈尔季耶夫斯基的家属到西方去，六年来他们一直未能出国去和戈尔季耶夫斯基团聚。我完全不想为戈尔季耶夫斯基本人辩护。但是一人犯罪，他的一家人都要负责，留下来作为人质，对这种旧观念，我却无法容忍。有一种举世公认的人道主义的作法，苏联在欧安会文件上签字以

后，对这种做法也已经正式承认了。

我到卢比扬广场任职的最初几天里，有一天英国大使布莱温爵士为戈尔季耶夫斯基的事向我提出了书面请求。我在他的请求书上批示：“请积极解决。”我的批示立刻得到了回文，说是，这不可能，这样的话，我们的侦察员就都要叛逃了。我对我们侦察员的看法却不是这样，我坚持自己的决定。戈尔季耶夫斯基的家属到英国去了。

旧克格勃的主要支柱之一，就是人们不大了解它的工作。与安全委员会有关的一切都是绝对的秘密，这就掩盖了它的犯罪活动，有时也掩盖了同样是犯罪的无所作为。在光天化日之下，克格勃就会感到不舒服，它不习惯考虑社会的意见。当然，特工机关的活动并非所有各方面都可以公开，但是公民——纳税人有权知道，预算拨款都是怎么花掉的。10月2日我签署了一道命令，责成向社会定期通报安全机构的工作。如果情报上印有“密件”字样，但公布这些情报却是正确和合理的，遇到这种情况，就指示，按规定的程序，宣布这些情报不再保密。命令，要尽力帮助政权和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公民利用安全机关的档案材料，以查明过去的真实情况，为被非法镇压的人恢复名誉。

我自己也尽可能设法向社会通报特工机关的工作，让社会了解特工机关改革的主要方向。我想，过去没有哪一个克格勃主席，即使是多年担任这个职务的人，曾这么多次会见大众传播媒介的代表。到我办公室里来过的有塔斯社、国际文传、《消息报》、《独立报》、《莫斯科新闻》、《共青团真理报》、《劳动报》、《工人论坛报》、《红星报》、《绝密报》、《真理报》、《莫斯科真理报》的记者；从美国、日本、瑞典、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丹麦来的记者；俄罗斯《消息》电视台、中央《新闻报道》电视台、

“蛇足”<sup>①</sup>电视台，美国 SBS、ABC 和 CNN，英国 BBC、法国电视一台、瑞典电视台的电视记者们。我想，还不是所有的都记起来了。

还有几十位记者要求采访我，我一直没能满足他们的要求，我想在此向他们表示歉意。

我在报刊上发表的谈话，好像在委员会内部插上了一把尖刀。10月，一群匿名的“克格勃军官”在（俄罗斯报）上发表声明，其中除了其他内容，还指控我“迷恋大众传播媒介”。

与匿名者不能进行争论。与大众传播媒介合作，这是任何一个领导人的责任。此外，这也是艰巨的劳动，神经系统的过度负担。而且还应该考虑到，在发生叛乱以后，那是一个什么时候。不过，当真非常抱歉——我喜欢和聪明人交谈，而在记者中，聪明人比我们这些人当中要多一些，这能怪谁呢。

会见，采访，的确很多。但是我常常有根据相信，就连报道克格勃情况的那些记者，对克格勃中的改革也远没有一个完整的概念。对于其余那些完全有权看到全面报道的人，还能说什么呢。至于那些并不设法和我会见，却“从权威性来源”获取虚假消息的记者，那就更不用说了。

在安全委员会工作的四个月里，我会见过许多人。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使我永志不忘的，是和这样一些人的谈话：这些人从前都与克格勃发生过冲突，吃过克格勃的苦头。不能说，我感到对过去那些年代里的不法行为，我个人应该负责。然而，面对那些当时曾奋不顾身进行斗争的人，有时我很难摆脱负罪的感觉——当时他们在忘我地斗争，而绝大多数人，包括我在内，却继续随波逐流，什么也没有做。

与爱伦娜·邦奈尔的会见是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的。她是科学

<sup>①</sup> 原文是“第五个轮子”。第五个轮子是多余的，意思也就是“蛇足”。

院院士萨哈罗夫的遗孀，在萨哈罗夫受迫害、被流放到高尔基市去的那些岁月里，她和他同甘共苦，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我感到惭愧，对爱伦娜·格奥尔基耶芙娜为捍卫人的尊严而英勇斗争的情况，我甚至并不完全了解，而她却和我们苏联境内为数不多的战友们——一些有良知的人（对于我们来说，是“离经叛道的人”）一道坚持了下来。这是一位有罕见的文化修养和天生的正派人，无缘无故的贬黜和流放并没有使她变得冷酷无情，反而使她对任何欺骗和不公正更加敏感。我尽可能支持她。帮助她寻找有关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维奇<sup>①</sup>的文件，寻找未能逃脱旧制度迫害的、她的其他亲人的文件。

已经是在改革的年代里，由于胆敢正直地说出克格勃内的秩序和风气，奥列格·卡卢金将军竟失去了军衔和退休金。他是最早要求会见我的人之一，以后他和我进行了开诚布公的谈话，对于委员会的改革，给了我不少帮助。卡卢金已经完全恢复了自己的权利。

与弗拉季米尔·布科夫斯基的会见是很有意思的，他是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特殊象征。因为他挺身而出保护达尼埃尔·辛尼亚夫斯基、金兹堡、加兰斯科夫，因为他公开了为达到政治目的而滥用精神病学的材料，他在精神病院、监狱和集中营里度过了大约 10 年。直到用他来和智利共产党领袖路易斯·科尔瓦兰进行交换。

布科夫斯基在我的办公室里。电视台对这次不寻常的会见表现出了如此浓厚的兴趣，由于电视台作了转播，使千百万人都看到了会见的情况。我从《消息报》援引一段 A·普鲁特尼克对这次会见所作的评论，照我看，普鲁特尼克对会见的气氛“掌握”得恰如其分：

<sup>①</sup> 萨哈罗夫的名字和父名

“从一方面来说，这不是审问，从另一方面来说，也不是揭发。只不过是弗拉季米尔·布科夫斯基和瓦季姆·巴卡京，这两个知名人士的一次友好谈话。一见面，互相说了几句客气话：‘您就是我要会见的克格勃主席。’‘我是对您了解得很少的克格勃主席’

“这次会见无疑已成为轰动一时的电视新闻，然而，大概不能把它叫作一次没有先例的会见（关于先例，以后会谈到的）。我们这一代人一生中并不是那么经常看到这样的情况：一个出了名的机关的领导人，当着我们的面，和一个委员会对他的活动如此了解的人心平气和、平心静气地进行对话。不仅认识他的外表，而且了解他的内心。

“不错，好像觉得，双方都过于焦躁不安，当着对方的面，都感到激动，窘迫。最明显的是都有些做作，甚至可以说，有点儿像在演戏，演一场其实最不打算公开上演的戏……

“……昨天不可能的事，变成了可能的。这样的时候是打破旧框框的时候。但是从原则上讲，不难回想起，我们的记忆里已经有过这样的会见了，——当时曾经大肆宣扬的、当时的内务部长与‘灰狼’阿赫托·列维的会见，从法律观点来看，‘灰狼’是个小偷，但后来也成了作家……随着岁月的流逝，后来才弄清楚，那次会见原来纯粹是装装样子。现在会怎样呢？时代不同了。现在，怀疑未必是恰当的。不过最后的结论还有待于今后做出。在将来。”

《消息报》的记者说得对：要作出变化已不可逆转的结论，为时尚早。只要特工机关的工作人员，哪怕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对“契卡主义”的旧传统仍然忠实不渝，那就难以保证特工机关不会侵犯公民的权利。

当然，我来到克格勃的时候，它已经不是盲目执行共产党的任何指示、盲目执行任何一个首长的任何命令的整块顽石了。

1991年8月的事件清楚地显示出了这一点。委员会并不是铁板一块，改革使克格勃内部也和全社会一样，人们的思想是各不相同的。然而同样十分明显的是，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它的工作人员都是经过挑选的，“由党审查过的”，自然比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要保守一些了。

“契卡主义”的传统有十分顽强的生命力，和它进行斗争很难，我对此有充分的体会。单解散克格勃的党委会是不够的——8月19日，党委会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8月23日，同一个党委会又谴责叛乱。单单解除委员会保守的上层人物的职务，也是不够的。

必须改变在这些机关工作的人们的心理状态。需要非意识形态化，否则，只要政权一有什么变化，就会发生问题。譬如说，如果执政的是社会主义者，那么特工机关就会，譬如说吧，去追捕那些信仰基督教的民主主义者。我无论与委员会里的哪一个工作人员谈话，几乎所有人都说，他反对叛乱，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所有的人都赞成市场经济，赞成多元论，赞成民主。但是我有一切根据，对他们的诚实表示怀疑。

摘自《镜铁》杂志的访问记：

“问：您不得和旧的工作人员一道工作，大概，他们身上还有旧的精神吧？”

“答：和到处一样，无论是社会上，还是这里，都有各式各样的人。有许多职业特工人员和当之无愧的专家。我希望能够依靠这个坚强的核心。那些意识形态的教条主义者，只好请他们退休了。”

“问：这么说，您要去做的工作不少啊。”

“答：形势对克格勃不利。作为一个不是来自这个部门内部的新的领导人，我并不总是顾惜我们这些人的职业自豪感，因此会冒很大的风险。但是我不愿虚与委蛇，迁就别人，我要始终坚

持自己的意见。

“问：您的同事中有一些人宣称，他们是契卡传统的继承者，是肃反工作者，对于他们，您会说什么呢？”

“答：我对他们说：肃反工作者的传统应该连根铲除，作为一种思想体系的契卡主义应该消失。应该遵循法律，而不是遵循意识形态。不可能是另一个样子，特别是在这样的机关里……”

“问：结果是，以肃反工作者的精神培育出来的人，现在却要保卫民主主义吗？”

“答：但是我们没有其他职业特工人员。不能把所有的人全都解职。现在，在极权主义精神中教育出来的整个国家都必须走上民主的道路。所以这个问题不仅仅是我们这里的问题。”

是的，与迫害持不同政见者、毒害萨哈罗夫——即使他们是执行命令——的人一道工作，不是一件很愉快的事。但是，要知道，我们苏联人都是来自那同一个世界，同一个社会，同一个制度。大家都是。怎么办呢？把所有那些人全都驱逐出去，可是新人打哪儿来呢？把他们驱逐到哪里去？谁来担任法官？我认为，所有的人，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可以改变的。至少是应该改变。本质上有所改变。问题在于，仍然留在特工机关里的人能不能改变。我认为，大多数能改变，而有一些人，正如俗话说说的，本性难移。

我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胜利地完成根除契卡主义的任务？这样的问题本身就是不妥当的。灌输了 74 年的东西，三个月是无法根除的。这是人。心理、习惯、信仰都需要改变。有些悲剧性的日子、事件加速了这一进程，然而这里还是需要另一种“现实”和时间。而在“干部们”明白我不会顾惜给夸大的、“肃反工作者”的自我赞扬以后，我感觉到有一股隐蔽的、秘密的内部反对力量。我曾不止一次遇到这样一些情况：拖延，故意表示不理解，提供假情报，隐藏某些情报。有一个将军有一次在他的小圈

子里说：“我们高兴的话，他就根本什么也不会知道。”他说得不错。不过将来我会知道。关于这位将军的事，我就已经知道了。

12月20日，在前克格勃的俱乐部里庆祝肃反工作者的节日，和往常一样，大谈“光荣的传统”。缺少的唯一一样，就是主席的传统贺词。我不能认为，1917年签署成立契卡的命令的那一天是一个节日。对于这一点，他们也不能宽恕我。

一个来撤销克格勃、取消“肃反工作者”精神的人，这样的人不可能是“自己人”。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虽然我也有不少志同道合的同伴，现实工作也开始上了轨道，但是我不认为，委员会里的大多数人都支持我。

我也不认为，对于公民们来说，特工机关已经变得安全了。没有为特工机关的活动制定规则的法律，没有监督系统，没有完全符合民主法制国家标准的思想改革。我没能把这项工作进行到底，让别人来完成这一工作吧。

## 七、档案

没有任何秘密不会公开；没有任何隐瞒着的东西不会暴露。

—— 《马可福音》

大概，没有哪一个与克格勃有关的问题，像委员会的档案这样，使记者们、学者们和社会团体感到这么关心。几乎每天都有要求查阅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档案的申请送到克格勃和它的主席那里。为了“卢比扬广场上的档案”，各种不同意见争执不休，猜测不断，谣诼纷纭。

在叛乱以后，俄罗斯总统鲍·叶利钦发布的命令里，几乎没有哪一个命令不要求把克格勃的档案立刻全部交给国家保存。但是得知我说的理由以后，同意对这个不寻常的问题，要仔细研究研究。

克格勃的档案是什么呢？

首先这是克格勃的中央档案馆，馆内保存着自 1917 年，从全俄肃反委员会到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所有命令，已经归档的、对由于政治信仰遭受迫害的公民的侦查案件，非司法机关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部——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保安

部会议记录的副本，在法西斯军队后方进行侦察和破坏活动的小组的材料，以及其他等等。克格勃中央机关和各州的分支机构一起，一共保存有大约 65 万件案卷。以前各加盟共和国的克格勃及各边区和州的克格勃管理局也保存有数量和内容都与此大致相同的档案。总计共有 950 万件。

此外，克格勃以前的各总管理局的档案室里还有反映它们各自工作特点的档案，约 47000 件。

所以，前克格勃的档案中包括 1060 多万件内容和意义各不相同的材料。其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包括涉及国家重要机密的情报，而不仅仅是“机关的机密”。进入克格勃档案的，有我国的公民，也有外国公民，他们的利益都应该受到保护。而相反地，许多公民和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的利益，却要求能对他们公开档案，让他们能够进入档案库。

对这个伟大国家悲惨历史的珍贵的真正文献，实际上还没有作过科学性的研究。许多秘密的谜底，了解千百万无辜受害者命运的钥匙，都在这里。许多业务工作和间谍工作的材料，都在这里。国家最宝贵的机密，都在这里。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一定要给后代子孙保存下来。

保存档案的任务立刻作为一个实际问题摆在我的面前。叛乱以后的最初几天里，报纸上出现了一些“来自可靠方面”的消息，说卢比扬广场在大规模地焚烧档案。克格勃新主席的第一道命令就提到，绝对禁止销毁档案中的任何材料。当然，这没能、也不可能挽救涉及叛乱的那些文件：每个人都明白，这些文件不在档案里，而是在各级领导人的保险箱里和办公桌上。而且无疑，许多文件已经被销毁了。

但是对这些档案，该怎么办呢？各方面都在呼吁，公开特务的材料，让人民知道“谁是什么人”，让人人都能查阅档案。与此同时，各地克格勃的工作人员也提出几十条建议，建议焚毁所

有档案，以免攫取档案，公布档案，给“安全”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

破坏档案的危险，当时的确是存在的。希望销毁这些档案的人太多了，或者相反，也有太多的人希望利用克格勃的这些材料来进行政治敲诈。然而我坚决反对这种走极端的建议。档案应该保存下来，无论如何也不能允许把它“悄悄地”“销毁”。

以后怎样处理这些档案，那是另一回事。正确的立场是，需要有一个关于档案的法律，让一切走上正轨。

至于那些日子里最尖锐的要求——立刻公开特务的案卷，或者用那些“自由”记者们的说法：公开“告密人”的案卷，这是我坚决反对的。

我在《独立报》上发表的声明中第一次阐明了我对档案问题的态度，这个声明已经在 8 月 29 日刊登出来：

“鉴于《独立报》以及许多其他报刊上纷纷发表意见，主张必须公布‘千百万秘密特务和克格勃情报员’的案卷，我认为必须声明如下。我深信，公开这些案卷不但是不适当的，而且非常危险。

“有罪的不是人，而是制度，在极权主义的年代里，当人们还是少先队员的时候，这个制度就以这样的精神教育他们，使他们往往成为自愿的或迫不得已的情报员。他们当中占压倒多数的人都是正直的人，没有做过任何玷污自己声誉的事情。‘公开档案’的呼吁只能更加分裂我们这个本来就已经处于病态的社会。民主力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以后，对他们来说，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不要让自己堕落到可耻的‘迫害异端’的泥潭里去。现在不是投井下石的时候，现在是医治创伤的时候，而不是揭疮疤的时候。

“在任何一个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的国家和里，这样的案卷都没

有公开。<sup>①</sup> 只要我还担任克格勃主席，我们就不会这样做。这当然不涉及反对人民的罪行，不涉及镇压、迫害持不同政见者的罪行，以及其他等等。这些档案，将遵照俄罗斯总统的命令，立刻作出适当安排，保证让所有有利害关系的人都能查阅。”

我相信这样的态度是正确的。

有些人过去曾被克格勃监视，受过迫害，为了自己的信念，被关进集中营，被流放，受过侮辱。现在他们只要求一点——正义，我觉得，对这些人心情我也是理解的。这些人为了自由的新社会斗争过，现在正在着手建设这样的新社会，但是我也关心，要让以前的“克格勃特务”也都能和大家一道同样进入这个自由的新社会。而谁又能代表那些无辜的、已经不能说话的人，代表那些已被枪杀，死在集中营、“精神病院”里的人说话，说出他们的意见呢？报复吗？！某些评论家就在号召进行报复，然而又耻于说出报复这个词来。提出各种不同的办法。从简单的——“国家应该知道自己的英雄”——到要求进行莫名其妙的“全民”审判。

不，这些药方都不对。这些药方本身就散发出一股斯大林主义的气味。还很难说，是什么更加可怕——是道义上的谴责呢（用俄语来说，也就是精神上的“折磨”），还是被告席上一长串新的被告——“不是那种”已经与“民主主义者”格格不入的思想的代表。

这将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民主自由社会的建成将会推迟好几十年。社会意识里又会出现新的“受难者和牺牲者”，又会要求报复。

如果我们想学布尔什维克的样，想在极权制度的共产主义废墟上建立极权制度的反共产主义——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这些药

<sup>①</sup> 后来德国公开了“情报员”的案卷。（原注）

方才是合适的。

有些人在某个时候，也许是几十年以前，曾经与克格勃合作过，要为敲诈和镇压那些人开辟道路，是不是需要有什么高尚的气度和民主作风呢。镇压不仅是指道义上的，因为在国内许多地区，血腥的复仇绝不是老祖母讲的童话，而 50 年前一个部族的酋长告密、出卖另一个部族酋长的材料，就已经是部族间战争的十分充足的理由了。

此外，我非常清楚，一个特工机关，不管它所追求的是多么不道德的目的，如果它出卖自己的奸细，就会变得更不道德。无论哪一个情报机关也绝不会出卖那些曾经与它合作或正在与它合作的人。

从这样的例子中可以看到，“泄漏”与克格勃合作的情报，会导致什么后果，譬如说，卡济米拉·普伦斯克涅，一位我尊敬的人，一位勇敢的妇女，立陶宛政府以前的领袖。说她是奸细，指控她在做大学生的时候与克格勃“合作”过。或者拿围绕着“萨尤季斯”的领导人之一——切帕依基斯的那场挑拨性的喧嚣来说吧，这件事也在立陶宛引起了一场政府和议会的危机。如果说有什么人从这一切中得到了好处，那么，那只是右翼反动势力，绝不是民主制度。不错，我们这里还没有民主制度，而如果像这样搞下去，再过很久也不会有什么民主。民主和耍政治手腕，和投机，是格格不入的。

自然，这里所谈的不是具体的人，也不是具体的刑事犯罪。这里不可能有会引起什么后果的机关的机密。

如果一个人想要知道克格勃拥有一些关于他的什么材料，这也是他的权利。但同时，特工机关也有责任保护另一些人的利益。

我清楚地记得与摩尔达维亚著名作家约·德卢采的谈话。在他青年时代，克格勃曾经处理过对他进行告密的材料，怀疑他有

民族主义倾向，对苏联的现实不满，批评集体农庄，等等。他的案件早已停止了，但是积累了很可观的一大本窃听、监视的材料，“专家”的意见，如果不用告密这个词的话……

德卢采请求允许他看看这些材料。他来找我。我把这一大本案卷放到他的面前。我们进行了一场照我看来很有意思的谈话，我们谈的是我们不幸的社会以及使它恢复正常的途径。我对他见解的深刻感到吃惊。约·德卢采走了。他没有打开那本案卷。

我不能说，我对待档案的态度得到了普遍的理解和支持。许多人批评我。指责我“卖身投靠委员会的委员们”；“袒护罪犯”。委员会内部却认为，就连历史文件也不能公开，因为那仍然是关系国家安全的机密。不过，那里有什么与“安全”有关的机密呢。在克格勃——苏共“警惕的眼睛”的监视下，经济、国家、社会，全都瓦解了。正是因为“警惕的眼睛”监视之下才瓦解的。

我感谢那些理解我的态度的人。感谢弗拉季米尔·布科夫斯基，他对《消息报》的记者说：“巴卡京就职以后，发表了一个非常合乎逻辑的声明，说他不会公开情报机关的案卷。他非常清楚，公开这些案卷会有什么危险。他考虑的是，不让这仍然构成一个强大的罗网，但同时也不允许社会上又发生一次悲剧，发生新的镇压，在广场上的审讯。这一切十分微妙，所有细节都需要好好考虑。”感谢那份不再坚持自己最初立场的（独立报），10月22日它曾发表文章说：“各种各样可尊敬的人们不断向克格勃的新首长提出要求，要求公布帝国内外曾与这个机关合作过的所有人的名单。为什么不把问题提得更广一些：列举所有曾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支持过这个罪恶制度的人的名单。那么这份名单就相当可观了！”

要执行叶利钦的命令，就必须把克格勃的相当大一部分档案——连同保存档案的建筑物，档案管理员，财政经费，等等——

统统移交给俄罗斯联邦的国家档案馆。而要这样做，又必须解决一大堆法律的、科学的、组织的、道德—伦理的问题。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最初委员会的成员包括俄罗斯联邦总档案馆和克格勃的代表。各州也成立了类似的委员会。后来，我一次又一次地会见了委员会的代表，其中包括著名历史学家尤里·阿凡纳西耶夫，“纪念碑”协会的一些成员。在会见时，提出了一个想法：让俄罗斯的人民代表，研究档案工作和古代文献的专家，社会团体的代表和其他专家也参加委员会的工作，后来这个想法已经付诸实施。也不排除吸收其他国家的学者来参加这项工作，尤里·阿凡纳西耶夫和弗拉季米尔·布科夫斯基都向我提出了这个问题。

委员会的工作做得越多，他们面前出现的问题也越多。因为这不仅仅涉及基金、人员和房屋的问题。要鉴别数以百万计的文件，根据旧的国家指令和政府决定——不管是否证明有效——这些文件上都标有“密件”、“绝密”、“特别重要”等字样。必须在国内没有关于国家机密的法律、没有关于情报自由的法律、甚至没有关于档案的法律的情况下工作。要移交的这些文件，都属于一些有影响的机构（不久，也会有一些属于某些特工机关的）；而且，有历史意义和文化意义的文件（谁来确定它有这样的意义？）是一回事，有关电子业务的档案或工作人员的个人案卷，则是另一回事。得为这些文件规定一个多长的期限，才能使它们不再保密？对那些会给公民的名誉和尊严带来明显损害的材料，该怎么办？对那些不是与俄罗斯，而是与其他共和国有关的文件，应该怎样处理？对那些暂时保存的材料——而大部分都是这样的材料——该怎么办？各州的档案该如何处理？——运到莫斯科来，还是留在当地？把这些档案保存在哪里——总档案馆里没有空闲的房子，保存在克格勃的大楼里吧，可那里又要做别的工作？怎样保护这些文件，不让人把它们偷光？能在多大程度上使它们商业化？瞧，这只是委员会不得不绞尽脑汁设法解决的数千

个问题中的很少几个问题。

我的出发点是，全部工作的主要原则，应该是根据最高苏维埃通过的法律条文，保护个人的权利。对于所有属于国家机密的文件，我认为可以规定 30 年保密期，过期就不再保密，不过根据情报的性质和重要程度，也可以延长或缩短保密的期限。与个人生命有关材料，保密期可以定为 70 年。

11 月，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立了一个以有将军军衔的德米特里·沃尔科冈诺夫教授为首的议会辅助委员会，负责接受苏共和克格勃的档案。委员会要解决的第一批问题，就是讨论“关于俄罗斯联邦档案基金和档案”的法律草案，这个草案与我的想法完全一致。

但是，生活赶过了委员会从容不迫的工作进程和立法者的工作计划。没等到通过这项法律和对许多其他手续作出明确决定，为了满足社会了解过去事件的需要，为了恢复历史的真实，我就不得不做了我所能做的事。

和以前一样，克格勃档案馆里的工作人员做了大量工作，为被非法镇压的人恢复名誉，发起重新审查，并重新审查了数以千计伪造的案件，其中有大案，也有一些案件很少有人知道，然而并非不那么具有悲剧性质。

在克格勃档案馆工作人员的帮助下，莫斯科市苏维埃寻找被镇压的牺牲者秘密埋葬处的委员会，成功地在莫斯科郊外查明了埋葬战俘和被拘留的外国人的 87 个确切地点，还查明了被埋葬在那些地方的人的名单。

为了永久纪念那些被非法镇压的牺牲者，决定在埋葬他们的地方——在顿斯科依、瓦冈科夫、卡利特尼科夫、罗戈什和加利扬诺夫墓地，在诺沃-斯帕斯修道院，在布托夫，在“巴黎公社社员”国营农场的用地上，在亚历山德罗夫斯基花园，设置纪念性标志。建造这些标志的分包单位是苏联克格勃的军事建设工程

局，确切些说，是它的继承者。

9月，由于苏联总检察长提出异议，建议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撤销彼得格勒肃反委员会 1921 年关于诗人尼古拉·古米廖夫的决议。根据虚假的指控，诗人已被枪决，对他的指控是：“积极帮助反革命战斗组织，为它写反革命传单，答应积极参加叛乱，并挑选敌视苏维埃政权的公民，唆使他们参加彼得格勒的反革命起义，为了技术性的需要，接受反苏维埃组织的金钱。”

一批苏联人民代表和从事创作活动的知识分子代表，通过报纸公开向我提出请求，要求解决克格勃档案中关于马克西姆·高尔基的材料的问题。9月10日发表了我的答复：

我仔细看过了今年 8 月 29 日《独立报》上发表的你们的请求，你们要求解决苏联克格勃档案中有关马克西姆·高尔基的材料的问题。我已责成档案馆工作人员更确切地查明这些材料的情况。

真的，1961 年 9 月，安全委员会的确已经将这位作家的书信、评论、笔记，共 70 件文件移交给了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其中包括对《工厂史》丛书中《三山》一书的五篇评论，还有对 И. 舒霍夫的《叶利扎尔·德宾》、М. 科洛索夫的《试验者》、《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的人们》及其他文艺作品的评论。已经移交给世界文学研究所的文件中有给罗曼·罗兰的五封信，给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拉普）书记 Л. 阿维尔巴赫的 19 封信，信中涉及文学创作和 1929—1930 年政治进程等问题，还有给 Л. 卡缅涅夫、М. 托姆斯基、Г. 亚戈达及当时其他活动家的信。

移交这些文件时，克格勃领导在给世界文学研究所所长的信中表示，希望对其中某些材料要专门保管，研

究人员查阅这些材料时，不要告诉他们这些材料的来源。这是因为，与马克西姆·高尔基通信的人中，有一些人当时尚未恢复名誉。

目前安全委员会的档案中还保存着高尔基给列宁的三封信的副本（为与格尔热宾出版社签订的合同和扎克斯发生纠纷的事，以及一封请求释放被捕的合作社工作人员沃罗比耶夫的信），还有几封给苏联另外几个人的信的副本。

克格勃的档案里还有马·高尔基的病史和关于他的死亡的文件。1938年对所谓‘托洛茨基右派集团’的案犯（后来已给他们恢复名誉）普列特涅夫教授、列文医生和卡扎科夫医生提起公诉，指控他们‘参与谋害’作家高尔基，同时被起诉的还有内务部人民委员 Г. 亚戈达。

至于马·高尔基的其余文学遗产和来往书信，根据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会议 1936年6月的决议成立了一个政府委员会，该委员会已经对这些材料的命运作出了决定。苏联克格勃的档案馆里有该委员会两次会议记录的副本，还有关于登记和保存马·高尔基的文件的指示。档案中没有发现政府委员会的其他材料。

考虑到舆论界对安全委员会档案中保藏的与马·高尔基的创作、生活和死亡有关的文件怀有巨大兴趣，并响应《独立报》的呼吁，我已下令将这些材料移交给世界文学研究所，并取消对 1961年已经移交的那些文件的限制。

谨致敬意

瓦·巴卡京

每当向我提出请求，要查阅文件，以弄清某些事件的时候，我总是竭力满足这些要求。根据苏联人民代表尤里·卡里亚金的倡议，与“联系电影制片厂”达成协议，着手拍摄一部自 1917 年以来安全机关的历史的多集记录片，一些专家和克格勃的档案馆都参加了这项工作。我曾两次会见电影创作小组，审查未来电影剧本的构思。克格勃公共关系中心签订了利用档案拍摄影片的合同，不过关于签订合同的事，并没有通知我。

为拍摄关于尤·加兰斯科夫的记录片，布科夫斯基有机会了解了许多持不同政见者的案件。《工人论坛报》的记者试图帮助寻找在战争末期失踪的、著名的琥珀屋的踪迹。克格勃的高等学校里详细制定了公布一系列克格勃档案文件的计划。应东正教总主教阿列克西的请求，教区代表获得充分了解镇压宗教活动家案件的权利——包括宗主教吉洪和都主教文尼阿明的案件。根据拉脱维亚最高苏维埃主席戈尔布诺夫的要求，拉脱维亚历史研究所所长拉依尼斯获得允许，可以研究他感兴趣的、40 年代被镇压的该共和国著名政治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的所有案卷。

档案尽可能地变成了公开的财富。在许多情况下，等待着记者和研究者的却是失望。有些据认为应该存放在克格勃档案库里的文件，很可能从来就没存放在那里。肖洛霍夫的亲属向我提出请求，要寻找“肖洛霍夫案卷”，但是没能发现任何踪迹和任何类似这种案卷的东西。另有一些文件因为保存期满，已经按照旧规定销毁了。还有一些，是在相对来说不太久以前有目的地销毁了，免得以后会作公开报道，而克格勃以前的领导却不愿让人报道这些东西。在这个机构里，如果希望保密，是会保守秘密的。

在与档案有关的所有问题中，向我提出请求的人们最感兴趣的是，与安德烈·萨哈罗夫、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李·哈维·奥斯瓦尔德有关的案件，还有越南的美军战俘的命运，拉乌尔·瓦连贝尔格案件，谋杀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的情况。研究这些

案件中的每一个案件时，都出现了某些问题。

爱伦娜·邦奈尔请我帮助寻找安德烈·萨哈罗夫的手稿和日记，我布置下任务，寻找这位院士的案卷。向我报告说：没有收集过萨哈罗夫的“文件”。不得不对军官重新进行审查。结果不出所料，他们是撒谎。是有萨哈罗夫的案卷——共 550 卷。但是所有这些材料只剩下了关于销毁全部“苦行僧”<sup>①</sup>案卷的决定，萨哈罗夫 1974 年接受一家立陶宛报纸记者访问的一盘录音带，还有不同领域的专家所作的四份结论，对萨哈罗夫发表的讲话和声明在多大程度上涉及到苏联核武器的秘密，作出了鉴定。这就是全部材料。可是，要知道，萨哈罗夫的笔记和日记是极其宝贵的，销毁它们，真是愚蠢之极。难道有人会干得出这种事来吗？直到现在我也不能相信。应当继续寻找。对撒过一次（？）谎的人，是不能相信的。

为什么要迫害萨哈罗夫？为了什么言论，一定要追究他的刑事责任？克格勃从他 1973 年 9 月 28 日致苏共中央的短筒中援引了不应宣扬出去的、最危险的几段话：“我们的社会沾染上了这样一些风气：冷漠、伪善、市侩的利己主义、毫不掩饰的残酷无情。社会最上层的大多数代表人物——党和国家的管理机关，一帆风顺的最上层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代表——顽强地抓住自己或明或暗的特权，对违反人权、进步、安全、人类的未来利益漠不关心。

“……必须有广泛的思想自由，完全停止为了信仰对人进行一切形式的迫害。

“……人民的教育和卫生状况是：给普通老百姓看病的医院极端贫困，乡村学校缺乏经费，每个班级的人数都远远超过定额，人民教师受到苛刻的对待，在教学中采取官僚主义态度，口

<sup>①</sup> 萨哈罗夫的代号。

是心非，向正在成长的一代传播冷漠精神，对精神财富、对艺术和科学的无价之宝漠不关心。

“……为了政治目的利用精神病学，对社会造成的后果特别危险，也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对人权的侵犯……”

现在有谁能指出，这些话有哪一点不是事实！正是为了说真话而对人进行迫害，因为当权者最害怕说真话，所以才要“保密”。

根据索尔仁尼琴的案卷来看——确切些说，是根据案卷中剩余的材料——这一点也是十分明显的。

我面前放着关于销毁从“蜘蛛”<sup>①</sup>案中选出的部分文件的决定：

“我，一级侦缉员（我不说出他的姓名，他和别人，和那些签署文件的人一样，只不过是一个执行命令的人。——瓦·巴），研究了‘蜘蛛’案的材料，第14271号——索尔仁尼琴，发现：目前保存在文件选中的材料（档案编号：33518）以及‘普夫’的卡片，档案编号：11375，都已失去现实意义，不具有业务和历史价值。

“决定：焚毁下列各卷案卷（列举105卷的编号）从苏联克格勃行动计划中撤销‘蜘蛛’。”

对这一案件的“判决”已于1990年7月3日执行。完全是在不久以前，我们失去了了解此案的机会，无法了解60—70年代迫害索尔仁尼琴的一切细节了。

然而关于1945年第一次逮捕他，50年代为他恢复名誉的案卷，还都保存着。我不想引用这一案卷中的文件。我认为，有权公布这些材料的只有一个人——索尔仁尼琴。这一案卷中有他在前线上写的书信和手稿，其中包括在前线写的日记。决定通过苏

索尔仁尼琴的代号。

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把这些极珍贵的文件转交给索尔仁尼琴。索尔仁尼琴请求作家谢尔盖·扎雷金设法把这些材料交给他。我希望，经过 46 年之后，这些手稿已经找到了自己合法的主人。

克格勃秘书处关于把索尔仁尼琴驱逐出苏联的某些文件，我已经在前面引用过了。这个故事的续篇并不多。1974 年 2 月 9 日，安德罗波夫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安全委员会已着手实现针对索尔仁尼琴的措施。为此，今年 2 月 8 日，苏联检察院的一名工作人员奉命去索尔仁尼琴妻子的住宅，送交苏联副总检察长召见他的通知，副总检察长奉命预先通知索尔仁尼琴，检察机关正在研究他进行反苏活动的材料。

“由于索尔仁尼琴不在家中（他暂时住在彼列杰尔基诺村楚科夫斯基的别墅里），通知交给了他的妻子。具有特殊意义的是，他的妻子不让送信的人进去，而是隔着敞开的房门和他谈话。索尔仁尼琴的妻子看过通知以后，试图拒绝接受，理由是，从通知上看不出是为了什么事情传唤她的丈夫。然而最后她还是接受了通知，但拒绝在收据上签字，声称：‘我并不确信，能把它转交给丈夫’。

“这次访问显然使索尔仁尼琴的妻子感到不安，她好久拿不定主意，不敢把这件事告诉丈夫。当她告诉了丈夫以后，他劝妻子不要对周围的人隐瞒叫他去见检察长的事实，说：‘我已经知道该怎样回答了。’

“安全委员会正继续实现针对索尔仁尼琴的措施。”

安德罗波夫 1974 年 2 月 9 日写给中央的下一份报告——“关于驱逐索尔仁尼琴”的长达 12 页的那份报告，不在案卷之中，代替那份报告的，是副主席的答复，从这一答复中可以看出，那份报告已于 1989 年 12 月 31 日销毁了（新年前夕人们在做什么啊！）

以后克格勃向党的领导提供了一些情报（确切些说，是提供

虚假的情报)：外界对驱逐索尔仁尼琴的反应。这就是这类文件中的一例——1974年2月15日的一份报告：

“对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剥夺索尔仁尼琴苏联国籍、并将他驱逐出苏联的命令，各外交使团成员和驻莫斯科外国记者纷纷作出反应，有关材料正继续不断送到安全委员会来。

“外交官和记者们注意到‘苏联当局决定的合理性’，他们指出，‘依法起诉会引起相反的政治后果’……

“外交官和记者们指出，苏联政府作出的决定极为有效。在西方出现了关于逮捕索尔仁尼琴的报道以后，外国驻莫斯科的记者站接到任务，要它们制造歪曲事实的材料，然而驱逐索尔仁尼琴，就把资产阶级宣传中心的牌给打乱了，‘使它们不可能再发动早已准备好的反苏运动’……

“绝大多数外国外交官和记者认为，驱逐索尔仁尼琴，使他失去了‘英雄和受难者的荣誉’。根据他们普遍的看法，认为苏联政府采取的这一人道主义的措施，将会加强苏联在国际上的威信。”

这是在全世界为这位作家的命运当真沸腾起来的时候，是在全世界对苏联当局的行动群情愤慨的时候，写出来的。

李·哈维·奥斯瓦尔德和克格勃。奥斯瓦尔德被正式指控刺杀了约翰·肯尼迪。多少年来，这个案件使研究美国总统死亡情况的人伤透了脑筋。要知道，奥斯瓦尔德在苏联住过几乎3年，都认为他可能已被安全委员会招募，当了间谍。

多亏委员会的领导人之一于肯尼迪遇刺身亡以后，在监视奥斯瓦尔德的案卷上批了这么几句话，说这一案件有历史价值，这一总编号为31451、共有五卷的案卷才得以奇迹般地保存下来。这五卷案卷不容反驳地证明，奥斯瓦尔德不是克格勃间谍。

1959年10月15日，20岁的奥斯瓦尔德以旅游者身份来到了莫斯科，并立刻申请加入苏联国籍，提出的理由是：他拥护马

克思—列宁的思想。遭到拒绝后，他割断静脉，企图自杀。被送入鲍特金医院抢救，出院后，他到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去，声明放弃美国国籍。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和克格勃主席谢列平向苏共中央提出一份报告，要求给予他在苏联暂时居住的权利，并为他安排工作，提供住处。中央责成白俄罗斯国民经济委员会在明斯克无线电厂给奥斯瓦尔德安排适合他电工专业的工作（因为，据他说，他在部队服役时搞过无线电技术），红十字会拨给他 5000 (500)<sup>①</sup> 卢布装修住宅，并每月发给他 700 (70) 卢布津贴。

克格勃对奥斯瓦尔德表现出特别的兴趣。但不是为了要招募他，而是怀疑他为美国从事间谍活动。委员会动用了它拥有的一切手段：奥斯瓦尔德在明斯克的住宅受到窃听，几乎经常对他进行户外监视，克格勃的几名侦探在离他很近的地方和他一道工作，他的往来书信都被检查过。因此，奥斯瓦尔德在苏联土地上的几乎一举一动，克格勃都了如指掌。

在报告中把他叫作“纳利姆”或“利霍依”（大概是谐音——“李案”和“李·哈维·奥斯瓦尔德”）。根据监视他的报告来看，这个人当真会引起反间谍机关的怀疑。与他自己所说的侨居苏联的理由相反，对马克思主义他从未表现出丝毫兴趣，从来不去听政治课，也不参加工会会议。他有时阐述的政治观点也不完全符合苏联的教条，于是克格勃制定了一些措施，向奥斯瓦尔德说明“苏联生活方式的优越性”。结果发现，他也不大懂得无线电技术。

“纳利姆”的生活方式，是他这个年龄的人的典型生活方式：参加各种晚会，和姑娘们约会。工作偷懒，因此经常受到批评。在明斯克，奥斯瓦尔德醉心于打猎，报名参加了猎人俱乐部，买了一支图拉造的猎枪。在他的案卷中记录着，他的枪法并不怎么

<sup>①</sup> 5000 旧卢布折合 500 新卢布。

准。

奥斯瓦尔德在明斯克遇到了自己未来的妻子，在药房作药剂师的玛丽娜·普鲁莎科娃。与美国对她的怀疑相反，她并不是克格勃的间谍。

渐渐地，奥斯瓦尔德对于待在苏联感到苦恼了。从 1961 年 1 月，他开始坚决设法要求离开苏联，和住在得克萨斯的母亲、兄弟恢复通信，书信往来不断。1962 年，奥斯瓦尔德和妻子以及他们生的女儿一同获准离开苏联到美国去了。

发生达拉斯的悲剧性事件<sup>①</sup> 不久之前，他曾向苏联驻墨西哥大使馆申请去苏联定居的入境签证。他的申请被拒绝了。

克格勃对约翰·肯尼迪遇刺身亡的情况进行了分析，包括利用侦察渠道提供的材料，得出结论，认为谋杀“是美国反动垄断集团与亲法西斯集团共同策划的，目的是为了加强美国政治中最反动和最富有侵略性的观点”。奥斯瓦尔德被看作傀儡，或者是一个范围很广的阴谋的同谋犯。

我对现有的奥斯瓦尔德案卷的真实性毫不怀疑。伪造这样的案卷是不可能的，也没有必要——因为在 60 年代谁也不会认为，有朝一日它会成为公开财富。

“奥斯瓦尔德案”给我带来了不少麻烦。苏联和外国大众传播媒介的许多代表都急欲看到这一案卷，要求排他性地查阅这些材料。我们可以向他们介绍这一案卷大体上的内容，也已经介绍过了，并未涉及什么排他性的问题。但是只有在全部案卷不再保密的情况下，才能回答所有问题。我认为这是可能的，只有那些会暴露间谍活动和侵犯公民权利的材料除外。成立了一个研究正式解除保密的专门委员会，起初委员会根本拒绝公开这一案卷（借口不能公开采取监视行动的方法），后来送来了结论，只允许

指肯尼迪遇刺。

公开完全无足轻重的一部分文件。我把结论给退了回去，于是新一轮拖延战术开始了，这时找到了一种“主要的”官僚主义的办法——让白俄罗斯克格勃的代表也来参加这项工作，因为大多数文件都是在那里写出来的。没有通知我，案卷就给送到明斯克去作鉴定了，直到我离职时，案卷还留在明斯克。所以奥斯瓦尔德一案还在等待着它的研究者。

据说似乎仍然在苏联的、越南美军战俘的问题。

老实说，我难以相信我们的和美国的分析家们提供的消息：认为苏联的集中营和监狱里可能关押着几乎几千名美国战俘。虽然我们了解了这个制度犯下的种种罪行，但我还是难以想像会有这样的事情。然而我还是向情报部门、反间谍部门和军事反间谍部门提出质询。后两个部门根本没有这方面的材料。中央情报局<sup>①</sup>反复查阅了档案材料和正在经办的案件，询问了 60—70 年代驻越南间谍机关的领导人，仅仅发现了一个事实——奥·涅奇波连科曾经去越南，与当时被俘的美国中央情报局苏联科的一个工作人员谈话。这就是一切。虽说，少得可疑。不过，现在奥·涅奇波连科想自己来谈这件事。

至于奥列格·卡卢金的声明，说上述那些接触多半是私人性质的接触，那么我没有任何文件可以证实或推翻他的说法。

拉乌尔·瓦连别尔格案件。这是我们历史上可耻的一页。瑞典的一位外交官，在法西斯执政的年代，他在匈牙利救过几百名犹太人的性命，1945 年被苏军当局逮捕，多年来全世界舆论界一直不知道他后来的命运。1957 年以前，已正式否认这位许多国家的荣誉公民居住在苏联领土上。50 年代中期，战俘开始返回西方的时候，西方的战俘曾在卢比扬（内部的）监狱和列福尔托夫监狱与瓦连别尔格有过接触，继续矢口否认已经毫无意义，

<sup>①</sup> 这里是指苏联新成立的中央情报局。

于是葛罗米柯发表了一个声明，说 1947 年 7 月 17 日，瓦连别尔格在内部监狱中死于心肌梗塞，他的尸体未作解剖，已经火化。并提出国家保安部军医处处长斯莫利佐夫给国家保安部部长阿巴库莫夫的报告，以证实上述说法。多年来这一直是在克格勃档案中发现的瓦连别尔格案件的唯一文件。后来有许多好像是在各个不同的集中营和监狱中看到过他的人，提供了许多证词。地域非常广阔——提到了几乎是所有大家都知道的关押犯人的地方。这一情况就使人不会相信这些“目击者”的证词了。1989 年，在克格勃的档案中（根据一切迹象来看，当真是偶然地）发现了瓦连别尔格的一些个人文件，还有他的几件东西。几十个国际委员会和独立的研究者经过详细研究，提出过许多关于瓦连别尔格的命运的说法。只是都未能明确说明他的命运。

我第一次碰到瓦连别尔格案件，还是在内务部的时候，当时瑞典驻苏大使馆请求准许一个国际委员会的成员查阅弗拉季米尔监狱犯人的卡片，根据某些材料来看，认为瓦连别尔格可能被关押在那里。

在克格勃，我要查看档案室中此案的所有材料。向我报告说，有大约 10 份文件，其中 5 份是舆论界还不知道的。9 月 4 日，这 5 份文件转交给了瑞典大使别尔涅尔先生。其中有一份 151 步兵师政治部主任 1945 年 1 月 14 日报告的副本，报告中说，瑞典大使馆秘书拉乌尔·瓦连别尔格和他的司机在布达佩斯边丘尔街 16 号被拘留。秘书和司机已经“安置好，并且保护起来”。在内部监狱犯人登记册里发现了仓库管理员所作的记录：1945 年 2 月 6 日收下了他的东西。在监狱中德国上等兵扬·洛伊德的案卷里发现有一处提到，当时他曾和瓦连别尔格一道给关在卢比扬监狱；而在对瑞典驻布达佩斯大使馆职员托马斯—格罗斯格依姆—克雷斯科进行侦讯的案卷中，发现审讯他的记录中问到过瓦连别尔格。还有，曾把克格勃副主席卢涅夫 1957 年的一封信

信转交给外交部，信中就对匈牙利外交部查询维尔亚什·兰格费利德尔（瓦连别尔格的司机）命运的答复统一口径。信中说，遵照国家保安部以前领导的命令，有关兰格费利德尔的所有文件，也和瓦连别尔格的文件一道，全部销毁了。

这些就是继续寻找的出发点。我命令成立一个调查此案的机关内部的委员会，和苏联外交部、内务部、瑞典驻苏大使馆，以及一些独立的专家协同工作，一道进行调查。到 1991 年底，苏联—瑞典委员会举行过三次会议，就寻找的计划达成了协议，把新找到的文件交给了瑞典方面。

工作在这方面进行，只要有可能找到线索的地方，都不放过。检查了克格勃档案室中一切可以想像得到的材料，检查了苏联总档案馆中战俘和被拘留的外国人的档案，国家和党的档案，监狱里的登记簿，精神病院病人的名单，已被埋葬和火化的人的登记簿。拟定了一个 20 多人的名单，这些人以前可能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接触过瓦连别尔格案件。我给其中的每一个人都发出了亲笔签名信，请他们告知他们可能知道的、关于瓦连别尔格的任何信息；在有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人权委员会副主席尼古拉·阿尔让尼科夫在场的情况下，苏联—瑞典委员会的成员与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谈过话。核对了肯定说曾在各个不同地点看到过瓦连别尔格的证人们的证词。请求各共和国克格勃和各州克格勃管理局寻找关于瓦连别尔格的材料。仔细研究和核对了一切可能的说法，什么说法也没能推翻，什么说法也没能证实。

我委托我的助手 B. 尼科诺夫领导这一工作，在四个月中找到和公布的文件大概超过了过去 45 年里找到和公布的文件。然而现在我还是不能完全有把握地说明瓦连别尔格的真正命运。

在已经查明不容置疑的材料中，有哪些情况是最重要的呢？首先，根据一切材料来看，关于瓦连别尔格关押在卢比扬监狱里的所有文件，还在 40—50 年代就已经非常仔细而且系统地全部

销毁了。他在狱中的案卷没有了，对他的侦讯根本就没有立案。所找到的都是由于那些年代里偶然疏忽、未被销毁的材料，还有我们的魔法师——犯罪侦查学家的劳动成果。由于某种偶然情况，内部监狱和列福尔托夫监狱里的犯人登记簿和传讯犯人的登记簿完整无缺地保存了下来，而它们的保存期限早就已经超过了。这些登记簿里引起我们档案专家注意的是，有些登记的内容用浓墨水涂掉了，或者给刮掉了。请鉴定专家——犯罪侦查学家来鉴定，他们发现，那些地方既有瓦连别尔格的名字，也有兰格费利德尔的名字。现在我们确切地知道，1945年2月6日，瓦连别尔格被送到了内部监狱。1945年2月8日、4月28日曾经传讯过他。1945年5月29日，瓦连别尔格被转送到列福尔托夫监狱，直到1947年5月1日，他一直被关押在那里。1946年7月17日和8月30日在那里审问过他。1947年5月11日在卢比扬监狱审问过他，在那以后，监狱的总登记簿里再也没提到瓦连别尔格的名字。

在克格勃秘书处的发文簿里发现，那里登记着：由阿巴库莫夫签字的一份（关于瑞典犯人拉·瓦连别尔格）的报告于1947年7月17日送交莫洛托夫，这时，了解他的命运全部真相的希望又忽然一闪。找到这份文件，我们就可以向了解真实情况明显地迈进一步。但是，无论是克格勃的档案里，还是苏共中央、外交部或苏联部长会议的档案里，都没有这份报告或报告的副本。

外交部曾在不同年代向瑞典政府发出满篇都是外交词令的照会，非常令人失望的是，无论哪里都找不到克格勃为炮制这些外交词令而准备的原始材料。

询问见证人的结果，基本上是令人失望的。战后在第三总局或克格勃各监狱工作过的人，都知道有一个叫瓦连别尔格的囚犯，知道这个人是属于“单独监禁的囚犯”。但是谁也不能确切地说明他的命运。只有一个以前的侦查员记不得瓦连别尔格，

可是已确切查明，他本人曾两次审问过瓦连别尔格……60年代从事“瑞典方面”工作的人记得，比他们年长一些的同事认为，瓦连别尔格已经在1947年被处决了。

从苏联外交部、苏共中央和“克里姆林宫”的档案中要来的文件，又为苏联领导的政治麻烦——这幅众所周知的画面增添了一些鲜明的色彩，而这场麻烦正是由瓦连别尔格案件引起的。从1952年到1968年，为证实那些外交词令，政治局曾作出16个关于瓦连别尔格的决定！这是我没有料到的。1957年以前确定的标准调子只有一个（“关于瓦连别尔格，一无所闻”），1957年以后——是另一个调子（“1947年死亡，此外无可奉告”）。

我们没能找到任何文件，证明1947年以后他还活着。声称在这以后看到过他的目击者的证词，没有得到证实。

根据向我作的关于瓦连别尔格一案的汇报，我也形成了自己的看法，然而不能认为这就是最终的结论。

瓦连别尔格于1945年被乌克兰第二方面军反间谍机关逮捕，多半是因为怀疑他从事间谍活动（不过不清楚他是为谁效力）。反间谍机关的领导人（后来成了国家保安部的领导人）阿巴库莫夫甚至对外交部也隐瞒了已把他送到莫斯科来的这一事实（外交部的文件可以证明这一点）。当逮捕中立国著名外交官、并把他关押在卢比扬监狱的事实被揭露出来以后，最初曾在全世界面前矢口否认这一事实的苏联领导产生了消灭痕迹的想法。大概，阿巴库莫夫给莫洛托夫的信中就包含有消灭瓦连别尔格的建议。当然，这样的问题只能在斯大林一级才能作出决定。“有人——就有问题。人没有了——也就没有问题了”。大概，瓦连别尔格被“搬走”了。的确。曾下令销毁所有文件。根本就不可能有“执行判决”的任何记录，因为没有判决，而且在1947年，苏联没有正式宣布的死刑。可能是在莫斯科当时唯一开工的火葬场——顿斯卡亚修道院火葬的。从卢比扬监狱送到那里去的尸体多半都

不登记（“请收下 50 具尸体，进行火葬”）。我完全相信，拉·瓦连别尔格已经不在人世。但是为了纪念这位勇敢的人，人道主义者应该搞个水落石出，查明真相。

最后，是 1981 年 5 月谋杀约翰·保罗二世的事。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责成我寻找与这一事件有关的新材料。已经研究过业务部门的材料和克格勃的档案。找到了某些材料。但是未必能认为，这“某些材料”十分重要。这基本上都是委员会领导的报告，报告中对与谋杀案和以后的法院审理有关的事件作出了政治评价，提出，针对以“保加利亚事件”为借口“在西方掀起的叫嚣”，应采取哪些宣传措施。没能发现可以直接或间接证明克格勃参与谋杀教皇的任何材料。没有会引起轰动的新闻。我认为这也符合真实情况。

我引用福音书里乐观的题辞作为这一章的开始。

现在想从《消息报》记者 1991 年 12 月底采访我的访问记中引用一段比较现实的话，作为这一章的结束语：

“问：据悉，对克格勃保存的档案和案卷，您曾给予相当多的注意。大概，这是这个机构拥有的最隐秘的东西。作为克格勃的领导人，您当真有可能完全看到所有情报，而且能查问这些资料。有没有试图不让您看到这些情报的情况？您是否坚决相信，委员会中没有关于瓦季姆·巴卡京及其家庭成员的秘密案卷，也没有其他重要政治活动家的秘密案卷？”

“答：我并没有坚强的信心。但是我认为，克格勃里没有关于我的家庭成员的案卷，不过我要再说一次，无论对什么也不能完全深信不疑。说我对档案给予很多注意，这一点我不同意。不如说，是记者们、学者们、政治家们和舆论界对档案十分关心。我不过是想在某种程度上帮助他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这已经不该由我来判断了。大概，远非已经完全做到。需要有关于档案的综合性的法律。”

## 八、走向合作

真正的、积极的爱国主义，其特点正是在于，它排除一切国际敌对情绪，受这种爱国主义思想鼓舞的人准备为全人类劳动，只要能对全人类有益。

——尼古拉·杜勃罗留波夫<sup>①</sup>

90年代的开始，给世界带来了惊人的和史无前例的变化。人类轻松地摆脱了“冷战”的桎梏，几十年的不信任和对抗已经成为过去。人类的价值克服了边界的障碍，不久前还只有极权制度的地方已经获得公认的权利。

实现政治新思维的结果是“铁幕”已被摧毁，而这“铁幕”曾经把世界文明社会分割为两个互相对立、进行殊死搏斗的阵营。在许多方面挑起国际紧张局势的伪共产主义的原则，被送上了历史的法庭。毫无意义的对抗逻辑，越来越不再能决定东西方的关系。

克服超级军事化的变态心理，使限制和裁减军备的领域里实

<sup>①</sup> 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杜勃罗留波夫（1836—1861），俄罗斯著名革命家，民主主义者，哲学家，文学评论家。

现了真正的突破。以实力为基础保证安全的思想越来越退居次要地位，让位给主要以非军事手段来达到安全的目的：外交对话，对所有有争议的问题达成合理的协议，采取各种加强信任的措施。

放弃以实力解决问题的办法，克服意识形态的局限性，使人道主义的合作内容得到了发展。向合乎理智和民主精神的全世界统一的社会思想迈出了一大步。在稳定的发展过程中，世界越来越相互依赖，各国的利害关系越来越趋于一致，这就给每个国家又增加了新的安全保障。

最近几年的趋势愈来愈不可逆转，不可避免地必然会对特工机关也产生一定的影响。业已形成这样的条件，使特工机关的活动从互相直接针对对方、破坏“敌人”的稳定，转向在保障稳定的领域内互相合作，互相支持。当然，无论东西关系、南北关系的变化多么深刻，却未必能够期待，在最近时期内，安全部门会变得不再需要。但显然，特工部门不仅应该在民主监督下工作，而且应该促使各族人民、各国政府相互信任，而不是制造假情报和挑起对抗。自然，只有民主主义、裁军政策以及在解决任何冲突时都放弃使用武力的思想在国际和国内都得到充分保证的情况下，这样的理想才有可能实现。

我不能说，旧克格勃正是在这个关键性的领域内开展工作的。它向最高级政治领导提供的情报，无论如何也不会促使停止军备竞赛，加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信任。委员会的国际联系基本上只面向“友好”国家的特工机关。与发达的民主社会的联系带有偶然的性质，而且仅限于一些十分独特的问题。

在反对威胁全世界的犯罪活动中，扩大特工机关的国际合作，我认为，这具有重大意义。为了使安全部门相互协作的水平适应地缘政治的新现实，适应政治领域内业已形成的国际关系的性质，这样做也是必要的。

此外，我不能容许有让联盟解体的想法。像苏联这样一个在地缘政治中如此“庞大”的国家，它的分裂除了会带来纯属内部的不愉快的后果，而且会带来全球性的震动。那样的话，会随之出现一些完全不同的安全问题，特工机关的工作也会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

在这个短暂的时期，当联盟好像真的获得民主、自由、自愿联合的性质的时候，克格勃应该既在国家一级，也在特工机关一级开展国际上的联系。说实在的，这一工作方针给我带来了最大的乐趣。不过，正如以后发现的，也带来了最大的不愉快。

我认为，与下列这样一些著名国务活动家和政治活动家的会见，不但重要，而且有益，他们当中包括：大不列颠外交大臣道格拉斯·赫德，联邦德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汉斯-季特里赫·根舍，法国国防部长皮埃尔·若克斯，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格·瓦西利乌和塞浦路斯外交部长乔治·亚科乌，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和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多纳德·埃特伍德，联合国驻维也纳分支机构总干事玛格丽特·恩斯吉，以及外交使团的代表们。

这些会见本身就是引人注目的。正如 1991 年 9 月 13 日我和美国国务卿会谈时，詹姆斯·贝克所说的：“今天美国国务卿能和苏联克格勃主席在后者的办公室里会见，真的，再没有什么别的事情比这更明显地象征着苏联发生的变化了。这次会见的确有特殊重要意义。”

在这些接触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当然，不能把什么全都说出来——讨论过不少秘密问题。不过首先想到的就是外国伙伴们合作的意愿，真诚地希望帮助我国解决我们的社会—经济问题，帮助我们的社会进行民主改革。

有时我有这样的印象，对苏联的局势，客人们比我们的某些著名政治家还要担心。实际上，在 1991 年秋天，对于他们所有人来说，具有代表性的一点，就是希望促使当时仍然是苏联加盟

共和国的各共和国以某种形式保持统一，而这和我对此问题的看法完全一致。

“我有可能以旁观者的态度来观察贵国的局势。与苏联境外的许多人一样，我认为苏联的解体是危险的。”道格拉斯·赫德对我说。“当然，不应由中央来发号施令，应当放弃行政命令的体制，但同时中央必须拥有某些重要职权。总之，我们西方的人都认为：‘不应该瓦解’。”

詹姆斯·贝克把苏联各加盟共和国获得政治主权的过程看作客观现实，同时强调保持经济领域统一的重要性：“保持经济领域的统一，才能最有效地进行经济改革。经济改革是困难的事。因此，我们的看法是，各共和国应该与中央合作，签订经济条约或者经济协议。这样会比较容易实现政治改革。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变革将是和平的。”

健全的、英明的见解，直到现在仍然不能不承认这些见解是正确的。

我从外国政治家那里了解到不少他们国家里对特工机关的活动进行政治监督和社会监督的经验，使特工机关的活动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经验，解决必需尊重人权和秘密工作特点之间的矛盾的经验。詹姆斯·贝克，道格拉斯·赫德，皮埃尔·若克斯都表示愿意向我们提供标准材料，以帮助我们制定关于特工机关的法律，并给我们派有关的专家来，为此我向他们致谢。

当然，我明白，从外国请专家到克格勃来，会使那些习惯对人人都保密的人感到恐惧。我们有很多人对于请外国顾问还抱有成见。我记得，波罗的海沿岸三个共和国获得独立，请求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专家帮助他们建立自己的安全部门，消息传来，曾使安全委员会的某些工作人员感到多么惊惶失措。我对此却十分镇静。既然能利用别人的经验，干吗要重起炉灶呢。不能错误地、有害地认为，克格勃的经验是全世界特工机关的最高成就。显

然，我们不妨向别人学习学习。

某些西方国务活动家提出了苏联情报机关活动范围的问题，认为其规模已超过了合理的需要。从我们这方面来说，认为这些问题要在克格勃总的改革框架之内，根据国家安全现实需要的新概念来予以解决。

我会见过的所有国家的代表，都对特工机关直接合作表示出了很大的兴趣。这种兴趣使这些接触的发展获得了一种完全没有先例的、新的推动因素。

在卢比扬广场工作的 3 个多月里，我会见了许多国家情报机关和安全机关的领导和代表。其中有波兰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美国，英国，意大利，阿根廷，法国，巴基斯坦以及其他国家。这些会见的结果是达成了就互相感兴趣的广泛问题进行协作的协议，其中有正式协议，也有非正式的协议。

当然，在特工机关一级讨论过的那些问题，以及已经达成协议的内容，是各不相同的，而且涉及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利益，因此不是都能公开宣布的。不过有些还是应该谈一谈。

与波兰同行的谈话，最大的注意力集中在这样一些问题上：寻找关于悲惨地死在卡滕、科泽利斯克、奥斯塔什科夫的波兰战俘的文件，克格勃在波兰活动的情况，苏军从波兰领土撤出。阿根廷代表最强调的是在与贩毒和恐怖主义进行的斗争中互相协作的问题，在这方面他们有丰富经验。

意大利情报机关和军事安全部门的领导积极帮助我们寻找可靠的材料，以弄清在南斯拉夫失踪的两位苏联记者根纳季·库林内和维克托·诺金的命运。

让我们的小伙子们从阿富汗回国，是一个特殊的问题，他们被当作政治上的可兑换的货币，已经在阿富汗被出卖过两次了。

我很快就发现，在这个十分尖锐的问题周围，一直有不少真心诚意和形形色色愿意帮忙的人以及政治家。意见各不相同，而

且想在这个问题上进行投机。某人和某人达成协议。某人想飞往某地，以便达成协议。某人需要一笔赎金，某人需要飞机，某人需要保证他的安全……大家都致力于解决问题，结果却完全微不足道。克格勃，确切些说，是第一总管理局，可以作为协调行动的中心，自然要依靠外交部和积极的外交活动。

10月初，我签署了一道命令：在第一总管理局范围内成立一个专门机构，它的任务是寻找、救助在阿富汗和其他地区战争中被俘的苏联战俘、人质以及失踪的苏联专家，设法使他们返回祖国。第一总管理局的名单上有300多人，其中许多人可能还活着。对于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来说，从事这方面的工作，要冒很大的危险。我不认为，在这方面克格勃会吝惜自己的力量。例如，曾经用1200万阿富汗尼<sup>①</sup>救出一个获释的人。然而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如果我们不与巴基斯坦和美国的特工机关合作，我们的一切行动都不会有什么效果。我认为，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进展。

应该特别谈一谈和美国中央情报局代表的接触，至少是因为，这些接触是没有先例的。和美国国务卿达成协议后，我们的关系继续向前发展，1991年10月2日，克格勃主席有史以来第一次接见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著名代表人物。我同意美国驻莫斯科大使罗伯特·斯特拉乌斯当时所说的那些话：“从我国政府的观点来看，这不是一次普通的会见，而是一个新过程的起点，这一过程将为两个国家和全世界开辟新的前景。”我们当真跨入了一个以可能进行现实合作为基础的相互关系的新时代。这种合作的基本方针是在莫斯科确定的，而以具体内容使这一方针变得充实起来，却是10月26日—11月2日在华盛顿完成的，应美国中央情报局邀请，以我的副手费奥多尔·米亚斯尼科夫为首的苏联

① 尼是阿富汗的本位货币。

安全与情报部门的代表团访问了华盛顿。克格勃的工作人员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跨进了中央情报局在兰格里的大本营。苏联代表会见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当时的代局长理查德·凯尔，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某些负责人。决定，优先进行合作的内容，包括与贩毒、恐怖主义、有组织的犯罪活动作斗争，对核武器的扩散进行监督。两国的共同努力为减少这些当真是对全球的威胁，开辟了很好的前景。

不过，当然啦，与每个特工机关合作，都是既考虑到他们的利益，也考虑到我们的利益。试图进行包罗万象的合作，那是没有意义的。不过众所周知的全球性问题也不少，与所有国家的安全机构协作，会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可以取得很大成绩。

一些有组织的犯罪集团企图把它们的活动转移到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里去，无论是对于我们国家，还是对于其他东欧国家，这都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利用迁居外国的渠道，现代通讯工具，运货和汇款的手段，一些在以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活动的犯罪组织正在着手建立国外基地。1991年秋，10多个在苏联活动的犯罪团伙的成员曾几次进入欧洲各国，作相当紧张的“巡回演出式”的旅行。他们在某些国家（其中包括德国，匈牙利，芬兰）境内的积极活动已经开始使人感到担忧。通常这些团伙先在那里讹诈从苏联去的移民和旅游者，后来就开始威胁当地居民了，他们有可能进行范围极广的犯罪活动——从受雇充当杀手，到偷运毒品、武器和最让人担心的放射性物质。

同时，作为不由自主向外国输出有组织犯罪活动的“输出国”，我们国家本身也越来越成为国外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对象。到其他国家去的我们同胞的安全也令人感到不安。

毒品和麻醉品非法交易的问题也越来越让人感到忧虑。大家都知道，全世界大约三分之一毒品是在与现在叫作独联体的某几个共和国接壤的国家里生产的。不久前我们还认为，这是遥远的

威胁，只是西方的头痛问题，现在这已经成为现实。从 1985 年到 1990 年，护法机关破获了 1597 次企图走私和过境运输毒品的案件，没收了约 16 吨毒品。可以完全肯定地推测，随着经济和政治领域里更加开放，贩毒情况将会变得更加复杂。对于国际毒贩辛迪加来说，我们的市场可能成为有吸引力的市场，而我们本国的贩毒活动也会力图成为有竞争力的对手，——首先是在欧洲大陆上。

贩毒黑手党的活动特别危险，全世界与它斗争的经验也表明，只有采取整体的——全民的和跨国的措施和它进行斗争，才会有效。因此我们和内务部预先共同制定了与外国同行互相配合、互相协作的办法：交换贩毒问题的情报，采取共同行动，培训和重新培训专家，互相提供技术上的帮助。

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国际恐怖主义问题的范围也发生了某些变化。这首先与我们和以色列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有密切关系。来自穆斯林恐怖集团的威胁更加频繁，为了抗议苏联公民迁居以色列，这些恐怖集团越来越经常地对运送移民的航空公司采取恐怖行动。1990 年在雅典和贝鲁特发生的极端行为说明了这种企图严重性。布加勒斯特、布达佩斯、雅典、阿尔及尔、拉纳卡，都是今后可能出事的地方。这些集团对苏联在波斯湾地区战争的立场表示明显的不满，暗示，对我国驻外国的机构和我国公民采取恐怖行动的危险大大增加了。许多欧洲左翼极端主义集团也发出类似的威胁，它们指责我们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停止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等等。

全世界各种不同恐怖主义组织团结一致，组成地区性联合体，实现“战略性的互相支持”，采取互相配合的行动，这一切使人产生更大的忧虑。许多恐怖主义集团力图掌握大规模杀伤武器和核技术，以实现政治讹诈，破坏原子能设施，这构成了当前面临的特殊危险。此外，根据预测，最近几年，常规武器市场可

能变得非常活跃，会有许多人愿意出极高的价钱购买最普通的武器。

为反对这些罪恶活动，所有文明国家和它们的特工机关必须共同协作。

为了解开“冷战”期间特工机关帮助结成的一大批国际矛盾的疙瘩，为了清除阻碍各国人民互相信任的发展、妨碍各国人民坦诚相见的障碍，各国特工机关也必须进行国际合作。现在，“冷战”的坚冰已经融化，这些障碍看上去更显得特别难看，特别岂有此理。

莫斯科柴科夫斯基大街深处有一幢方形红砖大楼。这是美国大使馆的新址，大楼已经空了 10 多年了。它本身就是以前苏美敌对关系的象征，外交僵局的象征，并非外交辞令的谎言的象征。以前是苏联领导，现在是俄罗斯领导声明，与美利坚合众国的伙伴关系的新时代已经到来，在这一声明的背景上，这样的象征尤其显得不合时宜。

美国方面发现大楼内有窃听装置以后，立刻停止施工，10 年来一直等待我们对在他们大使馆新大楼里安装窃听装置一事作出正当解释，同时禁止我们的外交官搬进华盛顿苏联大使馆新建的综合大楼。10 年来苏联方面一直撒谎（不能用另一种说法）说，那里面什么也没有。

从最初几天起，我就已经面对这个问题。是继续执行克留奇科夫的方针，掩盖克格勃这一最大的可耻的失败，继续撒谎呢，还是再详细研究一下这个问题的实质，考虑到新的形势，制定出自己的方针。与技术管理局局长贝科夫谈话以后，我得知，从 1976 年到 1982 年，这幢未竣工的大楼里的确安装了窃听系统，目前对美国人来说，这已经不是秘密。大部分部件已被他们发现了。1982 年，这一行动失败以后，克格勃的领导决定停止这项工作，把能销毁的一切统统销毁。现在窃听系统已经不起作用。

秘密地恢复这些装置是不可能的。然而可以认为，直到现在，美国人还没能发现传声器，他们认为，我们采用了一种他们不知道的窃听方法。因为连他们已经发现的那些显而易见的东西我们都矢口否认，所以他们坚持自己的错误看法，认为没有理由信任我们，想要重建一座使馆大楼。

装备美国大使馆新（正在建造的）大楼时使用的那些收集情报的技术系统，目前已经不是秘密了。把这些装置的示意图交给美国人，他们如果愿意的话，就可以省掉一大笔毫无意义的花费。不过这已经是他们的事了。我们的事情，我认为，就是停止说谎，根据合作和相互信任的国际政策，建立我们之间的新关系。我同意，只有在相互的基础上，才能做到这一点，但是总得有人迈出第一步。何况与大使馆里的“看家狗”有关的，这一毫无价值的事件，远不是什么第一步。外交官和政治家们早就走到克格勃前面去了。而克格勃的利益（这是不是它的利益所在呢？）不能妨碍政治家的愿望和国家的利益。

作出这样的决定，并把它付诸实现，我明白，这会激起反动的假爱国主义者愤怒的浪潮，无论在克格勃内部，还是在政治家家中，都不乏这样的人。但是我深信，这是正确的和对国家有益的行动，健全思想的逻辑终将获胜，对我表示支持。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只有第一种推测，我确实没有弄错。正如一位记者所说的，那些“爱国主义”的、保守的和“黄色”的报纸，利用一切可以想像得到的和无法想像的虚假情报，无谓的推测，“专家们”和以克格勃道德标准来衡量的行家们的结论，掀起了一场“愤慨的风暴”，来势之猛的确超过了一切预料。我没考虑到主要的一点：民族布尔什维主义需要这样一些史无前例的事实，用来煽起仇恨情绪，破坏新政权的威信，欺骗群众，与“所谓的民主主义分子”、“犹太—共济会员”、“外国情报机关的间谍”、“世界帝国主

义的傀儡”……进行斗争。有谁愿意让自己处于受攻击的地位呢？

美国驻苏大使理查德·斯特拉乌斯于 12 月中旬在华盛顿声明，美国方面从姆斯勃那里得到了正在建造的大使馆大楼里窃听装置的示意图。在这以后，一场喧嚣突然爆发了。从几经转载的、塔斯社所作的解释来看，这件事看上去是这样的：好像是巴卡京突然把斯特拉乌斯叫到他的办公室里，把美国外交官现在居住和工作的所有建筑物中的所有技术装置示意图，连同这些装置的样品，统统都交给了惊愕的大使。

不到两天，所有报刊上都充斥着这样的材料，其中为这场喧嚣定下基调的，是保障国家安全委员会（奥克奥·格勃）的呼吁，而这个委员会是在姆斯勃内部、由它的工作人员成立的。奥克奥·格勃的呼吁一开始用的是这样的词句：“肃反工作者们！同志们！战友们！”几乎所有报纸都引用了这份呼吁书里的话。里面提出了一种说法，说是巴卡京本人带着示意图和样品秘密地到了美国大使馆，把这些东西交给了美国人，“毫无顾忌地使安全机关最复杂的技术设施之一失去了作用”，而这是叛国行为。“肃反工作者，同志们，战友们”一定都知道，这些“最复杂的设施”在 1982 年遭到了可耻的失败，为了消灭痕迹，那些如此热心安装起来的装置，只要可能，已经都被他们的同事永远消灭了。除了这些话，呼吁书中就只剩下连孩子也能一眼看穿的谎言了。

《真理报》和沙文主义报纸《日报》对我极尽诬蔑之能事，像“叛徒”、“背叛者”一类的词汇，恐怕是最温和的言词了。担任莫斯科市苏维埃代表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发起倡议，要以“叛国”罪追究我的刑事责任，而这一条款规定，对叛国者的惩罚，可以直到判处死刑。俄罗斯总检察长责成进行相应的调

查。<sup>①</sup>

在报纸上进行狂热叫嚣的最初几天，使我感到惊讶的，首先是，所有报纸都乐于引用不署名的“肃反工作者”的意见，却没有一份报纸全文公布姆斯勃就此发表的正式声明。这是一个明显的证据，说明旧克格勃还远未失去操纵大众传播媒介的能力。

我在此引用这个声明的全文，好让读者能第一次看到它：

“鉴于美国驻苏大使理·斯特拉乌斯先生发表声明，谈到下述事实：共和国间安全局向美方转交了在建造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时安装窃听装置的技术文件；姆斯勃认为必须通报如下：

“美国驻苏大使理·斯特拉乌斯先生的声明符合实际情况。

“1969年苏联领导通过决议，决定在计划建造的美国大使馆综合性新大楼里安装收集情报的专门技术装置，1976—1982年建造这幢大楼时，这一决定已经付诸实施。

“以后美国政府发现了这些装置，一再提出抗议，在大楼内安装专门技术装置的工作已停止，连结暗藏的部件和记录装置的电缆已经拆除，全部情报收集系统已经不起作用。

“然而直到最近，苏联主管部门一直否认安装专门设施这一事实。多年来存在于我们两国之间的不信任促使美国国会通过一项法案，禁止使用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新大楼，也禁止苏联使用华盛顿的新大使馆。为重建实际上已经竣工的莫斯科的综合大楼，美国国会不得不拨出一笔为数达3亿美元的专款。

“最近两国间建立了基于相互信任和开诚布公的新关系，其性质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这样就允许作出完全符合政治新思维精神的决定。

“根据姆斯勃领导人瓦·巴卡京的倡议，在他与美国大使理·斯特拉乌斯谈判的过程中，达成协议：将美利坚合众国大使馆内

经过调查之后，由于不构成犯罪，俄罗斯检察机关没有起诉。（原注）

专门技术装置及其部位的全部情报转交给美方。这一协议已获得苏联总统、俄罗斯总统、苏联及俄罗斯外交部的同意。这样的决定使美国方面为重建一座大楼而付出的巨额开支变得毫无意义，而且考虑到我们新关系的前景和精神，对此美国人民是可以理解的。”

转交已经不起作用、也无法恢复的窃听系统的示意图，根本不是姆斯勃“发疯的”领导人自作主张和唯意志论的决定。这个问题已经在政治一级和专家一级仔细研究过了。

与报纸上所断言的恰恰相反，无论是对于斯特拉乌斯，还是对于两国的最高领导，转交这些文件都根本不是什么出乎意料的事。12月5日转交这些文件的情况比报纸上所描写的要简单得多：无论是巴卡京，还是斯特拉乌斯，都没参加，参加的只有一些专家。同时，美国方面也没有得到任何技术装置的样品，因为这种样品美国方面早就已经有了。这又是一个谎言，不过没有特别意义。

在作出这一非传统的、全世界实际经验中没有先例、但毕竟是个别的——就具体对象和大家都知道的情况来说——决定时，当然，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谁也不会怀疑，这一善意的行动会继续加强双方的关系。大概谁也不能否认，这一步棋使我们国家在政治上赢得了一分，不过，当然啦，与俄罗斯在裁军领域里的单方面倡议相比，相对来说这只是一个较小的胜利。不过这毕竟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

对克格勃在美国使馆新大楼的技术文件不再保密，还在1991年9月，我就向戈尔巴乔夫第一次提出了这样的建议。他同意我的意见，建议在征得苏联外交部长鲍里斯·潘金的同意以后，再解决这个问题。潘金作出了最积极的反应。

既然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俄罗斯的利益，所以我事先把这件事报告了鲍·尼·叶利钦，并且得到他完全赞同。俄罗斯联邦外交

部长安德烈·科济列夫也同样支持转交的倡议。

在埃杜阿尔德·谢瓦尔德纳泽取代潘金以后，我也和这位最有经验的外交官联系过。当我告诉谢瓦尔德纳泽，有可能砍断这个大使馆的死结的时候，他轻松地呼了一口气：“早就该这样做了！你要是知道，这个问题多么妨碍一切谈判就好了，它总是迫使我们不得不躲躲闪闪，设法辩解。”

最后，就在转交的头一天，我又给叶利钦打电话去，听到他声音中好像有点儿气愤的语气；怎么，他说，以前的话算白说了，拼定了——就该去做。

也是还在 9 月里，就已经通知美国方面，我们打算把技术文件交给他们，如果这有助于美国驻莫斯科使馆新大楼投入使用，苏联也可以迁入华盛顿新使馆的话。关于这件事，我写信告诉了贝克。斯特拉乌斯大使专程回美国去进行必要的协商。12 月初他正式声明，美国最高领导同意以文明精神解决围绕使馆大楼的冲突，如果交出“所谈的全部情报”的话。

12 月 5 日，终于又在建立两国之间真正友好关系的道路上迈出了现实的（而不是空谈）一步，不久前叶利钦总统访问美国时，曾经那样清晰地谈到了这种真正的友好关系。

后来，就连民主报刊也向我提出责问，其中一项主要指责就是，没有遵守相互的原则，美国人没有立刻把他们在华盛顿苏联使馆新大楼里安装的窃听装置示意图交给我们。不错，这是公正的指责。不过也是根据过去的标准所作的指责，过去在成年累月的谈判中，总是用药房里的天平衡量相互的让步，一定要让双方的让步取得平衡。政治不是市场，在市场上，买一小捆莼萝就得立刻付出 5 个戈比，而政治上的好处却并不总是立竿见影，立刻就能看得到的。

信任的新政策，如果它是信任的政策，就不能继续遵循这种药房和市场的原则。不能以不信任来侮辱对手。我们迈出了第一

步，没有任何先决条件。然而我相信，美国方面也会采取相应的措施，而我能够使这一问题彻底解决。

最后，现在谁会否认，包括转交大使馆文件在内的、显示我方立场真正诚意的行动，促使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情报委员会的主席接受了裁减中央情报局一半人员的建议——既然美国已经不再把独联体看作自己的敌人了。顺带说一声，从美国方面来说，这也是一个单方面的行动。现在重要的是，不要在这个过渡时期自然会有有的复杂情况和可能发生的误会中迷失路途。尤其是因为有不少“爱国主义者”总是从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制造这些“误会”。必须继续执行信任政策，因为任何其他政策都是没有前途的。

我们的专家研究转交这些文件的问题时，最注意的就是遵循这一原则：不要给我国的安全带来损失。某些对技术方面的问题有一定知识的专家最近在报刊上发表意见，对这一行动是否适当，表示怀疑，这些怀疑对我来说完全不是什么意外的新问题。在进行预备性讨论的各个不同阶段，我就产生过这些怀疑。然而我依据的是与在使馆大楼安装这些技术装置有直接关系的专家的意见，而不是那些只“听说过”什么的人的意见。

研究这一问题时提出过的最主要的技术性论据，可以归纳为三点，为了证明转交这些材料是适当的，现在把这三点叙述如下：

- 1、把最新的绝密技术交给美国人，在美国，没有类似的东西。在美国，大概是没有“类似的东西”，因为甚至对于我们来说，这也是昨天的技术了。正如一位专家所说的，美国的技术设备“较为精致”。

在美国使馆大楼安装的技术装置，最多在 70 年代中期是新的，而绝对不是 90 年代的新产品。可以说，已经过时了。此外，关于这些装置安装在哪些地方，美国人以前就有情报；没有我们

提供的文件，他们就已经取走了一些样品。借助放射性同位素层体照相技术，在 80 年代他们用钴“炮”对大楼进行“透视”，我们那些巧妙的玩意儿安装在哪里，他们已经完全了解，或者已经掌握了百分之九十五了。无论如何，那些曾经使用层体照相技术“透视”具体建筑物，通过模拟试验了解了这种技术效果的苏联专家，都持有同样的意见。

2 得到这些文件以后，美国特工机关就能研究出办法，发现其他建筑物里类似的窃听系统。

美国人在没有示意图的时候，就已经成功地发现了窃听系统。此外，“专家们”应该知道，真正的专家不会按照“标准设计图”去做这种“事情”。类似的情况是没有的。

3 美国特工机关会知道，有特殊技术装置的某些成套部件是从哪里弄来的（其中有一部分是从国外运来的），这将有助于他们发现我们国外的间谍机构。

在没有示意图的时候，还在几年以前，美国人透视了建筑结构以后，就已经知道哪些成套部件里有些什么东西了。当然，如果他们对此感兴趣的话，早就已经知道，这些成套部件是在哪里制造的。我们没有向他们提供这样的情报。至于《论据和事实》报刊登的消息，说把示意图交给美方的时候，还从芬兰与我们合作的某些机关里派去了几个工作人员，那么可以认为，这属于报纸上的公开“造谣”。这和我们在芬兰的专家有什么关系？让《论据和事实》以及提供这一情报的、有黑手党作风的机构来承担“泄密”的责任吧。

不能说，姆斯勃里的所有专家都赞成把示意图交给美国人，也很难期望事情会不是这样。多年前使这一行动遭到失败的人，谁也不愿承认自己的错误。

那些要为“泄露最重要的国家机密”追究我的责任的工作人员宣称，我作出把关于大使馆窃听装置的文件交给美国人的决

定，违反了国家保密法。同时还举出了一条那么厉害，但也同样天真的理由：“如果这些材料是特工机关的普通工作人员泄露出去的，那么他必然会坐牢。”

同时不知为什么忘记了，姆斯勃的领导人实现国家最高领导的政治愿望，他并不是普通工作人员。为了进行比较，再举一个例子：如果导弹基地的普通工作人员让来自五角大楼的人进入基地，那么他就是犯罪。如果是国防部长带领来自五角大楼的人到基地去，那么要追究他的什么责任呢？我们没有国家保密法，即使我想违反也不可能。现在有效的只有部长会议的决定和由克格勃主席批准的工作条例，根据这些条例，他本人有权独立自主地作出决定，让他主管的这个机关里的任何文件不再保密。不过只是主席有这样的权力，而不是普通工作人员。然而不管怎么说，并没有泄露任何“秘密”。克格勃的一次行动失败了，现在只不过是证实这一早就众所周知的事实。

这些由大使馆事件引起的诽谤和叫嚣使我，而首先是使我的亲人们经受了一些十分痛苦的时刻。出于意识形态上的考虑，以最无耻的方式造一个人的谣，谁也不愿意处在这个人的地位。在这件事情上，真理是显而易见的，然而谁也不需要真理。需要丑闻。因此辩解是徒劳的。辩解只会给火上加油。

对祖国报纸上掀起的这场反对我的运动，我是这样理解的：十分明显，空穴来风，其来有自，来自“肃反工作者”和——说得委婉一些——“社会主义爱国主义者”。美国报纸上说：“巴卡京交出来的不是一切”，对这种说法，我也能理解。当然，难以相信像克格勃这样的对手是真诚的，昨天它还是最凶恶的敌人。然而，该放弃老框框了。我执行改革克格勃的政策，不是为了玩老把戏。不是为了用半真半假来取代纯粹的谎话。从不信任到信任是一条很难走的道路。然而必须从这条路上走过去，尽管那些寄生在对抗政策上、靠不信任过活的人会妨碍我们，也正是因

此，他们才像保护眼珠一样保护这种不信任。

国家，尤其是特工机关，还得克服许多困难，从“冷战的布雷区”上走过去，而不要让地雷爆炸。应当做自己的事。不要有失身份地去进行辩解。但是，说对反动势力的攻击不值得作出反应，却是不正确的。民主力量应当采取积极进攻的姿态，不是丧失速度，不要造成真空，因为不信任尚未消失，它还会重新迅速填补真空。

## 九、一百零七天

各族人民的历史中往往有一些好似喝醉了的日子。应该熬过这些日子，但是在这样的日子里生活，却是永远不可能的。

——泰菲<sup>①</sup>

结果，在改革克格勃这一工作上，我花费了 107 天。从 8 月 23 日算起。在第 101 天，1991 年 12 月 3 日，克格勃形式上已经不复存在。形式上，而不是实质上，国务会议委托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产生了一个原则上不同的机构——共和国间安全局。

5 天以后，12 月 8 日，白俄罗斯、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和乌克兰的领导人在明斯克缔结了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的协议。苏联没有了。结果发现，与苏联一起，作为协调各加盟共和国特工机关共同工作的机构——姆斯勃也不需要了。现在发现，原来这紧张的 107 天，就许多方面来说，都是白白过去了……我并不为它们感到可惜。我本人不可能以另一种方式度过那些日子，也不知道，在那种情况下还能采取什么不同的行动。当然，

<sup>①</sup> 泰菲——俄罗斯女作家娜·亚·洛赫维茨卡娅（1872—1952）的笔名。

建立特工机关和实现改革特工机关的构想，归根到底都不取决于某一个人的意见，即使他是克格勃的主席，而取决于国内发生的政治过程的性质及其总和。取决于政治提出的目的。

这是一些充满戏剧性、内容丰富多彩、政治上无法预言的、史无前例的日子。

9月1日，星期天，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第一次召集以后叫作政治委员会的会议。在克里姆林宫，胡桃木厅，出席的有加夫里尔·波波夫，尤里·雷若夫，安纳托利·索勃恰克，亚历山大·亚科夫列夫，叶戈尔·亚科夫列夫，格奥尔基·萨赫纳扎罗夫，格里戈里·列文科，伊万·拉普杰夫……讨论的问题是即将召开的人民代表大会。当然，不容许随意转述，谁说了些什么（我这里没有速记记录。我也不会这么做）。我要说的只是，我为我们大家都束手无策感到震惊。每个认为需要表态的人，态度都很明确，但是没有这样一个机构，能够使任何建议付诸实施……没有充分可靠的情报和预测。一大堆问题悬而未决。代表们会不会来开会？谁不会来？代表大会会不会开不起来？会要求总统辞职吗？还是自己提出辞职？由谁来主持大会？作什么报告？谁来作报告？俄罗斯的态度怎么样？他们又不在这里，这可不好，能向大会提出些什么文件来呢？

最有信心的是加·波波夫和安·索勃恰克。

情况异常。以前的联盟正在瓦解。国家陷入混乱之中。曾经提出一个想法，由各共和国领导人发表一个共同声明，这样来宣布大会开始。号召缔结新的联盟条约，立刻签署一个简短的经济关系协议。建立临时的联盟机构。根据新的选举结果确定人选，制定新宪法。立刻缔结关于集体安全和统一武装力量的协议。重申遵守一切国际义务。

就这样散会了。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请求每一个人，如果对代表大会有什么主意，一定要告诉他……但是十分明显，已

经没有时间了。

根据我早就养成的习惯：“上级任命的官员”每次“开会”，都带着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就在那天晚上，为防万一，我草拟了一个发言提纲。

我把它写在这里，仅仅是为了避免用现在的眼光来对当时的事情进行评价。

正如聪明的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克<sup>①</sup>指出的：“……一个坐在写字台前，而不能防备现代病毒侵袭的人，一不留心，这种病毒的毒素甚至会渗透进对《伊里亚特》和《罗摩衍那》<sup>②</sup>的注释里去。”我认为，我就属于那些不能防备这种病毒的人。因此我只写出当时我对形势所作的估计，不加任何注释：

“1、对叛乱分子的胜利——这是在改革政策陷入僵局的情况下一次革命性的突破。要拆除专横的机构，在正常情况下需要几年时间，现在在屈指可数的几天里就已经完成了。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不过，可惜，并不仅仅是往好的方面转变。

“2、叛乱分子，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实际上达到了他们主要目的中的一个目的——联盟条约的签字被破坏了。完全可以理解的、对中央国家机关的愤怒，以‘独立大示威’的形式表现了出来。现在造成了一种反常的形势。在中央政权急剧民主化的情况下，当联盟可以真正具有民主内容，保证过去的情况不会重演的时候，却出现了某些共和国要与这个新政权划清界限的明显意图，要脱离获得新生的联盟的明显意图。

“我深信，联盟是需要的。这不是为了某种抽象的国家观念，而是为了每一个共和国里每一个人的利益。现在已不可能使以前

马克·布洛克(1886—1944)，法国历史学家。

② 《伊里亚特》是荷马的史诗，《罗摩衍那》是印度史诗。

的联盟条约草案复苏了，然而我深信，我们需要迅速行动起来，草拟新的条约，签订这个条约。而且所有共和国，如果不同意条约中这一项或那一项规定的话，作为联盟成员，它们应该享有保留自己某些特殊条件的权利。最后，有利害关系的所有共和国必须缔结一项经济协议，无论这些共和国是否在联盟条约上签字。

3、至于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应该作出有法律效力的相应决议，以实现它们的独立，并使之具有合法的形式。但同时不容许犯这样的错误，跨越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获得完全独立之前就应该予以解决的一系列问题：希望保留联盟国籍的人的命运，少数民族的权利，私人财产，安全保证等。

4、政变的失败造成了中央政权的真空状态。国家领导人中的一些主要人物现在都关在监狱里。联盟政权的执行机构瓦解了。这种情况远不像某些人在胜利的喜悦中所认为的那样没有危险。结果国家已经没有任何可以影响危机发展过程的杠杆，首先是经济领域里的危机。在实际上缺乏市场机制的情况下，经济有完全虚脱的危险。

“出路在哪里呢？市场，然而这比有些人所想像的需要更长的时间，也更复杂。迅速建立新联盟政权的执行机关，也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可能，是把政权暂时交给由各共和国首脑组成的国务会议，赋予它管理国家的职权。

5、叛乱的失败为民主力量的团结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为民主力量利用人民的支持，把国家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可惜，我们现在看到不少趋势，说明民主力量正在走向新的分裂。在这个困难时刻，许多民主主义者不支持中央，不支持苏联总统和俄罗斯总统。苏共的领袖们早已背叛了改革思想。他们从来也不处于‘中心’，现在政治中心空了……那里只有叶利钦个人的威信……如果不能为形成新的积极的政治运动找到思想和口号，那么经济和政治的解体将会急转直

下，而变得不可逆转，不久我们不得不应付的就不是八个无能的阴谋家，而是心怀怨恨的、饥饿的人民了。

“6、为民主的胜利欢欣鼓舞的时候，不能闭上眼睛，看不到遭受失败后力图进行报复的力量迅速团结起来的可能性，这些力量暂时退出了舞台，但是在任何时刻都可能从幕后走出来，或者进行秘密活动。顺带说一声，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开会期间，已经可以感觉出这些力量在恢复积极活动了。如果这次代表大会上这种情况占了上风，那将是一场悲剧。”……

代表大会是由哈萨克斯坦总统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发表“声明”开始的。大会开得很紧张，但最后，当时我觉得，还是通过了唯一可能做得到的正确决议。我个人赞成这些决议。“过渡时期”开始了。照我看，谁也不知道，这个过渡时期从何时开始，会过渡到哪里去，将怎样结束。因为代表们刚一回国，大会的决议立刻就遭到了破坏，这就更加难以想像，将来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了。

叛乱失败了，民主获得了胜利，代表大会取得了惊人的积极结果，因为这一切而产生的希望……这一切希望都已开始渐渐消失……随着这个美丽而漫长的秋天，随着苏联最后一个秋天的秋叶，而四散飘零了。

9月6日，国务会议召开第一次会议。所有共和国的领导人都出席了。就连格鲁吉亚的代表也出席了会议，但是当他弄清，今天谁也不想审议承认格鲁吉亚独立的问题，就立刻离开了会场。

花了很长时间、相当混乱地审议了外债问题。谁也不听谁在说什么。戈尔巴乔夫显示出对这个问题了解得十分深刻，而且显示出他是一位无可争辩的领袖。实际上他以自己的博学和精力压倒了所有的人。然而这并不好。各共和国领导人之间产生的矛盾和争论得不到解决。戈尔巴乔夫总是以仲裁者的身份最后发言。

要想不致遭到激烈反对，总是有一个可靠的办法：“好吧，我们就认为，原则上已经达成协议，‘细节’嘛，可以按照‘日常工作程序’再作研究……”

我们的情况是可悲的。我们编制外汇收入计划的时候，认为一吨石油可以卖 105 美元，结果每吨只卖到 68 美元，这是什么原因呢？对此所作的解释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是谁这样“编制计划”的？

这样天真的问题得不到回答。最后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说，最危险的，是把这些问题宣扬出去。

在讨论过主要问题以后，我利用当时的形势，请求通过一个苏联总统令，为波罗的海三个共和国被撤销的克格勃的工作人员提供法律和社会保障。会议同意我的请求，但是后来会议的执行机关不能对这个问题提出多少还可以接受的方案。

有一次会间暂时休息的时候，我找到叶利钦，和他讨论莫斯科管理局隶属关系的原则，同时也请他支持由叶夫根尼·萨沃斯季扬诺夫担任这个管理局的局长。

9月4日，在预定于16日召开的国务会议开会前夕，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又召开了一次政治委员会会议。讨论“当前形势”。大家都积极批评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和某些俄罗斯政治家的态度，这些俄罗斯政治家的目的似乎是想并吞联盟的机构，而实际上却是妄想使联盟解体，以加强俄罗斯的力量。建议总统在对全体人民生死攸关的问题上采取积极行动。例如，颁布土地改革法令，而目前的土地改革已经陷于僵局。鼓励出卖土地。或者颁布促进小企业活动的法令，颁布私有财产法。变更公债条款的问题……保障外国投资，等等。

也谈到了对于像乌克兰在联盟军队问题上采取的那种行动，总统必须作出反应。现在最可怕的就是停滞，而停滞的迹象已经明显地出现了。为了加强有利于联盟的态势，应该利用一切，而

不管共和国的总统们会有什么反应。

讨论粮食供应问题、听取格奥尔基·亚夫林斯基作关于经济联盟报告的这次国务会议，就是按照这个脚本召开的。苏联总统控制了会议。客观上他当真比旁人更了解形势。但是他不该显示这一点，而应该让旁人把话说完，沉默一阵以后，各共和国领导人提出，必须达成协议。戈尔巴乔夫却希望尽可能作得更好一些——他觉得是这样——结果却引起国务会议成员的不满，他们在走廊里摆摆手说：“又是一次空谈会”……国务会议以后，我去见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说，我觉得，他犯了一个大错误。他应该作会议的主席，而且只是作一个主席，这样来主持会议：让各共和国的每一个领导人都感觉到他是对整个联盟负责的主人，而不是堵住他们的嘴，把自己的决定强加给他们。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同意我的意见。

在这次会议上，叶利钦的坚决态度使我感到惊讶，他提出充分论据，但是说话不多，实质上他是要求尽快签署经济协议，立刻（在9月底以前）缔结粮食供应协议，同时也要求成立姆埃克（共和国间经济委员会）。我所尊敬的、一向十分稳健的吉尔吉斯共和国总统阿斯卡尔·阿卡耶夫的态度也让我感到吃惊，他反对亚夫林斯基，反对经济联盟。

怎么会是这样呢？要知道，总统们在联合声明上签字，过了还不到两个星期，而声明中谈到必须“立刻”（！）缔结经济联盟……

希望逐渐消失……问题尖锐化了。当然，历史以后会对一切作出恰如其分的结论。但是我觉得，在这幕戏剧中，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出乎意外地扮演了“梅菲斯特 这个角色”，他好像很快变成了另一个人。需要改变，对于这一点谁也不会争论。不

能永远作一个共产主义空想家。一切都没有什么关系，只有社会分离主义不好，因为它利用政治为自己的竞选服务，为总统的宝座而斗争。

9月里各共和国的领袖们下意识地“与中央进行的斗争”是可笑的，如果不是导致共同的危机加深了的话……

事情毫无进展，被淹没在空谈里了。

不久鲍·尼·叶利钦去休假了，米·谢·戈尔巴乔夫实际上已经没有实权。以西拉耶夫为首的中央执行机构处于一种虚假的状态：“掌权，然而不在管理”。所有问题，不管怎样反正要取得叶利钦的同意，才靠得住。叛乱以后，已经过了一个月了。形势越来越让人感到不安。我决定发表一篇文章，谈谈我对形势的“不理解”。拖延了好久，文章才刊登出来。10月25日发表在《消息报》上的文章，标题本来是《我们继续庆祝阴谋家们的胜利》，不知为什么给改成了比较心平气和的形式：《我们继续庆祝节日，我们没有着手解决问题》，不过文章的内容没有改动。我在此引用其中的某些片断：

“……旧的中央已经死亡。政府和苏共中央政治局这辆两轮马车已经垮掉了。使人痛苦的追求已经结束，结果发现，根本就没有所追求的那个东西。苏共的领袖们没有愿望，主要的是没有能力自我更新。他们这些盲人精神饱满地大步走进阴谋的深渊，结果违反自己的意愿，做了一件好事，加速清除了改革道路上的障碍——思想怠工。

“已经开始腐化的革命——改革，终于实现了突破，那些日子里俄罗斯的街头人们都在庆祝胜利。

“节日结束了。又是日常生活中从前那种无谓的忙乱。但是我无法摆脱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我们在继续庆祝节日。我们没有着手解决问题。

“我们无忧无虑，已经不知有多少次浪费了时间，而没有发

觉，战胜反动的教条主义以后，民主思想和健全的理智正在失去民主的特点，丧失健全的理性。新的领袖们互相推开对方，正在精神饱满地走向同样有害的深渊。

“国家、人民，客观上正处于一种最复杂的形势之中。论据就在窗外。在成千上万买糖、买面粉、买伏特加的长队当中。经济混乱的情况就在眼前，只有取得最起码的政治稳定和对政权的信任，大家都懂得，在这条唯一可行的道路上，只有通过自由企业活动，以首创精神和毅力克服无法避免的困难，才能应付目前的混乱局面。否则这种混乱局面必然会使人民的不满发生威力最强大的爆炸，埋葬我们的国家体制，埋葬我们刚刚诞生的民主的萌芽。而这正是叛乱分子所要达到的目的。

“阴谋家们打算破坏在各共和国之间形成的新关系。如果不能形成新的关系，联盟就会瓦解。我指的并不是用一种思想体系、暴力和谎言粘结起来的统一的旧联盟。对那个联盟值不得惋惜。瓦解的是一个由千百种经济、文化、人与人的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多民族的组织。正是人与人的关系。旧制度的那些思想家们发明了“统一的共同体”这样一个干巴巴的公式，而与他们半官方的报刊上所宣传的恰恰相反，在俄罗斯人、格鲁吉亚人、乌兹别克人、乌克兰人、哈萨克人、塔吉克人、犹太人、奥塞梯人、鞑靼人……在我们所有人之间，都有人与人的关系。当除了半官方报刊上宣传的思想，无权信仰其他思想的时候，有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就好像是对于扼杀人性的一种自然的自卫反应。这种关系是自然的，因为它是人与人之间的，而不是‘民族之间’或‘国家之间’的。

“现在，获得了思想自由，获得了作一个民主主义者、保守主义者、基督教徒、犹太教徒的自然权利，因为终于获得了作为个人的权利，我们却开始忘记了人的本质和作人的义务。取代‘阶级’立场的不是‘优先考虑所有人的价值’，而是普遍的利己

主义。

“如果我们首先不是一般的人，而是俄罗斯人或亚美尼亚人，信教的人或无神论者，民主主义者或《苏维埃俄罗斯报》的读者，那么我们就要完了。用另外的方式无法摆脱我们目前所处的困难处境……”

“扎根于过去和现在的无数主观和客观因素使局势的困难日益加深。

“这就是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和由它产生的军事化的畸形经济。它们把希望寄托在实力上，阻碍了民族—国家建设的自然进程，结果导致旧的国家体制发生爆炸，使大家面对国家雪崩似崩溃的事实。

“这就是实际上缺乏民主政治结构，缺乏民主主义的社会基础，政治文化素质普遍较低，市场不发达，市场心理和企业活动的道德不发达，经济结构是畸形的，以及许多其他情况，这一切说明，对于自然的一体化进程来说，条件还不成熟。

“不过……可以先分开，等待这些统一的条件成熟。我倒希望我的看法错了，然而不幸的是，这是不可能的。几百年联合在一起的东西，不能用议会表决或群众大会表决的办法使它分开。违反历史自然进程，不会不受惩罚。

“所有思想健全的人早就懂得，只有在互相怀有善意的情况下，我们才能生活在一起，不流血，不使用暴力，也不为早就没有的东西发生争执。所有的借口，说在伊凡雷帝<sup>①</sup>的时候就是这样，那至少是挑拨性的。时间带走了一切，过去有过的，现在已经没有了。历史不能重写，不管它是多么痛苦，让人多么难过。现在是另外的时代，另外的几代人。使过去的仇恨复活，把它留给自己的子孙，那是极不合理的。

<sup>①</sup> 伊凡雷帝（1530—1584），俄罗斯沙皇。

“可惜，许多人与其说把阴谋的失败看作民主力量的胜利，与其说把它看作进行全新的创造性活动的条件，不如说把它看作中央政权的失败和威信扫地，看作可以不考虑破坏的后果，‘悄悄地，迅速‘解决’自己‘民族’问题的机会。当然，这里放在首要地位的并不是各主权共和国人民的客观利益，而是那些和以前一样关心巩固自己权力的政治家的利益。

“但是，单方面的声明或威胁并不会使政权得到巩固。任何民主政权的力量都在于信任。信任提供的选择是合理的、最有利的地方分权。无论是对于‘联盟’，还是对于共和国或州一级来说，这都是正确的。

“当中央专制的时候，力图脱离它是进步的。现在中央没有了。各主权国家的领袖应当自己建立一个他们能够信任的中央。这也会有助于共和国内部局势的稳定，如果在对待任何民族国家的形成，或者共和国自己在对待地区的形成时，采取排除强制手段的措施的话。

“先签署什么协议——经济的，政治的，军事—政治的——这并不重要。让各共和国成为国际法的主体吧。让我们在其他国家开设两千个驻外代表机关吧——如果我们有那么多多余的外汇的话。就让我们不通过联盟宪法吧——有各共和国的宪法已经足够了。

“但联盟却是需要的。至少是因为，在联盟之外，谁也不能保证自己的领土完整。如果不是至少在心理上感觉到有一个联盟，那么无论俄罗斯，还是乌克兰，或哈萨克斯坦……就都会瓦解，或者变成战场。一个分离行动必然而且会立刻产生另一个分离行动。联盟解体以后，我们立刻会经受共和国解体过程的痛苦，这是无法逃避的。

“我们会人为地挑起共和国内不属于土著民族的那部分居民要求分离出去的问题。随着分离主义倾向的加强，这一部分人

（而他们有好几千万）将不得不按照他们所理解的，或者是按照民族主义政策的大众传播媒介向他们灌输的东西，越来越坚决地捍卫自己的权利。而这会来自哪一方面，并不重要。我曾尽可能支持波罗的海沿岸人民争取独立，而不相信‘联盟’一些政治家的预言。我为正义获得胜利真诚地感到高兴。独立实现了。但是我不希望阿尔克斯尼斯的‘预言’应验，我不能同意，那些年轻的独立共和国一开始就让自己的所作所为那样缺乏‘绅士风度’。他们失去了现实感，竟通过了歧视性的国籍法；在忍耐了 50 年之后，似乎没有更迫切的事情可做，却表现出过于匆忙的‘勇敢精神’，扮演了对过去毫不妥协的法官的角色；要求在完全不现实的期限内撤军，等等。而且这一切都是还在谈判开始以前就采取的行动。波罗的海沿岸共和国的议员们一向认为自己是文明的政治家，而文明的政治家不应该堕落到这种程度，竟侮辱并非出于自己的意愿现在仍然生活在他们身边的人，以这种方式对已经消失的制度进行卑鄙的报复。

“希望能够相信，这种以民族主义暗中偷换民主主义的症候不会成为规律。希望这只是一种例外，不过是因为胜利冲昏头脑，一时糊涂。然而这又一次证明了这一定理：分离主义和民族主义是分不开的，而民主主义却总是国际主义的。

“分离主义在经济领域内是有害的。众所周知，阴谋家们提出的目标就是阻止市场经济改革，不让商品生产者在统一的经济区内享有自由和独立，阻止国家享有充分权利进入世界经济体系。而这些目标现在正‘胜利地’成为现实。

“如果说以前实行刻不容缓的市场改革，是由于受到中央的思想破坏而停滞不前，那么现在却是由于各共和国的分离主义，使这一改革越来越成问题了。不是承认我们对经济问题普遍、完全的无知，在国际经济研究所和专家们的帮助下，为健康的企业经营活动创造合法和有组织的条件，我们却在加深危机，进行破

坏，不是去改革国民经济综合体的残余，却继续分配越来越少的产品。

“各主权国家，而在它们之后，是各个州，都力图保存在它们自己领土上由它们生产的、共同经济大馅饼上的那一小块东西。战后德国‘经济奇迹’的创造者刘德维克·艾哈德正确地指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在于分配，而在于增加生产。那些把注意力放在分配问题上的人总是会犯这样的错误：希望分配到的东西超过国民经济生产能力所能提供的东西。’我们现在却已经谁也不去考虑扩大生产的问题了，尤其是不去考虑在新的基础上扩大生产的问题。大家都在忙着分配，或者充当‘中间人’。

“私有化过程停滞不前。农场事业的发展毫无改进。给人造成这样的印象：新政权把财产从中央那里夺过来以后，并不急于放弃它。但是，在目前情况下，是谁当权——是民主主义者，还是反动派，是拥护旧联盟的人，还是反对旧联盟的人——这并不重要，糟糕的是，财产仍然是国家的——不管是联盟的，还是共和国的——而没有向个人靠近一毫米。要知道，还在亚当·斯密<sup>①</sup>那个时候，他就已经知道：‘一个无权获得任何财产的人，他感兴趣的只能是，吃得尽可能更多，而做得尽可能更少。’出路仍然是，把财产下放给人。让任何一个希望开创自己事业的人都有可能实现自己的愿望。为此要建立没有伸缩余地的机制，帮助企业，让那些为了自己的利益妨碍这样做的官员——现在已经是‘民主主义者’了——承担责任。

“分离主义也对所谓战略性的经济构成威胁。现在有共同的循环系统和神经系统——输油管道，远距离通讯线路，宇宙空间，铁路干线，统一动力系统；统一系统遭到破坏，对任何一个共和国的经济都将是致命的灾难。我们继承下来的威力强大、统

<sup>①</sup> 亚当·斯密 (1723—1790)，英国经济学家。

一的、当真是不可分割的、要求遵守特殊纪律、需要最高智慧的裂变物质生产综合体，将彻底崩溃，而这绝不是夸大其词。在这方面，理智正和保全自己的本能一道背弃了我们……

“……在外交领域，阴谋家们也在某种程度上取得了胜利。显然，他们的胜利会把新政治思维的所有成就全都一笔勾销，会破坏国际安全体系和欧洲安全体系的稳定。稳定的确遭到了破坏。由于我们的民主化而感到的喜悦变成了恐惧。由于我们每天都在发生的变化，全世界感到胆战心惊，担心可能被崩溃的联盟的碎片埋葬的，不仅是俄罗斯人、乌兹别克人或乌克兰人。

“核武器的问题十分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不止一次声明，要把所有核武器都置于俄罗斯的控制之下，实际上这简直是不可能的。控制核武器的问题没有明确解决，这不仅会使各共和国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不仅会使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受到威胁，而且会使与其他核大国的关系变得异常复杂，使裁军进程变得极其复杂。照我看，主要的是，我们还不大了解首先是对于我们自己的极大的危险。这甚至不是切尔诺贝利那样的危险。

“目前局势的出路在哪里呢？我深信，要解决这些问题，所碰到的困难与其说是政治的现实，不如说是实际的政治家们，是政治决心和政治野心的冲突。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认清自己肩负的重大责任的领袖们，在于人们相信他们、委以决定人民和国家命运重任的领袖们。

“我们最应该担心的是，有朝一日叶利钦对斗争感到疲倦，戈尔巴乔夫对一切都不再抱有希望，而那些为分裂推波助澜，为实力政策、为进行威胁呐喊助威，用‘惩罚’分离主义者的办法促进分离主义的人们的政策获得胜利。不应该寻求暂时的好处：只考虑眼前利益，也和情况不明一样，是一种最坏的政策……不要把一批又一批新的障碍堆积到可能使各共和国协调一致的道路上去。要表现出耐心和毅力，互相之间就一切可以达成协议的问题

题明确地达成协议。哪怕是慢慢地、渐渐地，然而要大家一起走出危机，要把这种唯一可能的前景看作自己的利益。只有这样，才能在实际上达到巩固每一个共和国国家体制的目的（如果这是目的的话）

“……现在各共和国必须暂时同意，委托由各共和国组成的全联盟机构来解决一般政治问题、国际问题和防务问题。那个能带动整个链条的中心环节，在经济领域里，在于为私人企业家，特别是小企业家——从农场主到面包师——的活动创造一切条件。

“终于到了该开始实现有控制地向市场过渡的时候了。这样做需要有相当大的政治勇气，因为这样的过渡不会没有痛苦，而在最初一段时间，也不会给它的倡议人带来人民的爱戴。

“已经获得胜利的民主力量迫切需要不再以中央的反对派的立场来思考问题。他们已经不是反对派。他们是当局。”

可以在各个完全不同的领域里看到具有雪崩性质的瓦解症候。军队里的形势特别令人担忧。每天得到的情报都是足够严重的。无论是外部的，还是内部的，客观的以及主观的力量和矛盾，都在使武装力量发生分裂。为支持叛乱而算账，或者是与此相反。民主主义者和正统的共产主义者。假爱国主义、沙文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一切加在一起，扩展为社会和精神上的不设防状态，聚集成不满和发生纠纷的、危险的潜在力量。

就连很难设想会发生冲突的地方，也发生了冲突。例如，在我尊敬的阿富汗战争参加者运动的领导人之间。我尽可能促使这个运动团结一致，尽可能帮助这支团结的、在置身于政治之外的情况下能够制止使用暴力的潜在力量。

宗主教阿列克西私人会见我的时候，对有分裂危险的宗教界正在发生的情况深感不安。我自己请求他接见我，目的是为了向他保证，今后克格勃不再干涉教会里的事务，决不再利用神职人

员为特工机关的利益服务。克格勃档案中凡是与教会有关材料，我们都将把副本交给教会处理。

一切都笼罩着分裂政策的阴影。就连慈善机构（儿童基金会），就连体育界，也不例外。

然而我仍然认为，实际存在的统一的经济、社会和心理环境，以及客观上不可避免的一体化进程，不允许我们沿着瓦解的道路滑下去，最多只限于在独立国家联盟内进行合理的、自由选举式的地方分权。

然而，我不是对现实不够了解的唯一的一个人，我不理解新的年轻政治家们那种如波涛一般无法扼制的愿望，他们渴望获得完全的自由和独立，渴望推翻可恨的“克里姆林宫”，成为新的主权国家“一长制的统治者”。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人的逻辑，我想建议读者们看一看一份文件的摘录。

尼古拉·斯托里亚罗夫是一位非常接近俄罗斯民主主义者们的政治家，他第一个同意和我一起到克格勃来，但是他并没有达到所有的目的……他常来找我，谈谈他一些十分新奇的想法。这一次也是这样。他非常激动，把一份报告放到我的桌子上，现在我把它引用在这里，不过做了某些删节。

## 关于一般政治形势问题

（政治理论分析和预测）

克里姆林宫试图借助新联盟条约修复正在瓦解的政治共同体，这一最后的尝试是注定要失败的。俄罗斯联邦共和国采取中立的等待态度，等待各共和国间达成大规模的协议，现在它已变成软弱的中央的政治人质。

俄罗斯政府中的所谓危机，其实是由于惯性长期以

来存在两个中心的合乎规律的结果。

俄罗斯立法和执行机构中那些接近叶利钦的高层人士中，有一部分终于清清楚楚地明白了这一点。俄罗斯的自我意识已经有了像鲁茨科依、布尔布利斯、科济洛夫、萨赫拉伊、卢米扬采夫、斯坦克维奇、特拉夫金、波尔托拉宁、绍欣、费多罗夫、拉扎列夫同志等这样一大批聪明的代表。另一部分与中央最高层领导人有某种联系的俄罗斯著名政治活动家不同意上述那些人的看法，他们还没有摆脱自己的错觉，认为中央和俄罗斯两套机构并存，相对来说是合理的。

现在比较接近真理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认为，苏联是俄罗斯存在的形式，俄罗斯不应该让自己有几千年历史的国家解体，而那些不承认苏联的共和国却面对着这样的抉择，要由它们自己决定，是否在一个新的国家共同体中联合起来……

作为一个总的现象，现在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社会意识正准备作出困难的决定，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形成享有充分权利的独立的俄罗斯。在这个问题上，鲍·尼·叶利钦既能在有民主主义情绪的群众中，也能在有传统观念的人们中找到支持者。俄罗斯不必害怕会受到指责，说它有帝国作风。俄罗斯承担责任，对自己今后的命运负责，并没有压迫任何人。它并没有邀请其他以前的加盟共和国加入自己的国家。

现在叫作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这个国家必须在联邦宪法原则的基础上保存下来。可能，不得不用建立总统直接治理的办法来绕过进行抵抗的议会。

现在，在对待以前各加盟共和国的态度上，俄罗斯

客观上必须“从实力地位出发”。在经济领域，这可以靠“石油和天然气的龙头”来作保证，而不必消除各共和国领袖对这个问题的担心。不能排除这种情况：他们对待中央的行动也会这样背信弃义，这首先是因为，中央对这些“龙头”并没有实际权力。俄罗斯极端需要能证明它有足够强大力量的工具。在俄罗斯联邦领土上的军队、安全机关和内务部，必须完全置于俄罗斯的管辖之下。在这方面谁也不会有这样的错觉：认为它软弱无力。

在发生政府危机的情况下，俄罗斯内阁大换班不会带来任何结果，如果不同时拒绝承认中央政权，不同时改变群众意识中希望的方向和模式的话……

所以，俄罗斯别无选择，只能：

- 1 担负起自己的责任，让巩固的俄罗斯国家在国际政治地图上继续存在下去。

- 2 然后，分离出去的各加盟共和国继续就有新的共同利益的问题，在可能范围内真正达成协议，并建立相应的机构。

- 3 立刻把与以前各加盟共和国的关系纳入国际关系的渠道。

所有这些问题都必须立即解决，而不能束之高阁。不必担心会受到这样的指责，说这些建议会促使俄罗斯参加地缘政治竞赛。为什么不参加呢，既然这样的竞赛将成为在前苏联领土上形成的所有国家发展的主要推动因素。换一种说法，意思也是一样：现在这个共和国之间的集体中心完全不能成为这样的推动因素，完全不能有效地解决一系列战略性的任务。

我不认为这是斯托利亚罗夫本人写的。我觉得，这位政治家的观点，特点一向是极其慎重。

这份报告中却把一切都颠倒了过来。在那个时期，俄罗斯并不是“软弱的”中央的人质，而是中央装在鲍·尼·叶利钦的“口袋里”。这份报告中所说的实话是：它（中央）是“软弱的”，而对于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却无论如何也不能这么说。

还有一点也是实话，“苏联是俄罗斯存在的形式”。既然如此，那么俄罗斯不来保护这个“形式”，还有谁会来保护它呢，不过当然要排除它的帝国内容。报告中恰恰相反，全部“政策”都建筑在帝国的内容上，建筑在实力上，建筑在“关闭闸门”的威胁上。

“两个中心”的问题的确存在。但是在过渡时期，这是自然的。应该用协调性的机构取代发号施令的中央机构。而“无权的”各共和国的机构应该成为自己共和国内掌握实权的机构了，而不必抱怨中央。为什么要为它“软弱”而担心呢？

然而这个问题不仅是一个心理问题，也不仅是干部问题，甚至也不仅是政治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法律问题。所以会产生这个问题，是由于没有在严格的宪法的基础上，或者是在条约的基础上，解决各共和国与中央机构之间权力分配的问题。这个问题还有第二个——俄罗斯的标准，也是一个更为复杂的标准。

把建立总统直接管理看作解决问题的办法，“绕过”议会的办法，这又是重犯认识上的错误。

政权应该是强有力的，对此谁也不会反对。然而，从实力地位出发的行动是永远没有前途的，尤其是在政权软弱，也就是得不到群众支持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其实对于戈尔巴乔夫，对于中央来说，10月和11月是为了恢复协商进程，也就是所谓“新奥加列沃进程”，重新开展积极

活动的两个月。

10月2日，政治委员会的成员在戈尔巴乔夫那里开会，主要讨论某些俄罗斯领袖的这种新政策，其实质就是上面斯托利亚罗夫那份报告中所表达的东西。不过，当然啦，制定这项政策的主要思想家是根纳季·布尔布利斯。头一天他曾会见人民代表，阐述了这些思想。俄罗斯应该宣布独立，成为正在从世界地图上消失的苏联的合法继承者。代表们批评鲍·尼·叶利钦，说是，叛乱以后他错过了消灭苏联、接收所有联盟机构的机会。这些政治家们深信，联盟条约是不需要的。

还讨论了其他问题。尤里·卢日科夫通报了“我们在哪里找到粮食”……大家抱怨说，就这样，在生产领域里，正常的企业家活动并没有获得进展。共同商定，怎样推动与波罗的海沿岸三个共和国的谈判。决定派安纳托利·索勃恰克和叶夫根尼·韦利霍夫院士到塔吉克斯坦去……

但主要的仍然是联盟条约和各共和国之间签订协议的问题。10月1日，戈尔巴乔夫把联盟条约草案分送给了政治协商委员会的所有成员，这个草案是“根据鲍·尼·叶利钦的意见进行修改并得到他同意的”。现在就是在研究这个草案。

由于格·亚夫林斯基和米·戈尔巴乔夫表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耐心、灵活性和说服别人的能力，由于鲍·叶利钦和努·纳扎尔巴耶夫的坚决态度，10月18日各共和国签署了经济协议。

似乎理智占了上风。至少，我们都记得，一个多月以前詹·贝克和我们的各位领袖会见之后留下了这样的印象，谈到这个协议的时候，认为这是一个已经解决了的问题，认为这是一个能使大家联合起来的核心。我同意他的看法，不过有一点保留：在我们这种情况下，经济和健全的思想都可能成为政治目的的牺牲品，我觉得，他没有领会我的意思。不过，也许是有什么东西我没能理解……

然而 10 月 18 日我也曾和大家一道高兴过……尤其是因为就新联盟条约进行的协商相当顺利。而且各共和国的某些领袖，包括纳扎尔巴耶夫，在保留共同协调机构和管理机构这个问题上，甚至比戈尔巴乔夫走得还要远。

在国务会议上，大家一致同意建立一个原则上全新的、取代克格勃的共和国之间的安全机构，这个机构应该建立在合作和协调的原则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发号施令的原则基础上，我认为这是对联盟有利的一个论据。我开始与各共和国接触，调整我们之间的关系。与俄罗斯的接触是非常有益的。我觉得，加琳娜·斯塔罗沃依托娃是很理智、很有分寸地对待共和国之间、各民族之间关系的问题的。和她交换情报的情况再一次显示出，俄罗斯政治家们往往不是根据文件，不是根据事情的真实情况，而是根据从大众传播媒介得来的印象，根据由此而产生的情绪采取行动。

例如，“我们”又放出了一个在电视上播出的谣言，据说，似乎巴卡京把情报机关转交给了爱沙尼亚人。这个谣言立刻在政界激起了完全可以理解的愤懑情绪，使赶快摆脱这个“有害的”中央的心情更加增强了。我从来也没把加·斯塔罗沃依托娃归入这样的政治家，现在也不认为她是这样的政治家。她认为，在“愤怒”之前，必须先听听“第二”方面的意见。

11 月 1 日政治委员会举行例会。谈论的是叶利钦赞成联盟，纳扎尔巴耶夫送来了他的第五条的方案，对中央的责任和权力作了更明确的解释。谈到应该尽一切可能支持叶利钦，大家又抱怨说，谁也没有可以影响事态进程的机构。某些人在谈论最近期间就会到来的专政。俄罗斯人和各共和国都没有经济计划。这是无情的现实。

然而在 11 月，大家的出发点仍然是，联盟或联合体有机会继续存在下去。要以某种形式保存共和国间的统一，这一思想并

没有遭到各共和国领袖的公开反对。这个思想继续得到社会上广泛的支持。

11月27日，在苏联消失之前不到十天的时候，公布了社会政治调查基金会所作的民意测验的结果，结果显示，与3月17日的全民公决相比，选民的情绪实际上没有什么改变，而那次全民公决，有73%的公民投票赞成保留联盟。根据这次民意测验的材料来看，在俄罗斯联邦、哈萨克斯坦和乌克兰的城市里，回答者中有75%表示赞成联盟。在莫斯科，拥护联盟的人数由50%上升到81%，而在基辅——从45%上升到60%。

11月11日，米·戈尔巴乔夫在国务会议上对各共和国总统发表了简短讲话，讲话中流露出痛苦的心情。他简直让人认不出来了。他说，我们在浪费时间，我们成了一时政治热情的人质。我们应该对人们作出回答，解除他们的担心和不安。有人想要使中央和各共和国发生冲突，想要消灭中央，消灭联盟。他声明，他不会死抱住自己的职位不放，而打算离开。不过，到了表明立场的时候了。他提议，不达成协议，就不散会。

11月14日，在新奥加列沃，参加苏联国务会议的人原则上就主权国家联盟条约文本达成了协议。条约中规定联盟采取邦联制，由全民选举联盟总统，双重主权的原则——联盟的主权和组成联盟的各共和国的主权——各共和国具有国际法全权主体的地位，保留联盟政府和统一武装力量。大家认为，条约正文与9月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人权宣言结合在一起足以代替苏联宪法。所以，苏联宪法也就失去其必要的意义。现在需要做的是，对文件进行最后校订，在各共和国议会里进行讨论，在国务会议上再次进行审议。

我参加了这次于11月25日召开的新奥加列沃会议。

快到12点的时候，在莫斯科郊外、坐落在美丽的花园中一座古老的住宅里，大家都到齐了。在等待着什么重大的事情。有

许多记者，诚然，照我看，大家对待他们的态度都不十分文明

.....

戈尔巴乔夫立刻提议用最普通的方式开始，讨论条约文本。

坐在他旁边的叶利钦简短地插了一句，说，可惜，文本中出现了一些我们还没达成协议的新措词。

戈尔巴乔夫委婉地对此作出反应，说：“啊，没关系.....等审议到那些地方的时候.....我们再讨论.....那么，独立国家联盟。没人提出不同意见吗？”有人“提出”欧亚共和国联盟，但是被否决了。

叶利钦又坚持要回到讨论的基础上去。他说，不应该说结成联盟的民主国家，而应该说民主国家邦联。

戈尔巴乔夫说：“我看不出这有什么意义.....”

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说，那么他要在草签时附上如实记录的声明.....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这毫无意义.....”

叶利钦不同意这样的评价，说，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不会批准条约。

戈尔巴乔夫说，会批准的，并且回忆起他在伊尔库茨克的情况，说人民是多么赞成联盟.....

我却回想起了另一回事。还完全是在不久以前，大家都希望签订建立在邦联基础上的新联盟条约，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和卢基扬诺夫却反对这样做。无论如何也不行。只不过是联盟。我们还没有在联盟中生活过。等着瞧吧，到时候再说.....

但是没有等到.....现在已经连邦联也不能让新的领袖们满意了.....

在这次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上，米·戈尔巴乔夫又一次试图保留那个哪怕是象征性的、不稳固的、然而却是统一国家的机构，似乎他毕竟在党国极权主义碎片的基础上建成了这样的机构。然而

国务会议还是没有草签联盟条约。没有草签，而是送交各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审议，各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却希望建立一个新的联盟，它们要做的事情只是讨论和作出决定——赞成，或者拒绝。把一个有待“加工润色”的草案送到议会去，作一次航程无法预言的航行，它是不会从那里回来的。果然没有回来。

在 11 月 25 日的会议上，我只作了一次发言，向各共和国的领袖们提出了一个“我自己的”问题：他们认为，安全机构将来应该怎样。所有出席会议的总统和最高苏维埃主席，意见都是一致的：共和国间的安全机构应该务必保留下来。姆斯勃，中央情报局，边防军和从克格勃分裂出来的其他机构，在未来的联盟中都会有一个适当的地位。会议到此就散会了。

苏联国务会议历史上的最后一次会议是 11 月 27 日召开的，参加会议的有五个共和国的领导人。审议的问题只有一个——由于阿塞拜疆一架直升飞机失事而引起的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关系中的紧张局势。

此后国务会议再没有开过会。

11 月 29 日，在政治委员会例会上讨论了新奥加列沃会议失败的结果。但是这会改变什么呢？

不错，大家都同意，如果一年前按照逻辑先提出经济协议，那么现在一切——包括经济在内——都会遇到政治联盟的障碍。

应当坚定地站在联盟一国家的立场上。

当然，由于乌克兰的立场而感到不安是理所当然的。没有乌克兰，还叫什么联盟呢？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对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突然改变态度感到惊讶，对他的国务顾问谢尔盖·萨赫拉依感到愤慨，这个人“赞成统一的俄罗斯，却赞成联盟解体”……显然，我们又得设法对付俄罗斯领袖的动摇了。他们怎么不理解，随着各共和国之间的相互关系变得更加紧张，对联盟的需要也日益增长了……

然而他们却不理解……怎么办？着手解决最迫切的问题。又是粮食问题。又是企业家活动的问题。储备问题，等等。

既然总统们受目前形势影响，那就必须依靠别的力量。社会，社会运动，知识界，自治权。

显然，俄罗斯政治家们已经作出决定。他们在玩自己的把戏。不是对目的有所动摇，而是在策略上犹豫。怎样甩掉中央，也就是联盟。但是他们暂时还不敢把这一点公开告诉人民。不是直接消灭联盟，而打算采取这样的策略：逐渐切断联盟领导的一切最主要的命脉。国家银行主席格拉先科已经要求总统给予“书面指示”，但是就连书面指示他也不执行。联盟将要自己寿终正寝，俄罗斯则作为合法继承者登上舞台。

对经济改革，俄罗斯还没作好准备。没有计划。他们想用夺取联盟机构的办法赢得时间，同时在政治上得到好处。然而对于俄罗斯来说，这是一个注定要失败的政策。同时，中央对俄罗斯的批评却正中俄罗斯的下怀。然而民主主义不能胜任它所扮演的角色，不能不辜负人民的期望，必然失去人民的支持，结果上台执政的将是“社会主义”面貌出现的法西斯主义。

官僚主义、混乱和特权愈演愈烈。手忙脚乱。贪污受贿。谁也不作任何决定，给谁打电话也打不通，然而每个人都要求给他在小汽车里装上电话。

公开发表讲话是无益的。会有反作用。但是不公开宣扬出去的激烈的谈话，把该说的全都说出来，却是必需的。要么是联盟国家，要么大家滚蛋。集体辞职。

这是一个必然要灭亡的国家，这个国家注定要失败的政治家们的最后一次谈话。这个国家是他们从过去继承下来的，事实证明，它只能以自己的毁灭作为代价，来克服自己的这个过去。

## 十、联盟的终结

过去已经得到报酬，现在正在悄悄溜走，你们就生活在将来之中吧。

—— 加斯頓·德·列維斯

1991 年 12 月 1 日，乌克兰、哈萨克斯坦、第聂伯河沿岸和加加乌吉亚进行了总统选举。当选的乌克兰总统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宣称，退出“帝国，对于乌克兰来说，不会发生任何灾难，因为它是一个潜在的富国。乌克兰不会签署联盟条约”。很难说，这里是什么更多一些——是利己主义呢，还是犬儒主义。然而这一有害的政策却似乎是以乌克兰 90% 的选民表现出的意志为依据的，在同一天举行的全民公决中，90% 的选民表示支持宣布共和国独立。全民公决的结果事先就已经决定了。难道能够设想，有人会投票反对“自由”吗？

12 月 3 日，公布了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总统叶利钦的声明，声明中说：“俄罗斯领导宣布承认符合乌克兰人民民主意志的乌克兰的独立。”文件中提出必须尽快着手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建立国与国之间的新关系。

12 月 2 日，应我的请求，叶利钦接见了。这是一次短暂

的会见。我请求俄罗斯总统解决年底前给姆斯勃的拨款的问题。在谈话中我提醒他，他曾同意接见阿兰·皮科克先生的代表团，这个代表团是联合国驻维也纳分支机构总干事玛格丽特·恩斯吉女士应我的请求组织的。代表团访问的目的是建议在向市场过渡的情况下为居民提供社会保障。我还请求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签署一份简短的告“姆斯勃”新机构工作人员书。谈话不能不提到乌克兰的局势。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的意见是相同的。应当镇静地对待这件事，承认全民公决的结果。但是两天以后，从白俄罗斯打来的电话对我来说却是一个意外。星期六和星期天在明斯克等待着叶利钦和克拉夫丘克。为什么呢？

三位领袖的非正式会晤，结果却是作出了真正革命性的和完全正式的决定。根据 1991 年 12 月 8 日关于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协议，苏联已不再存在，现在已经是前苏联的机关在联合体成员国领土上的活动也停止了。

在别洛韦日森林中一个僻静的地方自发产生的协议，结束了保存一个统一国家的尝试。各共和国获得独立后必然会发生的某些客观和主观的进程，远远超过了新奥加列沃的进程。戈尔巴乔夫为联邦进行斗争的时间太长，终于迟了。

星期天，12月8日，晚上他显得激动不安，丢开了一切，我觉得，他不知所措了……

20 点左右，他不知在哪里给我的家里打来了电话。

如果说以前，所有情报他都是从克留奇科夫那里得到的，而最近，在特工机关处于瘫痪状态、有“两个中心”和严格禁止对政治家进行监视的情况下，有时总统了解的情况比我还多……

“他们从明斯克寻找纳扎尔巴耶夫，”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说……“不，”我说，“纳扎尔巴耶夫不会去，他不是那种人……”“是的，当然啦……”还能说什么呢，尤其是，还能做什么呢？

但是，在这些复杂的情况下，苏联总统决定为联盟斗争到底。当我们，政治委员会的成员，星期一在他那里聚会的时候，他说，他不辞职，他要等待事态的发展，并试图影响他们。我们把希望寄托在这一点上：有可能把停止苏联存在的手续转移到宪法的轨道上去。我们集体帮助米·戈尔巴乔夫起草《苏联总统声明》，劝他当天不要在电视上发表讲话。叶·亚科夫列夫布置拍一盘告别磁带录像，我们都走到熟悉的克里姆林宫走廊上去，长长的走廊上空荡荡的，光线暗淡。所有这些忙乱都是不需要的。明天会有别人到这里来。但愿他们能够成功。

一边是束手无策的中央，一边是政治上强大的各共和国，它们的力量太不平衡了。三个斯拉夫共和国认为自己有权不考虑中央政权机关和其他共和国的意见，自作主张地解散 1922 年它们首先创建的联盟。12 月 10 日，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批准了建立独联体的协议，12 月 12 日，俄罗斯议会也继它们之后批准了这个协议。所有这三个共和国都通过了停止它们在联盟立法机关中代表全权的决议。

在这以后，试图制止联盟像雪崩样解体的一切尝试，都注定了要遭到失败。

很难描述那些天里自己的感觉，这不仅是因为难以摆脱“当代现实的病毒”，而且因为，直到现在我还感觉到，这是一个无法弥补的损失。我在其中生活了一辈子的那个国家消失了。这个国家一定要改革，但是不能跨过消灭它的界限。然而，历史注定要作另一种安排。

不过历史并未结束，一体化是不可避免的。

暂时，政治家们选择了一条树立自尊心的最容易的道路，用人民对民族国家十分自然的向往和过于渴望获得“独立”的心理，赢得了一场危险的赌博。这儿的危险在于，越过破坏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条界限，同时也可能不知不觉越过另一条界限：从

健康的“民族自觉”走向各种不同形式的法西斯狂妄。我就不谈人所共知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法律方面的耗费，不谈联盟解体的过程有波及独立国家内部的危险了。

形势的悲剧性在于，人数很多的一部分公民赞成保存联盟，但是普遍的独立综合症、过去的否定的经验、还有希望碰碰运气的侥幸心理，这一切压倒了这些人的愿望。说是，总不会比过去更坏吧。

在这种情况下，联盟机构能采取什么立场呢？实际上没有立场，因为中央已经不存在了。为了避免事态悲剧性的发展，联盟政权别无选择，只能同意三个共和国的决定，即使它不完全符合宪法。在这种情况下至少可以暂时减少发生暴力行动的危险，也就是说，能够较快恢复客观上必然的一体化进程。

和自己最亲密的助手们分析了形势以后，我们得出了下述结论：

“一、停止苏联的存在，需要有符合宪法的适当形式。忽视现有的法律准则，以后可能成为促使保守力量与独立国家联合体进行斗争的补充因素，使自己经常有遭到破坏的危险。为防止事态这样发展，认为采取下列步骤是适当的：

(1) 前苏联所有加盟共和国国家最高代表机关通过决议，宣布 1922 年成立苏联的条约对它不再有效，1977 年苏联宪法中关于它们的苏联成员资格的那一部分也失去效力。

“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要通过关于这个问题的决定，必须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因为根据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宪法第 104 页第三条，通过与俄罗斯联邦国家体制有关的决议，正是属于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范围。最高苏维埃会议讨论问题的情况表明，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废除 1922 年条约和修改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宪法的可能性很大。

“同时，每一个共和国都应预先说明苏联法律在它领土上有

效的期限。

“(2) 即使考虑到一系列主权国家通过决议，召回它们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代表，也应研究在采取下列法律措施所必须的范围内恢复各共和国代表全权的问题：以合法形式宣布撤销苏联，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把前苏联机构的某些职权移交给新成立的独联体机构。把苏联机构全部移交给俄罗斯管辖，可能引起其他各共和国不正常的反应。

“ 必须通过苏联最高苏维埃（主要是联盟院）解决下述问题：

“ —— 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宣布它们是苏联的合法继承者；

“ —— 在过渡时期对核武器的监督问题；

“ —— 重申边界不可侵犯；

“ —— 关于联盟财产的命运，其中包括国外的财产；

“ —— 解散国家最高苏维埃，停止苏联人民代表的权力；

“ —— 停止苏联总统的权力，关于他不受侵犯和为他提供物质保证的问题；

“ —— 解决关于某些政权机关和管理机关（国务会议，宪法监察委员会）的问题；

“ —— 取消苏联国籍的问题；

“ —— 提出为独立国家联合体保留苏联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席位问题，同时提出各独立国家加入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的问题。

“ 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另一种途径解决——组成以前各加盟共和国的全权代表团，然后由各独立国家首脑以条约的形式予以批准。

“ 二、各独立国家间相互关系发展的逻辑必然会提出必须建立国家间机构的问题。

“ 最合理的办法是不要另起炉灶，重新发明什么模式，而是利用现成的欧洲共同体的模式，把现有的某些共和国间的机构也

归并到这个模式里去。

“独联体的最高机关可以是各国首脑会议（包括前国务会议除苏联总统以外的全体成员）。可以由各独立国家的总统（最高苏维埃主席）轮流担任会议主席。各国首脑会议应该按照欧洲共同体委员会的形式，确定国家间常设执行机构的组成及其职权。

“在过渡时期，前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可以作为没有立法职权的（就像欧洲议会那样）、联合体的代表机关。

“在解决建立国家间司法机关的问题之前，为了解决独联体成员国之间可能产生的矛盾，利用根据国际法准则行事的国际法院和国际仲裁机关是适当的。就远景来看，建立联合体的司法系统，将是合理的。

“三、保障各国——独联体参加国——安全的国家间的机构可以采取下列形式：

“（1）战略力量的统一司令部；

“（2）武装力量的联合司令部；

“（3）中央情报局；

“（4）边防军联合指挥部；

“（5）关税政策协调委员会；

“（6）政府及特殊通讯委员会；

“（7）可以按照‘国际刑警组织’的形式，在苏联姆斯勃和内务部某些部门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协调国家间安全工作的机构。

“姆斯勃可以：

“——为了共同利益，协调各国——独联体参加国——特工机关和护法机关的活动；

“——进行情报分析工作和研究工作；

“——保证向各共和国安全机构提供专门技术设备；

“——利用统一的材料供应站；

“——为联合武装力量提供反间谍保证；

“——为所有国家——独联体参加国——培训有高度业务水平  
的干部。”

联盟解体的性质、速度和合法性的过程，现在仅仅取决于各共和国首脑的意志，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最高苏维埃批准洛韦日协议以后，我给叶利钦送去了一封信，信中的基本内容就是上述分析的那些结论。

直到现在我仍然相信，与各共和国总统采取的办法相比，我提议的办法较为正确，但他们却宁愿以 12 月底在阿拉木图达成的协议为在独联体框架内进行合作奠定基础，而忽视了联盟的合法机构。如果苏联最高苏维埃，或者它的上院——所有加盟共和国在那里都有人数相同的代表——于去年 12 月底解决了上述那些问题，那么现在，当我写这些话的时候，也就是 1992 年 2 月，就不会看到，围绕着军队、边界、苏联在国外的财产，或者是恢复苏联人民代表的权力并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的想法这样一些问题，发生一系列政治纠纷了。但是当时鲍·叶利钦对我的信却作出这样的反应，说他担心，如果召开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最高苏维埃可能进行反抗，从而拖延实现联合体这一联合的形式。我不认为俄罗斯总统的这种担心是有根据的：就当时政治力量分布的情况来看，“反抗者”是会有有的，但无疑，在联盟院里，他们始终只处于少数地位。归根到底，很少有真正聪明的政治家会不明白，有时某些过程是不可逆转的。反对这样的过程也许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然而实际上是愚蠢的。

摘自 1991 年 12 月 26 日刊登在（梅加波利斯快报）上的答记者问：

“问：根据戈尔巴乔夫的看法，要改革我们统一的国家，联盟条约简直是必不可少的基础，因为没有各共和国之间的协调一致，就不可能进行改革。而各民族分道扬镳，即使有一个联合体

的形式，也会使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复杂化。您的意见呢？您对建立独联体怎样评价？

“答：第一，各主权共和国（国家）之间的条约不仅是改革的基础，更重要的是，条约本身也就是改革的实质：放弃统一的国家，对待联盟的态度是优先考虑各共和国的利益，而团结的形式正是要由各共和国协商的问题。照我看，理想的办法是较为平稳的过渡。然而时间已经丧失，发生的事已经发生了。戈尔巴乔夫的（新奥加列沃的）模式不能使各独立主权共和国的领袖们满意。他们走得更远，签署了关于独联体的协议。现在任何一个思维健全的政治家都应该支持这个决定，帮助它成为现实，帮助它巩固起来。因为可能发生的最坏的情况，就是新的团结也将崩溃。

“我想提醒一下，我一向赞成这样的公式：以共和国为主，联盟是次要的。这样的公式现在正在成为现实。但是，第一，十分重要的是，应该无可指责地、合法地完成这一过程，让实际上已经发生的联盟解体具有令人信服的合法形式……

“第二，我不认为完全撤销各共和国之间的所有机构是明智的想法。任何联合体，如果是友好团结的话，都需要某些协调和实现共同决定的机构，以实现各国首脑——联合体成员国首脑——作出的共同决定。完全破坏旧的，然后重新建立共和国之间的新机构，例如，像对外关系部这样的机构，那至少是危险的。”

可惜，结果是，别洛韦日协议及以后的事件不仅对于对外关系部，而且对于共和国之间所有机构都是非常不幸的。甚至连欧洲共同体的模式，因为有共同体的协调机构，各独立国家的领导人也认为它太缺乏伸缩性、太强调中央集权了。所有联盟机构的残余，其中也包括姆斯勃，都注定要从此消失。它们一个接着一个已不复存在，到 1991 年底，只剩下了武装力量联合司令部和保卫边境委员会，然而独联体各国也越来越坚决地对它们的权力

提出异议，越来越坚决地削减了它们的权力。

9 月里我曾对米·戈尔巴乔夫说，他对待前“帕夫洛夫”内阁的部长们作得不够漂亮。他本应把他们召集起来，对他们说几句“告别的话”。鲍·叶利钦和我谈过。但这等以后再说。

随着苏联的消失，我建立的那个共和国安全局却会照样保留下来。我指的是，即使是软弱无力的，然而形式上是联盟的——我对这一点没存任何幻想。对我个人的命运也没存任何幻想。作为联盟班子里的一个成员，作为戈尔巴乔夫班子里的一个成员，我应该与苏联总统一道离职。然而某一段时间里，我的确曾经希望，联合体的某些协调机构将会保留下来，而我可以在其中某一个机构里成为一个有用的人。

别洛韦日协议公布以后，我当即想好了立刻辞职的方案。然而我决定不这样做，而是把这个想法告诉了自己那一班子人。如果姆斯勃注定毁灭，那么我，作为一艘沉船的船长，应该最后一个离开这艘沉船。

同时，我责成自己的班子草拟协调各共和国特工机关活动的、共和国间新协调机构的草案及其工作的构想，现在这个机构的人数已经不是四万，而是不超过两千了。我过去认为，现在仍然认为，按照特殊的“国际刑警组织”原则行动的这样一个机构，会是十分有益的。

同时，新政权似乎已经开始行动起来了。

12 月 9 日早晨，会客室的值班人员请我拿起电话听筒来。打电话来的是伊万年科。他说，是根·布尔布利斯打来的电话，托他转告我，请我在 15 点前请叶·普里马科夫到我这里来，布尔布利斯委托伊万年科和萨赫拉依与我们讨论由于“别洛韦日协议”形成的形势。

下午 3 点，普里马科夫已经在我这里了。我们等了几乎有一个钟头。伊万年科终于来了。只有他一个人。萨赫拉依没能来。

我和普里马科夫当然表示“深感遗憾和理解”。不过到底有什么事？

原来，俄罗斯政府想转告我们，它对我们的理智抱有希望，希望我们不会采取任何“行动”，而是相反，尽力设法保证局势平静。这话用不着对我们说。无论是普里马科夫，还是我，从来也没想过要煽起不安情绪，挑动风潮。我们所受的教育就是如此。

12月11日，我和沙波什尼科夫、普里马科夫、巴兰尼科夫一起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一个委员会里，与 A. 科坚科夫和 B. 斯塔德尼科夫会面。叶利钦打电话到那里找我。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通知我，我请求拨给姆斯勃的一亿五千万已经有着落了。至于12月2日留在他那里的那份告姆斯勃工作人员书，表示俄罗斯领导支持和十分关心他们的工作，他却不知道该拿它怎么办。“我认为，现在已经什么也不需要做了，”我回答，“谢谢，请取消这个问题吧。现在表示好感是毫无意义的。”幸好拨款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这可以使收支相抵，可以给人们发12月份的工资了。少了一件要操心的事。但同时另一个问题却让我感到担心：鲍·尼·叶利钦对姆斯勃的未来有什么看法呢？

他相当明确地回答，共和国间安全局应该存在，并且请我“放出空气”，说最近期间他打算亲自会见姆斯勃的同仁。“我们怎样保留它呢，如果联合体的首都迁往明斯克的话？”我问俄罗斯总统。对于我的问题，他对我说，不该提出天真的问题，也不应一切都照字面来理解。当然啦，不会有任何大规模往明斯克迁移的事。

这次谈话使我深信，起初叶利钦倾向于建立一个与以后的实际情况比较、关系较为密切的联合体。我觉得，是其他共和国的领袖们使他的立场发生了变化，首先是乌克兰的领袖，他显然不愿意让自己和乌克兰的关系恶化。而他这样做是正确的。不过，

可惜，有时他也做不到这一点。“对中央进行报复”的一种特殊愉快心情也起了一定作用，多年来这个中央即使不是被看作共和国各种灾难的根源，那么至少也是被看作对共和国领导进行限制和不愉快的监督的机构。

但是已经过了一个星期以后，叶利钦让我明白，要保留姆斯勃已经不可能了。他给我打电话来，说，他打算让俄罗斯的内务部和反间谍机构（阿夫勃）联合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姆斯勃就要与阿夫勃合并了。“那情报机关呢？”我问。“情报机关仍然独立。”

有什么呢，至少明确了，而且终于稳定下来了。阿夫勃还没来得及从姆斯勃完全分裂出去。所以合并不会有什么问题。这个可惜是不正常的分裂过程，现在当真最好还是停止下来。至于与民警机关合并，有一个时期我自己就曾经赞成这种模式，不过我觉得，“肃反工作者”会反对这样做。

“这是我们的问题，”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说。

我完全真诚地支持由维克托·巴兰尼科夫担任这个后来被叫作“怪物”的部的部长。当时完全没有考虑，内务部并不是与有 50 万人的旧克格勃，而是与编制不大的姆斯勃和阿夫勃（实际上只是内部反间谍机关）合并。

12 月 19 日，就在叶利钦出国去意大利访问的那天，公布了“关于组建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安全和内务部”的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总统令，命令一开始就说：

“鉴于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已批准 1991 年 12 月 8 日关于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协议，为保障俄罗斯联邦的安全，决定：

“1、组建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安全和内务部。

“在已经撤销的苏联内务部、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内务部、共和国间安全局和俄罗斯联邦共和国联邦安全局的基础上成立俄罗

斯联邦共和国安全和内务部。

“决定，已经撤销的各部和各机关的所有建筑物、设备、物质技术基础、情报库和情报系统、业务文件及其他财产，都依法转为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国家财产……”

原苏联内务部部长巴兰尼科夫被任命担任新的部长。

共和国间安全局时间不长的历史就这样结束了。

当时发生了一件只能说它是荒诞可笑的事情。这件事几乎逃脱了报界的视野，然而非常明显地说明了俄罗斯政府某些走廊里的秩序和风气。

12月20日，有人在我的办公桌上放了一份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政府的命令，上面的日期是头一天的日期，命令指示阿夫勃的领导接管共和国间安全局。我觉得这份文件非常可疑。第一，它与叶利钦19日的命令互相矛盾，根据那个命令，无论是阿夫勃，还是姆斯勃，都已经撤销了。第二，我确切知道，叶利钦在去意大利以前没有签署过这样的命令。不会是他从亚平宁半岛把这份命令寄回来的吧？第三，文件末尾有用打字机打出来的叶利钦的姓名，也有俄罗斯联邦总统机关的公章，可是没有总统的签字。最后，正文中有明显修改过的地方，其中包括姆斯勃应该转归阿夫勃管理的日期“12月19日”那是在最后一分钟用铅字不同的另一架打字机打上去的。

作了如此简单的“犯罪学”分析以后，我指示自己的下属，在叶利钦回来以前不要执行这项命令，并把这一点通知了阿夫勃的主席伊万年科，他立刻同意我的意见。

我认为，这是“机关游戏”的产物。当我把这个命令拿给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看的时候，他简短地说，这是假的。根据他生气的情况判断，看来，我无意中给总统机关里的什么人带来了不愉快的事情。

12月19日关于组建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安全和内务部的命

令，结果是出自叶利钦笔下的、最受批评的文件之一，为它准备下的命运，也是时间不长的生存期。把民警机关和反间谍机关合并为一个机构的条款埋葬了这个命令。

这个问题由来已久了，这里不得不说几句历史性的离题的话。在我任内务部长的时候，我曾经是赞成这种合并的人们之一。我觉得，把穷而“无马”的民警机构巨大的人力资源与克格勃强大的物质技术及智能潜力联合起来，可以在与犯罪进行的斗争中取得重大突破。我始终赞成建立一个这样的机构，但是在姆斯勃工作的时候，出于对形势的考虑，认为不断改组不但会使民警机关，而且也会使特工机关陷于瘫痪，为了让这种不断的改组停下来，我以事实证明，还是分开的模式比较优越。

1991年11月4日，苏联国务会议决定：“委托巴兰尼科夫·维·帕，巴卡京·瓦·维同志考虑各共和国机关的意见，审查将苏联内务部和共和国间安全局合并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安全机构的建议，并向苏联国务会议提出经过协商取得一致的建议。”当时我表示反对，这一委托顺利地自然而然地结束了。但是12月19日以后，这个问题已经在俄罗斯作为一个实际问题提了出来。某些报纸上发表文章说，叶利钦草拟组建安全和内务部的命令时，没和任何人商议过，其中也包括巴卡京。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和别人商量过，不过和我是商量过的，我表示“赞成”。

不能说我没看出这个命令有消极的方面。当然，组建统一的法制机关，这与它们之间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构想不完全协调。不过老实说，以前也没有这种相互监督。议会的监督，以前也没有过，应该以随便什么形式建立这种监督。我预见到，对于俄罗斯又吞并一个共和国间的机构——姆斯勃，各共和国会有消极的反应。我了解卢比扬广场大楼里的情绪：把杰出的特工机关划归内务部领导，这个主意让特工机关的工作人员感到心情压抑，而且那里的工作也更加困难。他们关心地互相打听：“什么

时候去领警察的哨子？”许多民主社会团体的代表对这个命令的反应也不是什么秘密，俄罗斯政治镇压受害者联合会的声明中有一段话，可以说明他们的态度，这份声明是联合会主席尼古拉·努梅罗夫交给我的：“我们以十分明确的态度声明，国家企图把所有镇压机关联合成一个强大的、不受任何人监督的怪物，其使命又是要扼住人民的咽喉，对国家这一新的企图，以前古拉格的囚犯们表示极端忧虑。”当然，这段话里更多的是情绪，而不是理性。

然而在和叶利钦谈话时，我支持特工机关和民警机关合并。正如我已经说过的，我认为，对于特工机关来说，最坏的情况就是对它们的改组拖延不决，未来极不明确，这的确使它们的工作陷于瘫痪。命令使它们可以在短期内结束一切改组，获得坚实的立足之地，终于能开始正常工作。即使是不好的明确也比不明确要好一些。

下面是一个让人难以置信的理由。我产生了这样一种信念：特工机关划归“民警机关领导”，会使它们丧失特权地位，在某种程度上能中和“契卡主义”对社会的威胁，破坏“契卡主义”的传统。请注意，反对合并的不仅是民主社团，而反对得更起劲，起劲得多的，还是安全机关的代表们（而不是内务部）。他们十分清楚，在新的部的编制中，他们不可能再保留自己的特权地位。

最后，我相信叶利钦的民主意图是真诚的，他不容许利用护法机关和安全机关来反对人民，这也正像他不怀疑俄罗斯总统有权独立自主地决定这些机关的结构一样。

12月23日，恰好是在我被任命到卢比扬广场工作整整四个月以后，叶利钦邀请我到他的办公室去进行一次长谈。这次会见给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详细介绍了头一天他和戈尔巴乔夫所作的一次谈话，内容是戈尔巴乔夫辞职的问

题。他再一次表示，支持我在关于大家都知道的、拖延已久的、美国使馆大楼事件中所采取的行动。

叶利钦问我，今后我愿意担任什么职务。我并不隐瞒，我看不出在十分复杂、到处都有分歧的俄罗斯机构里，有适合我的位置。总统以理解的态度对待我的回答，并且建议我考虑担任外交工作的方案。也许我想错了，不过我觉得，我能学会这种对于我来说的新工作。然而在这个不稳定的时期，我不愿离开俄罗斯。我对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说，我准备在各共和国之间的机构里工作，如果这对工作有好处的话，而主要的是，如果将会有这样的机构的话，而这样的机构是应该出现的。关于建立这种机构的问题，需要在 12 月 30 各国——独联体成员国首脑会议上讨论。总统很有道理地建议我去休假两三个星期，并且说，等到关于共和国之间的机构的问题明确以后，他会找到我的。

我们就这样分手了。12 月 24 日我清理了保险柜里的文件，把保险柜腾了出来，于是离开了卢比扬广场大楼里我的办公室。结果是永远离开了那里。

第二天公布了苏联总统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的辞职声明。我深信，这个人向地球上六分之一土地上的极权主义提出挑战，从对抗和自我毁灭中拯救了人类，他已经把自己的名字永远写进了历史。是的，他曾表现出不够坚决，犹豫，也犯过错误。但是戈尔巴乔夫所做的一切是最新的历史上鲜明的一页。我有幸从最初几天就积极参加了戈尔巴乔夫开始的改革我们国家和社会的工作。在最近，最富有戏剧性的改革年代里，命运两次为我准备下了并不是最愉快的，也不是最“轻松的座椅”——内务部和克格勃。

现在该作总结了。

摘自答《消息报》记者问：

“问：尽管您来克格勃以前担任过内务部长，但可以想像得出，您并不彻底了解卢比扬大楼里在干些什么。一般说，大概，绝不会有许多人可以自诩，他们完全了解克格勃的一切。现在您对克格勃了解些什么，四个月来您对这个机构的概念是不是已经有所改变了呢？”

“答：请不要相信那些自吹自擂，说他完全了解卢比扬的一切的人。没有这样的人。我的概念没有改变，而是扩大了。然而现在我知道，我对克格勃的了解，比我以前所认为的要少得多。”

“问：在您以新的身份第一次接受《消息报》记者采访的时候，您曾经说，旧形式的苏联安全委员会对于国家是一种危险。您承担了从这种危险中拯救国家、使克格勃成为保护国家及其公民的工具这样一个任务。您现在能说什么呢：苏联的，确切些说，已经是俄罗斯的特工机关，仍然可以认为是不安全的吗？”

“答：我过去不认为，现在也不认为我们可以用走极端的办法——德国式的，或者捷克斯洛伐克式的办法，来改革克格勃，也就是完全撤销，然后重新组建。不是把人赶走，而是改革。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那么我选择的是人道主义的方针。”

“此外，我已经不止一次说过，改革包括大家都知道的三个方面。首先是分解。这已经做到了。就结构来讲，特工系统对于社会已经较为安全了。至少，我感到高兴的是，围绕着我们国家体制所发生的所有这一切激烈的突然变化，最终至少还是允许把统一的情报机关保存下来了。”

“第二——分权。当然，这方面取决于克格勃领导人愿望的程度，或取决于任何其他机关领导人愿望的程度，都要小一些。在联盟软弱无力的情况下，客观上这也不取决于中央的意志。但是我们，我指的是姆斯勃——共和国间安全局，并没有失去控制，谁也没有破坏共和国和州的安全机构。而所有安全机构的领导，的确是所有的，包括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摩尔

多瓦，所有外高加索和中亚共和国安全机构的领导人，都表示同意合作。成立了协调委员会，对于已经是在独联体的情况下发挥作用，这是一个很好的基础。

“第三 改革的主要方面——放弃‘契卡主义’思想，放弃经常寻找敌人，因为没有明确指明的敌人——以前是政治局指定的，人们所理解的那个旧的克格勃就不可能存在。起初敌人是反革命分子，后来是托洛茨基分子，然后是破坏分子，然后是‘美帝国主义’，然后是持不同政见者，等等。必须放弃这一切，而没有这一切，就难以设想克格勃还是原来的克格勃了。接着是这方面的第二部分——提高工作效率。特工机关向社会实际需要转变，在已经根本改变了的新的政治条件下，从间谍狂转向建立在合作和信任基础上的安全工作。主要注意放在国外刑事犯罪对我们国内事务的影响上，与在新的经济和国际情况下的犯罪活动进行斗争。与有组织的犯罪活动，首先是贪污受贿，进行斗争。应该坦率地说，在这方面没有取得成绩。而且，如果您想知道的话，所有与刑事犯罪活动斗争的机关，而不仅仅是克格勃，都正在实行民主化改革，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认为，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能够做出什么成绩来。我也不认为，正在诞生的俄罗斯特工机关，以及其他机关，在进行完全符合民主国家理论的思想改革方面会有很大成就。这是还需要去争取的东西。我不认为，对于公民来说，特工机关已经是安全的了。没有法律，没有监督，也没有职业化的国内安全部门。”

我正式离开姆斯勃领导岗位的命令，拖延了一些时候，迟迟没有公布。大众传播媒介开展了一场运动，反对叶利钦组建内务和安全部的命令，这场运动得到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和宪法法院的响应，这就使执行机关实现这一命令的努力实际上陷于瘫痪。最后，1992年1月14日，俄罗斯宪法法院裁定，这一命令与基本法相矛盾。这就意味着，一切又回到自己原来的范围，从

而形成了一种有点儿奇怪的局面。从法律观点来看，我又成了姆斯勃的领导。但是叶利钦 1 月 15 日的命令结束了这种状况。我被解除了姆斯勃的领导职务。我并不感到遗憾。我不喜欢在卢比扬大楼工作。

## 十一、在议会里

权力越大，滥用权力就越危险。

——埃德蒙德·比奥尔克<sup>①</sup>

一个人，如果什么时候偶然地，尤其是如果是有意识地“落入克格勃”，与它接触过一下，在自己身上留下了它的痕迹，而把自己的足迹留在了它那神秘的、空荡荡的走廊里，那么这个人终其一生都将被打上这个印记。尤其是，如果您当过“首长”，担任过这个独一无二的机构的主席的话。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现在你终生都是克格勃的最后一任主席。即使是前主席，但这并不会使事情有什么改变。甚至给你换了“军人身份证”，发给了你一张新的“克格勃预备役将军的军人身份证”。这么说，我是克格勃的“预备役”军官，尽管克格勃已经没有了。

现在我不在任何地方工作。我坐在自己的写字台前，写作。回答富于求知心的亲戚和熟人们打来的电话。在家里接待所有来访的客人。突然接到一封电报。政府的电报。上写“巴卡京·瓦·维”。

<sup>①</sup> 埃德蒙德·比奥尔克（1729—1797），英国评论家，政治活动家。

敬爱的瓦季姆·维克托罗维奇：

委员会邀请您参加议会的公开听证会，内容是：“前苏联镇压机关在准备和发动 1991 年 8 月 19—21 日苏联政变中的作用”。委员会希望知道您对这一听证会的看法，同时也想了解您对我国新建立的联邦安全机关的地位、面对的任务、职能、以及保证它们今后不可能参加准备和执行反对合法政权的阴谋的机构，有什么意见。

听证会订于今年 2 月 4 日 10 点正在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民族院大厅举行。

委员会主席  
俄罗斯联邦 人民代表 列·亚·波诺马廖夫

老实说，这是出乎意料的。刚刚开始习惯过私人生活……又要去搞政治？这需要吗？

不过我还是不能不去。我写好了发言稿。与列夫·波诺马廖夫交换了一下意见，更明确地了解了任务，准时到了我不十分熟悉的“俄罗斯白宫”。那里大家都认识我。从讨人喜欢的、好心的存衣室女管理员到记者们。我坚决拒绝回答记者们的问题。不过，大概，态度太坚决，废话也说得太多了。因为第二天报纸上登出来了，而这是无法拒绝的。看来，我是说过一些类似答记者问的话……

时间过去还不是那么久，而我的印象却是，仿佛回到了十分熟悉的过去，但同时又什么也认不出来，什么人也认不出来，一切仍然是那样，可又不是那样……正如韦尔京斯基所说的：“……当时我们生活在另一个星球上，而且太疲倦了……我们太老了……”

不过没关系：我在那次听证会上发了言……似乎大家都在听

着……当我回到自己座位上以后，后面有人说，“真想不到，他多激动啊，可见他说的话是真诚的……”

我觉得，我并没激动，不过说得确实真诚，尽管没能把什么话全都说出来。

在结束关于摆脱克格勃的谈话时，我要引用 1992 年 2 月 4 日我在俄罗斯议会讲坛上发表的最后一次讲话。谈话就要结束了，但是并没有摆脱。摆脱仍在继续。

那么下面就是我的讲话。“敬爱的代表们，我感谢你们的邀请。不过必须强调，我在这里发表讲话，并不代表任何人，而是说出我个人的意见。

“建议我回答两个问题。

“第一 克格勃在准备和发动 8 月 19—21 日政变中所起的作用。我对列夫·亚历山德罗维奇说，我自己没有专门研究过这个问题，不过完全显而易见，克格勃的领导在这里起了重要的思想上和组织上的作用，后来却消灭了一切痕迹。然而，我不认为我能对某些人个人的行为作出判断。

“这是检察机关和法院的事。进行侦讯时，我已经提供了我的证词。此外，我过去认为，现在仍然认为，应该仅限于追究委员会最高领导的责任。

“如果简短地说，那么我赞成斯杰帕申委员会对克格勃扮演的角色所作的评价，不过我认为，重要的是，要更深入地研究造成反宪法政变形势的起因。

“也许，这不是今天听证会的主题，不过……照我看，起因应该在这种现象里找寻：在一个正在瓦解的社会主义的统一基础上，上层建筑出现了我们社会所不熟悉的双重政权——在旧的中央集权的党国机构与新的民主政权机构之间产生了矛盾。我们是沿着令人悲痛的、毁坏性的道路来解决这一矛盾的。不是进行有组织、有控制的改革，使军事化的社会经济过渡到社会市场经

济，而是开始了一个对抗和破坏的过程……

“苏共、克格勃、军政训练所和军队正统最高领导的反动政策在这里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们从一开始就拒绝妥协，选择了一条拖延和强行反对的道路，阻挠经济、国家和社会客观上不可避免的民主化和权力分散。

“结果，从1月份维尔纽斯事件开始，经过一系列冒险行动之后，达到了顶点——八月叛乱。

“作为一个独立的、除了苏共中央不受任何人监督的、极端封闭的机关，克格勃拥有广泛的权力——从秘密政治监视到执行‘特殊任务’——被苏共领导直接利用来实现它的这种政策。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党国机构的失败，各民族间关系紧张，经济雪崩似地崩溃，看来已经失去有控制改革的最后机会了。

“总之，仍在继续积聚的社会爆炸的潜在力量目前暂时还没有使任何事情停止下来。局势已经变得比八月里危险得多。

“传统上安全问题只有两个范围——外部的（地缘政治的）和内部的，与此同时，现在突然出现了完全没有受到保卫的第三个范围——联合体内部的安全问题。除了宣言，联合体内部完全没有合法的、有组织的机构，而在正在萌芽的侵略主义的背景上，民族爱国主义搞出什么‘即兴创作’来的危险，是确实存在的。在俄罗斯，利用经济崩溃造成的困难，从惊恐中恢复过来的新布尔什维主义和与它联合起来的沙文主义的假爱国主义正开始积极地表现自己。它们没有提出任何积极的东西，却在等待着自己的时机。对于它们来说，情况越糟越好。

“如果我们承认这种情况，那么第二个问题，关于联邦安全机关的地位、职权以及建立这样一些机构，以保证联邦安全机关不可能参加反对合法政权的阴谋活动，这一问题就会退居次要地位，而把执行安全政策提到首要的地位上来。真的，如果主要是‘保证不参加’，那么这个问题是容易解决的。最‘有效的’可能

是东欧或波罗的海沿岸共和国的办法。

“完全解散旧的，建立不受‘契卡主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影响的新安全机关。然而我认为，这种办法原则上是不能接受的。

“这也是布尔什维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相反的布尔什维主义。这是过去的重复，是没有前途的。

“问题比对待以前克格勃的态度还要广泛，还要深刻。我深信，必须与布尔什维主义和契卡主义思想体系进行斗争，然而同时应当小心谨慎地对待每一个人的权利。如果说，没有镇压，大概甚至不可能建成‘我们这种类型的社会主义’，那么，要采取歧视性的措施，尤其是意识形态方面的歧视性措施，也就绝对不可能建成文明、自由、民主的社会。

“然而，在回答第二个问题的时候，我倒想遵循一个改革时期没有利用过的、大家都知道的公式。在‘改革以后’的这个时期，也要慢慢来。首先不容拖延的是：

“1、制定共同的安全概念。这个概念要确定新的轻重缓急，而且要以国际、国内经济、政治稳定的成就，以俄罗斯的领土完整和独立为基础，而取得这些成就的途径不是靠恐吓、暴力和镇压，而仅仅是在信任的基础上，也就是说，要在有各种形式监督的民主政权的公开性的基础上，取得这些成就。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时间。这些概念要现实地反映安全系统和安全法律基础建设所必需而且可能的每一阶段的实际情况，放弃‘政治上的考虑’，而依靠法律，而且仅仅依靠法律。但暂时我们这里的法律真空却日益加强了。

“2、签订联合体各国集体安全条约（有一个时期已经拟好条约草案）。对于人们来说，再没有什么比保存联合体更重要的了。建立特工机关工作的协调机构，建立统一的情报系统，并且一定要有根据参加者的职权范围严格规定的相互干涉的手续。

“签订各共和国间进行合法帮助的协议。

“3、制定和通过‘一系列’经详细研究过的特工机关活动的法律基础。

“正是要详细研究过的……这里不容许有像有纪念意义的关于克格勃机关的法律那样的‘法律宣言’，因为这种‘法律宣言’保留有民主国家不能接受的、侵犯人权的工作条例。

“首先必须制定这样一些法令，明确确定安全的概念，明确确定什么是国家机密和商业机密，对保护情报、截获情报、特工机关的工作和侦查活动、克格勃的档案、对个人侦查和调查等等，规定出详细办法。

“关于国事犯罪的法律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这样的法律里要简单、明确地写进煽动民族不和、沙文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责任。

“4、对特工机关建立无所不包的、然而负责的、以法律为基础的议会监督，但是不能对其业务工作进行任何干涉。

“5、现在不是对特工机关进行机构改革，就能确保公民、社会和民主的安全。

“不如说，恰恰相反。这种部分改革本身就会造成危险。瓦解干部，使他们养成无所事事、不负责任的习惯，这会导致失去职业特工人员（不是指我自己）。

“应当停下来了。

“如果终于成立了两个部（安全部和内务部），情报机关，特种通讯部门，边防军，保卫高级领导人的保卫部门，那么是该让它们安定下来的时候了，让他们有可能习惯全新的环境，开始工作。

“我深信，更深入地进行分解和权力分散，这恰恰是安全的保证，保证它们不会参加阴谋，这些和另一些安全机构（军事情报机关，海关，还需要建立强大的税务检查机关）的领导人一定能制定出各种协调机构所必需的工作办法。

“在结束讲话的时候，我想再说一次，我认为，主要危险在另一方面……”

“到目前为止，在还没有经过详细研究制定的私法，在帮助小企业主、保护他们不受新的贪污分子和旧的社会主义垄断专横迫害的机构还没开始工作的时候，谈论企业家的活动，最多不过是越来越使人气愤的空谈而已。”

“到目前为止，在我们还没有利用我们剩余的潜力管理国家经济，以改变它的不人道的机构的时候，在我们还没有采取措施真正刺激农业生产和消费品生产的时候，任何最强大的职业化的安全机构，甚至是待遇很高的安全机构，都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我相信，它们不会参加准备和进行反对合法政权的阴谋，但是也不会保证政权和社会的安全。”

当我离去的时候，在存衣室工作的妇女们祝愿我成功和身体健康。谢谢她们……愿大家成功。我们只有大家同心合力才能获得成功……摆脱克格勃将有助于这一点……但是这一切不能一下子全都做得到。

## 十二、旁观者的看法

苏联公民是极权社会的产物，而且暂时也是它的主要支柱。我只能祈求命运，当走出这一历史死胡同的时候，不会同时发生我们暂时还无法想像的巨大的震荡。这就是我——一个进化论者，为什么是一个改良主义者的原因。

——安德烈·萨哈罗夫

旁观，这是个不好的态度。不过一切都是相对的。

我不在政府机构工作，不为这些或那些日常活动、决定、指示、声明负责，已经是第三个月了，而在完全是不久以前，我每天的生活中都充满了这些东西。但是，我不是“从一旁”来观看生活。根据我自己的情况，我知道，当权者中没有哪一个承认他不了解生活。不过生活毕竟不完全是他从当权者的高度所看到的那个样子。

请你们仔细阅读作为这一章题辞的那些话。我们自己走进了一条合乎规律的历史的死胡同，题辞中那些话透彻地说明了走出这条死胡同的全部实质和令人难以置信的复杂性。问题不仅在于错误的思想体系，不仅在于苏共，而在于我们这个与任何其他社

会都不相同的病态社会的每一个公民。“存在决定意识”。“社会主义”依赖性的存在形成了我们畸形的、缺乏首创精神的、平均主义的意识。不过现在我们怎样才能“用这种意识来意识到”另一种“存在”的必要性呢？怎样才能避免暴力和革命，怎样才能避免震荡？而这种震荡的规模，连科学院院士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答案就在题辞的那些话里。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这才是可能的：如果新的、或经过乔装改扮的、旧的“人民救星们”，共产主义的、民族主义的或其他极权主义的代表们在我们每一个以前的（！）苏联公民中找不到支持者的话。我们在成为完全不同、自由和独立的人的时候，同时应该仅仅在一个方面获得统一。不再靠别人的智慧生活。每个人都意识到，在走出死胡同的这个新的历史转折关头，困难是不可避免的，并且表现出从事诚实劳动的意愿，必须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人。但这还不够。至少还要有一个合理的纲领，一个负责的、正直的、获得信任的政府。似乎俄罗斯已经有这样的政府了。但是有没有纲领呢？

我本人从来也不认识安·德·萨哈罗夫。我不希望让人怀疑我“混入”他的战友的行列。可惜，我从来也不是他的战友。但是在主要问题上，我同意他的意见。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共产主义”，而是某种更高级、更发达的：工业化后期的民主社会，这种社会里的人比任何没有主见、像机器人一样的人都更高尚。为此，我们需要进化。现在也需要进化，尽管我们把自己赶进了一场最激烈的“走出危机的危机”，这场危机已经变成了崩溃。然而我们，可惜，却按照布尔什维克的传统，玩弄革命的词句，没能站稳脚跟。“改革，这就是一场革命”。破坏不是建设。破坏是容易的，尤其是不正常的和历史上注定不可避免的破坏。不要再使用暴力了，一切都会自己瓦解。不过以后呢？

是时候了，应该承认，我们——“改革者们”——没能深入

考虑，我们的民族精神背负着独特而沉重的过去，多少个世纪以来这种精神在各民族间扩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样才能回到更有效的发展文明的道路上来。

怎样才能把一体化的优越性、社会计划的经验与建立有效的市场自我调节的经济结合起来。然而，唉……叹气是无益的。显然，我们没能制定计划，并实现国家和政治的上层建筑与基础——经济，所有制——步调一致，同时进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危机不是米·戈尔巴乔夫引起来的，而是他揭露的，并试图解决它；在这场危机爆发以后，在上层建筑领域里开始了一场斗争。不是进化，而是“社会主义的”党国旧机构和“民主主义”新力量之间的斗争。在叛乱之后，“新”力量胜利了。遗憾的是，当然啦，由于我们的民主主义很自然地还不成熟，当它掌权以后，就有点儿变了样。民主主义的特点被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有些地方还被傲慢的主观主义给冲淡了，变得模糊了。

但最主要的是，这场上层“革命”是在实际上并未改变的旧经济基础上进行的，而这个经济基础是集中的，超级一体化的，垄断的和疯狂军事化的，“社会主义类型”的。这份遗产，新的当局是无法摆脱的。但是这里有一个难题，它已经足够令人信服地表现了出来。这份“遗产”与新政权的市场思想并不怎么合拍，甚至是根本互不相容。

思想也和政府一样，可以迅速更换。某些人甚至希望十分迅速地更换。但是不能改变。上帝保佑我们，千万不要这样“解决”问题。经济应当改变。但是，不管什么人多么想要迅速改变，迅速改变却是办不到的。无论是“改革”，还是“叛乱”，甚至“休克”，都无济于事。

必须在思想上作好足够的准备：这将是一个长期和困难的过程。因为建成“社会主义以后”的市场经济，这是一个谁也不知道的、难以想像的困难任务。在这条走向繁荣的道路上，必然会

出现生活的暂时恶化，而这是由结构发生根本变化、心理和社会及生产“竞赛规则”骤然改变而引起的。希望设法使这个时期尽可能不要拖得太长，这是个好的愿望。然而，可惜，这种愿望忽视了社会衰败的深度。不如说只会带来损害，而不会加速这一进程。

不能越过界限。政府不能像那个茨冈人一样，他嫌马吃饲料太浪费，开始让它戒掉这个浪费饲料的习惯，起初似乎十分顺利，然而在这以后，他的马终于死了。

从年初开始，物价几乎涨了十倍，而这并没有引起社会爆炸，政府为此感到高兴，是可以理解的。人们为了“光明的未来”勒紧裤带（商品流通减少了一半），在忍耐着。我不知道，也许他们也能忍受住物价新的飞涨，而在政府实现它的计划，“放开”能源、牛奶和面包的价格以后，必然会引起物价飞涨。从技术观点来看，这是顺理成章的。从社会后果来看，政府可能要冒风险。但是政府不可能是残酷无情的。它没有道义上的权利，以人民的贫困化为代价，来解决即使是重要和复杂的，但毕竟是技术性的任务——使预算保持平衡。请让人民喘一口气。政府曾许下诺言，要在 1992 年 4 月前消灭预算赤字，即使这一诺言完全不能兑现，让政府丢脸，那也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无论是今年，还是明年，这样的诺言都是不现实的。

我真心诚意十分敬爱的殉难者叶戈尔·盖达尔立刻宣称，他并不赖在自己的座位上，他什么也不怕；然而他应该不仅考虑，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面前他是否会丢脸，而且应该为与他相比并不是那么悲观绝望的、自己的同胞们考虑考虑。

政府“诚实地”预测，会有几百万人失业，却只字不谈自己采取什么行动，怎样来避免或至少减轻造成这么多人失业的后果；难道仅仅希望成为勇敢和正直的人，就能使政府摆脱对这几百万失业者应负的责任吗？一般认为，政府“只负责宏观调控”，

而对具体环境里具体个人的社会保障，是地方当局的事，这一论题并不错。原则上讲，这是一个正确的论题。但不是对于我们现在这个混乱的半社会主义状况来说，在目前的状况中，既有“宏观的”，也有“微观的”以及一切其他的“份额”。不管我们怎样自作聪明，怎样耍滑头，竭力要作客观和正直的人，这一切都很像极普通的、动物的叫喊：“各自逃命吧！”这当然纯粹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精神的市场口号。然而不幸的是，并非所有人都认为，他们能够逃命。真的，他们逃不了命。而周围，无论是旧的，还是新出现的“祖国的救星”——形形色色的——还没有绝迹。甚至连尼古拉·雷日科夫的部长会议机关奴仆中最不受人欢迎的克雷勃将军们，也拼命想要扮演“以祖国的名义”拯救人民的民族爱国主义者的角色。

是的。由“指令”向“市场”、由极权主义向民主主义、由一种国家思想独霸向个人无可争辩的自由过渡，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认为，按照政府选择的公式进行的这种过渡已经不可逆转，那就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一分钟也不能忘记，“社会主义”经济仍然存在，而且它的全面瓦解还不等于建成市场经济。

还有一支被民族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分裂的庞大的军队，它的社会地位和精神状态都是灾难性的。不能让假爱国主义者的“关怀”来操纵它的命运。

因此，赶快并不意味着向前推进。某些“理论家”要求采用皮诺切特将军的方法，但是在俄罗斯，用他的办法不会建成一个新的文明社会。有可能发生的是反共产主义的布尔什维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恰恰相反。大俄罗斯“思想”，谁也没有。就连它的伟大的创始人也没彻底懂得，在我们的条件下，大俄罗斯“思想”会蜕变为沙文主义，会到其他民族的代表中去寻找敌人，最可能的是，会变成通常的法西斯主义。

在一个有复杂的悲惨历史的多民族国家里，曾经受到镇压的民族有忘不了的屈辱，在一个没有得到大家一致承认的边界、法律和宪法的国家里，在一个塞满各种武器的国家里——既有各种裂变物质、化学的和细菌的产品与设施，又有常规武器和爆炸物——如果现在忽视所有这一切，匆忙行事，那么人的生命可能就成了问题了。

如果说在改革年代里丧失了时间，那么这并不意味着，现在急急忙忙，就可以把失去的时间追回来。不该着急。着急，只是让人觉着好笑。尽管人们顾不得笑。“过去不好，现在什么也不是”这说的是实话……一切都完全没有信心，完全不确定。人们不想要这样的诺言：“到秋天”或者两年以后会好一些，而想要明确的、提出论据来的、合理的措施的纲领。

这才是必须急忙去做的。应该炸开封闭的怪圈。得不到人民的支持，政府就不会有成就。而没有成就，就得不到支持。要炸开这个怪圈，暂时只能用言辞，用人民理解和明白的逻辑。现在一切都仅仅靠对俄罗斯总统鲍·尼·叶利钦的信任来支持着。作为一个人，作为个人，人们信任他。这并不算少。但也仅仅是……

有一次我曾参加米·谢·戈尔巴乔夫那里一伙很有学问的人的辩论。争论的问题是，这两个时期：“改革时期”和“叛乱以后的时期”有什么区别。我说，它们没有任何区别，却有共同的东西。无论是“改革”，还是改革以后出现的情况，都不是以明确的政治纲领，尤其不是以明确的经济纲领为依据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不同意这一点。也许，我说得也不对。不过无论是改革的时候，还是现在，我都不知道，有这样的纲领。一般的、健全的民主原则，过去是有的，现在也有。但这还不够。尤其是对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来说，现在这个国家需要找到从这个“社会主义”中走出来的出路，而且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不能滑到野蛮时期去

这是困难的。这也是历史上的第一次。但是我不怀疑，我们大家同心协力一定能找到道路。主要的已经做了，做出了选择。目标是有的，而走路的人一定会战胜道路。

目标是——为无愧于 21 世纪的人的生活创造条件和机会。进化性的制度改革是手段。必不可少的、必须的条件是稳定。可见，需要有一个稳定的政策。

在地缘政治中，这就是戈尔巴乔夫—谢瓦尔德纳泽最近几年执行的方针的连续性。双方面和多方面的行动，在合作和信任的原则基础上积极参加国际团体各种学会的活动。这里，与我们一些传统的问题存在的同时，出现了比以前复杂得多的全新的现实。然而可以认为，这种环境是最令人满意的。

现在不稳定的主要根源，不管这是多么可怕，是在独联体各国、昨天的“兄弟们”的相互关系之中。

我们面对的情况是：任何经济改革，都会主要由于在独联体范围内没有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而遭到破坏。要进行经济改革，需要至少知道，是在什么区域里，在什么地理边界之内实行改革。这个问题却一点儿也不明确，因为在保留统一的生产基础设施、货币系统、国家边界等等的情况下，独联体的每一个国家都在制定和实行自己的稳定政策，而不怎么注意其他国家在做什么。这种情况是荒谬的，孕育着使经济完全陷于瘫痪的危险。除了这些，再加上在法律（而且每个国家都急欲改变以前的法律）、海关、税务、银行、信贷政策上，都不互相紧密配合。

独联体成员国首脑会议远远背离了去年年底表现出来的、至少是表面上的协调一致。不知怎么，看不出经济政策问题在议事日程上占据优先地位。甚至就经济问题通过某些重要决议的时候，谁也不关心这些决议是不是得到执行。没有实现这些决议的任何机构。一直还没有联合体的协调机构。总统们在进行最高级会晤时制定的决议并没有约束力，需要有各国政府和议会的文件

来予以充实和巩固，而政府和议会可能并不急于这样做，或者是有旁的观点。

联合体显然并不是从解决这些问题开始，不是让全世界动手把所有国家从经济泥潭中拉出来，好像许多领袖关心得多的是，把注意力放在民族的自我肯定上。结果我们成了许多具有虚荣心性质的冲突的见证人：围绕着军队、舰队、战士誓言的文本、大使馆和国外的其他财产、瓜分文化珍品以及关于过去的争论，发生了无数争吵。我相信，这些问题可以搁置起来，等到比较适当的时候再来解决。

可以想像得到，联盟的解体并没有使各民族的关系走向和谐。苏联以前的各加盟共和国获得独立，并没有推动它们成为主要民主价值的绝对化身。这再一次证明，从民主主义的观点来看，具有首要意义的是改变社会关系，而不是改变国家组织的形式。社会民主化完全不一定需要通过国家的分解才能实现。恰恰相反，国家独立本身完全不是民主改革取得成就的保证。

要知道，目的并不是要分成一些单独的国家。重要得多的是，要使每一个共和国里的人和社会都从国家的强制下解放出来，由人民代表机关限制行政工作人员的权力，发展公民自己的首创精神和自我管理，尊重人权。

哪里把“我们的”、“主要民族”这些思想放在首要地位，那里的那个民族国家组织就有了明显的反民主的性质。“我们高于一切”，这已经不是合理的民族感情了。对于我们来说，幸运的是，各共和国的主权化基本上是依靠民主力量。然而在联盟的废墟上成立的某些国家里，我们看到，“民族主义思想”明显地占了上风。在波罗的海沿岸三国，不属于主要民族的人要取得国籍，甚至相当复杂，只是根据民族原则或定居原则，使这些人变成了“二等”人。我深信，民族极权主义丝毫不比任何其他极权主义好。

关于独联体内各国的相互关系，除了我已经说过的以外，我不能再提出什么别的来了。应当遵循真正友好团结的原则，在某种程度上以欧洲共同体的模式为方向，建立一些富有生命力的、经常起作用的独联体协调机构。各国首脑不久前在明斯克和基辅达成的关于建立某些这种机构的协议，带来了相当一部分乐观因素，但是这还显然不够。共同利益的范围要大得多，所有这一切都应受到联合体各国的重视——从关税政策到各国之间的法律仲裁，而主要的是，建立协调各国外交和军事活动的联合体机构。

稳定政策的第二个组成部分，是经常关心对人的社会保障。现在，俄罗斯政府好像终于至少开始承认自己这个最大的错误了。社会保障措施需要与受严格限制的预算拨款协调一致，然而绝不应该以此为理由，对几百万人的命运置之不理。除了纯粹道义上的因素，不能看不到，在社会缓冲机制上节省，会使改革本身无法继续进行下去。所以，要比改革先行一步并与改革同步发展的社会保障措施，应该不仅被看作改革的一部分，而且要把它看作改革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第三，军队。绝对排除军队即使只不过是试图影响政治的可能性。

照我看，保留在统一指挥下的各独立国家的武装力量，最符合联合体的利益。建立各国完全独立的军队，而其中某些国家之间的关系又远不是那么和谐，这样的步骤会增加军事冲突的危险，而不是保障安全的方法。幸好，在战略力量方面，已就统一政策和统一指挥问题达成了协议。然而，其他各种武装力量，情况却复杂得多。这不仅使人对独联体实行有效的国防政策的可能性产生怀疑，而且使实现已有限制和裁减军备的国际协议和缔结新的国际裁军协议，明显地变得复杂化了。至少是因为，这些协议的主体，数量明显地增加了，而且部署在它们领土上的军队的管辖权又是各不相同的。

在围绕着瓜分军队进行的争吵中，实现军事改革这样一些不久前的中心问题已经退居次要地位。这样的改革是迫切需要的。改革的基础应该是放弃以“数量”保证安全的立场（“越多越好”），而把重点放在质量参数上。无论是就武器的战术技术条件来说，还是就人员的训练水平来说，都是如此。应该最终确定武装力量配套的原则，向职业化军队的目标前进。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高度的职业化，提高兵役在物质上和社会上的威望，使部队里的精神心理状态正常化，而就远景来看，也能给社会带来直接的经济上的好处。也就是说，社会将有更大的可能来支持军人和他们的家庭。不过现在也应该把支持军人和他们的家庭放在优先地位。现役军队里的军官和准尉应该比现在少得多，然而他们需要有这样的社会条件和社会地位，让他们谁也不会感到羞愧。

稳定政策，这就是经常以取得公民的和谐为方向，促使有能力和负责的运动、政党、工会、企业家联合会以及任何其他能促使社会团结的组织进行改革。必须为这些组织创造新的合法环境，旧的环境简直不符合公认的世界标准。

特别重要的是，要建立调节劳动关系和企业家活动的国家机构。在各级国家机关建立由工会和企业家联合会的代表组成的常设委员会，目的在于保证三方面的社会伙伴关系，将是十分有益的。由法律规定，建立工会和企业家联合会对国家政策施加影响的机构，或者如实地说——使院外活动合法化，这样作也并不是多余的。

在我们这个独一无二的社会里，如果我们容许最近甚嚣尘上的议论成为现实，“禁止”以前党的机关工作人员、苏共党员“工作”；取消上级任命的干部资格”那就不可能使公民获得和平。俄罗斯不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苏共也不是德国共产党。而且与其说问题是在于这样做违反最起码的民主原则，违反人权，不如说这必然会给社会造成损害，更不用说这种措施不符合稳定

政策了，因为它不是促进必需的联合，而是会加深分裂。

最后，稳定，这就是法律的胜利。目前在法律方面却是明显的失败。

必须坚决和始终不渝地消除法律真空，虽然法律真空的原因是完全可以说明的，然而法律真空的时间却已经拖得太长了。

政府的权力生效缓慢，议会还没开始讨论至少在一年前就应该通过的法律。政府不得不作出一些往往又不得不取消的决定。由于围绕新宪法草案争论不休，至今在俄罗斯起作用的仍然是旧宪法，这种情况是完全不能容许的。

我认为，采取使政治制度稳定的措施，恰恰是应该从通过新的基本法开始。没有基本法，政府的任何创举都会使它走进法律的死胡同。

在俄罗斯，执行权力的垂直系统是脆弱的。以前，主要是在各共和国和中央之间进行决议战和法律战，现在这种战争转移到以前的各共和国自己内部去了，各州和以前的各自治共和国越来越明确地宣布扩大自己的特权。政府试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整顿纪律，被看作新中央的独裁专断。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还是要实行合理的地方分权。

1989—1990年选出的代表机关和稍后组成的执行机关之间的冲突，仍然十分尖锐。未必能说，苏维埃的组成完全反映政治力量分布的现实情况和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情绪。

为了使议会活动职业化，必须不惜拨出经费，不能容许代表的职权与任何其他工作结合起来，而现在，这种情况却屡见不鲜。

如果权力机关本身不采取最坚决的措施根除自己队伍中的贪污受贿，就不可能加强权力机关的威信。贪污受贿，这个深入到以前党政机构中去的祸害，不仅没有消除，而且好像变得更加根深蒂固了。贪污受贿比公开的反对派更能炸毁任何政权，埋葬任

何改革。不能容许那些为社会公正和政府“纯洁”而斗争的口号，那些在许多方面导致民主主义掌权的口号，被抛到九霄云外。

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不幸受到民族利益钳制的刑事司法机关，必须进行改革。除了大家已经十分清楚的干部问题和物质问题，国家，而且只有国家，应该尽快予以解决外，这里还有一个政权和社会对待法院、检察机关和民警机关的态度问题。随便什么人都能破坏这些机关的威信，这种情况应该予以制止。不能最初是政权禁止示威游行，后来因为破坏禁令的人中有人受了伤，又指控执行这一决定的民警机关。不需要再一次向“犯罪宣战”，然而应该与犯罪开始斗争了。

至于主要手段，获得福利的基础——经济改革，那么这些改革终于开始了，这就已经不错了。骂改革，批评改革，成了“好风度”的准则。所有人对改革进程都有自己的看法。这是好的，但是我个人并不认为，提出批评，就一定是认为自己正确。也许，是我错了。然而不容许现在就提出俄罗斯政府辞职的问题。应当有耐心，给专家们一些时间，让他们自己认识清楚。然而我深信，修正是不可避免的。

改革的逻辑必须公开和十分明确。政府成员用许多不同的声音发表“不得要领”的议论，与其说会加强信任，不如说更会使人迷失方向，惹人生气。而现在，当距离结果还十分遥远的时候，除了令人信服的、简短而明确的言论，没有别的办法能够获得信任。

大家都已经明白，市场不是社会主义，根据命令，靠强制的办法，是建立不起来的。但是应当在企业家活动、市场关系自我形成的自发过程和把指令性经济改造为自由经济的计划管理之间，找到一个不走极端的折中办法。

有一种理论说，需要限期实现私有化。这是正确的，这里让

我感到困惑不解的是“限期”这个词。应该限期做到的，是严厉制止“背阴里的”，正如现在人们所说的，“捞一把活动”。不过我还是深信，即使在私有化得到社会意识支持的情况下，私有化过程也将是极其困难和长期的。我们怎么也没能真正开始实行“小的”私有化（商业，服务行业，小企业）。基本生产资料，首先是土地的所有制问题，直到现在甚至还没有在原则上获得解决。甚至在非黑土地带、西伯利亚，这些没有土地不足问题的地区……土地所有制问题也没有解决。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这方面，暂时不要强制实行大型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这里更重要的是把它们划分为小企业，取消它们的垄断权，为它们的工作“商业化”制定严格的办法。像雪崩那样“按照计划”实行私有化，如果不是把我们引向一场新的社会主义革命，那么也会导致名副其实的社会爆炸，尤其是如果大多数居民都是极其有条件地参加私有化的话。

我们年轻而有学问的政府熟知主张自由企业家活动的理论家们的理论，“背得滚瓜烂熟”。当然，实际上全部经济都需要非国有化和私有化，这没人反对。然而由原则出发，只按照理论的字面意义，机械地这样做，而不考虑实际的经济结构和经济状况，而主要的是不考虑社会的心理特点，那至少是不明智的。

当然，改革缺乏统一计划，改革的各个不同方面没能步调一致。在税务系统还没有组织好的情况下，我们就急于实行市场关系——这是政府最大的错误之一。在没有多少能够发生作用的税务检查机关的情况下，把税率提高到会压制生产活动的程度，这就造成了寻找各种办法偷税漏税和隐瞒自己收入的动机，并为这些违法行为开辟了广阔的活动天地。与进行正常交易和在银行里转账相比，广泛的“以物易物”，把没有审核过的钱装在信封里亲手交给对方，成了更受企业家们欢迎的一种结账形式。也许只是在纸面上才有税务检查机关。至少，这仍然是“社会主义的”，

而不是市场经济国家的税务检查机关。

缺少有效率的税务系统，会有深远的消极社会后果，使我们无法解决过分敏感的两极分化问题。只有这样的税务制度能够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不要破坏对劳动和企业活动的刺激因素，另一方面又要为建立社会缓冲机制提供必要的条件，消除社会上这样一种敏感意识：“富者愈富 穷者愈穷”。

最近在俄罗斯政府代表们的讲话中出现了不少我们以前没用过的宏观经济政策词汇中的术语，这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然而最关键的词汇之一——生产，却不见了，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国家统计委员会的数字，尤其是生活，让人注意到这样一些趋势，在这种趋势的背景上，政府关于稳定卢布对美元行情的乐观主义议论，看上去不过是对头脑简单的人虚张声势而已。当生产下降，而货币继续发行的时候，怎么能够使卢布“巩固”呢。货币发行的速度相对降低，只能说明通货膨胀的速度有所下降，但无论如何也不说明卢布已经巩固。然而，要知道，连这种“降低”都还没有呢。

在生产者处于垄断地位的情况下，提高价格不会成为增加生产的刺激因素，而会成为减少生产的刺激因素。收入增加，而且数量很大，不过不是在生产者中看到这种现象，而是在进行重新分配的各个部门里。

然而，尽管有这一切错误和差错（只有不工作的人才不犯错误），鲍里斯·叶利钦的政府还是应该得到支持。至少是因为，他没有多少可供选择的余地，非此即彼，形势是十分严峻的。

但首先政府不妨自己对其他最高权力机构先给予支持。

俄罗斯领导中的分歧如此明显，有时好像觉得，似乎总统、副总统和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别人就不说了，属于几个不同的“班子”。

当然啦，这种“旁观者的看法”可能会让人感到气愤。“每

一个观战的人都认为自己是战略家”。有很多问题，对它们还可以再议论议论。不过，为什么呢？

这些“议论”、建议已经绰绰有余了。1991年5月31日，当选举俄罗斯总统的竞选运动正在紧张进行的时候，我曾经回答《共青团真理报》提出的问题：

“出路何在？”

“我想，出路就在于回到有健全理性的政策上来。我们的许多不幸都来源于不会认识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过渡时期的辩证法。有些人什么也不想改变，另一些人却要改变一切，而且越快越好……我认为，像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不需要剧烈的运动。需要破坏的时候，才需要剧烈的运动，而破坏，戈尔巴乔夫已经做到了（不错，后来开始动摇，急忙退到一旁）。后来叶利钦分析明白‘昨天的’立场，接过了接力棒。不过是该考虑建设的时候了，要把旧的和新的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以免瓦解。

“您认为我们还没瓦解吗？”

“几乎瓦解了，特别是在经济领域。在这方面，我们的情况也是匆忙和延误的罕见的混合。应该为调节创造条件——不，不，不是调节市场，而是对向市场过渡进行调节。但是我们错过了时间。在已经有那么多问题的情况下，又出现了一个代表们院外活动的问题。也许这说得太严重了，不过现在地区代表、政治运动的代表、社会集团的代表，都在把那条很短的被子往自己身上拉！许多时间都在争论中过去了：我们背叛理想，却没有背叛……无论谁对这都完全不感兴趣。应当做有益的事，哪怕这会触犯意识形态的圣牛<sup>①</sup>。

“还有：应当摆脱那种旧病——不尊重异己思想。我们过去是怎样呢？如果有人伸出头来，那么头就飞走了——在最好的情

<sup>①</sup> 印度教徒把牛看作神圣不可侵犯的圣牛。这里是借用。

况下，是飞到巴黎去<sup>①</sup>。异己思想是财富，是发展的必要条件。什么都该做，不过头脑不要发热。

“据说，帕夫洛夫是正确的，至少在这一点上：他渡过波涛汹涌的河流，到了对岸，然而其他人暂时还都是观众……”

“到了对岸吗？这种改革在许多方面都是不正直的，它的一切后果都转嫁到集体，转嫁到企业身上去了，而企业的条件是各不相同的。帕夫洛夫如果今后继续这样做的话，他将会得到的是社会爆炸。这种政策是无效的——他不是已经开始提高工资了吗，这也就意味着，他已经站在超标准的通货膨胀的门坎上了……我看到的仍然不外是健全的思维能力：价格应该放开，但不是放弃最低限度的保证，放开一切价格。应该保护人们，不要让他们承担物价高涨的后果——不过不是保护所有的人，如果同时进行私有化，那么大多数人会自己保护自己。应当支持农场主，但是不能容许建立小型商品自然经济。应该对外国资本敞开门户，而不只是建立只能挑起区域间矛盾的‘自由经营区’。不能听信那些用‘出卖俄罗斯’这种蠢话吓唬人的人，不过要把更大的希望寄托在自己的力量上，而不要更指望‘外国会帮助我们’。应当支持企业家的活动，但是不容许非法致富。等等，等等：辩证，深思熟虑，循序渐进，协调一致。

“您认为，在我们进行的这场猛烈的政治斗争中，这种‘调解人’的观点会取得成就吗？”

“这要看情况了 不过我没有别的观点。”

有一次我在大不列颠驻莫斯科大使馆壁炉边与赫德先生和一向好客的主人布列特韦特先生几乎谈了三个小时。看来，赫德先生谈累了，他说了大致如下的一段话：

俄罗斯人是罕见的人。我有这么一个印象，现在莫斯科的许

<sup>①</sup> 指驱逐持不同政见者。

多厨房里，正在最高理智的哲学水平上讨论一大堆当前最重要的问题。但是只要到了早晨，要丢开哲学去做正经事的时候，讨论的一切都毫无结果。

我想，这是个正确想法。遵照这一想法，我这就要结束这本书，去做正经事了。